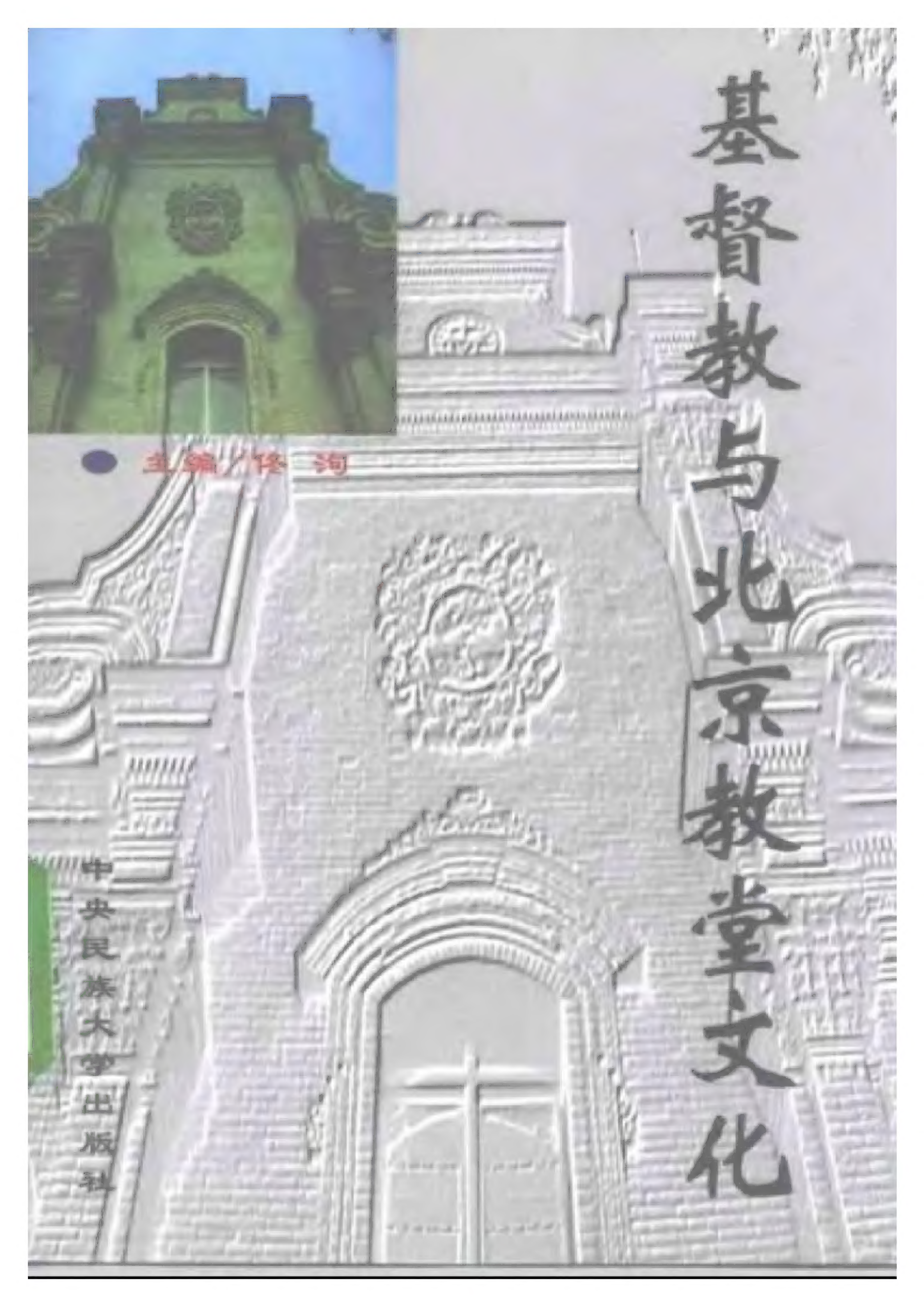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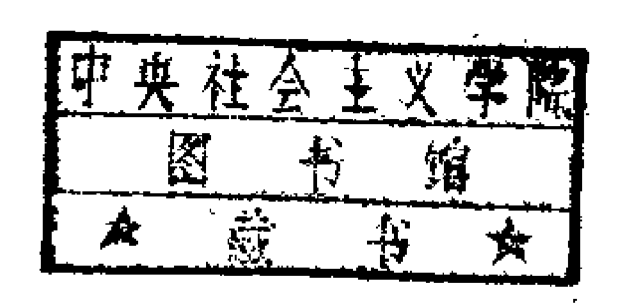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
主编/佟洵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

佟 洵/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佟洵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9
ISBN 7-81056-273-8

Ⅰ.基… Ⅱ.佟… Ⅲ.基督教史-北京 Ⅳ.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5995 号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

主　　编：佟　洵
责任编辑：郑玉琴
平面设计：秀琴工作室
责任印制：丁燕琦
出 版 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国际互联网网址：http：//cunlp.com.cn
　　　　　电子邮件（E-mail）：nckpm@public.bta.net.cn
　　　　　电话：68472815 68932751 传真：68932447
印 刷 者：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
发 行 者：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5　插图 8 页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56-273-8/B・3
印　　数：5000 册
定　　价：26.00 元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

傅铁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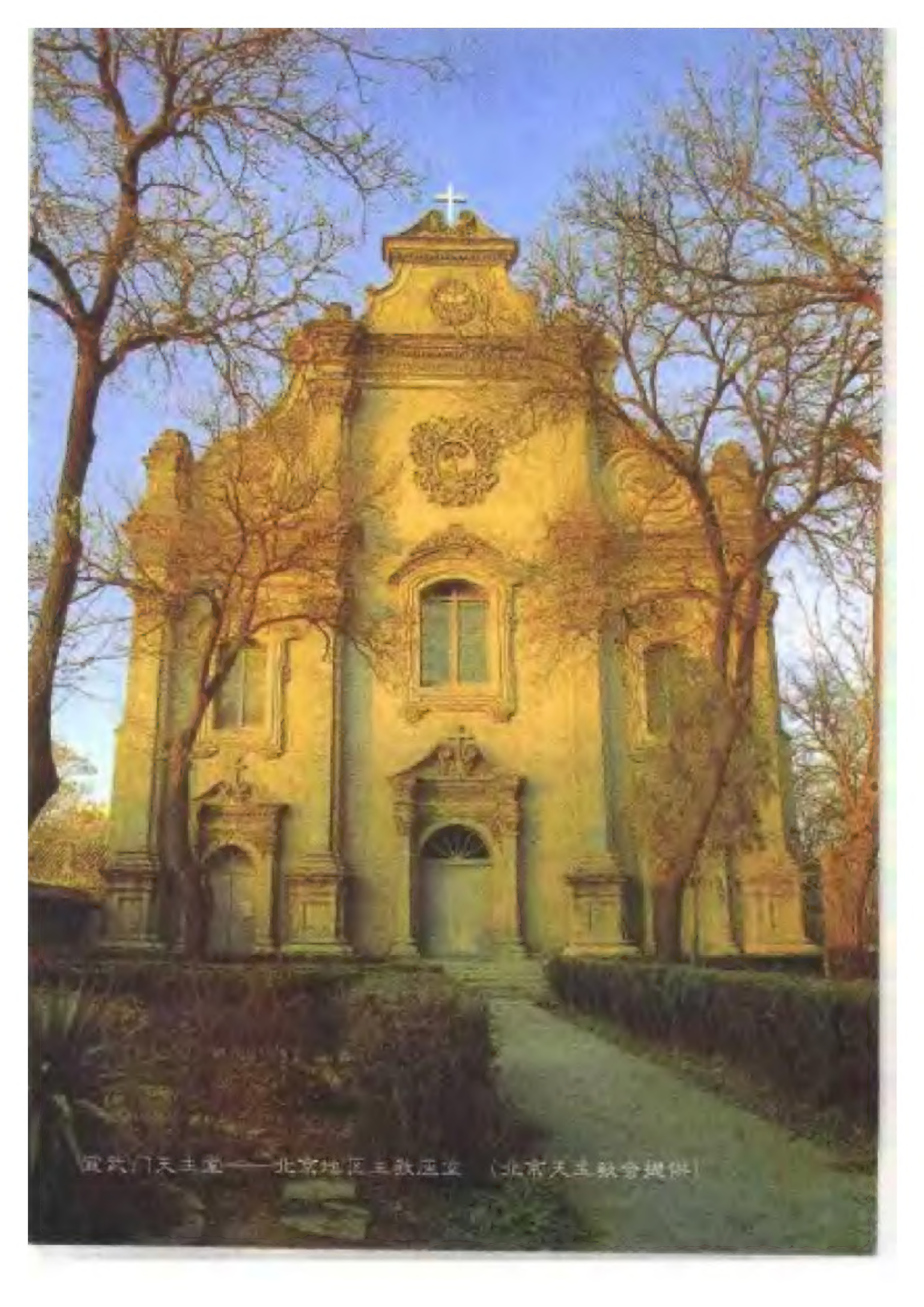


佟洵老师

能够出版"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是对历史的贡献，更是落实宗教政策的具体表现，利在当代功于千秋。

于新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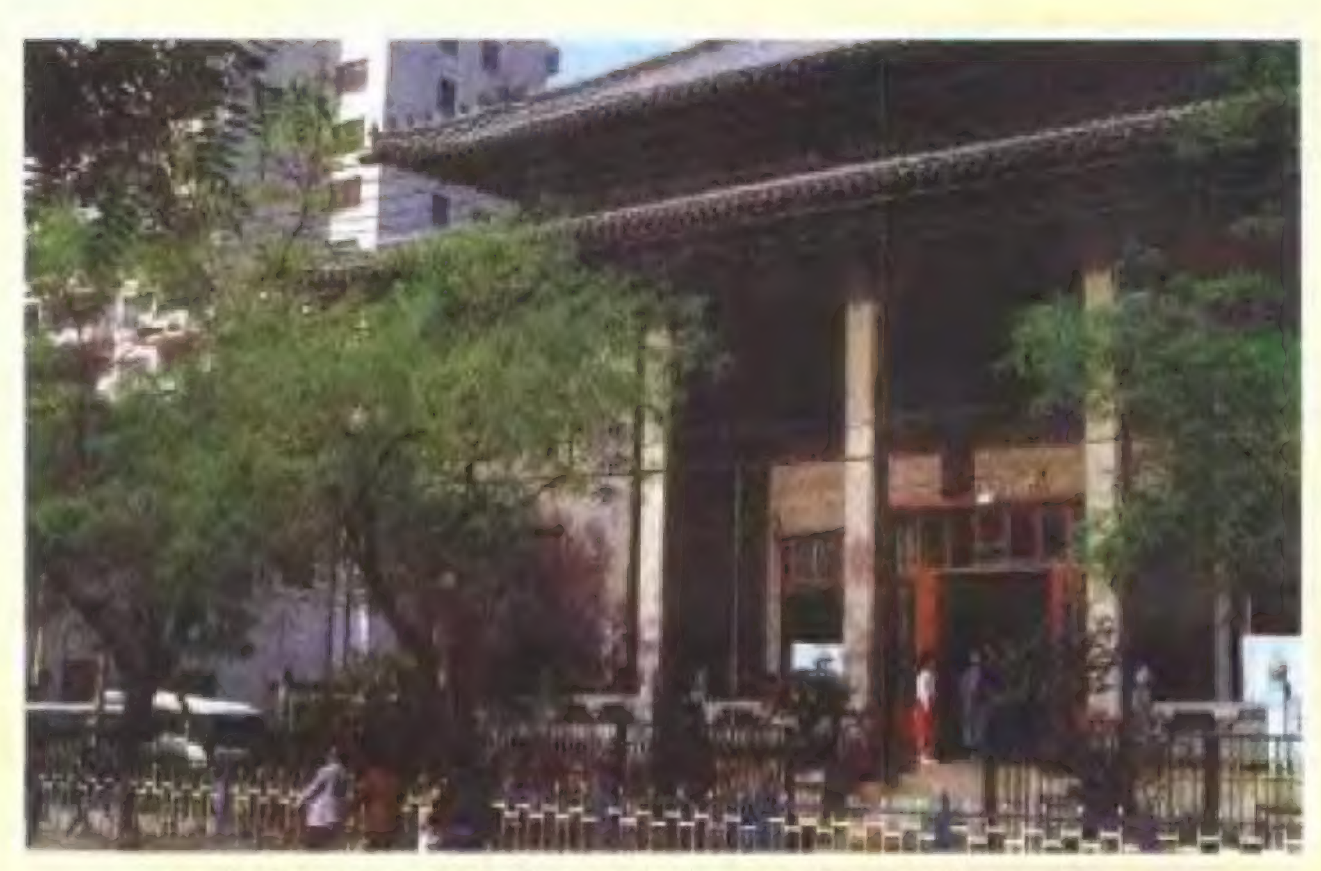
一九九八.十二.三十日.



宣武门天主堂——北京地区主教座堂　（北京天主教会提供）



崇文门教堂 （崇文门教堂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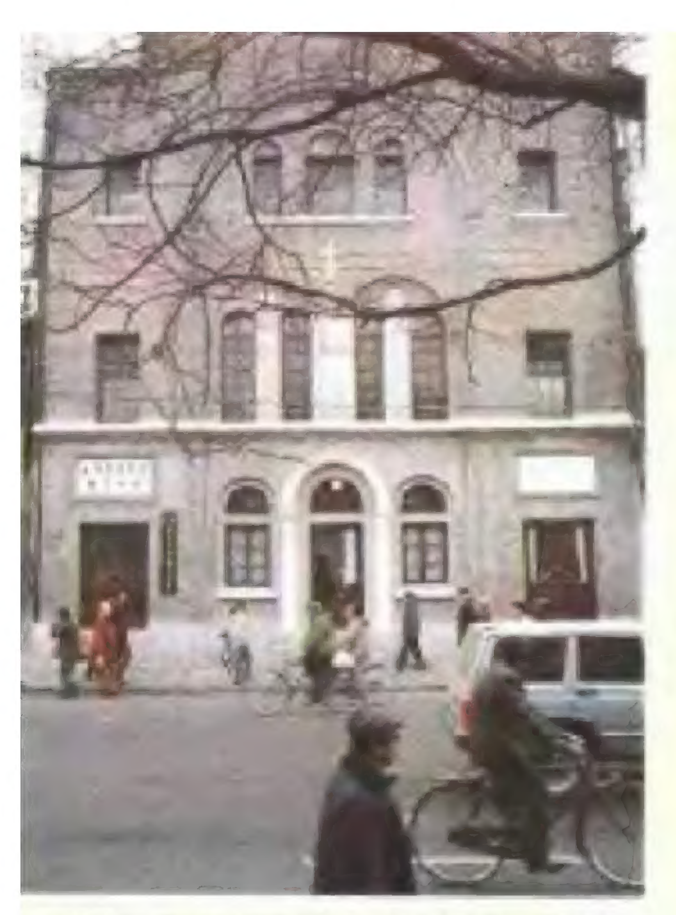
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会址 （北京市基督教会提供）



西什库教堂 （冯秀生摄）



缸瓦市教堂夜景 （缸瓦市教堂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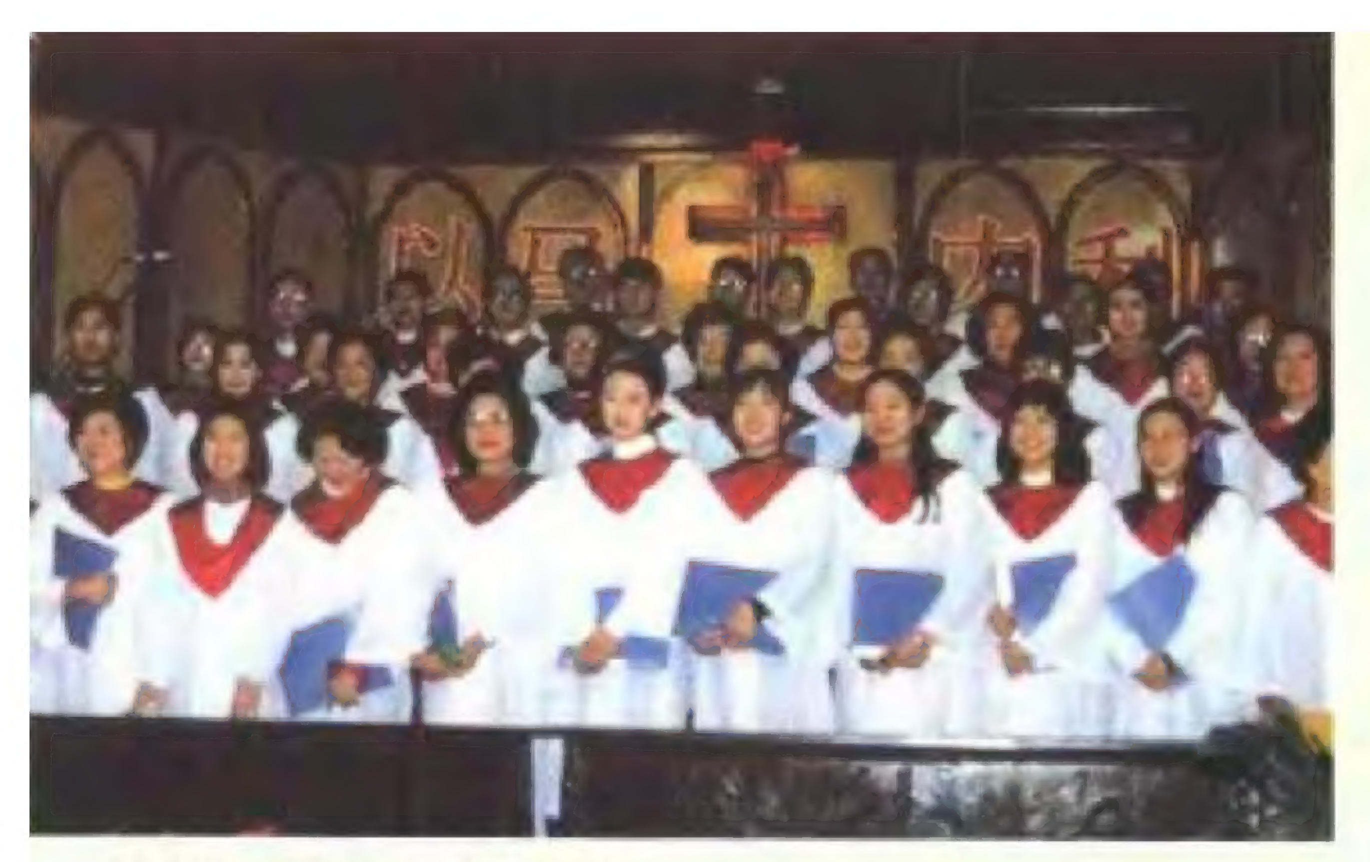


珠市口教堂（李永江牧师提供）



宣武门教堂圣母山 （冯秀生摄）

五塔寺法国传教士墓碑碑林 （佘三乐提供）



唱诗班 （北京天主教会提供）



王府井天主堂
（北京天主教会提供）



主教印戒 (冯寿生摄)

西什库天主堂圣母山 (冯寿生摄)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

作者介绍

佟　洵　全书统稿并主要撰写：

绪论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北京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房山景教十字寺

北京基督教会西堂——缸瓦市教堂

北京天主教北堂——西什库天主堂

北京天主教南堂——宣武门天主堂

基督教文化拾零

后记

荀振茹　主要撰写：

成功的传教士——利玛窦

杨靖筠　主要撰写：

中国第一位洋监正——汤若望

受康熙皇帝器重的传教士——南怀仁

参与设计、修建圆明园的传教士——郎世宁

因病而入教的中国信徒——李之藻

北京最大的基督教教堂——崇文门教堂

北京基督教会南堂——珠市口教堂

北京天主教西堂——西直门天主堂

北京天主教东堂——王府井天主堂

北京最小的天主教教堂——东交民巷天主堂

余三乐 主要撰写：

康熙年间的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与蒋友仁

雍正年间的洋监正——戴进贤与刘松龄

在清朝历局任职的传教士——邓玉函、罗雅谷与龙华民

藤公栅栏传教士墓地

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

汪开云 主要撰写：

第一位中国教区大主教——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

赵之恒 主要撰写：

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

精通西学的中国信徒——马相伯与英敛之

左芙蓉 主要撰写：

为求知而入教的中国信徒——徐光启

序　言

佟洵同志多年从事中国近代史、北京地方史和宗教史的教学与研究。近年她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着手主持编撰一套北京宗教文化的系列丛书。继去年主编的《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一书出版后，最近她主编的另一部著作《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又告杀青，即将付梓问世了。

北京很早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辽、金、元、明、清五朝的故都，北京史的研究也因此格外引起人们的重视。经过许多学者长期的不懈努力，已有多部通史性质的北京史著作问世。如何将北京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这里，史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文物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但从不同的角度，对北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生态环境、人口发展等的历史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则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因为这不仅可以大大拓展北京史的研究领域，从而更加全面地揭示北京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同时也可为北京史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将来撰写更高质量的北京通史提供必要的条件。佟洵同志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编撰这套丛书，符合北京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要求，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是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在宗教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所形成

的宗教文化，不仅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和科学以及哲学、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基督教最早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后来逐渐流传于欧洲，并陆续分化出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等不同宗派，再传播到美洲等地，成为西方许多民族的信仰中心。它是欧美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维系欧美社会道德的一种主要力量。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至会昌五年（845年），因遭禁绝佛教诏令的波及而陷于中断。元代聂斯脱利派与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并传播到北京地区，但流传不广，影响不大，元亡后复陷于中断。明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又将天主教传入中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允准其在北京留居传教。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沙皇也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进驻北京，传播东正教。鸦片战争前后，新教各宗派也陆续传入北京。基督教各派在北京传播的过程中，对北京和全国的文化及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例如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首次打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障隔，给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机械工程学、西式火器制造技术以及西方的哲学、史学、语言、绘画、建筑、音乐等，同时把中国传统的史学、语言、文学、绘画、园林等，特别是儒家、道家的学说介绍给西方，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将基督教作为实行殖民侵略的工具，来华的传教士凭借其攫取的特权，搜集中国的各种情报，欺压中国百姓，包庇人教莠民，又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引发了一系列反洋教斗争和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北京，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民，手持大刀长矛，冒着枪林弹雨，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谱写了一曲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悲壮乐章。因此，对基督教在北京传播过

程中所形成的教堂文化进行系统的清理，是可以使人们获得丰富的知识和启迪，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别是对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中西方文化的冲撞与吸收进行认真的总结，从中引出深刻的经验教训，更将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有益的借鉴。我想，这也正是撰写这部《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的另一层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本书的写作，佟洵同志和几位作者不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考古资料，吸收前人和今人的许多研究成果，而且还亲自到现存的一些教堂进行细致的探查考察，力求做到立论稳妥可靠，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在文字的表述中又力图做到具体形象，生动活泼，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扩大阅读的层面。主编与作者的这种追求和努力，使这部著作写得雅俗共赏，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社会效益，这也是值得赞许的。

在完成这部著作之后，佟洵同志和几位作者，又将投人北京宗教文化丛书第三部著作的写作之中。我预祝她们获得成功，向读者奉献出新的佳作。

陈梧桐

1998年11月1日

于北京魏公村寓所

绪 论

基督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总称）和佛教一样，是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与佛教和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是世界上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反映人们世界观的一种社会意识的形式。一般认为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叶罗马奥古斯都帝国统治下的亚洲西部巴勒斯坦地区。一位外国学者称基督教产生的历史时代是："那时的世界，政治是罗马的，文化是希腊的，社会是异教的，宗教是希腊化东方的。"基督教是东方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的混合物。初期的基督教信徒多为贫民和奴隶，他们仇恨罗马残暴的统治，期望基督再次降临世上，解救他们的苦难，建立穷人的幸福"天国"。

基督 Christ 一词是希腊文，希伯来原文是弥赛尔 Massiah（原为受膏者，后转化为"救世主"）。基督教教义认为上帝（天主）是唯一的尊神，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子，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合一成为三位一体的上帝，三者虽然各有特定的位格，却是同一本体。基督教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类。由于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犯了罪，所以整个人类都处于有罪的状态。上帝为了拯救世人，将其独子耶稣派到人间。耶稣受死、复活，使人类脱离罪恶与死亡。基督教的天堂、地狱、炼狱说，宣传善良的人将得到永生，恶人将永受地狱之苦，表明了人类追求美好与光明和爱憎分明的情感。基督教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主张天下男女皆为兄弟姐妹，众生平等，提倡

忘我与献身的精神。

当前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信仰基督教。据1995年统计，世界基督徒总人数已达16亿之多，比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人数要多。基督教的圣诞节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美洲和大洋洲最主要的公众节日，是西方国家家人团聚、各种庆祝活动异常热闹的全民佳节，宛如中国的春节。这一事实说明，基督教是人类文化知识活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基督教的研究历来受到了国内外专家与学者的重视。

一、源远流长的北京教堂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一定意义上讲，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两大类。"宗教文化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寺院、教堂、圣像、圣书、圣地等宗教器物是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态，它们必将长久存在下去，从而为未来的宗教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宗教制度是宗教意识的结构化、体制化，只要有人信教就必然还会有宗教组织，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宗教制度文化即宗教信仰的观念形态体系，它是宗教文化的核心，也是区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根本标志。由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并不是绝然排拒的关系，也还有互相渗透，互相吸纳的一面，因而宗教文化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艺术、伦理等诸多领域。现代化、世俗化的结果，很可能使宗教道德在宗教文化中的地位凸显，成为宗教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而各种宗教最重视的也正是以善恶之说来教化信众，达到人格的高尚完美"。[1] 文化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

① 199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吴云贵文。

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周一良先生说："文化应当包含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一般说起文化，就是想到哲学、文化美术、音乐以至宗教等主要与精神文明有关的东西。"可见宗教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的生活习俗、教义、教仪、宗教音乐、绘画、寺庙观堂建筑等都是宗教文化的具体体现。

文化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文化融合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的传入，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北京是中国六大文明古都之一，又是人类的发源地，其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自元、明、清以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文化作用一年一年地全国化，北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北京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某一方面都可自成体系。北京的教堂文化，自唐朝景教的传入建寺立碑至明清天主教传教士建堂传教算起，就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每一座教堂的历史，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写照。

教堂，是神父、牧师、长老、修士、修女等神职人员修道、传教、举行弥撒、礼拜、祈祷等宗教活动的场所。教堂与每一位信徒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凡信徒的婚丧嫁娶都要到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北京的教堂文化，已构成北京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人文景观。研究北京教堂文化，也就是研究北京的传统文化。

巴黎圣母院、圣索菲亚大教堂、罗马圣彼得堡大教堂……以其精美绝伦的建筑特色而闻名于世。随着基督教的传入，雄伟辉煌、精美绝伦的教堂建筑艺术也传入了北京。一座座罗马式的教堂在北京这座东方文明古城中落户，丰富了北京传统文化的内容。北京的教堂文化，已成为北京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地区最早的教堂，是位于房山区三岔山的景教十字寺。北京房山区周口店车厂村的房山景教十字寺，是北京地区有据可考

的最早的教堂。1625 年（明天启五年），陕西盩厔（今周至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的史实。唐朝时称基督教为景教，教堂为景寺，教众为景众，教会为景门。大秦国阿罗本来到长安后受到中国皇帝的礼遇，唐太宗不仅允许他在中国传教，而且还恩准他在长安建寺度僧，景教因而法流十道，寺满京城。景教自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流行达 210 年之久，至唐武宗时崇道禁佛，景教亦遭禁绝。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就是唐朝景教流行的历史遗迹。

随着蒙元帝国入主中原，基督教再度兴起。元朝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教。由于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极为宽容的政策，所以基督教在中国再度广泛传播。中国南北各地都建有不少教堂，并立了很多十字碑。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在元代就曾重修过，至今遗存的两通石碑碑文记载了当年重修十字寺的历史。基督教在元朝的传播有一显著特点，那就是紧紧依附于元朝统治者，因此元代信仰基督教的人多为蒙古人、色目人，其中有些信徒是朝廷中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这种“奉敕传教”的特点，很容易受政治风云突变的冲击，随着元朝在中原地区统治的覆灭，基督教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再度受到冲击而绝迹。当年在元大都内修建的教堂，亦遭到灭顶之灾。除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因地处郊区幸免外，所有的教堂都随着改朝换代政治风云的突变而荡然无存。

北京地区现存的教堂多为明清两朝时期所建，教堂虽然很多，但是大多已经拆除不存在了。北京现存最古老、最有名的教堂当数天主教的南堂、北堂、西堂、东堂和北京基督教会的崇文门教堂、缸瓦市教堂以及东正教的“南馆”与“北馆”。北京地区天主教教堂至今仍进行宗教活动的共 17 所，其中 6 所在北京内城，11 所分布于北京远近郊区。在郊区的教堂，数门头沟区后桑峪教堂最有名，其历史也较长。

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的活动过多地参与政治，充当了沙俄

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东正教在北京地区建立的“圣尼古拉教堂”和“奉献节教堂”，实际上成为沙俄安插在北京的侵略据点。因圣尼古拉教堂坐落于东直门北大街，奉献节教堂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所以两座教堂又有“北馆”与“南馆”之称，东正教的活动，现今已在北京绝迹。

基督教新派的教堂一般称为礼拜堂。因基督教新派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传入中国进驻北京，发展较快，所以北京基督教会的礼拜堂大多为1863年以后所建。北京的礼拜堂是由欧美不同国家、不同宗派差遣的传教士建造。据粗略统计，北京现有各差会礼拜堂达近百所，其中最有名的仍是崇文门教堂和缸瓦市教堂。

二、北京教堂文化的特点

基督教创建于公元1世纪，在其发展演变中不断地分化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耶稣教（基督教新派）和其他一些比较小的派别。基督教不同派别自明朝万历年间之后陆续传入北京，因其派别不同，传入北京地区的时间不同，所建堂、传教方式亦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派别经过长期与北京传统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京教堂文化，成为北京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归纳起来，北京教堂文化在旧中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北京教堂是宗教活动的场所。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它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宗教的存在与否，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这项民主权利。对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不得歧视。我国公民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有了加入各教的组织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的权利。

教堂（礼拜堂）不同于佛教的寺庙，也不同于道教的道观。与寺庙道观相比，教堂似乎多了几分神秘与庄严，似乎离京城百姓生活远了点。这是因为教堂从不搞什么庙会，也不对外开放，不允许京城百姓随意参观。教堂是主教、牧师、长老、司铎、修士、修女等神职人员传教布道举行弥撒、礼拜和圣事的纯宗教活动的场所，是基督教信徒过宗教生活的所在。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婚配要在教堂举行婚配圣事，基督教的信徒去世以后也要在教堂举行弥撒。教堂是基督教教会的所在地，它与每一个信徒的生活息息相关。教堂虽然谢绝参观，但是在一年一度的重大节日——圣诞节期间也不拒绝百姓的来访。

第二，是传播西学的中心。

中国有句俗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基督教可不大适用。与中国习俗恰恰相反，基督教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用基督教文化征服中国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众多的不同国籍的传教士被罗马教皇派往中国。为了获取中国民众的好感与信赖，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大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西学有成就者。

17世纪初期，基督教一个派别——天主教终于叩开了明王朝宫廷的大门。随着天主教在北京的传布，一些传教士在知识传教的旗帜下，把欧洲文化传人了北京，教堂成为这些传教士传播西学的中心。

最先获准在北京留居、传教的是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他在北京建立起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利玛窦初到北京正值传教伊始，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招揽京城百姓进堂参观，除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画像、十字架摆放在教堂圣台的中央外，还将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日晷仪、报时钟、西洋琴展放在教堂里，任人参观。利玛窦有意识地结交中国朝野学士名人、顺应中国文化，传播基督教思想。与此同时，利玛窦将地圆说、日大于地、月小于

地、九重天说、四元行论等天文理论首先传入中国，并向中国人传授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还教中国人制造天文仪器。徐光启、李之藻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天文学后，与西方传教士一起参加崇祯年间的修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编成《崇祯历书》137卷，同时又完成了日晷、星晷、望远镜、圭表等的制作，使我国新法书器俱备。后来在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曾主持设计、监造天体仪、地平经仪等大型铜仪，并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从此中国完成了旧历法改革，使欧洲天文学说在中国进一步得到传播。

传教士还将欧洲的医药学、解剖生理学等著作传入了中国，并译成汉文出版。康熙年间，西医、西药在中国已进入实用阶段。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曾在清宫廷充当御医，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晋和巴多明合作，将法国《根据血脉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了满文，供御医参考[①]。康熙皇帝两次御驾南堂，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解剖学。

随着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除传入天文学、医学等西方科学外，西方的地理学、数学成果也传入了中国。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成《几何原本》，康熙年间南怀仁的《坤舆全图》问世。欧洲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

传教士为传教而给中国带来了西洋的奇器异物，近代的科学文明。虽然传播西学并非出于传教士来华的本意，但是其客观效果却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总之，欧洲文化随着教堂的建立而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为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和重新焕发青春注入了活力，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在

① 《中外文化交流史》，第50页。

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北京的教堂在客观上成了传播西学的一个中心。

第三，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西方传教士通过教堂把欧洲文化介绍给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翻译成本国文字，介绍到欧洲。为了更好地推行知识传教的政策，西方传教士们大多尽可能地把基督教教义说成中国人所能接受的哲理。为此他们必须研究中国的典籍。早在明末，利玛窦就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康熙年间传教士将《大学》、《论语》译成西文出版。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四书译本和《中国哲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欧洲传教士还比较早地研究了《易经》。白晋用拉丁文著《易经要旨》，将八卦与“二进制”联系起来的假说，为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二进制”的科学创见提供了营养。在罗马出版的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是一本最早系统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书，也是由传教士撰写的。传教士卫匡国用拉丁文写的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在欧洲影响很大。元曲《赵氏孤儿》，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俄文在欧洲出版。伏尔泰还将它改编成《中国孤儿》，曾在巴黎公演。一些传教士还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轿子等带有工艺美术性质的物品，不断地运回欧洲。中国文化通过这些在京的传教士传到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伏尔泰曾说：“欧洲王公和商人所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1] 事实说明，北京的教堂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第四，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营垒。

19 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葡萄牙丧失了海外霸权，英、美、法、俄、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兴盛

① 科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 79 页，商务印书馆，1962。

起来，掠夺殖民地，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首要任务。于是，资本主义各国就把基督教各个派别当作是争夺海外市场、掠夺殖民地的工具。基督教各派充当了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外国传教士在近代时期为资本主义侵略者刺探中国政治情报、军事机密，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积极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马前卒。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时期的活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改变了明清以来在中国传教的谦恭卑微的态度，随着大炮和军舰昂首阔步地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不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北京的教堂也由昔日沟通中西文化的场所变成了资本主义各国侵略中国的营垒。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资本主义各国分别签定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这些条约中，不仅重申了要“给还旧产”，而且还允许法国传教士随意地在中国各地建堂传教。自此，各国传教士纷纷要求抵还教堂，一时间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教士以还堂名义霸占田宅的事件。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理衙门的奏折说：“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己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则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各国传教士在“利益均沾”的口号下，蜂拥而人地来到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签定表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扩张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神父唆使法国侵略军总司令葛罗，依据中法《北京条约》，向清政府索回了东堂、西堂和北堂。法国传教士根本不考虑东、西、北三处教堂地基上的居民有无搬迁困难，一律强令中国百姓立即迁走。他们的不法行为激起北堂居民强烈反对。清朝政府怕激起民变，只得与法国传教士协商，拨给教会八千两白银作为北堂的赔偿费，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收了钱，不久却再次强硬地向清朝政府索要北堂。清朝政府只得强逼北堂地基上

的居民搬迁，将东、西、北三处教堂全部归还教会，但是已经拨给教会的八千两白银，却分文未能收回。

1866年（清同治五年），教会用勒索之银在蚕池口地址上重新修建起北堂。作为北京枢机主教公署办公的所在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清政府为了扩建皇宫，决定给价银圈禁宫廷附近的地方，北堂也在圈禁之列。经多次协商，清政府将西什库三分之二面积（约20英亩）提供教士移建新堂之用，并拨给迁移费库平银35万两之巨。法国传教士遂将北堂迁建于西什库。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这些外国传教士，还要求在中国享有与中国官吏同等的权力，以达在中国站稳脚跟，永远占领中国之目的。为此，一些外国传教士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增加权益的要求。迫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压力，总理衙门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二年）颁布了带有法律形式的《章程》，谕示各地照办。这一《章程》给了传教士与地方官吏同等的权力。对此，遣使会驻北京的总主教樊国梁说："我们对这（指《章程》）应该知足了"。[1] 从此，一些外国传教士依仗《章程》为非作歹，肆意掠夺京城百姓的房地产。一些无赖之徒为了寻求保护纷纷入教。他们入教后，肆无忌惮地欺压邻里，为所欲为，成为社会上的特权阶层，京城百姓气愤地说："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2]

由于外国传教士及不法教民的不法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终于酿成轰轰烈烈的烧教堂、反教会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巨大洪流。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教会、不法传教士和不法教民。义和团团民不仅围攻教堂，也围攻外国使馆区。这种做法虽然不可取，但是它说明中国人民对洋人、洋教痛恨已极。

---

① 《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第75页，天主教主徒会，1980。
②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388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法国传教士樊国梁以北堂为营垒与义和团进行对抗。法国公使馆派法国武官恩利保率30名士兵进驻北堂，意大利又派来10名水兵加强北堂的守卫。2000多名信徒在崇文堂牧师指挥下修筑工事，抗击义和团。一些外国传教士还充当炮手，为八国联军通风报信。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外国传教士与不法教民怀着复仇的恶念，冲出教堂与八国联军一起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见物就拿，见人就杀。北堂——这个传播“福音”的圣地，竟成为烧杀抢掠的罪恶之所。在主教樊国梁的指挥下，北京的银子、玉器、古玩、珠宝源源不断地流进西什库天主教教堂。1901年1月9日的《纽约先驱报》登载文章说：“北京教区会计葛珑璧在三天内就发出了四十五万法郎的记名和不记名的支票”。[1]

东正教自康熙年间传入中国后，先后在北京修建了尼古拉教堂、奉献节教堂和圣伊尔库茨基·英诺肯提乙教堂。尼古拉教堂位于东直门北大街东侧的今俄罗斯大使馆内，奉献节教堂位于东交民巷，所以北京人习惯地称二座教堂为北馆和南馆。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实质上是俄国政府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它名为“传教团”，实则“负有供给俄国使臣情报之秘密任务，甚至暗中参与密谋”。[2] 东正教教士在北京主要任务不是传教，而是执行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工作内容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实际上是沙皇手中直接掌握的工具。“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3]

---

① 《近代史资料》，第98页，1963年第3期。
② 《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6页，云南崇文书馆版。
③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著：《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282页。

东正教教士以教堂为营垒、为沙俄政府干着侵略中国的勾当。例如："俾丘林神父经常冒充中国人走街串巷，先后绘制出《北京城廓图》，编写成《蒙古志》等，为沙俄侵略中国做准备"。[1] 1861年，沙俄政府外交部派公使进驻北京，俄国政府居然将南馆改为俄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令传道团迁回北馆居住。"传教士们以教堂为堡垒，以教徒为臣民，形成地方的权力中心，成为国中之国"。[2]他们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其劣迹书不胜书。

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近代时期北京地区的教堂不是传播福音的圣地，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营垒。

第五，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见证。

义和团反洋教运动失败后，北京的法国教会还要求法国公使馆与清政府交涉，要求中国赔偿北京教区和教徒的损失与伤亡。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得向北京的法国教区和整个宗座代牧区赔款达五百万金法郎。[3]不仅如此，八国联军侵华攻克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又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达9.82亿两。加上地方赔偿2000万两以上，庚子赔款总数达十亿两以上。清政府以"关余"、"盐余"和"常关税"等为担保。从此，清政府的重要税收，除田赋外，几乎全被帝国主义控制。帝国主义各国以"损失"多少分赃，各国传教士以"损失"最大为由，纷纷索要赔款。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从庚子赔款中得了13万8千两白银的赔款，除修复尼古拉教堂外，又新修了教众归天堂、圣母堂、英诺肯提乙堂以及修道院、坟地教堂等。在北京西山地区、

---

① 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北京文化卷》，第16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② 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宗教文化卷》，第33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③ 《零落孤叶—剛恒毅枢机回忆录》，第43页，（台）天主教主徒会，1980。

通县、香山等地建堂传教。

在义和团运动中天主教南堂也受到了冲击，外国传教士用庚子巨额赔款于1904年重新修建了教堂，我们今天看到的南堂就是用庚子赔款修建的。

王府井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于1905年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在教堂的中间部位至今仍清晰地刻着“1905年”几个字，它记载着外国传教士掠夺中国人民财产的罪恶。

东交民巷天主堂始建于1901年，是由法国传教士高加理用庚子赔款修建的。

1903年英国伦敦会利用索赔之款，在缸瓦市教堂旧址周围征地扩建了缸瓦市教堂。

1900年后，美国卫理公会用庚子赔款先后开设了珠市口堂、花市福音堂、方巾巷堂、广安门关厢福音堂、白纸坊福音堂、和平门外小沙土园堂、左安门外教堂和右安门关厢福音堂。八国联国攻占北京后，各国传教士纷纷出笼，乘机为各自的教会强占地盘，索要赔款，建成一座座教堂。

北京地区现存教堂多为义和团运动后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因此这些教堂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掠夺中国人民财产的历史见证。

三、北京教堂文化对北京传统文化的影响

北京教堂文化是北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北京传统文化的知识宝库。

随着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他们将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水利学一一带入北京，推动北京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们把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也带到北京，悬挂在教堂中。这些西洋艺术品传入北京后，立刻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清人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说：“明时有利玛窦者，西洋欧罗巴国

人，通中国语，来南都，居正阳门西营中。画其教主作妇人抱一小儿，为天主相，神其圆满，彩色鲜丽可爱，尝曰：'中国只能画阳面，故无凹凸，吾国画阴阳，故四面皆圆满也'。凡人正面则明，而侧处则暗，染其暗处稍黑，斯正而明者，显而凸矣"。[①] 西方绘画艺术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对中国绘画艺术影响较大的，当数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他到北京后居住在王府井天主堂，后在清宫廷任职。他的画别具一格，以中西掺用法而闻名于清朝画坛，为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画风的影响下，清代画坊上出现了新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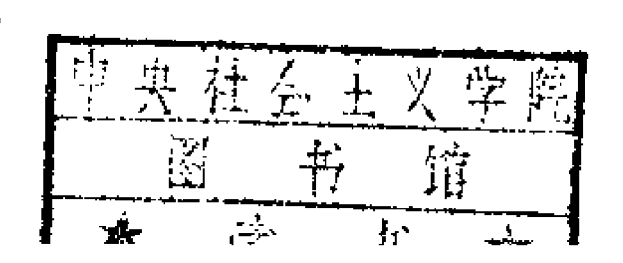
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西洋乐器及西洋音乐也传入了北京。利玛窦曾将一张铁弦琴贡献给明神宗，明神宗还命其子向传教士学习演奏西洋乐器。基督教信徒在教堂做弥撒时，也多以音乐伴奏唱诗，这说明西洋音乐自明万历年间就传入了我国，随之西洋乐理、五线谱的制作都陆续传入北京。欧洲音乐传入中国，使中国的音乐，特别是宫廷音乐的内容更加丰富。

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而传入中国的欧洲文化，还包括建筑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从明朝末年起，在教堂兴建的同时，传教士把欧式建筑风格也带到了北京，例如天主教南堂与北堂的建筑风格都属哥特式建筑，教堂有彩色玻璃镶嵌门窗，正面都有精致的砖雕和雕像。清代圆明园欧式宫殿的兴建，则是受欧式建筑影响而在北京兴建的最宏大的工程。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建筑群，具有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秀美可爱，也具有中国建筑的特色，是中西合璧的产物。[②]

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欧洲截然不同，外国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多采用罗马拼音方法。利玛窦当时只为自己学习汉字方便用罗马

---

① 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宗教文化卷》，第350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② 参阅《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95页。



字母拼音，没有想到却开创了中国文字拼读的应用与研究。

总之，北京教堂文化丰富了北京传统文化的宝库，推动了北京文化发展的历程，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对北京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早在元朝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就曾在北京建堂传教，房山景教十字寺的遗存记载着基督教传教士在元大都活动的情况。明末清初北京再次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的足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传教士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开创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互相沟通的先河。然而好景不常，康熙年间罗马教皇引起的“礼仪之争”阻断了这一进程。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伴随着殖民主义的侵略，凭借着武力，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西方传教士亦再度来到中国、涌入北京。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向海外扩张和掠夺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的迫切要求。在资本主义各国向外扩张、掠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基督教传教士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西方传教士们越出教堂、参与政治，充当了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西方传教士认为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叫嚣“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不但参与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而且还直接参与了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西方传教士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搜集情报、创办刊物、制造舆论，摇旗呐喊，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来华后创办了《中国文库》期刊，为美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大造舆论；在参加中美不平等条约谈判时，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要求最惠国待遇权。总而言之，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时期的活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然，基督教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与政府官员和商人是不完全相同的，他们除了在本国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与保护下参与政治外，

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要彻底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使中国人西方化，一句话，他们要用基督教文化征服和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传教士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化的西学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工具。基督教化的西学就是通过开办医院、设立学校、出版刊物和书籍等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社会。正如西方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言，传教士的目的是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传教士的活动是以教会和帝国主义利益为指归的，以学辅教只不过是基督教传教士活动的主要手段。

本书为了进一步阐述北京教堂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撰写了曾经在北京活动过的十几位影响较大的传教士。

希望广大读者阅读本书后，进一步认识到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一部分，他们传播西学、开办学校和医院，只不过扮演了一个文化掮客的角色。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就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活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会摆脱了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方教会的控制，建立了自治、自传、自养的新教会，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我国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从民国时期就不乏其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至八九十年代又相继出版了一些论著、专著，如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顾裕禄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与现在》，唐逸的《基督教史》，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等。这些论著涉及到基督教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内容，但是对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对北京地区的影响涉及甚少。1995 年由姜立勋、富丽、罗志发编著的《北京的宗教》一书，开始注意探讨基督教对北京地区的影响及其独有的发展特点，但是对基督教的东来与北京地区文化交融的过程和

特点亦未能详尽展开论述。有鉴于此，我承担了北京学研究所、燕京研究院的这个课题，组织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撰写了这部《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力求比较详细地阐述基督教传入北京的历史和北京教堂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探讨其发展规律。由于学力不足，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缺点定然不少，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佟 洵

1999 年 4 月于北京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

目　录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著名的传教士与信徒在北京地区的活动

北京地区的教堂和传教士墓地

基督教文化拾零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一、基督教的形成与发展

基督教的源流

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中叶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巴勒斯坦地区，始称“公教会”。基督教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宗教背景和文化背景。

巴勒斯坦濒临地中海东岸，很早就有迦南人居住。大约公元前14世纪上半叶，来自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希伯来人侵入迦南人的居住地。希伯来人分成两个集团：占据北部和中部平原地带人数较多的称为以色列，占据南部山地人数较少的称为犹太。不过，也有人把这两个集团的人统称为以色列。以色列人在迦南人文化的影响下，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大约公元前1010年，以色列人经过长期斗争，终于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并定都耶路撒冷。不久，以色列人又修建了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圣殿。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以色列社会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只经过80年便趋于分裂，北部的称为以色列王国，南部的称为犹太王国。

北部以色列王国政局动荡，内乱不止，公元前722年为亚述帝国所灭。南部犹太王国政局比较稳定，并在公元前621年进行了改革，强调尊奉耶和华为唯一的神，耶路撒冷圣殿为崇拜耶和

华的唯一中心，企图通过宗教上的一致加强政治上的统一。然而，由于新巴比伦王国灭掉亚述王国，以及与埃及争夺巴勒斯坦所带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犹太王国的改革中途夭折，最终也被新巴比伦王国灭掉。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开始统治巴勒斯坦地区。在波斯王的统治下，以色列祭司以斯拉于公元前397年又进行了改革，反对祭司贵族和他们所娶的异族妻妾，宣布实行《摩西律法》，重申耶路撒冷圣殿是耶和华的唯一圣所，特别是为保持以色列民族血统和宗教的纯洁，禁止和异族人通婚。从此以后，一些自以为纯正信仰与血统的以色列人开始自称为“犹太人”，“犹太”一词逐渐取代了“以色列”。

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167年，巴勒斯坦处在马其顿王国统治之下。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病死，马其顿王国陷于分裂，巴勒斯坦成为相互敌对势力争夺的目标。混战的100多年间，巴勒斯坦备受蹂躏，大量的犹太人为躲避战乱，不得不流落到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区谋生，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尤其是公元前198年，叙利亚军队进占耶路撒冷，大掠圣殿，对犹太人进行残酷镇压，使犹太人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随着罗马帝国的兴起和强盛，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又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不仅消灭了犹太人的国家，还对敢于反抗的犹太人实行酷刑。64—65年，罗马帝国境内发生饥荒，许多人饿死。罗马统治者企图通过劫掠耶路撒冷圣殿的财库来抵偿赋税。这一举动遭到犹太人的强烈反抗，许多犹太人加人起义者的行列。结果，犹太人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一天之内，竟有500名犹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几万名犹太人被卖为奴隶。

从以色列王国第一次建国时起，到70年犹太人反对罗马帝国起义被残酷镇压止，1000多年来，犹太民族苦难深重。怎样摆脱

民族苦难，使犹太人走上复兴道路？这是许多犹太人思考的问题。基督教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基督教的产生和犹太教有着密切关系。从公元前6世纪起，犹太人在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处于亡国奴的屈辱处境，加之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许多犹太人渴望摆脱异民族的压迫，于是企望一位"救世主"降临，领导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富强的国家。犹太人认为，以色列的保护神——耶和华就是统治世上万国、万族、天上、人间的惟一主宰，而耶路撒冷圣殿是他的惟一圣所。犹太人所以遭受了那么多的灾难，是耶和华对他们犯罪的惩罚，欺压犹太人的异国异族都是耶和华手中的惩罚工具。犹太人崇奉耶和华为独一真神，排斥其他宗教，这表明了犹太教正式形成。

在犹太教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代先知预言的"弥赛亚"。弥赛亚意即"受膏者"或"受上帝祝福的人"，也称基督。原来，古代以色列有一个传统，国王即位时要举行仪式，由大祭司代表上帝将橄榄油敷在国王的前额上，表示上帝的祝福，国王就成为"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犹太教中的"弥赛亚"观念，反映了以色列人在民族苦难中祈求上帝派来"复国救主"，以复兴犹太人的民族和国家。这一愿望成为基督教产生的重要因素。

巴勒斯坦地区长期处于马其顿王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古希腊罗马哲学对犹太人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基督教产生的文化背景之一。古希腊哲学中有斯多噶派，该派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命运"决定的，人应该自觉地服从命运的安排，要敬畏神灵，绝对服从神灵，在现实生活中，则应当安分守己，忍让克制。古希腊哲学中还有犹太派，该派主张用希腊哲学解释犹太教经典，认为神是万物的本原，至善至美至尊，创造了万物，人只有断绝情欲，通过沉思默想才能够和神相通。此外，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新柏拉图主义也是一个重要派别，该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

"太一"，世界上万物都是由"太一"中流溢出来的。物质世界是最后产生的，离"太一"最远，因而是最恶、最卑贱的。人的灵魂被囚禁于恶的肉体中，只有通过静思，消除物欲，才能使灵魂摆脱肉体羁绊，回归"太一"。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上述流派的许多观点，比如宿命论、禁欲主义、博爱等，都为早期基督教所接受，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罗马哲学对基督教产生的影响。

在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念发展过程中，犹太教出现了一个新的支派拿撒勒派。该派以耶稣为创始人，并认为耶稣就是救世主。耶稣在肯定犹太教律法和先知预言基本信仰的同时，还特别提出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他的行动和主张得到许多犹太下层人民的拥护，同时也遭到了祭司贵族的反对。耶稣在和旧势力的斗争中，最终失败并以"犹太人的王"之罪名,[1] 被罗马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死后，他的信徒们相信耶稣会复活，并降圣灵在他们身上。不久，传说耶稣圣灵果然降临。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只要信奉耶稣基督，接受洗礼，就能接受圣灵，使罪得赦。这些人逐渐形成为基督徒社团，并开始进行布道与传教活动。基督徒社团的信徒们要过集体生活，财物公有，取消债务，反对蓄奴，人人平等，每七天要有一天纪念耶稣复活，名为守主日，也称休息日。随着信徒的日益增多，基督徒社团的组织逐渐完备，并选出执事，来管理日常生活杂务。而大多数信徒，则到各地去传播福音。起初，基督徒社团的信徒和犹太教的信徒在一起搞崇拜仪式，后来由于基督徒社团信徒还有自己的特殊仪式——圣餐，特别是一些非犹太人加入基督徒社团以后，在生活习惯等方面和犹太人区别很大，崇拜仪式难以在犹太会堂里继续举行。于是，基督徒社团就开始脱离犹太会堂，单独有了自己的聚

---

(1) 范埃待：《教会简史》，第2页，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印。

会场所。基督徒的聚会场所由监督（即后来的主教）主持工作，下设执事（长老）专门管理会务。信徒聚会自由，主要内容是祈祷、讲道、训诫、见证等。

基督徒社团最初没有统一的经典，而是以犹太教经典作为自己的经典。后来，在宣传耶稣的生平事迹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启示录》以及21篇书信等共27卷经典。其中，4卷福音书开始是口头讲述的，也称“口头福音”阶段。它的主要内容是告诉众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降世是为了拯救世上的罪人，他受难、复活、升天后还将再次降临人间，来审判这世界，他就是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世主，人们应该认罪悔改，信奉耶稣基督，接受福音成为新人。

基督徒社团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又有自己的经典，还有自己的崇拜对象，以及一套较为系统的神学理论和成熟的宗教组织，这样，它便不再是犹太教的一部分，而形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就这样产生了。

基督教产生后，基督教信徒认为自己不是罗马帝国的公民，而是天国国民，因而不向罗马神庙献祭。罗马皇帝是罗马神庙的至高祭司，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便认为基督徒是蔑视罗马政府和皇帝的。此外，基督教教会组织最初比较封闭，活动内容不为外界人所知，罗马统治者便也认为基督徒在搞反政府活动。由于上述情况，基督教产生后，便多次遭到罗马政府的迫害。不过，基督教教会上层人士不断地利用一切机会，尽力争取罗马政府的承认与保护。后来罗马政府中的一些皇室贵族、行政长官以及社会上层人士也纷纷加入基督教，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权势集团。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和罗马帝国内部矛盾的转化，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实行镇压与怀柔两手政策又成效不大，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终

于在 313 年颁布了《米兰敕令》,明确宣布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改取支持、利用基督教的政策。这样，基督教就取代了犹太人的正统宗教——犹太教，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宣布："只有靠基督教才能完成久已在进行中的统一帝国的进程,罗马帝国只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切自由民只有一种公民身份，因此也应该只有一种宗教"。基督教最初二百年的苦难历程至此宣告结束，并渐渐处于罗马帝国皇权的控制之下。[1]

基督教的教理教义

基督教以《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为经典。《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合称为《新旧约全书》，也称《圣经》。基督教认为,《圣经》出于人的手笔，但它是在上帝的默启下写成的，是用人的语言表达了上帝的思想，所以《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具有最高权威，是信仰的依据，也是宣传教义和教徒行为的标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以圣经为依据的，其主要内容有：

创世说

基督教认为,"三位一体"的上帝（或称"天主"和"神"）是创造和管辖天地万物的主，是宇宙惟一的真神。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全善，全智，全爱"。上帝是"灵"，有理性的意志，但无形体。上帝超乎万物之外，又贯于万物之中。基督徒认为天主一词可用 15 个字概括之，即"无始无终，肇造天地神人万物真主宰"。[2] 由于上帝是天地的惟一主宰，是万物的创造

① 美利威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译:《基督教会史》，第 13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② 《天主教教理释义》，第 31 页，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编印。

者，所以人们对他必须敬畏驯服，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上帝给了每人两种精神能力——理智能力和自由意识的能力，目的是叫人主动行善避恶，行善有赏，作恶受罚。行善的到天堂，作恶的下地狱。

原罪救赎说

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也称“圣子”。是“道”借圣母玛利亚由圣灵感孕降世为人的，是道成肉身，具有神性和人性。他是天父的启示者，到人间是来宣传救世福音，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复活后升天，以后还要再降临人世，施行最后审判。基督教认为人类从始祖亚当、夏娃时起就犯了罪，他们违背了上帝意愿，偷吃了伊甸乐园中“知善恶树”的果子，犯下了罪。上帝于是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乐园之外，警告说：“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得食，直到归于土中，因为你是由土来的”。[1] 基督教把亚当和夏娃所犯的这种罪，称为“原罪”。这种罪遗传给他们的子孙，代代相传，所以后来世人一出生就都是罪人，必然要犯这样或那样的罪。世间一切苦难，都是人们自己犯罪的结果。基督教认为：人们生来要忍受一切苦难，惟一解脱的途径，只有依靠救世主耶稣为人赎罪，才能求得死后永生。

天堂地狱说

基督教认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运行在世界和人类的心中，使人知罪、悔改、成圣。现实世界是罪恶的渊薮，人们在这个世界的苦楚无法摆脱，只有相信神和神派来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一切驯服神的安排，死后灵魂才能升入天堂，否则就要受到末日审判，被抛入地狱。天堂是上帝、天神和得救的人的所在，

---

[1] 《天主教教理释义》，第101页，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编印。

是一个极乐的世界。地狱是恶鬼和受罪之灵魂的所在之处，是阴森可怕、寒冷黑暗、残酷无比的地方。基督教的天堂、地狱说，旨在使人忍受现实之苦，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天国。

顺从驯服说

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号召人们要有爱心。不但要爱神，而且要爱人如己，还要爱自己的仇敌。要服从有权柄的人。抗拒掌权的人，就是抗拒神的命令。要存敬畏之心驯服主人，不但驯服那些善良温和的，也要驯服那些性格乖僻的。所有的基督教信徒，都要忍受一切苦难。基督教的这一教义，对维护和巩固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教会使命说

基督教要求信徒相信，教会是基督所建立的，是由上帝的“选民”组成的团体。《圣经》是使徒传下来的，具有圣洁和公正性。教会负有在世界上宣传福音的使命。

二、基督教的主要派别举要

基督教形成以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派别。主要派别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基督教、耶稣教）等。

天主教

天主教也称“公教”、“旧教”，因为它以罗马为中心，所以又称“罗马公教”和“加特利教”。16世纪时，天主教传入中国。因为其信徒把所崇奉的神称为“天主”，所以中国人便称之为天主教，或音译为“加特利教”。

基督教产生后，基督教的权力中心原在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今属意大利）。330年，独掌罗马帝国大权的罗马大帝君士坦丁迁都于罗马帝国东部的城市拜占庭，后称为“新罗马”（今属土耳其，称为伊斯坦布尔。后人为纪念君士坦丁，曾一度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城）。随着罗马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新罗马教会自然成为东部教会之首，因此“动摇了罗马教会传统的首席地位”，[1] 并由此导致了后来长达700年的争夺教会领导权的激烈斗争。由于日尔曼人的入侵，使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基督教也随之逐渐分成东、西两派。西派地区属于拉丁语系，东派地区为希腊语系。西派以罗马帝国的西都罗马为中心。天主教就是在西派的基础上演进而成的。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西罗马帝国力量渐弱，罗马主教和教

[1] 张绥著：《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51页，学林出版社，1986。

会的作用日益明显。410年，西罗马帝国陷于战乱，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凭借自己的影响，避免了外敌的入侵，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在欧洲西部、北非西部、西班牙、高卢等教区，居于首位。西罗马帝国从4世纪起，就受到北方日尔曼人的持续进攻，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终于彻底崩溃而灭亡。不过基督教却没有和西罗马帝国一起灭亡，相反地却征服了入侵的日尔曼人成为新兴封建国家的国教。此后不久，法兰克王国兴起，国王克洛维信仰罗马公教，并利用该教会的影响，与其他王国进行斗争。于是，教会和政权的力量开始结合。6世纪末，格列高利一世身兼罗马主教和罗马行政长官，形成政教合一局面，教皇制逐渐形成。在这一制度下，教皇是管理教会的最高元首，享有最高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有权就教义和伦理问题发布权威声明，制定或废止教会法规，创立教区，任命主教，管理传教事务，组织初审法庭与上诉法庭等。教皇一经当选，便为终身职务。总之，罗马公教教会和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便产生了教皇制。教皇制是天主教的显著特点之一。

1054年，当时的罗马主教利奥九世和君士坦丁堡首区的牧首色路拉里乌斯互相宣布对方为异端，并且开除对方及其追随者的教籍。东西派基督教经过长期纷争，终于正式分裂成天主教和东正教。西部教会依据《艾西多尔文献》，认为罗马大帝君士坦丁把统治全教会的权力交给了罗马主教，因此罗马主教座高于普世的一切教会，在基督教会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故而自称“罗马公教”。[①] 作为独特的单一的教会和体制，天主教会及其教皇制也最后正式确立。天主教会在组织上的显著特点是教阶制。教阶分神职教阶和治权教阶两类，又各有品级。神职教阶基本由主教、司铎、助祭构成，是神所立的品级。其中，司铎为七品，助祭为六

①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51页，学林出版社，1986。

品。治权教阶是按权力而定的教阶，是根据教会治理权和统辖权以及某些特定分工而形成的级次。在治权教阶中，最高的是教皇，其下分别是宗主教、牧首主教、教区主教等。

16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再次发生分裂，新教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自成一教。于是，天主教在西欧一统天下的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到17世纪时，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大致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大部、意大利、爱尔兰以及德意志与瑞士的一部分。同时，随着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张，天主教也传播到美洲和亚洲。

天主教信奉天主和耶稣基督，并尊奉玛利亚为天主之母。天主教的基本信条是：天主圣父化成天地，创造人类；天主圣子降生为人，救赎人类，并受难、复活、升天，世界末日将再次降临；天主圣神（即圣灵）圣化人类；教会为基督所创立，并有赦罪权；人的肉身将于世界末日复活接受基督的审判，善人得享永福，恶人要受永苦等。

东正教

东正教也称正教，是在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教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东派的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等教区在罗马帝国的东部，教会在神学思想、礼仪制度、习惯等方面受希腊文化影响，具有一些不同于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教会的“东方”特色，因而习惯上被称为“东派教会”。

325年，基督教在小亚西亚北部尼西亚城召开会议，约有300多名各地主教参加。会议就神学和教会体制以及基督教教义规范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由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干预，阿里乌一派的意见被斥为异端，会议才形

成了某些决议。但是，会议上出现的矛盾并未解决。尼西亚会议之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派教会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派教会之间，因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矛盾更加尖锐。330 年，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两派在谁居教会首席地位问题上，斗争更加激烈。1054 年，罗马主教利奥九世和君士坦丁堡首区的牧首色路拉里乌斯相互宣布对方为异端，并宣称开除对方及其追随者的教籍，东西两派终于正式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大部分东派教会，认为自己保有正统教义，是正宗教会，因而自称为“正教”，东正教由此产生。

东正教产生后，即成为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的国教，东正教会是帝国的国家教会，直接由皇帝领导。皇帝可以任免教会的大主教，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的决定，并有权解释正教教义等。不过，东正教的日常领导权仍然集中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耶路撒冷四个牧首区的牧首之手。

东正教产生不久，其所倚托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在西方十字军和东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双重打击下日益走向衰落，而罗马教会则越来越强烈地谋求整个基督教世界首席地位。从 1096 年开始，西欧基督教国家先后 8 次组织十字军东征。1204 年，第 4 次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1206 年，东正教普世牧首区被迫迁往尼西亚，直到 1261 年，拜占庭首都归复，牧首区才迁回君士坦丁堡。

在拜占庭帝国衰落过程中，由于外患频仍，东正教教会的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两主教区先后为穆斯林占领，耶路撒冷主教区则为十字军建立的拉丁王国所占领。1430 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了并吞拜占庭帝国的战争。1453 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是，帝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继续向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和地区扩张领土，便对原拜占庭帝国境内的东正教教会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承认君士坦

丁堡普世牧首为被征服的东正教教徒总管，其监管范围包括东正教会四大牧首区。不过随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这四个牧首区的教会实际上也相继成为各自自主的教会，各区牧首便成为这些教会的首脑。后来，又陆续形成了一些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它们在法规和行政方面享有全部独立权，并且可以自选大主教和主教。按传统的尊称顺序排列，这些自主教会有：

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是东正教中具有名誉首席地位的自主教会，原为东派教会首席大主教区，相传由使徒安德列建立。该教区管辖范围曾包括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后来缩小到只有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上的查尔西顿、泰尔科斯、比约卡达和伊姆罗兹四个教区。

亚历山大里亚牧首区，是东正教中在尊称地位上仅次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的自主教会，原为早期东派教会四大主教区之一。相传圣马可在这里创建主教座。管辖范围一度包括北非地区。后来影响地区逐渐减少，信徒主要分布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开罗两地。

安提阿牧首区，在东正教的尊称地位上名列第三，是早期东派教会四大主教区之一。相传使徒彼得始建主教座于此。牧首驻叙利亚大马士革。是阿拉伯人信徒最多的东正教会。

耶路撒冷牧首区，在东正教的尊称地位上排列第四，是早期东派教会四大主教区之一。相传耶稣的兄弟雅各始建主教座于此。主要管辖巴勒斯坦地区的东正教信徒。

俄罗斯正教会，在东正教的尊称地位上排列第五。1589 年取得自主地位后，在北美、芬兰、日本、朝鲜和中国相继建立了归其管辖的教会和教区。

希腊正教会，曾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1833 年取得自主地位。此后，东正教成为希腊国教。

西奈正教会，东正教中最小的自主教区，只管辖圣凯瑟琳修

道院。

以上所述东正教的自主教会，都是在东正教中有较长历史的教会。实际上，东正教自主教会的数目远不止这些。

和罗马天主教相比，东正教教义具有如下一些特点：首先，东正教强调信守基督教在325年至787年间所召开的七次主教公会议的决议和信条，对此后罗马天主教教会所举行的历次主教公会议则不予承认。其次，东正教强调“道成肉身”，认为人之所以得救，在于把有罪必死之人，变成神的永远不死的生命。对于罗马天主教强调的赎罪说，东正教不怎么强调。第三，东正教认为，每一个人都在亚当的罪中犯了罪，拯救既要依靠自身，也要依靠天主，首要的是自身必须择善，天主才能帮助他。善功只是条件，并不具有得救的功效，只有依靠天主的恩典才能获得重生和得救。圣事中基督的肉血所生的救赎作用，是给予一切人的，凡愿意接受信仰和洗礼的人，都可以得救。再次，东正教特别重视对圣母的崇拜，许多东正教教堂以圣母的名字命名。

东正教在礼仪和圣事方面的特点是：对讲道十分重视，在专为尚未领洗的慕者安排的诵读长篇经文和诗篇的仪式上，继承了以往的规模。在祈祷仪式中，要唱九首赞美歌。向耶稣祈祷的祷文：“主耶稣基督，天主的儿子，可怜我吧！”受到特别的重视。东正教要举行七件圣事，即洗礼、敷圣油、圣体血、告解、神品、婚配、终傅。洗礼不同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施洗时，受洗者要浸入水中三次，然后由主教敷圣油，表明加入了教会，接受了圣灵，因此这两个仪式都是非常庄严的。圣体血是领受救主的圣体和血，意味着分享了主的生命。东正教认为，是圣灵的作用使圣餐中的饼和酒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告解包括痛悔、告罪和补赎，这是天主宽赦的三个条件。神品是指授予神职的圣事，接受神品的人要经过按手礼，表示领受了恩赐。婚配是由司祭在教堂里按规定的礼仪主持男女双方结成夫妻的婚事。终傅是信徒生

命终了之际，敷擦圣油，表示受傅者忍受病痛，赦免罪过，安心去见天主。

东正教在组织制度上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它否认罗马天主教会关于“只有使徒建立的教区才有权成为牧首区”的观点，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牧首区。牧首区之下是首府主教区，主教区的首脑是主教。在东正教中还有隐修制度，它是以苦身修行为宗旨，以遁世独居或群居为特征的修炼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奉行者终身不婚，逃避世俗生活，遁迹山林旷野，潜心默念祈祷。

新教

新教是16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各个新宗派，以及从这些宗派中不断分化出来的众多宗派的统称，是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在中国，新教称基督教、耶稣才教或耶稣教。

从15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萌芽陆续产生，一批大中城市发展起来。随着一些民族国家王侯的崛起，中央集权统治的确立，罗马帝国以及罗马教廷的势力越来越削弱。在反对神权统治的斗争中，教皇、主教和修道士虚伪、贪婪、无知的面目暴露无遗。自然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宗教领域中的改革便随之发生。

16世纪20年代，德国在宗教、经济各方面危机四伏。罗马教皇任意干预德国教会的事务。德国国内大小教士，又良莠不齐，饱受非议，修道院占有地产过多，贵族觊觎，农民抱怨。在此风浪汹涌澎湃之际，德国一位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公开反对教会兜售赎罪卷，并于1577年10月3日在维登堡教堂口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抨击罗马教廷，对教会中存在的弊政提出抗议。号召人民运用百般武器讨伐教皇和红衣主教，并提出要“用他们的血来

洗我们的手”。[1]他说罗马教皇是“怙恶不悛的异教徒”，其命令是反基督的。马丁·路德抨击罗马教廷权威高于一切的理论是“既不合历史，又不合《圣经》”。[2]1525年，他大胆地与修女波拉结婚。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运动，茨温利牧师和法国人加尔文也在瑞士进行了宗教改革。茨温利的宗教态度比路德更为激进，否认炼狱的存在，宣称牧师可以结婚，使改革迅速发展。英王亨利八世也进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坚决抵制罗马教皇对英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组成了新教教会。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到16世纪中叶，欧洲出现新教的三个主要宗派：有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加尔文创立的归正宗；作为英格兰国教的安立甘宗等。这些新教宗派出现以后，即和罗马天主教抗衡。新教宗派在形成过程中，得到了所在国世俗政权的支持和保护，分布格局也逐渐确定。德国的大部分和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是路德宗，德国部分、瑞士、荷兰、苏格兰是归正宗，英格兰则为安立甘宗。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期，新教的主要宗派在教会组织和崇拜仪式方面基本定型，教义也各成体系。只是这时期新教的理论家所编写的一些神学著作，内容多为繁琐的争辩和考证，缺乏活力。到了17世纪中叶，新教经过再一次变革，产生了一些新的独立宗派，比如英国的长老会、公理会等。随着一些清教徒移居美洲，这些新教派也在美洲得到了发展。新教几个较大宗派如下：

路德宗

也称信义宗，产生于16世纪初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德国，是新教里最早形成的一个宗派，该派对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持否定和抗议态度，也不承认罗马主教的教皇地位。它信奉德国改教运

[1] 范桥：《世界四大宗教三百题》，第38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 范爱侍：《教会简史》，第29—30页，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印。

动领袖马丁·路德倡导与宣讲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所以称为“信义宗”。该派反对罗马教皇对各国教会内部事务的干预，反对教会拥有世俗特权，主张基督徒一律平等。路德宗重视现世生活，实行教士自由结婚，禁止修道、乞食，提倡改良教育和法律，提高社会道德水平。该派信徒约占新教总数的四分之一，是新教诸派中信徒最多的宗派。主要分布于德国北部、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长老宗

也称加尔文宗，是基督教新教中主要宗派之一。马丁·路德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接着，法国人约翰·加尔文也在瑞士掀起了宗教改革，他抨击专制主义、暴虐政治，主张主权在民。长老宗教会组织原则是，由长老和牧师共同管理教会。教会中设长老、牧师、教士和执事。长老是信徒的领袖，由全体信徒选举产生，负责教会管理及道德纪律等。每一教堂立长老数人，长老在教会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该派规定长老每年改选一次，可以连选连任。牧师是专职的神职人员，在长老们的委托下主持教会教务和日常工作。教士负责神职学校的教育，同时也兼管宣教。执事也由信徒中选举产生，协助长老和牧师管理教会。该派以路德的“因信称义”为基础，提出“预定论”，主张国家应接受教会的监督，要使社会基督教化，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长老宗主要分布于苏格兰、英国、美国等国家。

圣公宗

也称安立甘宗，或安立甘教会，16 世纪 30 年代产生于英国。在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中，许多国家对罗马教廷干涉本国宗教事务不满，民族意识日益加强。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加强王权和本国的权力，对罗马教皇干涉英国事务极为不满。英国新兴的资产阶

级和新贵族为防止教会财产流入罗马教廷，支持国王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1533 年，亨利八世以罗马教皇干预他的婚事为导火线，禁止英国教会向罗马教皇缴付贡金，否定罗马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管辖。1534 年，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规定英国国王是教会最高首脑，宣布英格兰圣会为国教，断绝了英国教会和罗马教皇的关系。该派一方面承认《圣经》是教会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一方面保持了早期教会的主要教义和主教制，同时坚持用英文祷告，国家教会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赞成宗教改革运动。该派主要分布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

公理宗

产生于 16 世纪 80 年代，是第一个脱离英国国教会的教会。公理一词译自英文 Congregationalism，意为“公众治理”或“公众制”。公理宗崇尚民主，每一个堂区的会众为教会独立单位，不设教务行政上的各级总机构，每一个教堂的具体制度和礼仪由各堂自行决定，各教堂有权以民主的方式由信徒会众直接选聘牧师管理教会，强调信徒的权力与责任。公理宗创始人是罗伯特·布朗和亨利·巴罗。他们主张政教分离，教会独立，信徒自理。该派多数教会采纳加尔文派信仰自由的观点，不赞成用强力推行信条，不要求所有的教会统一信仰，主张应不拘小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该派主要分布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等地区。

浸礼宗

浸礼宗最初为公理教的一支。于 17 世纪初期，产生于清教运动中。创始人为流亡于荷兰的英国清教牧师史密斯。浸礼宗反对婴儿受洗，反对加尔文的预定论，强调成人受浸礼和信仰自由。宣扬全浸是与基督耶稣同生共死的表现，要求受洗者全身浸入水中，

象征受死、埋葬而获重生。该派主张教会由信徒自愿结合组成，政教分离，不承认圣礼、教会和教士的中介作用。反对国教和政府对教会的干涉。该派在发展中逐渐分化为浸信会、浸礼会、安息浸信会等众多支系。浸礼会主要分布于美国、英国、原苏联、巴西、扎伊尔、印度、缅甸等国。

卫理宗

也称卫斯理宗、循道宗和监理会。原为英国安立甘宗的一派。18 世纪 80 年代始形成独立的宗派。创始人是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兄弟。他们认为国教会的传统传教方式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宗教信仰在群众中也失去作用。为力挽危机，复兴基督教信仰，他们在牛津大学组织“牛津圣社”，提倡遵循基督徒道德规范，严格宗教生活，认真研读《圣经》，所以该派被称为“循道宗”；因它实行监督制，故又称“监理会”。卫理宗以《圣经》正典为最高的唯一信仰源泉和生活准则。反对加尔文的“预定论”，认为上帝会施恩于一切人，凡信仰者均可获救；赞同路德“因信称义”，提倡艰苦朴素。该派着重布道活动，主要分布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以及拉丁美洲、非洲、欧洲大陆等的一些地区。

公谊宗

也称贵格会或教友会，17 世纪中叶兴起于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创始人是英国人乔治·福克斯。公谊会宣称教会和《圣经》都不是绝对的权威，主张直接依靠上帝启示指导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该派也不设专职的牧师，不举行洗礼、圣餐等仪式。主张信仰自由和男女平等，提倡和平，反对一切战争。该派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拒服兵役。反对向任何世俗权威宣誓、效忠，主张从事正常的社会服务工作。该派主要分布于英国和美国。

基督教新派的组织活动与天主教相比，比较松弛。除上述七大主要派别外，据有关资料记载，目前全世界约有 600 多个教派。有的有国际组织，但也有不少教派只有局部地区的组织，其等级制度不像天主教那样繁琐。

18 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的胜利，思想文化方面也进入启蒙时期，崇尚理性、自由，对旧事物采取批判态度。在这一时期，新教中出现了一些哲学家，例如德国的莱布尼兹、康德，英国的贝克莱和休谟等。他们运用唯理主义哲学，重新解释和论证了基督教的信仰和神学，提倡自由思想和宽容原则，企图调和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矛盾。这些对 19 世纪新教神学的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19 世纪欧洲的新教，更强调个人宗教经验的重要，一批神学家又重新解释了传统信仰和早期基督教，并强调价值和自由，主张调和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提倡社会改革，主张用改良代替革命。

到了 20 世纪，西方社会出现危机，新教中又出现新正统神学，取代了过去的自由主义神学。新正统神学强调人的堕落和罪性，认为人类不能扭转历史，只有通过否定自己，完全顺从上帝旨意，才能得救。在美国新教中，则出现了基要主义。这是一股反理性主义思潮，主张接受基督教的传统教义，并把这一切定为信仰的基本要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俗主义、怀疑主义、各种社会思潮和问题的不断冲击，新教的传统教义和社会伦理思想日趋衰落，信教人数逐渐减少，一些小派别不断产生。此外，新教的一部分教会曾发起普世教会运动，企图在基督教世界中协调各种关系，加强各方面合作，但收效不大。

新教的教义有三大特点：第一，即强调因信称义；第二，信徒人人都可成为祭司；第三，《圣经》具有最高权威。

因信称义是新教救法论的核心，主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新教认为得救的真谛在于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凭借信

心，通过圣灵的工作，使信徒和基督成为一体。这样，基督的救赎就在信徒身上生效。新教认为行善是应该的，但这只是重生得救的表现，而不是功德，它没有使人得救的效能。

信徒皆可为祭司。新教认为只凭信心即可得救，所以不需要神职人员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介，信徒人人都可以成为祭司。此外，每个信徒都具有传播福音的天责，都有在宗教生活中相互照顾帮助的权利和义务，可以互相代为祷告。

新教主张只有《圣经》才是最高权威，每个信徒都可以借圣灵的引导，直接从圣经中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虽然教父遗训以及三一论、基督论等教义也很重要，值得尊重，但它们都不能和圣经相提并论。

圣餐和圣洗礼是新教承认的两种圣事，并认为这是圣经明确记载由基督亲自设立的礼仪。对于天主教和东正教承认的其他几种圣事，比如坚振、告解、神品、婚配等，新教则认为这些不具有完全的圣事意义。

在组织制度上，新教主要有三种教政体制。一是主教制，即各主教区的管理权集中于主教，下设牧师（也称会长）和会吏。各大地区（或国家）的全体主教组成主教团或主教院，形成该大地区（或国家）教会的集体领导核心。二是长老制，即由信徒推选平时从事社会职业的信徒领袖数人任长老，掌管教务权力，并委派或选举牧师执行教务。若干地方教会有领导权。三是公理制，也称会众制，是由各教堂的全体信徒会众直接执掌教会权力并聘任牧师，各堂独立自主，同一宗派教会的联合组织对各教会没有领导权。

新教没有修道院制度和神职人员独身制度。各宗派单独或合作举办神学院或其他宗教学校，以培养教会的专职教牧人员。此外，通过家庭影响，或教会举办一些活动，以及开办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等，来扩大宗教影响。

新教的崇拜仪式比较灵活，主要是圣餐礼文，信徒们都可以参加诵唱。解释圣经，宣传教义，坚定听众的信仰为主要内容的讲道，也是新教重要的崇拜仪式。新教虽然以十字架为标记，但是并不供奉天主教教会那种在十字架上钉有耶稣基督受难的苦像，也不供奉圣徒的雕像，耶稣教认为这是崇拜偶像。新教反对崇拜圣像和圣物，也不搞弥撒活动。

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景教——基督教最初在中国的传播

古代基督教的一派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唐代被称为景教，是最早传到中国的基督教派。聂斯脱利（约380—451年）是叙利亚人，原来是安提阿近郊隐修院的修士，在428—431年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属于当时基督教的东方教会。聂斯脱利对天子圣子降生为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意西方教会传统的神学见解。他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融合为一个“本体”，认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是“神”，她所产的是耶稣的人体，这个人体只是盛“神”的容器。认为耶稣具有真正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神性与人性在耶稣身上的统一，是精神上的统一，不是物体上的统一。聂斯脱利派主张“二重位格”论，否定“三位体”之说，即把耶稣的人性和神性分开，崇拜时再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聂斯脱利派的这些见解，被当时基督教的另一些派别视为异端邪说。罗马帝国的皇帝派人逮捕了聂斯脱利派的创始人聂斯脱利，把他先是送回叙利亚，后又流放到阿拉伯。聂斯脱利最终死在埃及的大沙漠中。聂斯脱利派的信徒也受到迫害，纷纷逃往波斯。聂斯脱利死后，他的信徒们继续向东方发展。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即古代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的管辖区，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赞同聂斯脱利的主张。498年，聂斯脱利派教徒在当时波斯的京城塞流西亚召开一次会议，推选了东方教会独立的大主教，正式接受聂斯脱利的信仰。这次会议宣告聂斯脱利派正式与罗马教会脱离关系，建立

东方教会。此后，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向东方传播中取得了很大进展，成为古代东方教会的主体势力。

就在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向东方发展的时候，正值中国的唐朝。唐朝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他在位期间(627—649年)，唐朝威力远播，直达西域各国以至波斯。唐朝都城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许多外国商人和使臣络绎不绝前来长安。唐太宗视野开阔，对外来文化包括宗教都采取兼容并蓄政策，并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聂斯脱利派传教士来到长安，将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中国人称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为景教。

联系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开辟，为基督教传入中国创造了条件。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候，汉武帝刘彻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使东西方的通路从此打开。广义上的西域地区辽阔，包括中亚和西亚各国，例如大夏（今阿富汗）、波斯（今伊朗）、大食（古阿拉伯）、大秦（古罗马）等。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

研究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到中国及其在华活动的重要文献，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朝景教文献。1625年（明朝天启五年），在西安市西南郊的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载：“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特令传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传教士在635年（唐贞观九年）来到中国的情况。这块黑色的石碑，现藏西安陕西省博物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后近300年，1909年（清宣统元年），甘肃敦煌石窟中又发现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

经》、《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等七种有关唐朝景教的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这些景教文献，记录了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唐朝传播的情况。

原来，唐朝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唐朝都城长安，唐太宗李世民给以礼遇，派遣宰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去西郊迎接，不但允许他在皇帝的藏书楼翻译圣经，而且有时还在皇帝的内室与他讨论福音的道理。唐太宗认为阿罗本带来的宗教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便在贞观十二年（638年）秋七月颁布诏书，允许阿罗本传教，并由政府出资在长安义宁坊建立"波斯寺"（即礼拜堂）。唐太宗的诏书是这样写的："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建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时人将大秦寺多称为波斯寺。波斯寺建成后，有关部门把唐太宗的肖像摹画在寺的墙壁上，使皇帝的英姿焕发出光彩，照耀着景教的门楣，象征着皇帝的形象腾跃吉祥，永远光照着天下四方。由于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允许，基督教聂斯脱利派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唐太宗死后，其第九子唐高宗李治即位。唐高宗继续执行唐太宗的宗教政策，使景教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阿罗本仍被推崇为"镇国大主教"。当时各州亦纷纷设立景教寺，景教影响遍及十省上百个城镇，被许多人家信仰。唐高宗之后，唐朝帝位更替频繁，最终武则天掌握政权，控制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期间，景教发展受到挫折，一度衰落。其主要原因是武则天崇信佛教，不支持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另一个原因是朝中一些士大夫对景教亦多加指责。所以景教的传播与发展受到制约。只是因为有主教及烈、波斯寺寺主罗含以及来自西方的一些景教高僧的维系，景教才勉强地度过了困难的年月。

712 年（先天元年），李隆基即皇帝位，是为唐玄宗。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励精图治，使唐朝进入了全盛的“开元”时期（713－741 年）。他恢复唐太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对景教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照。唐玄宗曾命令他的被封为王的五个兄弟亲临景教寺，设立神坛。与此同时，被毁坏的景教寺也得到了修缮。742 年（天宝元年），唐玄宗又命高力士把以往五位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的画像安置在景教寺内，同时还送来了 100 匹丝绸，以庆贺圣像的安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有关史料对此事都有记载：“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宁寺，建立坛场……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①] 744 年（天宝三年），大秦国景教僧人佶和来到长安当主教。唐玄宗召集波斯寺寺主罗含以及普论等 17 位景教徒与佶和一起，在兴庆宫颂经行忏。745 年（天宝四年），唐玄宗还颁发诏旨，改波斯寺名为大秦寺，诏旨中写道：“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长安和洛阳）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②] 波斯寺改为大秦寺以后，唐玄宗亲自为该寺题写了匾额。有了御笔亲题匾额，使景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达到高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唐玄宗赞扬备至，称“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

唐玄宗统治的后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开始由盛转衰。755 年（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那年，唐玄宗避难四川，太子李亨即皇帝位，是为肃宗。虽然是在战乱期间，唐肃宗对景教仍然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他在灵武等五郡重新建立了景教寺。唐肃宗之后是唐代宗，他对景

---

① 《旧唐书》卷 95，第 3011 页。
② 《唐会要》卷 49，第 864 页。

教也采取保护态度。每逢自己的生日，唐代宗都要赏赐天香，以庆贺事业的成功，还分发宫廷的御食给景教徒，这使景教徒十分高兴。779 年（大历十四年），唐代宗死，唐德宗继位。唐德宗对景教抱有好感。他即位的第二年，即 781 年（建中二年），由景教僧伊斯出钱，伊斯子景净撰文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了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在唐朝近 150 年传教的经过，以及唐朝政府对该教的政策。这里应当说明的是，伊斯虽是景教徒，但也是唐朝政府的官员。他是正三品宫门看守，北方讨伐军副使，试殿副监将，受过皇帝所赐予的紫色袈裟。他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在肃宗朝效力尤著，皇帝幕府名册上有他的名字。在正三品大臣汾阳郡王郭子仪担任北方讨伐军副使时，伊斯被肃宗任命为副使，因而常出现在郭子仪的左右。他还掌握着散发爵禄的权力。正是伊斯的这种特殊身份，其子景净才有可能在 781 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人们也才有可能在今天了解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唐朝传播的情况。

唐德宗之后，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相继而立。此时唐朝已进入衰世，宫廷斗争更加激烈，因而有的皇帝在位时间很短，比如顺宗在位仅八个月。从顺宗到文宗，总计 35 年时间（805—840 年）。这个时期，由于佛教、道教盛行，景教并没有什么大发展，只是在留居唐朝的西域人士当中流传，影响也很微弱。尽管如此，景教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841 年（会昌元年），唐武宗李炎即位。李炎是靠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通过政变登上皇位的。他称帝后，为永远保住皇位，便开始和道士接触，企图修炼成仙，长生不老。840 年（开成五年）九月，武宗即位刚八个月，就把道士赵归真等 81 人召入宫中，在三殿修金道场。后来，武宗还拜赵归真为师，向他学习神仙之道。赵归真等人乘机劝武宗重道抑佛，说佛教不是中国的宗教，白白地蠹耗生灵，应当排斥、铲除。

武宗临朝掌政后，除道教外，全国还流行景教、摩尼教、祆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五种宗教。其中，佛教影响最大。还在贞观年间，僧人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带回大量佛经，佛教的流行进入全盛时期。太宗和高宗都热心宣扬佛教，武则天还为佛教造过大像。中宗更加推崇佛教，举国上下广建佛寺，修饰庙宇，使寺庙建筑更加华丽无比。肃宗、代宗时期，都在皇宫内设立道场，时有数百名高僧在皇宫里面早晚念经。到武宗时，上自京师长安，下至穷乡僻壤，佛寺无处不在，信佛的人遍及全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归真等人劝武宗排斥佛教。当然，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因广建佛寺与庙宇，落发为僧侣者人数倍增，佛教的寺庙经济迅速膨胀，和国家争夺经济利益，这也是武宗灭佛的重要原因。当时曾有人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武宗在抑佛的诏令中也说："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寺人利为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1] 845 年（会昌五年），八月抑佛诏旨颁布后，全国很快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抑佛运动，到处都在拆毁寺庙、驱赶僧人。据后来户部统计，这次总计拆除寺庙 4600 多所，还俗僧民 260500 人，拆除僧尼住房 4 万多间，朝廷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 15 万人。与此同时，这次抑佛，也祸及景教、摩尼教等，景教寺、摩尼寺、祆祠等也一并拆毁，景教徒、摩尼教徒有 3000 人还俗，京城长安有女摩尼 72 人无处安身，自杀身亡。

唐武宗灭佛运动不仅使佛教遭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也使景教受到沉重打击。不过，在武宗死后，宣宗李忱即位，立即把这个案给翻了过来。847 年（大中元年）闰三月，宣宗颁布敕令，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会昌末年，裁减寺宇，并不妥当。佛教和其他宗教虽说是他国之教，中国人久行其道，压抑过分，有失民心。今

---

[1] 《旧唐书・武宗本纪》。

后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凡有会昌末年所废寺庙，原来名僧能够修复的，一任他们主持修复，各级官吏不得禁止。这样，和佛教一起，景教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正因为如此，在878年（乾符五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的时候，那里仍然有景教徒。

唐朝经过黄巢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已经是夕阳西下，日近黄昏，中央政府既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权威。藩镇割据日盛，宦官势力日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唐朝皇室扶植的景教，随着唐朝的灭亡，便也在中国的内地消失。基督教最初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有240多年。

也可以这样说，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内地是随着唐朝的兴盛而发展，也是随着唐朝的衰败而消失的，和唐朝几乎相始终。980年即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教士那及兰及另外五名教士，奉聂斯脱利派大主教之命前来中国整顿景教，他们却发现基督教在中国内地已不复存在了。987年（宋雍熙四年），他们回去后在报告中说：“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人外，无第二基督教徒矣。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归回也。”[①]那及兰等人的报告表明，在唐末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遭到致命的打击后，已无可挽救地在中国内地消失了。

古代中国文人有写诗凭吊的习惯。宋朝著名诗人苏东坡及其弟子由曾游览南山大秦寺（即盩厔大秦寺，今陕西省周至县境内），并分别留下了诗作。苏东坡在诗中写道：“晃荡平川尽，坡陁翠麓横。忽逢孤塔回，独向乱山明。信足幽寻远，临风却立惊。原田浩如海，滚滚尽东倾。”子由在诗中说：“大秦遥可说，高处见秦川。草木埋深谷，牛羊散晚田。山平堪种麦，僧鲁不求禅。北望长安市，高城远似烟。”金朝诗人杨云翼也曾游览大秦寺，并留

①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26页，知识出版社，1982。

有诗作，其中写道："寺废基宫在，人归地自闲。绿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暗谷行去度，苍烟独鸟迁。唤回尘土梦，聊此弄澄湾。"从上述这些文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往日的大秦寺早已颓废，除了孤塔、基石、碧瓦外，只有牛羊在这里吃草，庄稼在这里生长。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即唐朝景教，随着其扶持者的垮台，也在中国的内地消失了。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只有政府扶持，而没有世俗土壤的外来宗教，是难以在中国内地扎下根的。

虽然唐朝灭亡后，景教也随之在中国内地消失，但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景教仍在流传。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辽朝，全盛时疆域辽阔，东到大海，西达天山，北包括今内蒙古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南奄有今河北、山西大部，境内民族众多。在辽朝第六代皇帝圣宗耶律隆绪在位期间（998—1030年），景教已在辽朝境内传播。从考古发掘到的材料看，在辽朝管辖境内，发现了许多石十字碑，十字形横竖两道，长短平均，四端宽大，而中间狭细，和西方八九世纪的十字架的形状相同。此外，在辽朝管辖境内今涿县琉璃河左近山中，还发现了一座古十字寺，寺中有十字碑，碑上的十字形状同于前述。十字的四角还有叙利亚文字，这也和唐代的景教碑相同。经考证，此十字寺为辽朝所建，圮毁后，碑幢仍在，后有名净善的僧人经过此地，见到石幢十字，遂决定重修该寺，名古刹十字寺。寺修成后，附近的居民都称其为十字寺。上述情况表明，在辽朝中叶，即北宋年间，基督教还在中国北方传播。[1]

辽朝灭亡后，辽太祖的八代孙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在也迷里立国，定都八剌衮。接着，积极向外扩展势力，先后归并了高昌回鹘王国、东部喀喇汗国、西部喀喇汗国和花剌子模国，使西辽很快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中亚帝国。在西辽境内，活跃着多种宗

①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1。

教，景教是其中之一。总主教伊尔亚三世（1176—1190年）曾在喀什噶尔建立聂斯脱利派总教区，管辖地包括七河地区，在七河地区留下了许多碑铭。[1] 西辽的末代皇帝耶律直鲁古被西方人称为铎德可汗。他在位34年间，和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驿使相通，往来不绝。当时欧洲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正组织十字军，以图恢复被伊斯兰教国家占领的地区。耶律直鲁古曾致信欧洲信奉基督教的各国国君，表示愿意加入声讨伊斯兰教国的队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西辽传播的情况。[2]

也里可温——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

也里可温是元朝对基督教徒的一种称呼，也里可温是由阿拉伯文的"阿罗诃"转写而来，意思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元朝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它表明元朝建立后，基督教再次传入了中国内地。

前面曾经指出，唐朝灭亡后，景教随之也在中国内地消失，但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景教仍在流传，这里就包括蒙古族聚居的地区，例如外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蔑里乞部以及内蒙古的汪古部等。众所周知，蒙古族的先世是中国境内东胡语系室韦的一支，唐代称蒙兀室韦，最早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后来逐渐西迁，才出现在大漠南北。1206年，铁木真被推举为首领，人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开始向中亚和欧洲扩张。蒙古军西征的过程中，得罗马教廷多次致信蒙古统帅，希望停止杀戮，并希望能够永结百年之好。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成吉思汗从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罗·波罗和叔叔马弗·波罗兄弟

---

① 魏良弢：《西辽史纲》，第六章，人民出版社，1991。
② 萧若瑟：（民国丛书）《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一，上海书店，1990。

处“获悉了罗马人的全部所作所为，不胜欢喜”，允许罗马教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被征服地区的景教徒或因被俘，或是因经商，相当一部分人来到蒙古地区，加上罗马教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景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更加扩大。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后，蒙古国的宗室贵胄大多信奉景教，其中不仅有辅佐成吉思汗的名相耶律楚才，而且还有后来辅佐定宗的瓜达可和真该两大臣。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之妻玛真都剌吉纳。窝阔台即元太宗，在位 13 年，建都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他死后，由第六后即玛真都剌吉纳权朝听政。玛真都剌吉纳信奉景教，她的左右近侍也都信奉景教。玛真都剌吉纳还在自己的住处附近修建一所圣堂，按时依景教礼仪在里面举行弥撒等圣事。在圣堂内鸣钟诵经，声音可以传到宫廷。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蒙古汗国时期景教在蒙古地区流传的盛况。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于 1264 年改燕京（今北京）为中都，1272 年又改为大都。1279 年南宋灭亡之后，随着大都成为元朝的都城，蒙古贵族进入内地，景教也再次传入内地。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政策。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那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1] 所以元朝时，大都城内景教徒人数众多，在元朝全境则有 3 万人之多。“这些景教徒一般都有雄厚的资财，他们的教堂整齐华丽，有十字架及像，以供奉天主及古先圣贤。有的景教徒还代元朝皇帝举行各种祈祷，所以得到皇帝庇护，能享受许多特权。”[2] 另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萨逊城（今甘肃省敦煌附近的沙州），有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的基督教》，第 44 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② 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卷 3，转引自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 140 页，知识出版社，1982。

景教派基督徒。在欣斤塔剌恩州（今新疆巴尔库勒），也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在肃州、甘州、西宁、河北真定等地，都有景教徒。景教徒还在甘州建立了三座华丽的大教堂”。[1]

元代景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并在一定范围内扩大影响，马薛里吉思起到了一定作用。马薛里吉思又称薛里吉思（薛里吉思即《马可·波罗游记》中常提到的人物。《元史》写作昔儿吉思或昔里吉思，敦煌《蒙度赞》中称为莫萨吉思），他原本是中亚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一名医生。撒马尔干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中心，是东方教会大主教的驻地。马薛里吉思是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其外祖父撒必是当地名医，曾为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治好了病，后因此成为御医，享有各种特权。1268年，拖雷子忽必烈召他进宫，成为一名医官。1278年（至元十五年），元世祖忽必烈任命马薛里吉思为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他由医而官，并以“忠君爱国”为名大建教堂，在镇江建有教堂4所，丹徒2所，杭州1所，总计7所。这7所教堂的具体名称是：镇江的大兴国寺、云山寺、聚明山寺、甘泉寺，丹徒县开沙的四渎安寺、黄山上的高安寺，杭州荐桥门的大普兴寺。据史书记载，这七座教堂都是他休官以后建盖的，有的还是舍宅兴建。他的这些做法，得到元朝政府的支持。当时在镇江，平均每167户居民就有1户是也里可温，每63人就有1人是也里可温。那时镇江共有114206户，由此可见景教的兴盛。[2]

元代的也里可温，不仅是对景教徒的称谓，而且也是对天主教徒的称谓。元朝建立后约20年，罗马天主教会中的方济各会，就已派人到元朝来传教。“方济各会”是天主教13世纪创立的一

①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五章，中华书局，1984。

② 《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六章。

个僧侣组织，以“托钵”（求乞）为生，所以也称“托钵修会”。方济各会由意大利人方济各创立，并得到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支持，从而也成为罗马天主教对外传教的得力工具。

大约在1275年（至元十二年），大都的畏兀儿人、景教修士列班·扫马与东胜州人马忽思相伴去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历经艰难，抵达报答（今伊拉克巴格达）。聂斯脱利派的总主教马儿·亚伯剌哈三世，任命马忽思为大都和汪古部主教，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遣还东方。但因其时伊利汗国与察哈台汗国在阿母河一带发生战争，道路梗阻，又还居寓所。1281年，马儿·亚伯剌哈三世去世，马忽思被推选为总主教，称雅八·阿罗诃三世。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拟联合基督教国家攻打耶路撒冷和叙利亚，派遣列班·扫马出使罗马教廷和英、法等国。此次出访欧洲，扫马先后会见了法、英国王和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罗马教廷因此认为元朝皇帝与各汗国的统治者均崇信基督教。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便命令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约翰·蒙特·科维诺任教廷使节前来中国。1294年，约翰·蒙特·科维诺到达大都。元朝政府给予友好接待，元成宗亲自接见，并允许他在中国自由传教，在大都开设天主教堂。1305年，约翰·蒙特·科维诺在大都建成第二座天主教堂，可容纳200人。据说皇帝、嫔妃不用出宫，即可听到教堂的唱诗声。天主教在元大都扩大了影响。

1307年，罗马教皇格勒门五世封约翰·蒙特·科维诺为大都总主教，掌管中国教务，同时派方济各会修士七人前来北京，协助他掌管教务。约翰·蒙特·科维诺在中国传教34年，最后也死在大都。他在中国传教初期，曾规劝元朝皇帝信仰天主教，未能成功，但元朝皇帝对天主教的态度非常宽厚。约翰·蒙特·科维诺传教初期，曾多次受到景教徒的攻击。景教徒宣称他不是罗马教皇的使节，而是杀害使节的凶手。这些诬陷不仅使他的传教工作无法进展，而且常常遭到监禁和审讯。在最初到元大都的五年

中，约翰·蒙特·科维诺几次面临死亡的威胁。他在寄回欧洲的信中写道："聂斯脱利派教徒——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根本不像基督徒的样子。……他们既直接地又用行贿的办法指使别人对我进行极为残酷的迫害，宣布说我并不是教廷陛下派来的，而是一个间谍、魔术师和骗子。……这个阴谋持续了大约五年之久……最后，皇帝知道我是无罪的……"。① 虽然在中国传教困难重重，但是他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坚持下来了。约翰·蒙特·科维诺曾在他寄往罗马教皇的书信中记述了他传教的情况。1305 年，约翰·蒙特·科维诺在书信中写道：我在京城汗八里（今北京）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钟二口。自到这里以来，已有 6000 余人受洗。如果没有景教徒的破坏和捣乱，受洗者会有 3 万余人。我曾经收养幼童 150 人，他们的年龄自 7 岁至 11 岁不等，都没受过教育，也没有信仰。我给他们洗礼，并教他们希腊文和拉丁文。我还在他们当中挑出 11 人，组织了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就在寺中服务。唱歌时，皇帝陛下也来听，而且非常高兴。1306 年，约翰·蒙特·科维诺在另一封信中写道：1305 年，我在大汗宫门前，又建新教堂一所。该堂与大汗的皇宫仅隔一条街。厩舍、房屋、厅庭及会堂，无不完备。会堂可坐 200 人。教堂四周，又有围墙环绕。

1307 年，罗马教皇格勒门五世派遣七名传教士前来大都协助约翰·蒙特·科维诺传教。七人中只有三人到了大都，他们是哲拉德、裴莱格林和安德鲁。至此，罗马主教中国教区正式成立，约翰·蒙特·科维诺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得到罗马教廷的认可。1313 年，在福建泉州设立天主教主教区，三人先后去了泉州任该地主教。安德鲁在 1326 年写过一封信，从该信中可知，当时泉州有一个亚美尼亚妇人，颇有资财，在泉州建了一所很华丽的教堂，还

①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 262—26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捐了很多钱作为维修教堂费用。这位妇人死后，教堂便归哲拉德主教使用。哲拉德死后，裴莱格林主教继任。这时，安德鲁在泉州附近小林中盖了一所教堂。裴莱格林去世后，安德鲁就移居城内，任大教堂主教。安德鲁在信中还说，在元朝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信徒，都可以依照其信仰，自由居住。他们传教的经济来源，是由元朝皇帝钦赐的薪俸。

元代天主教方济各会派来中国传教的著名传教士，还有意大利人和德里、马黎诺里。和德里曾遍游中国各地，并在大都住了三年。马黎诺里是1324年秋天抵达大都的，是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派出的专使，接替约翰·蒙特·科维诺职位的人。马黎诺里到达大都后，曾觐见元顺帝，为皇帝祝福，并以教皇名义奉赠骏马一匹。马黎诺里在大都住了三四年，随来同事32人，一切费用都由元朝皇帝供给。马黎诺里曾这样记述他在大都的见闻："汗八里都城内，有教堂一所，接近皇宫。堂内有总主教寓所，还有警钟。教士的衣食费用，都由大汗供给，至为丰足。"[1] 安德鲁说"王朝皇帝每年给他的俸金大半用于建筑教堂"。[2]

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北走大漠，元朝灭亡。蒙古人以及信教的官员北走之后，基督教徒也被驱逐出大都。随着蒙古人的失败，基督教在中国内地再次绝迹。

元朝的也里可温——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以后，据统计，景教徒一度发展到3万人，天主教徒也有3万人左右。他们大都不是汉人，而是阿兰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元朝灭亡，基督教虽然在中国内地再次绝迹，但是许多记载和有关遗物，却使人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情况，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

---

①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287页，中华书局，1984。

②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121页，知识出版社，1982。

《多明我会士传教史》记载了作者在福建泉州所发现的元代基督教活动的遗迹：在这个城市中，发现有许多基督教徒活动的遗迹，仅在城墙上就有不少石块刻有救世十字架的标记，还有圣母玛利亚的像，并有天使在地上跪拜，还有两个小挂灯。在一位官员的官邸中，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理石十字架，后来基督教徒们得到许可搬走，十分虔诚而慎重地置于我们在该城的一个教堂里。我和我的同伴在这里的一位学者家中还看到一本古书，是用哥特文写的，字体非常工整，写在最薄的羊皮纸上，内容包括大部分拉丁文圣经。

刘嵩是明初的官员和诗人，洪武初任北平按察使，著有《槎翁诗》。[1] 他在一首《铁十字歌》中，描述了元代基督教的十字架标志。歌词如下：

庐陵江边铁十字，不知何代何岁年。
何人作之孰置此，何名何用何宛然。
形模交横出四角，三尺槎牙偃锥堑。
雨淋日炙黑色滑，土中鲍鳞见斑驳。
人言南唐竹木场所都，铸此罥碰筏与桴。
一沉江中一路隅，是邪非邪焉得虞。
或云此古厌胜法，水怪奔冲赖排压。
雌雄相顾走兴芒，神物护呵谁畚锸。
所以往代鼓铸虔州城，此物千载为英精。
并铸过之铜乃成，精化气感理莫明。
世人往往疑根植，下触每愁风雨殛。
近时暴卒破盲惑，掘地出之夸胆力。
终然弃之不敢匿，我时见之考其式。
赤乌之年乃妄饰。我闻天生五行中，

---

① 《明史·刘嵩传》第137卷。

惟金可革亦可从，何不为刀为错通商工，

为耜为镈利九农。斩犀刺虎为剑锋。

不然行雨极变化腾跃为蛟龙。

何独汩没在泥滓，断璧遗株等沦弃。

铜人不归秦镰废，坐阅兴亡一流涕。[1]

《中国教派志》一书记载：在福建省海岸靠近福宁州的一座小山上，我进入一座像是很古的庙宇，主祭坛上有三座神像，其中一神（如一般所画救世主模样）掌上持一小球，球上有一精美十字架，我把它掰下来带走了。主祭坛右侧祭坛上有一浮雕，是一个妇女形象，披风散开从头盖过双臂，左右下方有数个小女孩，手握手，仰面望着那个像圣母玛利亚的妇女，她敞开披风覆盖他们，犹如圣母玛利亚经常被画成的那种形象。上述小人中有一个一手持另一精美的镀金小十字架。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中国有过一种古代基督教。

基督教在元朝广泛传播，与元朝蒙古统治者的政治态度是分不开的。元朝皇帝对中国和外来的宗教都采用兼容并蓄的政策，并以礼对待各种宗教。元朝的也里可温始终备受尊崇。为了管理也里可温教徒，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元世祖特设立了崇福司机构。据《元史》记载："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和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员，从二品；司知二员，从三品；副使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人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为院。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年，悉以其事归之。

[1] 转引自（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95页，中华书局，1984。

七年，复为司，后定置已上官员”。[1] 崇福司和专管佛、道的宣政院、集贤院，合为元朝三大主管宗教机构。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元朝虽然受到统治者的保护和扶持，却因基督教信徒基本上多由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人士所组成，很少有中原民众参加，所以在蒙古帝国统治中原时期，基督教在中国并没有更深入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赖德烈所说："据我们所知，中国如果过去未曾传入过景教，或罗马教皇也从未派遣孟高维诺(即约翰·蒙特·科维诺)等方济各会修士从欧洲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而来到中国，那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也不会和今天有什么不同。"[2] 这说明元朝的也里可温对中国影响不大。

① 《元史·百官志》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的基督教》，第68页，商务印书馆，1997。

四、基督教在北京的传播与发展

天主教在北京传播始末

天主教在元代传入中国内地，随着元朝的灭亡，它也在中国绝迹了。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并得到发展，是中国明末、清初的事。这一时期也正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其发展的后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资本主义萌芽已经破土而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日益腐朽，佛、道诸教呈衰败之势。中国正经历着明、清两代转换之际的动荡与多难，但积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并根植于中国民众的心中。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欧洲第一批殖民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十五、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天主教教会势力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殖民扩张，传教士敏感地意识到："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它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①] 整个世界正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西方科学文化向中国的传播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学辅教"是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手段；维护教会和西方利益是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首要任务。正如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盖茨所说："从长远观点来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带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来的最终结果必将是和平地征服世界。"[1]正是为此目的，1510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印度果阿，随后便准备继续东进。天主教会中的耶稣会势力也开始到东亚传教。1514年，在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的请求下，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1552年，耶稣会教徒方济各·沙勿略来到中国，到了上川岛，后病死在那里。他是第一个到达中国而未能进入内地的耶稣会士。

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使用行贿手段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得准交纳租金，入居澳门。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殖民者私自扩充居地、构筑炮台，强行租占了澳门。此后，天主教耶稣会士也接踵来到澳门。教会规定：凡入教者都必须"学习葡国语言、取葡国姓名，度葡国生活，故不啻进教即成为葡国人也"。[2] 中国人对西来的传教士本来就不甚了解，加之条件苛刻，因而入教者寥寥无几。1578年，耶稣会"印度和日本教务巡阅使"范礼安到达澳门，他在研究了中国情况以后，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站住脚跟，必须改变自身的传教方式，提出耶稣会传教士要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要中国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教。在范礼安的要求下，果阿耶稣会印度省省长派罗明坚前来中国。1579年，罗明坚抵达澳门。

意大利人罗明坚到达澳门后，要求范礼安派利玛窦来做他的同伴。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澳门。为了传教，他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中国文化。

罗明坚也开始学习中国文化，而且很有长进，认识了不少汉字，还用汉字写了一部《天主圣教实录》。他经常到广州参加葡萄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②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69页，上海书店，1991。

牙商人举行的贸易会，因而认识不少中国地方官员，这为他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创造了条件。1582 年 12 月，罗明坚携带当时中国没有的时钟、望远镜等物品，到肇庆拜见了两广总督陈瑞。陈瑞安排他住进天宁寺。在这里，罗明坚剃去须发，换上僧装，完全是一个中国臣民的样子。后因陈瑞去职，罗明坚才又回到澳门。继任两广总督郭应聘得知罗明坚有许多奇珍物品可以贡献，便派人来请罗明坚。于是，罗明坚、利玛窦都穿上僧装，于 1583 年 9 月 10 日到达肇庆。在肇庆知府的允许下，他们在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建造了一所两层楼的住院，创立了在中国最早的传教基地。

1588 年，罗明坚回到欧洲，以后就没有再来中国。1589 年，利玛窦由肇庆来到韶州。1594 年，利玛窦换上一套儒服北上，先后在南昌、南京建立了住所。此后，耶稣会士龙华民、苏如望、罗如望、庞迪我等也先后进入中国内地。

在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中，利玛窦是最杰出的人士。1552 年，利玛窦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他 19 岁时立志修道，并产生传道四方之志，遂加入耶稣会。利玛窦不但知识渊博，精通天文、数学、地理、音乐、美术，而且有才识器量，善于交际。他致力研究中国文学，造诣很深，四书五经都能熟读，且通书法。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后，通过介绍欧洲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馈赠含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浑天仪、地球仪、日晷、自鸣钟、《山海舆地图》等物品，获得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员的好感。他与中国士子文人交往的情况，当时就有记载："利玛窦……果异人也。""力以本教诱化华人。……性好施，能缓急，人亦感其诚厚，无敢负者。饮啖甚健，所造皆精好，不权子母术，而日用优渥无窘状。"[①] 温陵李贽在南京与利玛窦相识，曾赠诗一首：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30，第 783、785 页，中华书局，1959。

“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
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
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
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1]

利玛窦遵照使徒保罗“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导，开始留须蓄发，穿丝绸服装，改称“西儒”，饮食起居也全盘华化，“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2] 他刻苦研习中国的经典，并著书立说，宣传天主教教义。但是，利玛窦深知，如果得不到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庇护，他既不能在中国长久立足，也谈不上传教。于是，利玛窦决心北上北京，谒见中国皇帝，利玛窦于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动身北上，1601年1月抵达北京，并想方设法通过进贡，得到皇帝批准使他们留居中国。1601年，利玛窦和庞迪我来到北京，通过明朝宫廷太监马堂，把两座大小时钟和西琴贡奉给了万历皇帝。万历皇帝非常高兴，允其留居北京，更使他兴奋不已。这样，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社会地位和传教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利玛窦留居北京之前，全中国不过100多人信天主教，其中没有一个是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利玛窦留居北京以后，教徒人数显著增加，1603年有500人，1605年有1000多人，1608年有2000多人，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也开始信奉天主教。

利玛窦等人在中国内地发展的天主教信徒中，属于政府官员和儒士行列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徐光启是一个科学家和政治家，曾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著有《农政全书》，曾任礼部尚书。李之藻也是一个科学家，做过知州、太仆寺少卿，向利玛窦学习过天文、数学、地

① 李贽《续焚书》卷6，第667页，中华书局，1974。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的基督教》，第73页，商务印书馆，1997。

理等科学。杨廷筠和徐光启、李之藻一样，也是进士出身，曾向利玛窦学习过几何，听过利玛窦宣教。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并成为明季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这意味着利玛窦等人在中国的传教取得了成功。正如《明史》所记载："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①] 利玛窦在北京的10年，每日除自躬瞻礼，存想省祭，诵经外，"皆谈道著书"，[②] 他不仅是"西学东渐"的先行者，而且也是欧洲汉学的开山鼻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601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逝世。经庞迪我、熊三拔上奏，准以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腾公栅栏为葬地，后来那里便成为北京传教士的公墓（在今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由于利玛窦的努力，天主教在元代灭亡后重新出现在北京地区。他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最高统治者崇祯、顺治、康熙等皇帝使用有科学专长的传教士，再加上传教士们遵循利玛窦创立的传教方法，使天主教适应中国国情，并注意在介绍欧洲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传教，所以从1610年到1700年，中国天主教徒从2500人增加到30万人。在南昌、南京、北京、杭州等地，都建有耶稣会住院。与此同时，这四个地方和上海、山西、陕西等地也都有了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西方传教士不断地从澳门进入内地。

1623年1月，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到达北京。汤若望是德国科隆人。1620年随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来到中国。汤若望非常

---

① 《明史·外国传》。

② 曹子西：《北京通史》第六卷，第295页，中国书店，1994。

精通天文历算，因为对月食的准确测算而受到明朝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1630年，在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下，供职于钦天监。后来他参与了《崇祯历书》的编纂，还受明政府委托，以西法督造大炮。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汤若望因为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而受到清政府保护，仍掌钦天监事，成为清朝钦天监第一任外国人监正。清顺治帝先后封授他为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还赐号"通玄教师"。汤若望身为北京耶稣会会长，随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使北京的传教活动随之逐步发展起来。因为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于是便开始注意在宫廷中传教。

还在明朝没有灭亡的时候，即1635年，汤若望就曾经劝得明朝一个姓王的太监加入天主教。后来，这个姓王的太监又在宫女中劝说50多人加入天主教。汤若望还曾劝崇祯皇帝入教，但未能成功。

在明清易代之际，天主教传教士还曾在南明政权中活动。当时，传教士毕方济、瞿纱微、卜弥格等人都在南明政权中，他们发展的天主教徒瞿式耜、焦琏、庞天寿等人，都在南明永历政权中担任要职。南明永历皇帝曾派遣庞天寿偕毕方济到澳门商议借兵事，澳门葡萄牙当局派兵300名，携带大炮数门，到桂林助战。瞿纱微还把天主教传入到南明王朝的宫廷中。在传教士的劝说下，南明永历皇帝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王皇后、新生太子朱慈烜等一齐领洗入教。王太后等人受洗礼后，于1648年10月，还派遣庞天寿携带礼物到澳门求弥撒，以表示感恩。澳门耶稣会对王太后入教十分重视，曾策划南朝永历政权遣使赴欧洲，寻求支援。王太后上罗马教皇书和致耶稣会总会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王太后写给教皇的信中说："……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贰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送耶稣会士

来，广传圣教”。[1] 1650年11月，传教士卜弥格偕侍从二人赍书从肇庆启程回返欧洲，1653年春抵达罗马。1655年12月他获得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复书。1658年回到暹罗，1659年病死交趾。因而教皇复信未能送达南明永历政权。此外，天主教传教士，还曾与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有过交往，并应弘光皇帝之请，至澳门求葡兵相助。[2]

清朝建立以后，出于修历的客观需要，对汤若望这位德国的传教士仍十分重用。主要原因是汤若望通晓天文。1644年（顺治元年）9月，汤若望精确地推算出全国各城市的日食时刻，使他在清朝的地位得以巩固。清初由于“旧历岁久差讹，西洋历法屡屡密合”，[3] 便令汤若望掌管钦天监，“定造时宪新历”，后官至“太常少卿”、“通政司通政使”。顺治皇帝亲政后，“诰授汤若望光禄大夫，并恩赏若祖先三代一品封典”。[4] 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原天主堂旁空地一块，准许重新修建新教堂。满朝文武大臣遂争相捐助，顺治皇帝的母亲也为修建教堂赏赐了银两。1652年教堂建成后，顺治皇帝御笔亲题了“钦崇天道”的匾额。1657年又亲笔题写“通玄佳境”，赐与宣武门教堂为堂额，并有御制天主堂碑记，以示恩宠。还准许他邀请传教士20多人分别到各地公开传教。顺治皇帝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不得不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顺治皇帝信任汤若望，不仅使在外地的天主教传教士平安无事，而且使中国天主教徒的人数有了新的增加。在中国许多地区，比如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

① 信的原文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菊先生于1911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王太后、马太后、王后、王子慈炬》，中华书局，1988。

② 参看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一册，《卜方济传》，商务印书馆，1938年；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卜方济》。

③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56—58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④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56—58页。

熟、上海、杭州、金华、兰溪、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赣州、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绛州、开封、北京都建立了天主教教堂。1638年天主教教徒有38200人，1650年有15万人，1664年已有148100人。

清初多尔衮辅政期间，清政府一度把天主教传教士发遣到广州居住，京城只留汤若望、南怀仁等数人。康熙皇帝亲政以后，重新使用有科学技术等专长的传教士，于是，清政府录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1671年，康熙皇帝又谕令遣发广州的传教士中，有通晓历法的，起送来京，其余仍在各省居住。由于康熙皇帝的重用，南怀仁的官衔步步高升，最后竟当上了工部右侍郎。受康熙皇帝重用南怀仁的影响，清朝地方政府也把天主教教堂归还给了传教士。1688年，白晋、张诚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到北京，被留京效用。1690年，康熙皇帝在研究解剖学时忽患疟疾，白晋、张诚进呈金鸡纳霜，为康熙皇帝治好了病。康熙皇帝因此对传教士更有好感，这样传教士人数便有了新的增加，教徒人数也增多了。据教会统计材料，1700年中国天主教信徒有30万人。

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天主教人数的增加，清朝初年，天主教中开始出现了中国神父，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罗文藻和吴渔山。罗文藻是福建福安人，他在18岁至24岁间，从一个方济各会传教士手中领洗入教后，曾多次去澳门和马尼拉。1645年，他第二次去马尼拉后，在圣多玛斯学院学习拉丁文、西班牙文及哲学。其间一度回到福建，做外国传教士的助手。后来他又去马尼拉，加入了多明我会。1654年，罗文藻成为神父，回国传教，1685年升为主教。除福建外，罗文藻还到过许多省传教。

吴渔山是江苏常熟人，杰出的山水画家。他是上海地区的第一个中国耶稣会神父。入教以后，他便不再作画。吴渔山著有《三巴集》、《三余集》等著作，这是最早的中国神父讲道集。

17世纪初期，随着基督教各个教派纷纷东来，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对于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方法发生了争执。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以及法国“外方传教会”对利玛窦式的传教方式极为不满，大加指责。他们要求“高举十字架”，改变中国礼仪习俗，欧化中国民族。1693年，法国传教士陆方济提出，中国天主教信徒应当禁止“祭天”、“敬孔”和“祭祖”的活动，违反者要逐出教门。由此便引发了一场“礼仪之争”。“礼仪之争”一方面反映出传教士内部的宗派斗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班牙、法国与葡萄牙对远东保教权的争夺，企图取代已经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取得一定成绩的耶稣会派的斗争。

康熙皇帝出面调和这场争论，并对中国的礼仪习俗做了必要的解释与说明。1656年（清顺治十五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为此做出决定，准许耶稣会按利玛窦传教方式行事，对中国祭天祭祖、祭孔等礼节及丧葬仪式，只要不妨害教徒的根本信仰，均可自由参加。但反对派仍坚持他们的意见。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康熙皇帝指出：“敬孔是敬孔子为人师范，祭祖是尽展孝思之念。”[1] 但到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皇克来孟十一世竟做出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的决定，并派铎罗为使者，携教廷禁约前来中国。罗马教廷禁约规定：“（1）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扁（应为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悬挂。（2）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人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人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3）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

---

[1]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民国21年3月。

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子庙行礼。(4)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5) 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6) 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还使得。(7)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边说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以上禁止条约之礼，屡次查明之后，仍定夺照此禁止条约遵行。"

康熙皇帝在得知罗马教皇的意见后，明白表示：从此以后，如果外国传教士不遵守利玛窦定下的传教规矩，就不能在中国居住，一定要逐回本国。康熙帝还决定，传教士要领票，才能表明你遵照利玛窦的规矩办事了。于是，领票的传教士可以继续在中国传教，不领票的人则被驱逐出境。天主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及法国的外方传教会挑起"礼仪之争"，一再干预和攻讦中国教区之事，是导致康熙末年以及雍、乾、嘉三朝严厉禁教的原因。

1720年，罗马教廷再次遣使前来中国，使者名叫嘉禄。嘉禄到北京后，重申中国天主教信徒不能敬孔和祭祖的禁约。康熙皇帝多次召见嘉禄，并命人把罗马教廷的禁约译成中文。康熙帝看了禁约后非常生气，并谕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意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

免得多事。"[①] 从康熙皇帝的谕示中可以看出，由于罗马教廷不尊重中国当时的习俗，干涉中国内政，致使清政府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不久，他即下令禁止传习天主教。原来，雍正皇帝即位后，西方传教士在各地的活动仍很猖狂，有个别传教士甚至插手皇室的内部斗争，这就促使雍正皇帝下决心禁教。1723年（清雍正元年），浙闽总督觉罗满保重新提出查禁传教士的建议。他说："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饬禁"。[②] 礼部研究了觉罗满保的建议，认为除将传教士驱至澳门外，各省天主教堂应改为公所，对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雍正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除了在钦天监任监正的戴进贤、监副徐懋德为首的20名教士外，其他传教士连同5名主教一起被驱逐出境。谕旨下达后，要求各地给传教士装卸的期限，令他们到澳门集中。不过各地进展不一，亦有行动迟缓者。这次驱逐传教士对天主教是一次较大的打击，各省大小教堂，大多被拆毁，其房屋院落或改为仓廒，或改为书院。顺天府一些属县的教堂改为官所，京都之北堂也改成了病院。除了在钦天监任职和在宫廷服务的有专长的传教士仍继续留居北京外，各国传教士不敢公开露面，他们只有在本国政府支持下，秘密潜入中国内地传教，传教事业陷人了绝境。

乾隆皇帝继续执行其父雍正皇帝的禁教政策。乾隆时期，清朝政府多次下令搜捕秘密进人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使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嘉庆皇帝即位以后，仍然禁止西洋人刻书传教。1845年（嘉庆十年）4月，清政府明令禁止西洋人

---

①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民国21年3月。

②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155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刻书传教。嘉庆皇帝就御史蔡维钰奏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一折，谕示内阁："京师设立西洋堂，原为推算天文，参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近来各堂西洋人，每与内地民人往来讲习，并有刊刻书籍，私自流传之事。在该国习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讲论成书，原所不禁。至内地刊刻书籍私与民人传习，向来本定有例禁。今奉行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二三好事之徒，创其异说，妄思传播，而愚民无知，往往易为所惑，不可不申明旧例，以杜歧趋。嗣后，著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人往来交结，仍著提督衙门，五城、顺天府将坊肆私刊书籍，一体查销，但不得任听胥役藉端滋扰，致干咎戾。钦此"。[1] 此后不久，清政府察觉广东民人陈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并查出传教习教各犯，嘉庆皇帝遂命将刊刻汉文经31种并向旗民传教的西洋人德天赐，送经热河圈禁；将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的陈若望，在教堂讲道的汉军周炳德、民人会长刘朝栋等，全部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人为奴；将充当会长的妇女陈杨氏，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将教堂存贮经卷及其刊刻板片，一律检查销毁。不久，清政府制定了稽查西洋教的章程，明令禁止西洋人刻书传教。

1811年（嘉庆十六年）七月，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福庆上奏嘉庆皇帝，谈及西洋人贺清泰、吉德明已年老多病，毕学源尚能通晓算法，此三人请令留京；高临渊、颜时莫、王雅各伯、德天赐四人，学业未精，留京无用，应遣令归国。嘉庆皇帝谕示内阁："贺清泰、吉德明、毕学源三人准其留京，饬令在西洋堂安静居住。高临渊等四人，交步军统领衙门，在他们起程时，派参将、游击二员，酌带兵丁数名，体送至良乡县。直隶总督再于文职同知通判内，武职都司游击内，拣派妥员，带同兵役接替伴送出境。山

[1] 《清实录·仁宗实录》第246卷。

东以下经过各省，均照直隶一体派员接替，到广州后，交两广总督松筠收管，等到有方便船只，饬令他们附载归国。沿途所过地方，以及在广东居住期间，均不许他们与内地人民交接往来。倘有意外之事，惟伴送之文武官弁是问，慎之”。[1] 清政府还下令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嘉庆皇帝谕示内阁说："西洋人住居京师，原因他们熟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先用。现在京的西洋人共11名，除福文高、李拱辰、高守谦三人现任钦天监监正监副，南弥德在内阁充当翻译差使，毕学源通晓算法留备叙补，贺清泰、吉德明二人均年老多病，不能归国，此外，学艺未精的高临渊等4人，已饬令归国，现在留京的西洋人只有7人。这7人中，有官职差使的，出入往来都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与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年老多病的，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不至发生传教惑众等事。至于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地方，也就不应有西洋人在境内潜住。从前外省拿获习教人犯，总说传播始于京师，今京师已按名稽核，彻底查清，若外省再有传习此教的，必定另有西洋人在那里煽惑，地方匪徒私自容留，不可不加以严禁。除广东省向有西洋人来往贸易，其居住处应留心管束，不得任其私行传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按例惩治外，其余各直省，各督抚都要饬属通行详查。如现有西洋人在境，以及续有西洋人潜来的，均令地方官即行查拿具报，一面奏闻，一面递交广东遣令归国。如地方官查办不力，致令传教惑众，照新定条例，严参重处。若内地民人私习其教，又影射传惑的，地方官一律查拿，按律治罪"。[2]

尽管从雍正朝到嘉庆朝，清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

① 《清实录·仁宗实录》第246卷。
② 《清实录·仁宗实录》第246卷。

但清政府对传教士的态度是有区别的。那些在清宫廷服务并且有专长的人,仍然可以留居北京,有的人还受到清政府很好的待遇。比如郎世宁,他是意大利人,出生于米兰,天主教耶稣会修士,是画家兼建筑家。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来北京传教,不久任清朝宫廷画师,曾参与增修圆明园建筑工程,擅长肖像、花鸟、兽,尤工画马。他的作品参酌中西画法,注意透视和明暗,注意写实,刻画细致。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六月),朗世宁因病在京去世。初十日,乾隆皇帝以他自康熙年间入直内廷,颇著勤慎,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内府银300两,料理后事。

道光皇帝即位后,因为钦天监的中国官员已经深知西法,不必再用西洋人,于是谕示停止西洋人入监。1873年(道光十七年),钦天监最后两个传教士高守谦和毕学源,一个返回欧洲,一个因病去世。这样,北京就再没有合法居留的传教士了。

天主教在中国北京发展的第二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即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这一时期,以基督教新教入华为起点,各派各差会纷纷凭借殖民势力,进行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不过,这一阶段天主教在中国北京的发展,和第一阶段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在第一阶段中,天主教传教士是受中国政府管理的;而在第二阶段中,传教士们则改变了明清以来在中国传教的谦恭卑微的态度,随着大炮和军舰昂首阔步地闯人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而是各受本国政府的保护,并依仗本国的政府和清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到处设立教堂、修道院,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用种种方法传布、发展天主教,俨然成为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势力。一些传教士们说:“我们不须大动海军,也不须多费钱财;需要的不过几只中等的和小型的军舰,由一个志坚心决的人率领着,带着一份拟就的,要清廷签字的条约稿本,直接到北京去,通知清廷它不但负有全权去签订条约,而且非等它的使命完成时,决不离开北京。也许有人

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去这样做。但是，中国既抛弃国际公法，难道我们却要受国际公法制约吗？对这样的政府待之以礼，他们就会当做这是你的懦弱；向他们的官吏横眉怒目，你就博得他们的优惠”。[1]从此，基督教教会凭借暴力步步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该条约第22款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惩”。[2]此后，法国使臣、天主教政界人物拉萼尼又要求清政府弛禁天主教。结果，1846年2月，道光皇帝颁布上谕：“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名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3]清政府弛禁天主教政策颁布后，天主教传教士首先在上海开展了活动。拉萼尼欣喜地说：“我欣悉我出使时工作，虽然有阻力和某些官员的刁难，但终于因收到基督教文化和宗教自由的极大成效而高兴”。[4]

罗伯齐在1834年从澳门潜入湖广、江南，他是罗马教廷传信部派遣来中国的，并被任命为“管辖”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南京教区”的署理主教。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在1842年到达上海，1846年8月被任命为上海耶稣会会长。

罗伯齐与南格禄来中国后，他们首先开展的活动，就是要求上海地方官员发还上海城内的天主教堂和旧教产。结果，他们得到了董家渡、洋泾浜、石皮弄三块土地，又在徐家汇徐光启的几户信教后裔中得到了一块土地。南格禄在这里修造了第一所徐家汇天主堂，罗伯济和他的继承人赵方济在董家渡造了主教座堂。自此以后，所谓“给还旧址交涉”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传教士依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②④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第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③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52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仗特权制造不少事端，他们仗势侵占民田、民居，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义愤。如总理衙门记载："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有无窒碍，强令给还。甚至绅民有高华巨室，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让还。且于体制有关之地及会馆、公所、庵堂，为阖境绅民所最尊最敬者，皆任性需索，抵作教堂。况各省房屋，即属当年教堂，而多历年所，或被教民卖出，民间辗转互卖，已历多人，其从重修理之项，所费不资，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让还"。[1]随着教堂的归还，及上述上海的这些天主教堂的重新建立，表明鸦片战争后天主教重新在中国获得了发展。但是，中法《黄埔条约》并不能满足外国传教士企图使整个中国都开放的愿望。他们对清政府把传教权限制在五个通商口岸，"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2]的规定极为不满，并指责"把宣讲福音限制在五口和邻近地区是没有丝毫理由的"。[3]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在英法联军大炮的轰击下北京沦陷，随之整个中国的防线彻底地崩溃了。被打败的清政府与俄、法、美、英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对于传教权力，都有明确的规定，迫使清政府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中俄《天津条约》第八条规定："天主教原为行善，嗣后中国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辱，亦不可与安分之人禁其传习。若俄国人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馆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4]

中美《天津条约》第29条规定："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

---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50卷。

② 道光皇帝1846年"上谕"的规定。图理琛：《教务记略》，第1卷，第3页，上海书店1986年版。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53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③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6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④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8—147页，三联书店，1957。

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已者亦如是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①

中英《天津条约》第8条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府，不得苛待禁阻。”②

中法《天津条约》第13条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人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③接着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第6条又宣称：“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墓、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传教士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④这些条约的签订表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事业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扩张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传教士为了把在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与保护鸦片贸易的战争融为一体，还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条款中擅自加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无论如何也是道德上永存的污点。但是中国官府和上层社会文人却视中国信徒为“非我族类”的异己力量，如薛福成认为：“中国（民教）之衅，何时而弭？虽然多事，犹中国之幸也。何也？以民之未尽变于夷也。窃恐数十年以后，耳濡目

①②③④ 以上条约均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8--147页，三联书店，1957。

染，渐渐不怪，则附之者日多，彼洋人敛中国之财，啗中国之民，启中国之变，胶固盘结，踞我堂奥，闲暇伺会，猋迅云合以起，而洋人纠群国之制其弊，虽有圣人不能为之谋矣”。[1] 由此可见中国上层社会对中国教民的看法。尽管如此，近代中国早期信徒仍然是忧国忧民的。中国第一位本国籍的耶稣教会宣教师——梁发，曾因宣教被官府逮捕，终以“离国出洋”之刑律“科罪”，遭衙役毒打，饱受缧绁、鞭笞之苦后乃获释。[2] 正是这位被朝廷一再缉拿的逃犯，在鸦片战争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到了广州向英国领事的中文秘书马儒翰（马礼逊之子）说：“如果英国政府派遣兵队来到中国杀害中国人，那么中国此后再也不会接纳《圣经》和听英国传教士讲道了”。[3] 梁发请求马儒翰想方设法来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事实表明中国基督教信徒是爱国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通过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传教士获准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力。这标志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标志着清政府对基督教政策的重大转变。1860 年 10 月，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北京主教”的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孟振生到达北京，在法国侵略军的支持下，重开了已封闭 20 余年的北京天主教南堂。这表明，外国传教士的活动，清政府已经无力管理。

随着上海、北京两地天主教活动的展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教士争先恐后来到中国各地。这其中既有法国耶稣会、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也有意大利方济各会、米兰和罗马外方传教会，西班牙多明我会和奥斯定会，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德国圣言会等修会和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此外，外国的修女，比

① 《庸庵文编》，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本，第 2 卷，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13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②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 175—176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③ 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 198 页。

如法国仁爱会修女，也到了宁波、上海、天津、北京。由于外国传教士凭借特权，欺压中国百姓，强买强占土地，包庇入教莠民，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而引发了许多教案，如西林教案、贵阳教案、南昌教案、成都教案、天津教案等。这些教案从南到北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当时一些爱国文人对此痛心疾首地感叹道："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睨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据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邑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1]外国历史学家斯奈也承认："传教事业过去与殖民主义有关，这个事实是必须承认的"。[2]

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随着它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既得利益的增多，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为帝国主义侵吞的对象。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人民大众反瓜分、反洋教的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全国各地到处掀起反对教会压迫和剥削的群众性运动。毁堂毙命，与教堂武装刀枪相见。民间百姓甚至收集各家的水和面，将其捏成小面人，"放在锅里，拿到十字路口用火煮。煮时嘴里还祝祷着说'千家面，百家水，活活煮死小洋鬼'。"[3]这种做法，虽不可取，但是它表明中国人民对洋教、洋人仇恨已极。这些反洋教的斗争，终于汇成了义和团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巨大洪流。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就完全是对着教会、不法教士和不法教民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如潮水般席卷了整个华北地区，并进入北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4卷，第20页。
② 中国基督教协会：《教会简史》，第6页。
③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501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京。义和团团民围攻天主教的北堂、东堂、西堂和南堂，同时也围攻使馆区。它把对不法传教士和教民的积怨、仇恨迸发出来，因而见到洋人修的铁路也仇恨。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基督教的强制输入不仅使近代中国人“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①]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外国传教士希望并要求本国派更多的军队来华惩罚中国人，保护传教工作。传教士谢卫楼、丁韪良认为：“传教士希望更多地流血……因为传教士了解中国人的本性和中国的形势，宽舒意味着更多的外国人和中国教徒将失去宝贵的生活”，[②] 丁韪良声称：“对杀害传教士和天真儿童的人进行任何惩罚都不过分，……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明智干涉而得以拯救”。[③] 这些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反教行为主张以牙还牙进行“惩罚”，与他们宣教时“怜悯众生，宽赦人罪”、“爱人如己”的说教大相径庭。这种做法当时就受到美国宗教界人士W·A·梅西的强烈谴责，他说：“应该让那些密切注意中国危机形势的基督徒们记住，战争和暴力只会导致罪恶：炮声述说的决不是兄弟般的情谊，而是仇恨和邪恶。战争也许会清除一些障碍，但从来不会弥合仇恨。这个民族（指中国）可能会被挫败，但是火与剑是不能使他们对西方产生爱的”。[④]传教士中的有识之士忧虑地说：“武力增加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使福音更难进入中国人的心灵”。[⑤] 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野蛮的镇压下失败了，一些传教士成为八国联军的特种工作队。

清政府在侵略军的压力下，被迫与英、美、法、德、日、俄、

---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48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7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③④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7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⑤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14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意、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11个国家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自此教会又开始恢复和活跃起来。所以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天主教在中国有了更大的发展。根据有关教会统计的材料记载：1889年中国天主教徒有54万余人，到1909年已增加到121万余人。天主教中还有了中国神父和修女。1889年有中国神父329人，1909年增加到631人。1901年中国修女人数为350人。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还创办了许多教会学校。比如上海的震旦大学，以培养为在华外国势力和教会的各种机构需要聘用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传布天主教。此外，天主教孤儿院、施诊所等"慈善机构"，也陆续开办起来。

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尽管中国教徒有几百万，中国神父有数千名，中国修女也为数不少。但是，教会的领导权却一直掌握在外国主教手里，教会和教务都受他们支配。这些外国主教把中国教徒看成是他们的"教民"，要中国教徒完全服从他们。这样，中国天主教成了外国势力支配的宗教，中国教徒处于无权和受压迫的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中国天主教内，美国势力急剧上升。当时的教皇追随美国侵华政策，他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黎培里和回到南京主教区的于斌，都是反对共产党的。他们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来对付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为敌。美国通过纽约总主教史贝尔曼插手中国天主教会。1949年初，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天主教内反共势力的大部分都已外逃。不过从抗日战争时期总体情况看来，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基本上处于衰退状态。虽然基督教信徒人数有所增加，但是教会活动的范围却趋于缩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天主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天主教已成为中国教堂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持统一战线，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

政策，开展了对天主教的工作。于是，在中国天主教内掀起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自此中国天主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许多地方的教区还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到了1956年的时候，地方性天主教爱国会达到200多个。1957年6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当前，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确定了四大任务：

第一，团结神长、教友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听从耶稣的训诲，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贡献一切力量。

第二，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协助教会办好荣主救灵事业，同时效法耶稣纯洁圣殿的榜样，反对任何外来势力对我国教会的干涉和控制，警惕并制止极少数坏人，假借宗教名义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及进行非法违法活动，巩固和发展反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

第三，继续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帮助神长、教友过好宗教生活，实事求是地向有关部门反映落实政策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争取使必须解决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同时还必须向神长、教友广泛地进行爱国守法教育，要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自觉地遵守国家政策法令，做天主的好儿女、国家的好公民。

第四，加强与国际天主教人士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980年，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成立。这两个领导机构的成立，反映了中国天主教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也反映了中国天主教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东正教在北京传播始末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前后，中国清朝军队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中，曾经俘虏了一些俄国入侵者，总计约100多人。其中，41人被安置在盛京（沈阳），其余59人被送到了北京。这59人到北京后，被安插到八旗兵镶黄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十七牛录）处，当时他们驻守在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1]清政府对这些俄国俘虏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政策，不仅允许他们与中国人通婚；对俘虏中的军官，还分别赐授正四品至七品官衔，发给他们土地、房屋和津贴。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双方勘定疆界，释放战俘时，有的甚至不愿意回俄罗斯去，而继续留居北京。对这段历史，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记载说："闻俄人俘虏，久留北京，归化满清，视为旗人，清末陕西总督升允即裔云"。[2]康熙皇帝十分尊重这些俄国人的宗教信仰，曾将胡家园胡同内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为临时祈祷处所，北京人称其为"罗刹庙"或"北馆"，俄国人自己称为圣索菲亚教堂或圣尼古拉教堂。这59人中，有一个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的东正教司祭，还被康熙皇帝授予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清政府的这些安置措施引起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关注。1695年（清康熙三十二年），俄罗斯东正教会托博尔斯克教区都主教伊格纳蒂·李姆斯基·哥萨阔夫，曾托来华商队给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司祭送来承训圣索菲亚教堂的证书，同时还带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被俘虏，这对神圣的事业是有利的，因为基督的正教信仰要依靠你们来加以传播。你不单要为沙皇祈祷，也要

①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九。

② 转引自王友三：《中国宗教史》下册，第939页，齐鲁书社，1991。

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传播正教的立足点”。[1]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对北京的圣索菲亚教堂也极为关心。他想利用这个教堂作为据点，来窥视清朝政府的政治动向，以为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服务。彼得一世曾经表示：必须占有对俄国未来发展异常重要的黑龙江口。为此，他还颁布特谕：要认真物色西伯利亚都主教人选。俄罗斯正教会要把研习和通晓汉、蒙语言和调查中国情况提到国家利益的高度，以便逐步地使中国和西伯利亚那些愚昧无知、执迷不悟的生灵，皈依天主，使中国皇帝及其臣民从罪恶的黑暗中走向正教信仰的光明。1693 年（康熙三十一年）底，沙皇彼得一世通过使节，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在北京建立一所俄罗斯正教教堂的要求，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1711 年，沙皇彼得一世派代表来中国，向清朝政府提出：希望中国方面准许俄国派遣修士大司祭来北京接替已经去世的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司祭的神职工作。清朝政府接受了这一要求。[2] 1714 年，彼得一世遂派以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和修士司祭拉夫连季、修士辅祭菲里蒙、教堂辅助人员阿法纳耶夫等 8 人组成的一个传道团前来北京。这个传道团就是第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的传道团。传道团受到清朝政府隆重的礼遇，给予他们十分优厚的生活待遇。

1727 年（清雍正五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在京城之俄馆，嗣后仅准前来之俄罗斯人居住。至俄使萨瓦请求修庙一节，由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协助于该馆内盖庙。现在京喇嘛一人住该庙，又按请求再准补派三名喇嘛，俟其到达后，照先来喇嘛之例，供以膳食，安置于该庙。凡俄罗斯人等，可按其规矩前往礼拜念经。再将萨瓦留于京城念书之四名

---

①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 181 页，学林出版社，1986。

② 阁理琛：《教务记略》，第 3 卷，第 1 页，上海书店，1986。

学生以及通晓俄罗斯文、拉丁文之两名成年人，亦准住此庙，并以官费养之”。[1] 根据以上规定，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取得了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权益，并取得在北京东江米巷（东交民巷）建立新教堂的权利。1732 年（清雍正十年），东江米巷的奉献节教堂（俄罗斯南馆）建成。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随之由胡家园胡同的罗刹庙（北馆）迁入东江米巷。至此，俄国东正教教会终于实现了在中国政治中心建立传教据点的愿望。

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实质上是俄国政府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它名为“传教团”，实则“负有供给俄国使臣情报之秘密任务，甚至暗中参与密谋”。[2]它执行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工作内容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驻北京传道团最初是由俄国沙皇政府西伯利亚事务衙门领导，1809 年改由俄国外交部直接指挥。“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3] 俄国国库为其提供大笔经费。起初每年拨付 6500 卢布，从 1820 年起增至 16250 卢布。[4]

从 1715 年到 1917 年，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总计 18 届。有关材料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并不以传教为主，而是为沙皇俄国夺取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而尽心尽力。特别是在 1840 年至 1860 年期间，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直接参与了沙皇俄国的侵华活动。1861 年，俄国政府援引 1860 年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有关条款，直接由沙皇俄国政府外交部派公使进驻北京，并将驻北京的传道团公然划归俄罗斯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直接领

---

① 李刚己：《异域录》，见何秋涛《朔方备乘》卷 43。

② 《明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 61 页，云南崇文书馆。

③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著：《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 282 页。

④ 黄心川：《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第 34 页，辽宁出版社，1980。

导。俄国政府居然将传道团所驻的东江米巷南馆改为俄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令传道团迁回北馆居住。此后，自1878年时起，由第16届传道团开始，传道团的活动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即从原先以参与俄国外交活动为主，转为以传教事务为主。这是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政策的转变。为了传教，高连茨基修士大司祭把一些传教书刊翻译成汉文。到1892年，信仰俄罗斯东正教的中国籍信徒总计有495人，不过其中还包括俄罗斯人的后裔149人。在其余310名中国籍俄罗斯东正教信徒中，约有250人住在北京城内，有60人住在北京安定门外东安定村内。为了传教的需要，第16届传道团翻译和出版了《圣经》、《福音义解》、《教理问答》、《升天指南》、《正教祈祷仪式讲解》，以及其他神学著作。从1861年到1889年间，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管辖的机构，除圣索菲亚教堂外，还有在南馆的奉献节教堂，以及位于北京安定门外东安定村的圣伊尔库茨基·英诺肯提乙教堂。此外，还有修道院及教会办的男女学校等。

1889年，以修士大司祭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为首的第18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到达北京。不久，义和团进入北京。使东正教的活动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北京的东正教信徒约有200余人被杀，其中包括司祭一名，诵经士一名和几个教会执事人员。北馆的圣索菲亚教堂、图书馆，以及属北京传道团的男女学校、养老院等，还有在张家口的教堂、北戴河的祈祷地，也都被义和团烧毁。[①] 东安门外传道团的墓地，也被拳民挖开刨平。在东北，中东铁路沿线的所有俄国东正教教堂、祈祷厅，也被当地群众全部焚毁。[②]

1901年，清朝政府被八国联军打败，被迫签订不平等的《辛

---

①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250—252页。

② 黄心川：《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第34—4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

丑条约》。1902年，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回国述职，被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晋升为主教。他再次回到北京，带回几十名神职人员和技术人员，使第18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规模大大扩大了。驻北京传道团还从庚子赔款中获得了13.8万两白银的赔款，除修复已经被毁的教堂外，又修建了许多新教堂如教众归天堂、圣母堂、英诺肯提乙堂，以及钟楼、图书馆、男女修道院、男女学堂、神学院、坟地教堂等，还设立了面粉厂、牛奶场、养蜂场、织布厂、工艺厂、印字房、订书房、养蚕室、果园、菜园等。不少中国人为了谋生，开始信仰东正教，中国教徒的数量显著增加。随着俄罗斯在华势力的增大，东正教广泛地传播于北京西山、通县、涿县、房山、永平、古北口及天津、北戴河、上海、汉口、广东、浙江乍浦、沈阳、旅顺、大连、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满洲里等地，并在这些地方设立了教堂。据统计，到1906年时，受洗的中国籍东正教信徒已有725人。当时在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信徒总计为3万多人。[①] 设立教堂37座，神学院一所，男女学校各20所，气象台一座，企事业机构46家。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大批沙俄军官、官吏、资产阶级、地主、贵族、皇族和东正教的各级神职人员纷纷逃到中国新疆、哈尔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教堂。其中，不少流亡者成了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的东正教教会对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立场。与此同时，以原基辅都主教安东尼为首的一批流亡教士，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建立“国外临时主教公会”。1924年，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正式改称“中国东正教会”，在北京设立总会。它下辖北京、上海、哈尔滨、新疆、天津等教区。[②] 英诺肯提

① 张绥：《东正教与东正教在中国》，第254—255页，学林出版社，1986。

② 王友三：《中国宗教史》下册，第934页。

乙·费古洛夫斯基担任中国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中国东正教会”在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主持下，对苏维埃政权十分仇视，并进一步采取了反苏维埃的运动。他们把偷运到中国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八位近亲的遗骸长期保存起来。其中除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婶母是英国皇室成员，她的尸体不久被转运英国外，其余七口棺材一直被停放在安定门外东正教墓地教堂里，直到1956年才被埋葬。每年“中国东正教会”都要为这些沙皇皇亲举行隆重的亡人祈祷仪式。早在1922年时，在中国的东正教会就已断绝了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区的隶属关系，而归属设立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洛齐的“俄罗斯东正教国外临时主教会会议”的管辖。在1930年，“俄罗斯东正教国外临时主教会会议”晋升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为都主教。确认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对中国各教区的统辖权力。

在中国的东正教会北京教区，直属北京总会管辖。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最后一任大主教是列昂尼德·维克托尔。列昂尼德·维克托尔早年毕业于俄罗斯正教神学院，后应征入伍，并成为沙俄军队的一名军官。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列昂尼德·维克托尔由新疆逃亡到北京做了修士。后一路升迁，直至出任北京总会东正教大主教。这样的经历，使他反对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十分坚决。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列昂尼德·维克托尔大主教同日本人在反苏反共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并取得了日本政府对他的支持。据《满洲宗教志》记载：日本人认为“考虑到白俄的将来，为使他们的存在具有意义，为执行这方面的政策，对于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在满洲地区的俄罗斯东正教，日本政府和满洲当局，应给予相当大的关心”。[1]“俄侨防共委员会”遂即成立。列昂尼德·维克托尔

---

[1] 曹琦、彭耀：《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第2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大主教与“俄侨防共委员会”关系十分密切，并直接参与了“俄侨防共委员会”的活动。奇怪的是，这位大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苏反共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他居然不顾东正教教会中不少人的反对，于1946年公然宣布：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和“俄罗斯东正教国外临时主教会会议断绝了关系，归属莫斯科牧首区管辖。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曾试图阻止列昂尼德·维克托尔大主教这一行动，但是没有成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的苏联政府宣布：流亡国外的白俄可以无条件地加入苏联国籍。所以在中国境内的俄侨和各国东正教教徒陆续出境回国，还有一些不愿意回苏联的流亡者也先后投奔其他国家。中国的东正教教徒人数急剧下降。北京只剩下一所教堂，即北京总会所在的北堂，有东正教教徒300人左右，可祭13人。[1]列昂尼德·维克托尔仍为大主教，继续主持北京总会的教务。1950年，在莫斯科牧首区牧首阿历克赛和其他五位主教主持下，举行了晋升杜润臣为主教的神品圣事仪式。杜润臣是俄罗斯东正教传入中国以来，所升圣的第一位中国籍的主教。杜润臣晋升后被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同年，北京总会又升圣十几位中国神职人员。1956年，在莫斯科牧首区同意中国教会取得自主地位的情况下，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成立，由姚福安担任大主教。中华东正教会下辖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新疆五个教区。1966年，这些教区都进行过一定规模的宗教活动。

汉口的东正教会，1876年设立，同年建成教堂。1902年汉口东正教会开始向鄂中的沔阳、天门、岳口等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先后有2000余名中国籍居民接受了洗礼。

哈尔滨香坊在1889年建立了一座东正教教堂，称尼古拉堂。

---

[1] 姜立勋：《北京的宗教》，第327页，天津出版社，1995。

第二年，又在哈尔滨南岗区建立第二座教堂，也称尼古拉堂。到1908年，在哈尔滨市内已有7座东正教教堂，信徒几乎全是俄罗斯人。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从1901年到1908年，在中东铁路沿线又相续建立起14座东正教教堂。这些教堂中的信徒，也全是俄国人。1922年9月，哈尔滨教区建立。从1918年到1924年，哈尔滨市建立9座东正教教堂。在东北其他地区，共建立11座教堂。1922年，哈尔滨教区东正教信徒人数曾达到30万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哈尔滨教区东正教信徒人数有所减少。不过，在1931年至1941年间，在满洲里、安达、三河、穆陵煤矿、齐齐哈尔、苇沙河、二道河子、巴林等地，又新建一批东正教教堂，教徒人数也有所增加。

1947年，哈尔滨中国东正教教会正式成立，何海林担任这个教会的首脑。从1946年到1949年，哈尔滨教区一共发展了15名中国籍教徒。1950年，哈尔滨大主教区改为中国东正教哈尔滨分会。1966年，哈尔滨教区大约有1万名东正教信徒。1984年，哈尔滨市内约有东正教信徒120人，在满洲里到绥芬河沿线地区大约有三四千名东正教信徒。

在上海，1902年经俄国政府提出，清政府被迫同意在闸北地区建立东正教教堂。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有两名俄国军官，在削发为修士后，授神职，称修士大司祭那发那伊勒和修士辅祭戛乌利伊勒，他们在闸北东正教教堂主持宗教活动。1924年，中国东正教教会决定在上海设立教区，由西蒙担任主教。后来，随着上海俄国侨民的增多，在新乐路又修建了一所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风格的大圆顶教堂，即圣母大堂。这是上海教区的主教教堂。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籍主教——杜润臣主持上海教区的工作。上海东正教还开办了东正教道学院，并出版内部刊物《正光》双周刊。1965年以后，圣母大堂的宗教活动逐渐停止。

在天津，1904 年留居此地的俄罗斯商人集资在海河北小关街建立一个能容纳一二十个人过宗教生活的小祈祷所。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批信仰东正教的俄国流亡人员来到天津。1920 年，天津便建立俄罗斯东正教教会。1922 年，修士司祭维克托尔主持教务。1929 年，圣母帡幪大堂建成，可容纳三四百人。维克托尔则晋升为修士大司祭。1930 年，天津教区建立，管辖圣母帡幪大堂、圣英诺肯提乙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圣谢拉菲姆教堂、圣众教堂，以及一所俄国医院、俄国小学等。1930 年，自办的天津中华东正教会成立，并建立一个祈祷所，接受一些中国人洗礼。1956 年以后，在天津的俄国侨民越来越少，天津的东正教信徒人数也大量减少，几个东正教教堂便进行合并。1966 年，天津东正教教会停止了活动。

在新疆，1851 年《中俄伊犁、塔城通商章程》签订后，已有东正教信徒的活动。1906 年，乌鲁木齐东正教堂建成。1915 年，俄国驻伊宁领事馆内也建立东正教堂，主持宗教仪式的是谢拉菲姆司祭。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批俄国流亡人员进人新疆，其中有许多是东正教神职人员，有的还是大司祭、司祭。1925 年，新疆教区成立。1934 年以后，伊宁逐渐取代乌鲁木齐而成为新疆教区的中心。1937 年，伊宁尼柯里斯基大教堂建成。1945 年 9 月，新疆教区归属莫斯科教区管辖。1954 年，新疆教区的东正教信徒约有 1 万人。1954 年以后，由于俄国侨民纷纷回国，新疆东正教信徒也迅速减少。

北京教区和其他教区一样，自 1956 年以后完全自主地开展一系列的宗教活动。不过自 1966 年“文革”开始后，北京地区的东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所不同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道教的宗教活动纷纷恢复，但是北京地区已无法恢复东正教的宗教活动了，原因是北京当时只有一名年迈多病的

东正教神职人员，而没有东正教的信徒了。据调查，在 1976 年“文革”结束后，全国范围内只有新疆和哈尔滨等少数地方恢复了东正教的活动。目前东正教教徒总数据统计也超不过一万人。这些信徒多为俄罗斯侨民或中国籍的俄罗斯族人。正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东正教在中国之所以难以立足，有几点原因值得探讨：

(1) 东正教传入中国后，从一开始就过多地和政治纠缠在一起。过多地借助政治势力来谋求宗教的发展，其结果必受政治制约，而使东正教的长期发展受到损害。

(2) 东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的 240 多年中，自始至终没有能够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未能摆脱“侨民教会”的性质，实无法同佛教、天主教和新教相比。

(3)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传播，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教者。正如近代中国天主教史专家徐宗泽所言：“天主欲创一大事业也，往往兴起一二德才出众之人，为其工具，使其成功”。[1] 早期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大多都是品性高洁、持身严谨、知识渊博之士，为信仰的传播打开了通道。而俄国东正教在选派传教士时，则忽视了对人选道德与素质条件的要求，致使一些传教士在中国行为不够检点，缺乏利玛窦、汤若望那样的兢兢业业的传道精神和才能，因而遭到中国人的拒斥。

(4) 东正教传教士所代表的俄罗斯民族利益同中华民族利益的冲突，是东正教在中国难以发展的一个更本质的原因。

东正教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及引发人们的思考，却没有同历史一同消失。

---

[1]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 216 页，上海土山印书馆，1938。

新教在北京传播始末

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到中国广州。他是第一个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782年出生于苏格兰北部莫佩思一个农民的家里,从小受到宗教的灌输。1804年加入伦敦会,进入高思上专传道学院学习。1807年,25岁的马礼逊自神学院毕业,即被封立为牧师。[①] 为了到中国传教,他努力学习中文。当时,清朝政府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马礼逊到中国后,不得不依托于英国殖民机构,从1809年起便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为了便于向中国人传教,他还把《圣经》译成了汉语。基督教的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是第一人。[②]马礼逊在华劝化的第一个教徒是印刷工人蔡高。1814年蔡高在澳门受洗。1816年,又一名印刷工人梁发在马六甲受洗。1824年,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位新教牧师。梁发写有许多宣教的小册子,他的《劝世良言》一书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影响很大,成为洪秀全发动农民起义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

1830年(道光十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到达广州。他是第一个到中国来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在1801年4月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彻城一个基督教信徒的家庭,1826年毕业于阿默斯特大学,后经教会介绍,考入安多弗神学院。经过三年的严格训练,他被派往中国传教。裨治文到达广州后,首先跟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学习汉语。1832年夏,他在广州创办了英文版的《中国丛报》,并担任该报总主管。从1832年至1847年期间,他一直向美、英等国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资料。裨治文叫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

① ②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①] 他还说：“中国虽然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她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②] 鼓吹以武力强迫清政府订立条约，打开中国大门，传教士应不顾中国法律深入内地活动等等。与此同时，他还在一些在华外国人成立的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1847 年，他在上海参加《圣经》中译本的修改工作。裨治文除传教外，还充当美国驻华公使的助手。到 1842 年之前，英、美、荷兰等国共有 7 个差会的 24 名传教士在广州、澳门之间传教。由于当时清朝政府采取禁教政策，所以一直到 1840 年时，外国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仅 20 人，新教信徒也不满百人。

1840 年以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因为中国法律所禁，不能进入中国内地，也不能公开传教，由于受到清朝法律的禁止，他们的传教活动只能秘密进行，一旦被清政府发现，就会遭到驱逐。因此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主要便以著书办刊传播基督教教义的方式进行活动。据史料记载：在传教士中，约有 10 多人写过 200 多种中文的书籍。这些书籍有的是诠释《圣经》的著作，还有的是一些教理书，布道小册子，也有少量的历史、地理、医学书籍。1815 年，马礼逊在马六甲主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是传教士主办的第一份中文刊物。1833 年，郭士立、裨治文在广州出版了《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创办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

早期新教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还做了许多办学兴医的工作。1818 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用中、英两种语言讲课。学院所设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1843 年英华书院由马六甲迁往香港。1839 年，他又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

①②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29—3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堂”，该学堂开设了物理、化学、音乐等课程。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架在广州兴办博济医院，一年中诊治了2000多病人。1838年，又成立了“中华医药传道会”。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新教的传教活动也被作为特权列入条约中。各国传教士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纷纷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传教士的数量急剧增加。1858年在中国的传教士是81人，1889年便增到1296人，其中大多是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他们代表了41个差会。此后，新教各主要宗派陆续传入中国内地，遍及于西藏之外的中国各省。其中，公理会主要活动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路德宗主要活动在广东、江西、湖北、河南、山东以及东北三省；安立甘宗主要活动在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安徽、江西、山东、四川、河北等省；浸礼宗主要活动在山东、广东、广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教徒人数以山东、广东最多；归正宗的活动区域大体上同于公理宗、路德宗，教徒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英国和加拿大的长老会，在19世纪中叶始传入台湾。

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新教的传教活动主要表现在兴办医院、学校和其他文化慈善事业。1900年以前，教会兴办的医院不足百所，而且多设在教堂里面，规模也不大。1900年以后，大批医院、诊所建立起来，到1937年仅属于英美教会兴办的医院就有300余所。1900年以前，教会兴办的学校有1100余所，都是中、小学，个别中学设有大学班。1900年以后，教会设立的大学迅速增加，著名的有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北京燕京大学等。到

1936年，教会办的中学有269所，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河北、山东等沿海省份；小学有几千所，学生10万多人。

在义和团运动后的20年间，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空前发展。1901年传教士人数是1500人，1914年为5978人，1926年达到8325人。新教教徒的人数，1900年是8万，1922年是40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中国活动的新教总计有130个教会，教徒人数70多万。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新教传教士中，也有些著名人物，比如英国的戴德生、李提摩太，美国的林乐知、丁韪良等。

戴德生在1854年受英国“中国布道会”派遣来到上海，在上海、汕头、宁波等地传教。1865年，他创立“中华内地会”，强调传教士要有献身精神，要使传教“中国化”。所以“中华内地会”发展很快，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约有650名传教士，270个传教点，5000多名教徒，成为新教在中国的最大组织。戴德生在1905年死于长沙。

李提摩太在1869年来到中国，是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他主张传教应走上层路线，以文化传教为主。他曾在山东、山西等地募捐赈灾，并和清朝政府高级官员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士关系极为密切。李提摩太曾说：要感化中国，没有比文字宣传来得更快的方法了。他主持广学会，以介绍新书、开发民智为宗旨，先后发行246种、73万册书刊。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

林乐知是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于1860年来到中国。1868年在上海创办和主编《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77年，林乐知和狄考文等人在上海建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1890年改名为“中华教育会”，1936年又改称“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1878年，林乐知和丁韪良等人在上海曾设立“上海圣教书会”。林乐知在中国一直从事传教活动，于1907年死

于上海。

丁韪良也是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毕业于新阿尔巴尼神学院，曾先后在印第安那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于1850年来中国，在宁波等地传教。因为丁韪良对西方教育模式比较熟悉，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自1869年至1894年在北京任同文馆总教习。同文馆是中国第一个新式洋务学堂，它对中国的教育影响很大，正如丁韪良所言："它影响了中国的高级官吏，由中国的高级官吏又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①] 由于丁韪良长期受聘于同文馆，所以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成立后，即聘任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虽然他从1898－1902年一直在京师大学堂任总教习，但是在他任职期间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所以他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不大。丁韪良于1916年死于北京。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民主和科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中国知识界强烈要求摆脱宗教的束缚，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1922年，李大钊等79名学者及知识人士在北京联名发表宣言，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强调"深恶痛绝宗教"。这样，在这些组织号召下，全国形成了一个非宗教运动，这使新教陷入空前的危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广大爱国基督教徒包括新教教徒开展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自此中国基督教包括新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参考书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① 丁韪良：《同文馆记》。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6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

江文汉著：《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

顾裕禄著：《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刘准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天主堂第三次排印本。

张绥著：《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

《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

江文汉著：《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

（法）史式徽著：《江南传教史》第一、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王毓华：《北京基督教教史简编》，内部刊印。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6。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教务委员会：《天主教教理释义》，内部刊印。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姜立勋、富丽：《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

何兆武、何高济、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1。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中国基督教协会:《教会简史》,内部刊印。
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1。
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88。
王友三:《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1991。

著名的传教士与信徒在北京地区的活动

第一位中国教区大主教
——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

1928年，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一位13—14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往中国的传教士、罗马教廷正式任命的第一位中国教区大主教和北京城司牧约翰·蒙特·科维诺逝世600周年。关于这位约翰修士与他在中国长达30多年的传教活动，中国正史和其他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现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教会档案材料中却保存了约翰本人写自“契丹国汗八里”即元大都北京的几封书信的手稿，以及当时另一位修士、曾被约翰任命为刺桐（福建泉州）主教的安德烈·佩鲁贾的书信手稿。这些材料连同当时罗马教廷对他们的训谕等，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元代天主教在北京传播情况的轮廓。另外，稍晚于他们的几位曾游历过中国的旅行家或传教士在其游记作品中也提供了一些线索。1913年以后，上述材料引起西方一批研究基督教东方传教史的学者们的兴趣。经过他们索隐钩沉，爬梳整理，这一段几近湮灭的历史渐渐显出了清晰的面貌，使我们得以对基督教在我国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源流获得比以往更加完整的了解。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在西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早在公元4世纪，12使徒之一的圣多默就已经由印度到达了中国，在中国发展了基督教徒。所以，在一本叙利亚文的《圣务日课》中，有下面这样的诗句：

由于圣多默，印度人摒弃了崇拜偶像的错误；

由于圣多默，中国人同埃塞俄比亚人已转向真理。

由于圣多默，人生真谛之光照亮了整个印度；

由于圣多默，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①

但是，从史实来看，基督教真正进入中国，要比这晚300年左右。据明代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秦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祈，至于长安。帝使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②唐贞观九年（635年）。这是于史有据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起点。同一篇碑文还记载了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下诏称赞景教"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并下令在京城义宁坊建大秦寺一座，度僧21人。这些内容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唐代史籍中也得到了印证。从此"景风东扇"，基督教开始第一次在中国的传播。不过，一般认为，这时传入中国的景教是经由叙利亚而来的基督教异端教派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约生活于公元4—5世纪，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由于他主张"二重位格"论，否定"三位一体"说，因而在431年的以弗所主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遭到流放。其信徒也

---

①②　阿·克·穆尔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4、43页，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

受到迫害，逃往波斯。公元5世纪末，聂斯托利派正式与罗马教会脱离关系，成立东方教会，向中亚一带发展。景教传入我国后，由于受到皇室支持，一度曾发展十分迅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称“法流十道（唐朝划分全国为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由此可以想象其兴盛之势。但是，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武宗李炎因为崇奉道教而下令灭佛，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同时受到打击。景教从此一蹶不振，在中原地区几乎绝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失败了。

又过了400多年以后，蒙古帝国崛起于漠北。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前后数十年的西征，重新打通了亚欧之间的陆上通道。而随着元朝军队铁骑南下，基督教也再次来到了中国内地。在元代，基督徒被称作“也里可温”，多数是随同蒙古军队从中亚迁徙而来的聂斯托利派东方教会的信徒。他们在元朝有很大的势力，不少人在朝廷和军队中担任重要官职，属于元朝社会四个等级中的第二等级色目人，享有很多特权。这一状况为罗马天主教会向中国传播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但也带来了由于教派分歧而产生的困难。

当蒙古大军西征欧洲腹地的时候，罗马教廷和欧洲信仰基督教的君主们，因为震慑于蒙古人的威胁，希图与之结好，曾多次写信给蒙古统帅，劝说蒙古人放弃武力，停止杀戮，但得到的都是措辞严厉态度傲慢的敦促投降书。直到1266年，两个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才使这一状况有了改变。他们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罗·波罗和叔叔马弗·波罗。这一年，他们在上都（开平）谒见了元世祖忽必烈。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忽必烈“从波罗兄弟二人获悉了罗马人的全部所作所为，不胜欢喜”。于是便派遣他们作为大汗的使节去晋见教皇，要求教皇派遣100名熟悉基督教信仰、通晓七艺、长于辩论的人到中国来。这就为罗马天主教向中国传播提供了一个契机。1269

年，波罗兄弟带着忽必烈给教皇的书信返回欧洲。两年后，他们谒见了罗马教皇格里高利。教皇当即委派两名传教士，随同波罗兄弟前往中国。就是在这一次，当时只有15岁的小马可也随同父亲一起到中国来了。回程用了三年半时间，途中还遇到巴比伦苏丹侵入亚美尼亚的战争，险遭杀身之祸。两位传教士“面临此境大为恐惧，不敢继续前进”，便把教皇颁发的特许状、信件等物品全交给波罗兄弟后分手而去。波罗一家三人则坚持到达了上都。据说忽必烈得到他们回来的消息后，曾派人于40日路程以外来迎接，给予很高的礼遇。后来他们留居元朝达17年之久，马可还曾任扬州城长官三年，受到忽必烈的器重。1295年，他们回到威尼斯以后，马可把他们的经历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1]

约翰・蒙特・科维诺在北京的活动

差不多和马可・波罗启程回乡同时，另一个意大利人约翰・蒙特・科维诺带着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忽必烈汗的信件，来到了北京元帝国的皇宫门外。

对约翰的经历和基本情况，目前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根据《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一书作者从西方文献中爬梳出来的一鳞半爪的材料，可以推断他生于1246或者1247年。其出生地是意大利一个叫蒙特・科维诺的地方。他的取名即由此而来。但是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在意大利至少有三个，我们无法判定他生在其中哪一个。他年轻时当过兵，后来成为法官，并且可能在30岁前后担任过皇帝的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聪颖过人的教徒。以后他加入方济各会成为修士。大约在1280年，约翰奉方济各会差遣，

---

[1] 本文引用的《马可波罗游记》均采用《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摘录部分，见该书147--165页。

作为传教士出使东方，到达了当时在蒙古宗王阿鲁浑统治下的波斯，受到阿鲁浑国王礼遇。1289年，他带着阿鲁浑王的书信返回罗马，又被立即派往中国。这一年7月，约翰带着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忽必烈汗的信件，向遥远的中国进发。从现存的教皇书信手稿中我们知道，约翰率领着一个规模不会很大的由方济各会修士组成的使团。他们的第一站是约翰已经熟悉的波斯。教皇也给阿鲁浑王写有书信，可能他们还在这儿留下了几名传教士。1291年，约翰一行离开波斯前往印度。他们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从塔纳一直航行到位于印度东海岸的梅拉普尔。1292年是在梅拉普尔的圣多默教堂度过的。约翰在这里传教，接受洗礼的人数接近百人。他还游历了印度的许多地方。他的同伴之一尼古拉·皮斯托亚修士在此去世，被安葬于圣多默教堂内。据推测，约翰有可能在印度马巴尔城遇到从中国回来的马可·波罗一行。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夏天，乘着印度洋上的西南季风，约翰从锡兰搭乘商船来到中国福建的泉州。当时的波斯商人把这个城市称作"刺桐"，是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物流汇聚，商贾云集，非常繁华热闹。我们无法确知约翰此时是否还有其他传教士随行，但至少有一个同路的商人做伴。他很可能在这里逗留了几个月。后来刺桐成为中国境内天主教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不仅建起了好几座教堂，而且成为汗八里大主教管辖下的一个教区，设有罗马教廷认可的主教。这也许同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在此的活动不无关系。

这年冬天，约翰启程北上，向帝国的大都汗八里进发。当时从泉州到北京，大约需要3个月的路程。这样，当约翰·蒙特·科维诺到达大都时，已经到了春末夏初的季节。帝国疆域的辽阔、人口的稠密和物产的富足，以及北京城宏大的规模气势，都给这位见多识广的传教士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

然而，正像一位诗人曾经说过的那样，通向天国的道路上没

有坦途。就在约翰由泉州赶往北京的途中，原来曾让波罗兄弟带信给罗马教皇要求派遣传教士的元世祖忽必烈于1294年2月18日驾崩。继位的元成宗铁木尔夏天在上都登基。直到秋天以后，约翰·蒙特·科维诺才有机会受到召见，呈上教皇的书信。这仿佛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预示着他的传教事业将不会一帆风顺。

刚刚即位的皇帝按照礼节接待了教皇的使节，允许他自由传教，但是拒绝了约翰提出的请他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要求。不过，真正对约翰的传教事业构成威胁的，还不是不信仰耶稣基督的皇帝本人，而是“名义上信奉基督，而实际上远离基督教信仰”[①]的景教徒。元代一直奉行宗教宽容政策，允许各种宗教和教派存在。但是由于景教徒“势力颇大，竟不许举行其他仪式的任何基督徒甚至建立一所小教堂，也不许刊印不同于景教信仰之任何教义”。[②]我们现在看不到景教徒对当时情况的说法，只能凭约翰·蒙特·科维诺的一面之辞来叙述这一事件。按照景教徒在元代享有的特殊社会地位推想，约翰的叙述多半是可信的。据他说，景教徒起先宣称他并不是教皇的使节，而是一个奸细或者骗子，并且收买了一些人作伪证陷害他。后来，他们干脆编造了一个非常离奇但表面看来并非不可能的故事，说教皇派来的使节是另一个人，随行带着大量财物，都是教皇送给皇帝陛下的礼物。但是真正的使节被约翰在印度杀害了，约翰劫掠了教皇使节携带的财物，又来冒充使节本人行骗。这个虚构的案件放在今天也许不难查清，但在700年前却几乎是无法调查的。约翰孑然一身，独处于陌生的异国他乡，面对的又是势力强大的景教徒有预谋的诬陷，真正是有口难辩，像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所以，

① ② 《约翰·蒙特·科维诺1305年1月8日从汗八里写给罗马教廷的信》，引自《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96页。

前后将近5年多的时间里，约翰常常遭到监禁和审讯，饱受了侮辱和迫害，几次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作为一名虔诚的修士，约翰以勇敢的精神面对了这一切磨难。

在来到北京的第六年，约翰建起了他的第一座教堂，其中有钟楼一座，置钟三口。今天我们无法确知这座教堂的位置，但可以肯定，这是北京最早的天主教堂。约翰在这里为信教者施洗。6年中受洗人数在6000人以上。他还陆续收养了40名年龄在7—11岁之间的儿童，施洗后教他们拉丁文和基督教礼仪，把他们培养成唱诗班。每天，约翰自己敲着钟，和儿童们一起作祷告。据说皇帝陛下也很喜欢听孩子们歌唱。约翰不久就熟练掌握了蒙古语言和文字，把全部《新约》和《圣经》译成了蒙文，请人用最优美的书法抄写出来。他还在大庭广众之前诵读宣讲经文，发表布道演说。看起来，约翰的传教活动此后进行得十分顺利。1305年（元大德九年），他又建起了第二座教堂。这座教堂位于皇宫门外不远的地方，离前一座教堂相隔2.5英里。一位从波斯和约翰一起东来的大富商彼得·鲁卡龙戈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购买捐献了第二所教堂的建筑用地，还有别的施主也有捐赠。这座教堂一定建筑得非常宏伟华丽，面积足够容纳200人做礼拜，造型带着哥特式的尖顶，在北京的建筑中显得别具一格，新颖特出，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它那高耸的尖顶和红十字架，为当时当年北京的一大景观。约翰将他收养的儿童分为两队，分驻在两所教堂。他自己则轮流在两所教堂里主持祭务。据说皇帝在宫中就能听见新教堂儿童的唱诗声。这种说法广泛传播的结果，当然会扩大了天主教的社会影响。

约翰·蒙特·科维诺同元朝皇室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皇帝陛下非常尊重和优待这位罗马教皇派驻元帝国的代表和专使，在宫廷中专门为他安排了一个职位，以便他可以出入皇宫。他还享有元朝政府发给的俸金，数目也非常可观，足以使他维持比较优

越的生活。以后由罗马派来的其他传教士也享受类似待遇。

在约翰的传教活动中，最有影响的事件是“善良国王阔里吉思”的皈依。阔里吉思是唯一能够把教会档案材料和中国正史记载连接起来的一个关键人物。但遗憾的是，《元史》的阔里吉思传同样没有提到他曾与西方传教士交往或皈依基督教之类与约翰的活动有关的线索。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下面的叙述是综合约翰的书信和《元史》的有关材料面成的。

阔里吉思是色目人，属汪古部，中国人称之为白达达。据说他们是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印度铎德约翰王的后裔，原来信仰的是景教。阔里吉思的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随成吉思汗，死后被元太宗窝阔台追封为高唐王，封地在今大同一带。其后历代世袭。阔里吉思的祖父孛要合，封北平王。其妻是成吉思汗之女阿剌海别吉公主；父爱不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小女儿月烈公主的驸马。阔里吉思本人也娶了两位皇室公主，一位是忽必烈的孙女，另一位是铁木尔的女儿。这些姻亲关系说明阔里吉思家族同元朝皇室的关系极为密切。据《元史》本传记载：“阔里吉思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兴建庙学，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①] 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儒雅博学文武兼资的王公。也许正是由于原有的景教信仰，加上他对经史性理阴阳术数的兴趣，使他能够与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约翰修士一拍即合。所以，约翰·蒙特·科维诺来到北京不久，阔里吉思就听从约翰的劝导改信了天主教。他不仅经常身着圣装参加各种祭祀和祈祷，而且率领大部分臣民皈依了天主教，并在封地建立了一座“雄伟壮丽无异于王侯之宫”的教堂，称之为“罗马教堂”。约翰曾在这所教堂按照天主教仪式举行弥撒。考虑到这些事情大约发生在约翰来北京仅仅一年多以后，可以推测这

① 《元史》第118卷。

位阔里吉思王的支持一定是约翰能够在景教徒的迫害打击下坚持下来并且最终安然度过危机的重要原因。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实际事务上，他都可以给予约翰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当然，阔里吉思也一定会因此而受到“叛教”的指责，约翰修士给罗马教廷的信中曾提到这一点。不幸的是，1298年（元大德二年），阔里吉思在西北边地的战事中孤骑深入险地，马伤被俘，最后不屈而死。元成宗为此加封阔里吉思为赵王，妻子皆有封赏。但从此约翰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保护人。尤其使他伤心的，是那些曾经跟随阔里吉思王皈依了天主教的高唐国臣民，又被阔里吉思的兄弟重新领回原来的景教信仰中去了。

成功和挫折，希望和失望，喜悦和痛苦，岁月就在这样不断的交替轮回中悄然而逝了。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孑然一身，远居他乡，十多年从未收到来自教廷和家乡的只字片语，心中的寂寞和孤独可想而知。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在这个远离欧洲的地方了。每天，他都在为别人的灵魂而操劳，自己的灵魂却没有人照管。因为没有第二位修士，他在长达11年的日子里没有行过忏悔礼，为此而惶惑不安。虽然还不到60岁，但他已经须发皆白。传道生活中的坎坷磨难，使他过早地感觉到了老之将至。迟暮之年，他不会放弃天上的主放在他肩上的神圣职责，但是如果能看到一封来自罗马的书信、知道他的工作得到了教廷和主内兄弟朋友的认可和赞许，也会使他寂寞的情怀感到莫大的慰藉吧！

1304年，有一位德国科隆省人阿诺德修士来到了北京。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位修士逗留了多久，想必他至少会陪伴约翰一段时间，也可能是长期留驻下来了。第二年，约翰得到一个机会，辗转托人带去一封给罗马教廷的信件，信尾注明“我主纪元1305年1月8日写于契丹国汗八里”。又过了一年，也是方济各会修士的托马斯·托连提诺来到中国。这位忠心耿耿的传教士带着约翰的第二封信回到意大利，当面向教皇克列蒙特和天主教议会上院会

议叙述了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在北京的传教经历和成就。据说托马斯的这个演说非常精彩，声情并茂，约翰的工作由是引起罗马教廷的重视。于是，由方济各会挑选的七名德性高尚、精通教义的修士组成的使团携带教皇的诏书前往中国。诏书授命他们代表教皇祝圣约翰修士为东方全境总主教和教务大总管，汗八里城司牧，“全权管理上述地区和臣属于鞑靼王的其他地区的灵魂”。这七名修士自己则被任命为汗八里城附近各大城主教以襄助约翰。克列蒙特教皇还授权约翰“可以任命东方各城和各主教区的主教、教士和牧师”，“统管各地主教和高级教士”。为此，教皇还给约翰送去了作为教皇祭礼象征的法衣。这个使团于1307年秋天由罗马启程向中国进发。据其中之一的安德烈·佩鲁贾事后追述，他们“在行经海路陆路时，备受艰难困苦和饥饿劳累，几经生命危险，又遭强盗洗劫，连教士衣装也尽丢失”。[1] 刚走到印度就有三位教士死去，后来又有两位在泉州逝世。最后只有安德烈和帕莱格林两人历经千辛万苦以后于1313年（元皇庆二年）到达了北京。他们按照教皇的训谕为约翰·蒙特·科维诺总主教举行了祝圣仪式。罗马天主教中国教区至此正式建立，约翰修士的辛勤努力得到罗马教廷的正式承认。

约翰已经是六十六七岁的老人了，他来到北京也将要快满20年。据原来在波斯时曾担任过约翰·蒙特·科维诺助手的约翰·科拉在其著作《大汗国记》中的记述，此时约翰又建起了北京的第三所教堂，说明教会的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大。被约翰劝导皈依天主教的除了部分蒙古人以外，主要是原来信仰景教的亚美尼亚人和阿速人。由后者组成的阿速亲军，是元帝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另一方面，由于约翰的努力，天主教信仰由北京传播到了全国许多城市。山西大同、山东临清、浙江杭州、扬州等城市都

---

① 引自《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218页。

建起了教堂。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数福建泉州。这儿有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妇人，她出资建造的一座教堂十分雄伟华丽，由一个叫哲拉德的主教管理。这位妇女临终时又遗赠给教堂数目颇大的一笔捐款。后来，约翰大主教即以这座教堂为刺桐教区的主教堂。哲拉德死后，约翰大主教指派帕莱格林修士为刺桐主教，管理这所教堂。再以后，安德烈也担任过这一职位。后者还在泉州城外不远处的一片小树林中建造了一座舒适而华丽的小教堂。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各种材料中，我们似乎都没有看到有汉人皈依天主教的记载。这似乎提醒我们，天主教也和景教一样，是把根扎在元帝国的第一、二等级即蒙古人和色目人中间的。这就埋下了它和元帝国一同衰亡的伏线。

基督教在北京地区销声匿迹

1328 年（元泰定五年），约翰·蒙特·科维诺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享年 78（或 79）岁。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块亟待填补的精神空缺。可是，从现有记载看，罗马教廷好像直到 1333 年才获知约翰大主教去世的消息。这年 9 月，方济各会修士、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被任命为新的汗八里大主教派往中国。但他似乎在中途失踪了，没有到达北京。所以 1336 年（元顺帝至元二年），元朝才派出了福定等 5 人随安德烈·佩鲁贾出使罗马，请求教皇迅速指定一位大主教接替约翰·蒙特·科维诺的职务。教皇本尼狄克特 12 世随即委任方济各会修士、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主教带领一个使团携教皇书信和礼物随同元朝使节一起前往中国。他们于 1338 年 12 月离开教皇的驻地阿维农，从那不勒斯乘船至君士坦丁堡，渡过黑海到达克什米亚。然后经陆路来到阿里麻里。这座城市的遗址在今天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16 世纪初以前就已被毁弃。前面提到的尼古拉一行，就是在这个地方不知去向的。从

这里，马黎诺里一行穿过沙漠进入内地。1342 年 8 月（元顺帝至正二年七月），他们到达了北京。《约翰·马黎诺里游记》写道：

越过沙山，我们来到汗八里。此城为东方帝国之首都，雄伟无比。其人口之众和军容之庄严，无须赘述。大汗……对我们尊重毕至。觐见时，我身着礼服．在我前面有人持一枚为精美十字架，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我口唱“笃信唯一真神”，进入豪华壮丽宫殿朝见大汗。圣歌毕，我为大汗祝福，大汗虔诚领受，然后我们被送至宫馆。此馆早已为我们准备，装饰豪华。大汗派二亲王侍候我们。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糊灯笼的纸，皆极为丰富。仆人皆由宫廷派来。彼等侍候我们约四年，始终备恭备敬。随员皆着贵重衣服。[1]

这段生动的描述，使我们不难想象到当年罗马天主教在元帝国受到的礼遇程度。毫无疑问，它正是约翰·蒙特·科维诺备受屈辱和磨难换来的结果。马黎诺里一行 32 人在北京逗留了三年多，同各派宗教人士有过多次辩论，还发展了一批教徒。但是，尽管元顺帝恳切挽留，马黎诺里却执意西归。终于在 1345 年取道印度经海路回到欧洲去了。据说马黎诺里临行时，元顺帝曾托他请教皇速派一有全权之红衣主教返回东方来主持教务。但是后来罗马教廷和元帝国各自都遇到了麻烦，派遣传教士的事也就付诸空谈了。1368 年（元顺帝至正 28 年），元朝被推翻，顺帝北迁，信奉基督教的蒙古和色目人随之而去，约翰·蒙特·科维诺撒在北京的种子也一同被连根拔除了。

罗马天主教向中国的第一次传播，至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

[1] 引自《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 286—287 页。

成功的传教士——利玛窦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指出，“中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前后有三次。第一次在唐代，第二次在元代，第三次在明末。前两次都没有传来哲学思想，因此，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由基督教传入而夹带的学术为其端倪。”[1]

提到西学对中国的影响，不能不提到明末基督教教士的传教活动；提到传教活动，不能不提到利玛窦其人。虽然利玛窦不是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但在传教活动中有许多“第一”是他创造的。相较于明末及其以前的传教活动，利玛窦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一个传教士。

到东方去传教

利玛窦，Matteo. Riceid（马泰奥·里奇），[2]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是他来华传教后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教皇邦安柯那（Ancone）省的马切拉塔城。该城位于意大利的中部，属罗马教皇的合法管理区。他的父亲乔万尼·马蒂斯特·里奇是马切拉塔城富有的药剂师，曾一度担任该城长官。其母是善良勤俭的家庭妇女。少年时代的利玛窦聪慧机敏，从师孟尼阁（Nicolo Benivegni）接受了启蒙教育。9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进人马切拉塔耶稣会学校学习。

---

[1]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1189页，人民出版社，1960。

[2] （美）乔纳森·斯彭斯：《利玛窦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16岁被望子成龙的父亲送到罗马，攻读法律，以期能承父业。在此三年期间，利玛窦却有志于修道，他摒除了名利，立志传道四方。他加入了圣母会，过着严格的修身生活，并于1571年8月15日加入了耶稣会。

1572年9月17日利玛窦进入罗马学院（College Remano）。16世纪70年代在欧洲思想与科学都已接近于近代，这些特征在罗马学院的课程及教育思想上都有所体现。如在学院中拉丁文是授课和学生间交谈的主要语言，学生要学习逻辑学、物理学、玄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数学，以及接受有关法律、医学、神学的培训，同时学校还提倡相互间的竞争，学校将智力相等的学生安置在一起，使他们可以相互竞争、相互激励，以便更好地献身于宗教事业。利玛窦在罗马学院中除了这些课程和训练外，还学习和掌握了研制天文仪器、钟表等技术，并利用学院提供的大量书籍进行了广泛的学习。罗马学院的学习生活，为利玛窦后来的传教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576年2月8日，耶稣会印度教区办事处主任希尔法要求增派赴东方的传教士。利玛窦闻知即向学院提出申请，自愿要求去东方传教。第二年他的要求被批准，从此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此时利玛窦还未修完学院的课程，也没有圣职，因此在耶稣会士的登记证件上只填写为"利玛窦，同事"、"神学院学生"。[1]

1577年5月18日，利玛窦觐见了罗马教皇额我略十三（Pope Gregory the thirteeth），之后，由罗马启程前往葡萄牙。在葡萄牙受到国王塞巴斯蒂安的接见，葡王决定，由葡萄牙向传教士提供所需的费用。

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和另外13名教士乘船由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这次航行长达8个月之久，其生活非常艰苦，大家

---

[1] （美）乔纳森·斯彭斯：《利玛窦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只能躺在木板上休息，彻夜都泡在汗水中听凭虱子、臭虫的叮咬。在湿热的环境中，各种东西都腐烂、变臭，同时还要对付偷袭的船只。[①]这次航行虽然苦不堪言，但却把年轻的耶稣会实习生利玛窦第一次引向了世界。

1578年9月13日，利玛窦等抵达印度果阿（Goa），在此利玛窦生活了4年，并授予司铎之职（1580年）。后来应范礼安神父的要求于1582年8月7日到达澳门，被指派负责澳门新信徒学校。这一年利玛窦30岁。

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已占领了澳门，并在此地建立了澳门学院（College at Macao，1565年建）。从此，澳门"成为葡萄牙在远东势力的中心，而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的传教事业，就以澳门为补给站"。[②] 利玛窦等到澳门后，并不以此为目的，耶稣会的目标是"为基督征服全世界。"利玛窦也立志要"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③]。因此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大陆传教，耶稣会希望能在大陆获得一个永久居留地。利玛窦被指派和先期到达澳门的神父罗明坚、巴范济一起去广东发展。但是虽然他们曾用自鸣钟、三棱镜等礼物博得过两广总督的欢心，也曾在肇庆小住，却因种种原因，他们的中国大陆之行都接连失败了。直到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9月经过5年的努力，才在肇庆知府王泮的协助下，获准在肇庆购地建房，定居下来。这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大陆后开辟的第一个传教地，

---

① （美）乔纳森·斯彭斯：《利玛窦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② 高龙倍：《江南传教史》，上编1卷，第2章，第1节。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也是自1552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远征中国大陆失败起，历经30年的徘徊，第一次获得了在中国大陆的居住权。

在肇庆定居后，利玛窦便开始了布道活动。为了在中国顺利地开展布道活动，利玛窦决心学习汉语，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同时还进行中国风俗习惯的研究，并按照佛教和尚的装束来修饰自己。同时他们还开放了教会图书室，展览各种天文仪器让人们参观，以此来吸引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通过这些工作，基督教在肇庆得到了传播。

两广新总督刘继文上任后，极力要把利玛窦等赶出肇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利玛窦离开肇庆前往韶州(1589年8月)。但这却使利玛窦有机会在中国有了新的传教地，发展了传教事业。在韶州利玛窦发展了新教徒，这些教徒有一些还被允许住在教堂里。在韶州利玛窦开始改变自己的装束，脱掉僧装而着儒装，极力把自己融入到中国士大夫的阶层中。

在韶州立足后，利玛窦计划继续向中国内地发展。1595年利玛窦借为兵部侍郎儿子治病之机，随兵部侍郎离开韶州去南京和浙江。在南京由于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的爆发，不允许外国人在南京居住，利玛窦只得放弃南京，返回南昌。1595年6月利玛窦到达南昌。此次北上的挫折使利玛窦非常沮丧。在总督陆万垓和朋友的帮助下，利玛窦在南昌购下房屋，并且秘密地搬迁进去。在南昌利玛窦住了3年。在这3年中，他结交了不少文人士大夫，包括建安王和乐安王，这些文人士大夫也对他极其谦恭。此间利玛窦用中文著成了基督教思想的评论性著作——《天主实义》，并由此广为流传。

1598年明神宗要将王弘海召回南京作礼部尚书，王弘海曾答应过利玛窦要带他进京去修改历法。这个机会重又唤起了利玛窦北上的念头，这一年的6月利玛窦跟随王弘海离开南昌。到达南

京时，由于日朝战争仍在继续，没有人敢接待利玛窦一行，因此他们只好在小船上藏身。利玛窦这次南京之行几乎无人知晓。1598年9月利玛窦托太监向皇帝呈递献礼的请求，但由于战争期间，无人敢为他们向皇帝进言。在绝望中，利玛窦决定返回南京去，先在南京发展再作打算。从1595年算起，这次是利玛窦第三次进入南京了。同以前几次一样，在南京利玛窦同样购置了房屋，展出了准备送给皇帝的礼品，广泛结交了各界人士，包括皇宫太监总管冯保。出席各阶层的集会，宣传基督教教义和宗教道德思想。

1600年5月，利玛窦再次离开南京北上北京。这次虽然受到山东督税官马堂的扣押，但终于没有让他再次失望，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1月8日在神宗皇帝的诏令下，利玛窦进了北京。在北京的近十年生活中，虽然有些官员反复上奏皇上要利玛窦永远离开北京，但皇帝不但默许了利玛窦在京城的一切活动，还让太监口头传谕：赐利玛窦安居顺天府。禁绝一切遣回南方和大西洋之言。并且每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皇帝成了利玛窦开展活动的最大保护伞。在北京利玛窦在徐光启等人的资助下，购置了居所，修建了教堂，也和徐光启等人一起翻译了数学、地理学、水利学、天文学等书籍，特别是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并完成了世界地图的修订。1609年他还首创了信徒团体——天主母会。在北京的这段日子，是利玛窦传教活动的高潮。他始终忙于接待来访者，平常日子不下20批，节日更多，每天达百人以上，而且还有大量的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利玛窦则每信必复，特别是1601年是国家会试之年，来访问利玛窦的人达5000多人。这使得有更多的人接受了基督教，成为教徒。

1610年5月利玛窦一病不起，虽经北京城多位名医诊治，终是无效，于5月11日坐于床上逝世。在他去世后，画家游文辉修士画下了他的遗容。最后以庞迪我神父的名义上奏疏请求赐地以葬。相国吴道南等也具言利玛窦"慕义远来，勤学明理，著述有

称，伏乞收葬。”6月神宗皇帝下旨同意赐给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38间，地基20亩，畀葬利子”。此地在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是一名下狱太监的家庙。利玛窦的墓是在中国设计修建的第一座基督教墓地，他的葬礼也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基督教葬礼。1611年5月利玛窦被安葬于此。在葬礼上，万历帝“敕使临之”，并赐葬费。朝廷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墓前大门上题有“钦赐”二字；少京兆黄吉士题了“慕义立言”的坊额；好友大京兆王应麟作《钦敕大西洋陪臣墓地居舍碑记》。[①] 利玛窦墓成为当时帝京胜景之一。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活动的特点

1583年耶稣会士定居肇庆，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大门之后，直到1601年进入北京，利玛窦从南到北共建立了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五个传教地。在这些传教地利玛窦每每购屋建房，不仅使自己居有所，而且也使其传教活动有了专门的场所。如保留至今的北京宣武门教堂（俗称南堂）就是利玛窦在北京活动的历史见证。

利玛窦传教活动的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虔诚的传教士

利玛窦作为耶稣会士，天主教徒，从他申请自愿到中国去传教时起，传教就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为了这个所谓“上帝的事业”，他的的确确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

利玛窦来华传教的时期，虽然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走向衰败的时期，但中国并没有正式走向世界，中国的大门仍然紧闭，仍然以世界的中心而自居，海禁如初。特别是日本发动侵略朝鲜

① 《北京通史》，第6卷，第297页，中国书店，1994。

的战争（1592 年）后，所有的外国人在中国都不受欢迎。即使是在 1601 年利玛窦在神宗的默许下驻进北京，他也只是进宫向皇帝的御座行礼谢恩。[①]（关于这一点，还有另外一种记载，即万历皇帝在便殿召见了利玛窦，并垂帘以观。对此可见《北京通史》第 6 卷第 295 页）虽然利玛窦托太监转告皇帝，他们的宏愿就是住在北京，并死在北京，而别无他求。[②]神宗皇帝也并没有召见他们，而只是派画师前去临摹了利玛窦的画像，在看了画像以后，神宗也只是把他当成了回回。[③]在广东百姓时常受到海盗以及葡萄牙人的骚扰，因此当地百姓害怕教士会将葡萄牙人引人内地，而群起反对教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的 20 年中，袭击教堂、伤及教士的事件时有发生，连利玛窦本人也在袭击教堂的事件中被伤了手脚。[④]利玛窦在 1595 年 8 月写给澳门上司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上帝选择、并赐予了我十二年艰难、羞辱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传教的艰难可想而知。

自 1583 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始，直到 1610 年逝世，他在中国共生活了 28 年，在这 28 年中，利玛窦定居肇庆，发展韶州，退守南昌，几出几进南京城，最后立足于北京，其足迹贯穿中国南北大地，终于使基督教在中国有了影响，使一些人自觉自愿地成了上帝的子民，也使得利玛窦成为中国大陆上较为成功的传教士。16 世纪 80 年代，中国只有 3 个耶稣会神父，一二个皈依者。1583 年利玛窦施洗 1 人入教，第二年他施洗 2 人，到 1586 年经他施洗入教的有 40 人。[⑤]1601 年之后，耶稣会的神父增加到 17 人，中国受洗入教人数已有 2500 人，其中不仅有下层的人，而且还有上层的人，如一品官员 14 人，进士 10 人，举人 7 人，秀才 300 人，皇

①②③④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416、407、406、265 页，中华书局，1983。

⑤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3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北京通史》，第 296 页。

室成员140人，内侍40人。[1]

（二）顺应中国文化、传播基督教思想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十分清楚地看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洋人和教士的名声是十分邪恶的。在这种情形下，利玛窦采取了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的策略来开展传教活动，即不是一味地就传教而传教，不是生硬地用基督教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顺应中国文化，赞扬中国文化中与基督教思想相一致的东西，在这种顺应中传播基督教思想，用基督教思想影响、感染中国人，幻想最后使基督教成为中国思想的主宰。例如，16世纪的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央，中国即天下。为了迎合这种观念，1584年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时，"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2]

1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后就开始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并由一名中国籍的基督教徒当他的翻译和汉语教师，帮助他学习汉语和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1583年利玛窦定居肇庆后，在传教活动中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因此利玛窦在接待来访者之余，就来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风俗习惯。到了1584年利玛窦可以流利地讲汉语，以及用汉语阅读和书写了。1594年利玛窦用了一年时间攻读《四书》后，他自豪地说，从现在起我能用汉语写作了。过了语言关，使利玛窦在传教中能够自如地与人交谈，并能用中文写作去宣传基督教教义。

1583年利玛窦进入广东后，为了使自己更像一个中国人，他和其他传教士便模仿佛教僧侣的装束来打扮自己：剃去头发和胡须，穿上和尚的僧袍。1585年利玛窦在写给校友富里盖蒂的信中说，"你现在就按这样的模样对我作一个想象吧，我已变成一个中国佬了。就我这身衣着打扮，就我这等模样，就我这种方式，我

---

①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页，中华书局，1983。

们用我们的各种外观特征，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国人。”但是在后来的十年中，利玛窦逐渐认识到，佛教僧侣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和尚不但不为官府所依重，也同样被百姓看不起。要想传播基督教，并使之成为中国的国教，和尚决不是效仿的对象。因此利玛窦决定从剃光头、着僧袍的模仿中退出来，而去穿儒袍戴儒冠。1594 年耶稣会的视察员到达中国时，利玛窦对他说，如果我们蓄长发，留胡须，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我们就不会被认为是和尚了。1595 年夏天利玛窦在写给澳门朋友的信中说，“我们蓄起了胡须，头发也已齐耳长了。与此同时，我们也选取了特殊的服饰——学者阶层出访时穿的衣服（同我们原来穿的和尚服完全相反）……这是中国达官贵人们出访时所穿的极其考究的衣服”。1592 年在写给耶稣会长的信中，利玛窦也曾解释说，“在获得了较高位置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双脚在街上行走，而是如同这一阶层的人们那样，把我们的大驾尊贵地高高安在由人们肩扛的轿子里。在这个地区，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这种荣耀地位。没有它，我们无法在这些异教徒中开展我们的工作。”因为经验说明，没有这种打扮，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改变自己的装束，是为了能够融入中国的上流社会并为此阶层所接受，从而易于在中国社会这个举足轻重的阶层中进行传教和皈化工作。但不幸的是，在广东，传教士们始终没能摆脱“和尚”的称号，在其他省，他们倒是被认作是有识阶层了。

除此而外，在言谈举止上，利玛窦也刻意将自己变成一个中国人。例如，来华传教后，他有号“大西域山人”、“西泰”、“清泰”、“西江”，自号为“山人”。按中国的习俗取字号，在来华的传教士中利玛窦首开其先河。

在肇庆，为了感谢两广总督拨地修建教堂，利玛窦摹仿中国人那样叩头谢恩。甚至在言辞上利玛窦也尽量用中国的方式来表达。在南昌，利玛窦在回答总督陆万垓时说，“我是什么人，应该

受到如此礼遇?"[1]

在每一个传教地，利玛窦所建造的居所和教堂，都没有完全按照欧洲方式来修建，而是尽量使其中化。在肇庆利玛窦就放弃了欧式设计，而建设为一套中国式样的砖瓦房：一厅堂两厢房。这种建筑设计固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但不可否认它比欧式建筑更能得到中国人的认同。

一个如此通晓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既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又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在南昌"大家都喜欢神父的仪表，喜欢和他结交。"[2] 明代的文学家、思想评论家和画家李日华在会见了利玛窦之后，曾作了这样的描述"玛窦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3] 利玛窦这种顺应中国文化而传教的行为，"西学中国化的努力，……其结果，他既避免触犯众怒，与中国文化尖锐对立，又巧妙地传播了西学，让中国士大夫在犹钦盛矣、自迷自醉的状态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学。"[4]

（三）争取士大夫，开辟传教途径

利玛窦来华后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他认为中国人只信奉三种教派，即儒教、佛教和道教。在这三种教派中，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以儒治国。但就个人来说，中国人并不选择这一教派，即不把儒教当作一种宗教来信奉，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学问来研究，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行为。利玛窦还认为儒教与基督教有相通的方面，如他们没有偶像，但却相信有一位神在维护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5] 同时利玛窦还发现，"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甚至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再

①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98、295页，中华书局，1983。

③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1。

④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⑤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0、101、103页，中华书局，1983。

相信任何别的教派的。”[1] “孔庙实际上是儒教上层文人惟一的庙宇。”[2]利玛窦认为儒家学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学说，是中国人用以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因此利玛窦并不像其他传教士那样一味地打击中国人的一切理论、信仰，以基督教取而代之。利玛窦以士大夫为对象，也以他们为工具，大力赞扬儒学中与基督教相一致的理论，借此宣扬基督教学说，以曲线传教的方式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基督教的根基，最后将基督教变成中国的国教，对儒学取而代之。即所谓的合儒、补儒、超儒。与此同时对其他教派，如佛、道，则坚决打击之。

利玛窦定居中国后，除了穿儒服、戴儒冠、坐轿子之外，还用一年的时间攻读四书，与中国士大夫恭敬认真地研讨中国古典名著，利用乡试、会试之际，接受任何一个手持介绍书信的考生的来访，与他们交谈，频繁地拜访各个阶层的士大夫，参加酒席宴会等等。以此种方式来传播所谓“上帝的福音”。与此同时，他还与佛教僧徒辩论，将其贬为邪教，而将基督教树立起来。

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还依靠和利用了中国士大夫，传教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这些士大夫的支持和帮助。

除此之外，利玛窦还结交了不少文人学子，如瞿太素、李之藻、徐光启等等。他们对利玛窦的学识水平倍加推崇，对基督教崇信有加，并纷纷受洗入教。通过这些文人学子之口，使得利玛窦在中国声名远播，基督教的传播有了一定的基础。

这些文人士大夫还对利玛窦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保障，以其手中的权力和自己的地位保证了传教的合法性。在肇庆和韶州利玛窦建造了房屋后，两地的知府都曾发布了告示，严禁任何人对他们进行骚扰，违者严惩不贷。在韶州当发生袭击教堂事件后，瞿太素坚决要求官府严惩肇事者，这样就使得传教活动不再是妖言

①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0、101、103页，中华书局，1983。

惑众之举，而成为合理合法的行为了。

此外，文人士大夫还通过传刻利玛窦的著述，推动了基督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

1584年利玛窦和罗明坚（先于利玛窦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翻译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第一本关于基督教的著作，即《天主实录》。开始只是传教士自己用机器付印，肇庆知府王泮见到此书后爱不释手，即刻着手刻印了许多册，使其在国内广为流传。1595年利玛窦在南昌应建安王朱多炜之请，编写了《交友论》一书，它是西方古典著名作家对友谊的阐述和神父对友谊的箴言汇编而成的格言录。这本书被人们广为阅读和称赞，在明末士大夫中风行一时，不少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用，有的人甚至将其中的话写在自己的扇子上，它"受到读过它的人的推荐，""赣州有一位知县……把它加以重印，流传于各省，包括北京和浙江。"[1] 1584年利玛窦定居肇庆后，就着手绘制了一幅大型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引起中国士大夫的极大兴趣。王泮亲自督印了这幅地图的第一个中文版本，并定名为《山海舆地全图》。从此直到1602年，利玛窦不断绘制、修复和更改这幅地图。在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同时，他还在图上对某些国家和地方作了说明。如他在图上添加了意大利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间的区域，并加注说"这块土地属于教皇——他是独身主义者，住在罗马，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天主教。全罗马帝国以及欧洲人都崇敬他。"[2] 此外，他还在地图上对基督教的风俗和教义进行了叙述和解释。1602年地图在刻版时，刻工制了两种版，后来一个信徒又刊布了一个新版本，于是北京同时流行着三种版本的地图。[3] 随着

---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01、432页，中华书局，1983。

② （美）乔纳森·斯彭斯，《利玛窦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③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01、432页，中华书局，1983。

地理知识的传播，基督教的知识也得到了传播。

（四）借助学术成果，传播基督教义

在中国利玛窦传教的主要对象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士大夫阶层，是知识阶层。因此，除了依靠士大夫，顺应中国文化外，利玛窦还积极介绍了西方的科技成果，编写了大量的著作，以此来吸引和皈化士大夫。孙尚杨先生称此为“学术传教。”①

在肇庆定居后利玛窦就开展了布道活动，但一开始他们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情，在称呼上也不说“上帝”而称“天主”。为了吸引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他们主动开放了教会图书室，让人们参观。还展览了诸如日晷、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等天文仪器。从此利玛窦每去一地，必携带大量的日晷、三棱镜、自鸣钟、玻璃器皿，以及十字架像等物品，甚至还自己制造了大量这类器物，分送给当地官员、名人、太监，直到贡献给皇帝。这些新奇古怪的东西强烈吸引了人们，在北京，利玛窦没有被逐，与自鸣钟需要修理不无关系。

除了这些东西外，利玛窦本人也被说成是个奇人，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在南昌传说利玛窦可以十分随意地将500个汉字列成表，然后把这个表倒背出来。甚至说他只要把中国古典著作浏览一遍，便能把它整卷地背出来。这一奇异的功能大大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很多希求功名的人都希望能学到这一本领。于是1595年11月利玛窦开始向人们传授记忆方法，1596年出版了论述记忆方法的著作《西国记法》。在1597年底的乡试中，就有4000多人慕名而来求教，这为利玛窦的传教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和众多的对象。

利玛窦在中国28年，著作有20余种，其中大半是用中文编写的。在这些著作中有些是专门论述基督教教义和宗教道德、伦

---

① 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第24页，东方出版社，1994。

理思想的著作，如《天主实义》— 在《天学实义》的基础上于1596年修改完成，为介绍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评论性著作。它第一次用儒家思想论证了基督教教义；《畸人十篇》——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的对话录，为介绍伦理思想的评论性著作，1608年刻于北京；《二十五言》——关于基督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书，由二十五节格言组成，1604年刻于北京，等等。也有些著作是不失时机地在其中介绍基督教的思想，如《交友论》、《山海舆地全图》，以及《西琴曲意八章》—— 1601年为教授太监学习古翼琴而为他们演奏的乐曲填写的歌词，内容涉及宗教伦理道德思想，等等。这些书籍的刊刻、流传，成为了基督教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

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利玛窦在将基督教思想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科学文化传人了中国。虽然这后一方面的传播并非是利玛窦主观所要做的，但这一客观的结果，在明朝末年大大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了眼界，在后来也对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些成果主要包括：

（一）利玛窦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

利玛窦在天文学方面对中国的影响较之其他方面是最为卓著的，因为明末清初天文学和数学是传入中国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从数量来说，天文学在诸学科中占第一位。在理论上，利玛窦传入了地圆说、日大于地、月小于地、九重天说、四元行论等理论。在实践上，利玛窦进行了天文和历法知识的传播，以及天文仪器的制造。1583年11月27日和1584年5月24日利玛窦进行了两次月食的观测，并对中国月食的推算方法加以肯定和赞扬。利玛窦在二进南昌时（1595年）已获得天文学家的称号，此称号在他三

进南昌时（1599年）已名噪南北。他还制造、并教授中国人（如瞿太素）制造了天文仪器。同时利玛窦还传授了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徐光启、李文藻等通过向他学习西方天文学后参加了崇祯年间的修历活动。至清初西洋新法终于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历算方法。西方天文学的传入使中国土生土长的天文学理论和实践受到巨大的影响，利玛窦在其间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二）利玛窦对中国数学的影响。

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的算术主要是筹算和珠算。利玛窦来华后第一个向他学习西方算法的中国人是瞿太素，对于利玛窦传入的算术与几何新知识，瞿太素或用中国古代算经上的术语，或用自己新创的算术术语，将它们译成通顺的汉语，在各地广为流传，由此也传开了利玛窦为“数学家”的称号。在对数学的贡献中最大的贡献是传入了《几何原本》。《几何原本》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于1605年8月开始，至1607年春刻印出版，共译出前6卷。几何由此而成为数学这一科学中的一类，并由此而确定了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名词。对于此书，徐光启在其《几何原本杂议》中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几何原本》的翻译成功，甚至成为利玛窦死后要求皇帝赐地以葬的理由之一。除此之外，利玛窦还传入了《同文算指》——利玛窦教授，李之藻译。是将克拉维乌斯的著作 Epitome Arithmenticae Practicce 译成汉语。分为《前编》上、下卷，《通编》上、下卷。1614年在北京刻印。它对西洋笔算作了系统介绍，对中国影响最大。《圜容较义》一卷，1608年李之藻译。以及《测量法义》一卷，1607年徐光启译等。利玛窦传入的西洋算法，使中国的算术由筹算、珠算进入与今天的算法相一致的方法中。

（三）利玛窦对地理学的影响。

利玛窦是第一个将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的西洋人，这些知

识集中体现在他绘制的各种地图中。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实地测量经纬度。16世纪中叶，西方已使用平面投影绘图法来绘制地图，利玛窦来华后，此种方法亦传入中国。运用此种方法绘图，首先必须确定某地的经纬度，利玛窦可以说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用近代新的方法和仪器进行实地测量的第一人。当年利玛窦所测定的中国各大城市的经纬度与今日的相差无几。第二，地名的译定。利玛窦在其地图中译定了中文地名、海洋名和专有名词，有些一直沿用至今。如亚细亚、地中海、罗马、古巴、加拿大、尼罗河、南、北极、赤道等等。第三，形成了五大洲的概念。利玛窦在地图上把世界依地势分为五大洲，即欧逻巴（欧洲）、日利未亚（非洲）、亚细亚（亚洲）、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蜡泥加（南极洲）。又依天势分为五大地带，如"以天势分山海，自南而北为五带"：南寒带、南温带、热带、北温带、北寒带。这些知识都是第一次传入中国。第四，对世界地图的认识。利玛窦在其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对当时各国的方域情况、文物、风俗作了尽量详细的介绍，使中国人大开眼界，弥补了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认识的不足。

（四）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利玛窦用拉丁文注汉字音，利用声母（"字父"）126个，韵母（"字母"）44个，声调符号5个注汉字音。这一方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反切注音法，使复杂困难的事情变得简易明了，还可以使今天对于当时的普通音仍知其一二。1598年利玛窦出版了《平常问答词意》———一本关于汉语语言的著作。利玛窦为最早深入研究中国古书的人。他不但学有根源，而且能纠正经书注疏的错误，给原文以正确的注解。这对清代考证学家很有启示。[1]

除此之外，利玛窦还向中国传入了西洋美术和音乐知识，对

---

①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76页，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画法和音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利玛窦带来的礼物和贡物中有圣母像、圣母抱耶稣像等宗教画。这些画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了西洋美术，并了解了西洋油画及其绘画原理和方法。同时还因利玛窦而接触了西洋雕版图画。[①]

利玛窦在进行传教的活动中也向西方介绍了古老的中国。实事求是地说，利玛窦对中国的宣传和介绍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对中国自然状况、富饶的物产、科学文化、风俗习惯、政府机构、宗教信仰等等作了较为实事求是的介绍。1594年利玛窦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将中国的传统思想介绍给西方。西方人“知中国古书，识其真厚。知中国经籍之真谛，皆为利玛窦之为。”[②] 利玛窦是第一个把中国正面介绍给世界的外国人。

作为一个传教士，作为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和汉学家，利玛窦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利玛窦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传教而开展的，是为传教而开展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传教这惟一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正如他所说的“对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候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人民关心基督教。”[③] 在当时的中国利玛窦采取的是如此这般的传教方式：改变装束，接近官僚士大夫，展示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等等，都不过是为传教而采取的手段而已，其“目的都在于让中国人卷入他的科学成就中，然后，用这些成就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更可接受性。”[④] 如果说有一些西方先进的成果因此而传入中国的话，也只是客观的效果，而非主观使然。例如，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住下来后，开始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这项工作“乍看起来与传教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

①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② 金尼阁：《大西洋利先生行迹》，第41页。

③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页，中华书局，1983。

④ （美）乔纳森·斯彭斯：《利玛窦传》，第18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却对传教非常有利。”[1] 当翻译出前6卷后，徐光启要求继续翻译其他卷，利玛窦却阻止了他，因为利玛窦认为“翻的已经不少了，已经达到了目的。”[2]在利玛窦看来目的一旦达到，手段就可以改变了。

单就传教而论，利玛窦较之明末其他的传教士应是成功的一个。但就整个传教活动而言，亦不能算是成功的。在儒文化如此深厚的中国，他想利用儒教来传播基督教，甚至想合儒、补儒、超儒，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连被他们斥为异教的佛、道教派，也没有被他们排挤出去。加之中国百姓对外国人和其教派的反感，利玛窦在中国的28年中基督教思想只对中国社会稍稍有了一点影响，但“随后弄到几乎光沉响绝的地步，直到19世纪的中叶，基督教才重拾起三百年前耶稣会传教士的余绪，而又重新开始。从根本上说 17世纪不仅西方的科学和思想已正式步入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要课题也同样在于完成这一由中世纪向着近代的转化，而耶稣会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从根本上不可能有助于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3]

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早已成为了历史，但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史却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闭关自守是不能进步的，各民族之间需要科学文化的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人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同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想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人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相互融合才能生存。

参考书目：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

①② 《利玛窦全集》，第458页。

③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第16页，中华书局，1983。

札记》，中华书局，1983。

（美）乔纳森·斯彭斯：《利玛窦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北京通史》第六卷，中国书店，1994。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清朝第一位洋监正——汤若望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1592年5月1日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科隆城内阿波斯特教堂附近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之家。汤若望是他的中国名字。根据Johann的发音和当时的译法，翻译为若望·汤，他按中国的习惯，取名叫汤若望，取道未为字。少年时代汤若望曾到罗马学习神学并加入耶稣会。1611年取得教士资格，1616年向耶稣总会长请求派他到中国传教，1618年受耶稣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于1619年与金尼阁、龙华民、邓玉函等传教士一同到达澳门，他改穿中国服装，改用中国名字。后来经广东、广西、杭州，于1622天启二年来到北京，直到1666年在北京去世，汤若望在中国工作、生活了40多年，他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汤若望初到北京时，首先在北京继续学习汉语，掌握中国语言后，在1627年（明天启七年）被派往西安传教，与王徵共同翻译圣经故事，撰写了《崇一堂日记随笔》一书。

修改历法、传播西学

当时，由于明朝政府历局官员所修订历法推算的数据与天体运行的规律不合，日食测验多次失败，亟需修订历法。汤若望从欧洲带来了许多天文和数学方面的书籍及天文仪器，他用这些先进的天文仪器对1623年10月8日的日食做出了非常准确的预测，名声大噪。1629年，礼部尚书徐光启受命主持开局修历，经

推荐，明政府将汤若望从西安调进京城。1630 年 5 月，汤若望进京到历局任职。开始与徐光启、李天经等中国同行一道参与修订历法，从事编撰《崇祯历书》的工作。《崇祯历书》于 1634 年（明崇祯七年）完成后汤若望受命管理历局，制造各种天文仪器，兼测日食、候节气，考定置闰先后等工作，将大量的西方科技著作译成中文，撰写了《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望远镜》、《测食说》等书籍，他用中文撰写的《望远镜》一书，阐述了望远镜的基本原理、制作方法和使用方法。指出光经过望远镜的屈折，凹镜散光，凸镜聚光，凹凸镜相合以放大物像。他很注重介绍望远镜在战争中的用途。这是将西洋光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书。

1634 年 2 月，汤若望向崇祯皇帝进献一架望远镜，《帝京景物略》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节，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大小，视远近。"[①] 说透过望远镜，可以将小的东西看成大的，也可以把远的东西看成近的。它引起许多人包括崇祯皇帝的极大兴趣。后来崇祯皇帝用这架望远镜观测了日食、月食。由于汤若望准确地预测了日食，名气大增，被称为"新来的利玛窦"。1639 年（崇祯十二年）1 月 6 日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前夕，崇祯皇帝特地亲笔题写了"钦褒天学"的匾额，赐给了设在南堂的北京耶稣会所。

汤若望还主译了《矿冶全书》（坤舆格致），共 12 卷，是介绍当时欧洲采矿、冶金等技术的经典著作。崇祯皇帝亲自看过初稿译稿。

汤若望还与其他人合著《主制群征》，介绍动物、植物。书中对人体内脏和血液功能的阐述，引起了当时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

汤若望从欧洲带来的科学，当时在西方也是相当先进的。他

① 《帝京景物略》，第 153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所带来的西方天文历法知识，对中国天文历法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试制大炮

明朝末年，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内忧外患。明政府为了阻止清兵入关，命令汤若望监铸大炮，帮助教授、训练炮手，同时协助视察京城附近的工事。

1639 年（明崇祯十三年），北部边疆告急，崇祯皇帝通过兵部尚书密令汤若望铸造大炮 20 尊，大的重 1200 斤，小的重 300 斤。在离京城 40 里的大广场上实弹试放，大炮试放一次成功。大臣、太监、工匠们在试放时，都用手捂着耳朵不敢靠前。试放成功后，大家高兴得欢呼雀跃。

后来，汤若望又铸造成功了长炮，每门炮需要由两名士兵、一匹骆驼背负而行。汤若望因铸炮有功而受奖，崇祯皇帝又命令汤若望与中国工匠再造“无敌大将军”500 门小炮。

汤若望奉命教授中国士兵放铳法，编纂《火药守城》等书进呈。第二年正月，崇祯皇帝又命他讲授火器知识，进行演练。这一年的 4 月，周远儒奉命边塞督师，动用所制火器，汤若望在随征途中试放空心炮，并教授士兵火器使用方法。现在故宫内的生铁大炮就是在汤若望的主持下制造的。

1644 年（明崇祯十七年）初，李建泰督师围剿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也命汤若望随军修理西洋火器。

汤若望是当时唯一精通西洋火炮的传教士。汤若望口授，焦勖笔译，成书于 1643 年（明崇祯十六年）的《火药挈要》（又名《则克录》），叙述了各种火器的铸造法、应用法、装配法，以及子弹、火药、火箭、地雷的详细制造方法。这本书是我国明朝末年有关火攻知识的比较全面、权威的著作。该书图文并茂，有 40 余

幅说明图，以图补文。

当时，历法连年失修，经常发生错误，再加上边疆形势长期不稳。这样，修改历法和铸造大炮就成为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们得以施展其所长，以科学技术作为其传教的先导，为扩大传教的范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汤若望与崇祯皇帝

汤若望利用崇祯皇帝对他修历和铸炮工作的赏识，可以自由出入皇宫，有了传教的便利条件，开始向明朝宫廷传教。

1640年，汤若望向崇祯皇帝进呈印刷精美、色彩绚丽的《耶稣行迹》多幅。皇帝谕命悬挂于御座大殿，令皇族大臣们观赏了十多天。汤若望还向崇祯皇帝敬献《进呈书像》，这是一本羊皮纸书，共150页，上面绘有耶稣的经历和事迹。崇祯皇帝赐给汤若望"钦褒天学"四字，制成匾额分送各地天主教堂悬挂，称天主教为天学，天主教并非邪教，而是正教。由于得到了皇帝的肯定，所以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相当活跃，领洗入教的善男信女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1631年汤若望在皇宫内付洗太监10人，第二年，御马太监庞天寿（教名亚基楼）由汤若望领洗入教，在宫中举行第一台弥撒礼。庞天寿领洗入教后，把天主教和耶稣会士一一介绍给皇室，于是皇族人纷纷奉教。后来在宫中建立起两个小教堂，在宫中领洗过的人不出皇宫门就能做弥撒。据1636年统计，奉教的有亲王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80余人。

汤若望讲，"不分男女，均可入教"，"凡对加人我教之人，各给《天主教要》一册，以及铜像、绣袋、会期等"。就这样，汤若望在一年内收徒200多人。汤若望以介绍西方科学来达到在宫廷立足和传教的目的，"出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趁

机言圣教道理”。到明末，使宫中信教者达540名之多。[1]

当时加入天主教的中国人，除有皇亲贵族、太监外，也有平民百姓。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汤若望升任北京耶稣会传教区区长。随着他政治地位的上升，在北京的传教活动也进一步展开。他不仅在大教堂中，而且也在小礼拜堂中作弥撒，讲教理和听取信徒的忏悔。崇祯末年，天主教已经在中国的13个省传播。经耶稣会传教士所付与的洗礼次数，1634年为287次，1637年为4000次，1638年为3504次，1639年为5480次，1641年为5400次，1643年为4824次。信奉天主教的人数不断增加。[2]这一切自然与汤若望开创性的工作密不可分。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五月，李自成率起义军攻陷北京后。在兵荒马乱的动荡年月里，汤若望坚持留在北京，没有逃到外地避难，汤若望也曾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有过接触。

服务清廷

清朝入主中原后，1644年（清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迁出，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等处，以便骑兵居住”。汤若望上疏朝廷，称“臣自大西洋八万里东来，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阐扬天主圣教为本，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臣自构天主堂一所，朝夕虔修，祈求普佑。作宾于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皇帝，另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帙，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之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所用

①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士概论》，第20页，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年。

② 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一册，192页，转引自顾裕禄著《中国天主教的过去与现在》，第27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整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1] 多尔衮下令保护汤若望及其教堂，不允许士兵进行滋扰。清廷内院特颁下满文告示：“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2]

是年 5 月 23 日，清廷录用各衙门旧职人员。汤若望表示可以继续留在历局工作，得到批准。从此，汤若望开始为清政权服务。

明末以来，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科学试验已经证明，西方历法比中国的传统历法更为先进。清朝初年，汤若望就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历法的建议，获得摄政王多尔衮的赞同。汤若望上疏，指出“旧法历本大谬七条”，请求清政府派人实地测验他推测的日、月食是否准确，并希望清廷能用西洋新法制定历书。

6 月 22 日，汤若望进呈奏疏：“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曾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有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尽进内廷，以用推测，屡屡密合。近闻诸器，尽遭贼毁，臣拟另制进呈。今先将本年八月一日日食，照西洋新法推步京师所见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像，与各省所见日食多寡先后不同诸数，开列呈览，乞敕该部届时共同测验。”说他曾用西洋历法厘正过旧历书，制造过许多天文仪器。他准备再制造一些天文仪器献给清廷。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推算出这一年的八月初一在京城所见日食的起复时刻、方位、食分、图像。此外，还推算出包括云南、贵州、沈阳、高丽等 16 个地区所见日食的数据，打破了历年来只推算京城日食的传统。汤若望把他新制作的浑天仪、地平日晷和望远镜及舆地屏图等献给多尔衮，并再次上疏希望修订历法。

---

①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55 页，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②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55 页，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此后，由弘文院大学士冯铨等奉命与汤若望及钦天监各官到观象台观测日食。结果，只有汤若望用西洋历法推算的各项时刻与方位均合天行，十分准确。清廷礼部经过研究决定，把汤若望依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法命名为《时宪历》，从1645年（清顺治二年）起在全国实行。

《时宪历》是中国封建时代历法上一次重要的改革。

除修改历法以外，汤若望也曾向多尔衮提出许多重要的政治建议，有不少建议被清政府所采纳。

中国第一位洋监正

由于汤若望在天文历法上的突出贡献，1644年10月清廷正式发布了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的谕旨："钦天监印信，着汤若望掌管，嗣后一切占候选择等事宜所属掌印管员举行。"汤若望婉言谢绝，被礼部驳回。12月初汤若望接受了钦天监职务，出任了中国历史上钦天监第一位洋监正。因为清朝前期的钦天监，不仅是掌天文、历法、星象的专门机构，也是耶稣会士在中国活动的联络中心，同时还是清政府与西方各国进行交往的重要的媒介。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清兵入关后，汤若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使清廷废止了有近2000年传统的中国历法，以及元、明时期传入中国的回回历法，使先进的西洋历法较快地传入中国。随之也使西洋传教士能在中国长期立足并在以后的一二百年间连续担任钦天监中的监正或监副等重要职位。钦天监在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禁教时期成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渠道。

1645年（清顺治二年），汤若望对《崇祯历书》进行了修改，编写了《西洋新法历书》，共100卷。顺治皇帝在封面上批示"依西洋新法"。书中介绍了西方天文、历法知识。汤若望在钦天监组

织官员们学习西洋新法，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定期进行考试，培养了一大批精通西洋天文、历法的中国官员。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播。

第一位天文台台长

汤若望也是北京古观象台第一届外国台长。北京建国门城垣南侧，矗立着一座高台，这就是我国明代著名的观象台遗址。观象台优雅秀丽的四合院最西侧西北角的几间小耳房，就是汤若望当年曾经办公的地方，也是古观象台历届台长的工作室。房中迎面是一幅十分醒目的大匾，在海蓝色的底色上面书写着四个金色大字“观察惟勤”。汤若望在这里整整工作了 20 年。

当时历局设观象台两处，有七政列宿大仪 9 座，平浑悬仪 3 架，交食仪 1 架，天体球仪 2 架，平面日晷 3 架，自鸣钟 3 架，望远镜 3 架。

观象台上的简仪是由汤若望改造而成的，现在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有汤若望制造的象牙日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汤若望制造的青铜日晷、浑天仪。现在北京古观象台上所陈放的天文仪器，虽然大多数是在南怀仁任职期间制造的，但与汤若望多年积累的数据材料及制器经验密不可分。

汤若望被清廷封官后，就脱下了洋装，换上了清朝的官服，把前半边的头发全部剃掉，头后面也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便于同中国官员、知识分子一起工作。1652 年（清顺治九年），顺治皇帝赐给汤若望朝衣、朝帽、朝袜。汤若望虽为钦天监监正，却很平易近人，很关心体贴监员的工作和生活。他要求清廷给在观象台上直接从事天象观测的人员增加俸禄，还特地向皇帝申请了一笔专款，缝制了厚厚的棉大衣，供夜晚值班的监员们御寒。

汤若望与顺治皇帝

由于汤若望主持钦天监工作成绩显著，顺治皇帝在1651年（清顺治八年）亲政后对他更加恩宠。此时顺治皇帝不满13岁，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还聘请汤若望作自己的高级私人顾问。当时汤若望已经59岁，顺治皇帝尊称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长者），这包含着晚辈对长辈和弟子对老师的敬仰之情。顺治皇帝可以算作是中国第一位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启蒙教育的皇帝。

顺治皇帝与汤若望的密切关系缘起自顺治的母亲孝庄文皇太后。据说在1651年（清顺治八年）4月的一天，汤若望居住的南堂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人是一位宫女，声称一个亲王的郡主得了急病，向汤若望求药。汤若望将一面十字圣牌交给宫女带回去，嘱咐将圣牌挂在病人胸前，祈求天主帮助她恢复健康。此事后不久，孝庄皇太后请汤若望进宫，告诉他患者并不是什么郡主，而是她的亲侄女，即顺治皇帝的正宫娘娘。她给了汤若望许多赏赐，还认汤若望为义父。这样，顺治帝也就可以算作汤若望的义孙了。

从此，孝庄皇太后也在胸前挂上了一面十字圣牌。顺治皇帝虽然不信奉天主教，但对西洋的宗教非常感兴趣，也十分尊敬汤若望。他对汤若望以及其他在华的传教士一直采用宽容政策。

1650年，顺治皇帝赐给汤若望宣武门内原天主教堂的一块空地，让他重新建造教堂。新教堂由汤若望亲自设计，孝庄皇太后、顺治皇帝和一些亲王、官绅等都捐赐了银两，一共1000两黄金。这座教堂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南堂。

1650年（清顺治七年）春新教堂开始施工，到1652年新教堂落成。汤若望立了一块大理石碑，用拉丁文和汉文写了一篇《御制天主堂碑记》，记述建造教堂的经过：“自昔西汉时，有宗徒圣

多默者，初入中国传天主正教，次则唐贞观以后，有大秦国西士数人，入中国传教。又次明嘉靖时，圣方济格入中国传教，至万历西士利玛窦等，先后接踵入中国传教，译有经典，著有书籍，传衍至今。苛蒙清朝特用西法，定造时宪新历，告竣。谨于都城宣武门内虔建天主新堂，昭明正教。时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为大清顺治七年岁次庚寅。修改历法汤若望记。”汤若望设计的新教堂古朴、庄重、壮美、舒适，还富有中国的建筑风格。大堂落成后，顺治帝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匾额。教堂附近还设有天文台、仪器室、藏书楼和传教士的住宅。宣武门教堂至今都是北京南城的一景，到这里参加宗教活动的教徒很多。从1690年起宣武门教堂成为北京主教座堂。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顺治皇帝又赐汤若望墓地，在阜成门外车公庄利玛窦墓旁，汤若望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圣母堂。

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又御笔亲书“通玄佳境”的堂额，并御赐了《天主堂碑记》，这块碑刻于教堂门前。碑身是一整块白色的大理石，高2米多，宽近1米，厚约33厘米。碑的顶端、两侧及碑文的四周，都刻有飞龙和云朵。碑记详细回顾了汤若望来中国后的经历，表彰了他在治历上的突出成就。

汤若望凭借着他广搏的学识和“玛法”的特殊关系，经常进出皇宫，与顺治皇帝谈天说地。顺治经常向汤若望请教有关天文方面的知识。日食与月食的原因，彗星或流星星座的排列和名称。为了怕汤若望受凉，顺治皇帝还把自己的皮褥子拿给汤若望垫着，甚至亲自为他斟奶茶。汤若望从不因为顺治皇帝的到来面在大门口铺放地毯，也不准备特殊的饭菜。顺治皇帝也经常出入汤若望的住所，1656至1657年两年间顺治皇帝亲自去拜访汤若望达24次之多，平均一个月去一次。汤若望入宫朝觐皇上的次数更是难以统计。

汤若望在向顺治帝传授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的同时，

也向他传播天主教的教义。汤若望曾经送给顺治皇帝一幅表现耶稣生活的图画，那是巴伐利亚的马克合亚大主教派人前来为中国传教的牧师们绘制的。

在汤若望的住处，顺治皇帝还让汤若望介绍天主教关于跪凳和念珠的用法，详细询问天主教的教规及生活方式。在圣诞节时，顺治皇帝也曾兴致勃勃地来到教堂看马槽（耶稣诞生之处），观看耶稣、圣母玛利亚和天使3位神王、牧民的画像。

顺治皇帝曾经赐给汤若望两把扇子，上面有御笔书画和玺章。他还十分注意汤若望的安全，晚上从不让年已六旬的汤若望单独骑马回家，总要派一些皇室亲王护送。每到汤若望寿辰时，顺治皇帝便派一些官宦士大夫前往祝贺。

汤若望不仅是顺治皇帝的良师，也是诤友，他经常指出顺治皇帝在施政中的缺点，教导他应该成为大臣们学习的好榜样。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6月，"南明延平王"的郑成功势力大大发展。他率领17万大军围攻南京，准备直取北京。顺治皇帝闻讯后要御驾亲征，满朝文武只有汤若望敢于向顺治进言，他不怕触怒龙颜，冒死苦谏，终于使顺治放弃了亲征的念头。

顺治非常宠信汤若望，使他在清廷中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1646年（清顺治三年）任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印务。1649年（顺治六年）任太仆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事。1651年（清顺治八年）2月加太常寺卿，8月授通议大夫，其祖父、父亲受封为通议大夫，祖母、母亲被封为淑人。1653年（清顺治十年）汤若望被授予"通玄教师"，加俸一级。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被封为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顶戴。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获光禄大夫衔，祖先三代一品封典，仕到一品，这在外国传教士中是比较少见的。汤若望的地位十分的显赫，成为清朝政府举足轻重的人物。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临终前，作为外国传教士

的汤若望竟直接参与了其继位人选的重大政务，确定不足七岁的玄烨为皇帝的继承人，他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

历狱大案

康熙继位之初由于年幼，以鳌拜为代表的守旧势力辅佐朝政。鳌拜等人的当政，使得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传教士在中国受了近 20 年的恩宠之后，突然面临着一场大的灾难。

鳌拜等上台后，提出“今当率祖制，复旧章”，废除了多尔衮、顺治皇帝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并开始着手恢复清朝人关以前的旧制。在强烈的复旧狂潮的影响之下，西方传教士在钦天监的地位开始受到影响。

但在康熙初年，汤若望仍加紧在中国宣传天主教，把天主教说成是全世界唯一的正教，汤若望与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人在 1663 年（清康熙二年）撰写《天学传概》，并请国子监助教许之渐为之作序。《天学传概》刊刻后，散发给在中国的天主教堂的传教士以及有关人员。这本书是针对杨光先指责天主教为邪教的论点而写的，阐述了天主教并不是邪教，而是正教。杨光先思想守旧，竭力反对当时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科学技术。他从 1660 年（清顺治十七年）起开始上疏批判汤若望所制定的西洋历法。1654 年（清康熙三年）7 月杨光先向礼部递了一篇《摘谬论》，主要是指责汤若望所制新法的十谬，并且对天主教进行猛烈的攻击。他认为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是为了造反。他在《不得已》一书中还指责汤若望等人“实欲挟大清认尽判大清而从邪教，是率天下无君父也”。说汤若望宣传天主教，实际是为了毁灭中国的文明。

杨光先认为《时宪历》敢写“依西洋历法”五个字，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毁灭我国正教，惟有天主教独尊。

他见到《天学传概》后指责是妖书，并于康熙三年（1644年）七月向礼部控告汤若望等人图谋造反。在《清诛邪教疏》一文中控告汤若望“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视朝廷秘密。若非内外勾连，谋为不轨，何故布党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种种逆谋，非一朝夕，若不速行剪除，实为养虎贻患”。[1]杨光先要求依律将汤若望正法，终于酿成了清初的一场大狱。

清廷从1664年8月到1665年7月（清康熙三年八月初六到康熙四年七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审理此案。从1664年9月26日开始进行会审，参加审讯的有吏、礼二部以及其他几十名大臣，汤若望及其助手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四个外国传教士和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许保禄等4位在钦天监任职的中国官员也被传讯到礼部大厅。

8月，礼部提审73岁的汤若望，汤若望肢体瘫痪，言语不清，由南怀仁代言。10月，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被投入监狱。汤若望作为散布“邪说”的“首犯”，被革职处死，监押礼部，两个月后又移押刑部大狱。清政府下令把各省传教的传教士一律押送到北京，听候审判处理。

1665年（清康熙四年）3月，辅政大臣鳌拜召集200余位大臣共同定案，汤若望等被处以凌迟。恰在此时，北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迷信的人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第二天，清廷颁布了一项谕旨，要行皇恩大赦，一大批犯人，包括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都被释放。孝庄皇太后对鳌拜等处死汤若望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鳌拜改判汤若望流徙，孝庄皇太后仍不同意，命令开恩加释汤若望免去一死。

---

① 杨光先：《清除邪教状》、《不得已》，方豪藏本影印本《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三）》第1077页，1078页。

然而，杨光先执意要把汤若望逐出教堂，派人砸毁了教堂中的耶稣圣像及御赐汤若望的“通玄教师”的牌匾，焚毁《天学传概》。

是年7月21日汤若望为教会写下了忏悔书，汤若望口授，南怀仁执笔。1666年8月15日（清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日），汤若望病逝于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享年74岁。这一天是西历圣母玛利亚的升天节，中国农历七月十五日恰是京城荷灯节——祭告死者的传统日子，俗称鬼节。

平反昭雪

历狱大案之后，杨光先取代了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时宪历》被废弃，改用原来的《大统历》。全国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受到了牵连，不准进行传教活动，很多传教士被押送到澳门。

杨光先主持钦天监工作后错误不断，康熙皇帝遂启用南怀仁治理历法，将杨光先发遣原籍。杨光先寻死于途中。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重新议定汤若望案，认为汤若望治历有功，为他平反昭雪。1669年（清康熙八年）11月16日颁布了谕祭汤若望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史司通政史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之灵：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遂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呜乎！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钦享。[1]

他下令恢复顺治皇帝所授官职，所赐“通微教师”（为避玄烨的玄字，改“通玄教师”为“通微教师”）归还所占用的教堂、墓

[1] 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一册，191页。转自顾裕禄著《中国天主教的过去与现在》第27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地归还。还赐银两，为汤若望重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汤若望的墓在利玛窦墓的西侧（阜成门外马尾沟12号法国教堂后侧），是一座中国式的墓地。礼部为汤若望撰写祭文，刻在汤若望墓碑的正面右侧，墓碑的正中写着“耶稣会士汤公之墓”。祭文、满文译文刻在碑的左侧，背后有拉丁文译文。墓碑后面写着：“汤先生讳若望，号道未，大西洋日尔玛你亚国人也……。”

清廷为汤若望平反，实际上也表现出对西洋传教士的友好。

汤若望在中国时间长达40余年，忍受了思乡的巨大痛苦，矢志修身，终身未娶。他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长期参与清政府的修订历法工作，掌管钦天监印务长达20年之久。汤若望使用西洋历法非常准确，因而受到清政府的重用。在观测天象、制造天文仪器、修治历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促进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汤若望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居于突出的地位，是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

参考书目：

李兰琴：《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1995。

周燮番：《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方　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

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81。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与现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注摘要》，中华书局，1949。

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受康熙皇帝器重的传教士—南怀仁

南怀仁（P·Ferdinandus Verbiest，1623—1688），是清朝初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与利玛窦、汤若望齐名，在西学传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怀仁是比利时佛拉芝镇毕登人，出生于1623年10月19日。南怀仁是他的中国名字，字敦伯。他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信奉天主教，18岁时加入了耶稣会，1648年毕业于天主教鲁汶大学。1657年他和其它35名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南怀仁在中国生活、工作了30多年，由于他才能出众，治历、铸炮，屡建功勋，因此深得康熙皇帝的恩宠，他死后所获的殊荣为西方传教士之冠。

受汤若望牵连

南怀仁刚到中国后，就在北京学习汉语，1659年被耶稣会派到陕西传教，他在西安工作一年以后，于1660年5月9日被召到北京，协助年近7旬的钦天监监正汤若望治历。由于南怀仁精通天文、历法，他很快就成为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得力助手。

1661年康熙登基，年仅7岁，还是天真的儿童，因此设置了四个辅政大臣代理国政。虽然康熙皇帝在13岁时就已经宣布亲政，但国家政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辅政大臣之一鳌拜的手中。

鳌拜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他与汤若望等西方教士不合，不愿意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西洋历法。

另一个守旧的代表人物杨光先在1664年（清康熙三年）7月向礼部控告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图谋造反，以邪说惑众。8月，汤

若望被礼部提审。9月，受汤若望案的牵连，南怀仁与利类思、安文思等西方传教士也被捕入狱。因为汤若望年过古稀，肢体瘫痪，言语不清，只能由南怀仁代言。在最后定案过程中，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观测法同时进行观测。预测这一年1月16日有日食。中国、回回和西洋历法都事先报告了自己所测出的日食时间。观测结果：回回历所测的日食钟点过早，大统历又晚了15分钟。当宣布南怀仁所测的钟点已到时，人们从天文望远镜中果然清楚地看到了日食。按道理来说，预测错误的人应给予定罪，但是杨光先、吴明煊等人并未受到任何处罚。虽然西洋历法非常准确，却没能减轻对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判刑。

1665年4月，历狱大案结果，汤若望被判凌迟。恰在这时，北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迷信的官员认为这是上天对历狱案的警告，孝庄太皇太后命令开释教士。汤若望回到了宣武门教堂，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西方传教士也被释放。但是，杨光先当上钦天监监正后却把汤若望赶出宣武门教堂，只好到东堂居住（又名圣约瑟堂）。南怀仁等人日夜陪伴着汤若望，照料他的生活。汤若望比南怀仁年长近30岁，又是南怀仁的前任、老师，因此，南怀仁非常尊重汤若望。汤若望病逝前为教会写下了忏悔书，由他口述，南怀仁执笔。由此可见，汤若望非常信任南怀仁。

为汤案平反

汤若望下台后不久，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吴明煊为监副，他们俩人以《大统历》治历，与节气不符，经常发生错误。杨光先无法对此做出解释，朝野一片怨声。由康熙亲政后，为了在学术上分清这场争论的是与非，他决定以实验的方法来验证争论双方的观点。

1668年（清康熙七年）11月23日，康熙皇帝派内院大学士

李蔚等叫杨光先、吴明煊和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竞争”，宣布“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1]命他们与礼部尚书布颜、郝惟纳去午门测验日影。第二天，内院大学士李蔚等带着杨光先、吴明煊和南怀仁等人来到观象台，让他们当众分别测验和推算正午时分日影所到之处。经过测试，杨光先测量的误差最大，吴明煊测量的也不准确。而南怀仁经过推算把当天中午时分的日影分毫不差地画在木表上。到中午大家一起前来观看，南怀仁推算的十分准确，有人情不自禁地轻轻地鼓起掌来。

后来，他们又在紫禁城午门前进行测验，南怀仁标出的线条与正午的日影也不差一丝一毫。令众人赞叹不已。测验结果出来以后，康熙皇帝马上下了一道谕旨：“将吴明煊所算七政及民历，着南怀仁验看。差错之处写出。俟报部之日，尔等议奏。”南怀仁等人一面进行精密的测算，一面仔细审阅吴明煊等人编写的《七政民历》一书，指出：《七政民历》内康熙八年12月闰，应移置康熙九年正月。南怀仁还指出：吴历中一年中有两个春分、两个秋分也是错误的。

1669年（清康熙八年）正月下旬，康熙皇帝派大学士图海、李蔚等20名大臣与吴明煊、南怀仁等一起去观象台进行测验，南怀仁的测验“逐款皆符”，而吴明煊的测验“逐款皆错”，而杨光先“不知推算”。

议政王等会议主张将康熙九年的历法交给南怀仁进行推算，礼部也向康熙皇帝建议：既然南怀仁所使用的96刻度法合乎天象，那么从康熙九年起就应启用南怀仁的西洋历法。已经颁布的历书中闰月的错误，由康熙皇帝下达诏书“停止闰月”，但杨光先

---

① 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册，第42页。

却仍然表示反对，说："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圣而采用天主教历？且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洋历，必致国算短促，不利子孙。"康熙非常尊重科学，力排众议，以杨光先"职司监正、历日差错，不能修理，'左袒'吴明烜，妄以96刻推算谓西洋之法必不可用"的罪名[1]下令罢免了杨光先、吴明烜等人的官职。

1669年（清康熙八年）5月，少年天子康熙以过人的勇敢、机智，铲除了鳌拜集团。为推行其先进的经济文化政策扫除了障碍。

南怀仁和利类思、安文思等西方传教士抓住这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呈请礼部向康熙皇帝控告杨光先，要求为汤若望平反昭雪。南怀仁等人在奏章中写道：他们所宣传的天主教教义是敬天爱人，连顺治皇帝都曾赐给汤若望御制碑文，门额上还书写着"通微佳境"（因避讳改"玄"为"微"），怎么能说天主教是邪教呢？杨光先诬告他们纯属是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图谋造反"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他们这些传教士远涉重洋、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不过几十人而已，他们怎么能造得了反呢？这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勤勤恳恳地为清廷服务，最后几乎都老死在中国，叶落不能归根。他们尽忠尽孝，受到了中国几代皇帝的信任和清政府官员的爱戴。

康熙皇帝派人对汤若望案重新进行审核，结果发现：杨光先等人加给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一切罪名都不能成立。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不仅没有图谋造反，而且治历有功。于是下令恢复顺治皇帝授予汤若望的官职以及所赐的"通微教师"称号，归还所占用的天主教的教堂和墓地。对由于受到汤若望的牵连而被押解在广州的25名传教士，也重新作了处理，于1670年12月予以开释。康熙皇帝还允许在北京修建南堂和东堂两座大教堂，恢复天主教

---

[1] 黄伯禄：《正教奉褒》第二册，第42页。

徒的宗教生活，这一年有3000人受洗入教。

南怀仁以充分的事实，准确的测验，可信的数据，论证了汤若望所造历法的准确无误，同时也驳斥了杨光先等人对西洋传教士的诬陷，使汤若望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清廷重用

南怀仁学识渊博，又长期参与朝廷的修历工作，使用的西洋新法准确无误，因而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器重。杨光先被免职以后，康熙皇帝决定“历法天文由南怀仁料理”，实际上想要由南怀仁代替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的职务。大概是由于受汤若望冤案的影响，南怀仁几次婉言谢绝，不愿意接受这个职务，表示自己可以参与治历的工作，但不担任任何职务。南怀仁给康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表明自己的心迹：“臣生长极西，自幼矢志不婚不宦，惟以学道修身为务，业今30余矣。荷蒙皇上不弃庸才特畀简用。犬马尚知报主，臣非木石，敢不勉力以答高深。臣一疏再疏，抗辞官职，出于臣至情，非致勉强渎陈。至于天文历法一切事关敢不竭蹶管理，宁惮烦劳。……乞伏皇上悯臣之心，察臣之悃，允臣微志……。”后来在康熙皇帝的一再恳求下，南怀仁终于在1669年担任钦天监监副，掌管钦天监监务。后来，清廷特地旨令广东总督：“（传教士）内有通晓历法的几名，即行起送来京，甚不知历法者，即令各归本省教堂。”于是有将擅长天文历法的传教士闵明我、恩理格等调到了北京，在钦天监内供职。

南怀仁十分擅长制造天文仪器。就职后，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始建于明朝的北京古观象台上的天文仪器进行了改建。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制器、编书的任务。今天北京古观象台的八件天文仪器，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等六件就是南怀仁任职期间于1670年至1674

年历时4年完成改建的。以后，南怀仁又制作了玑衡抚辰仪、圭表、漏壶、简平仪、地平半圆日晷仪和温度计等天文气象仪器。玑衡抚振仪是清代制造的最大的天文观测仪器，重5吨多，高大雄伟，雕刻精细。天文台上的每件仪器都是用白铜精工细作制成的，至今操作起来仍很自如。

由于南怀仁的工作很有成效，1674年被升任为钦天监监正，成为继汤若望之后中国第二任洋监正，并加太常寺少卿衔。后因撰写《康熙永年历法》，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以后康熙皇帝屡次对他加官进爵。

南怀仁在钦天监还培养了一大批天文历法方面的中国专家。当时历局有200多名官员参加编译、修订历法的工作，康熙九年，礼部又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分科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凡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就被提拔为博士官。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康熙皇帝下达谕旨：向者新法、旧法是非争论。今既深知新法为是，尔衙门学习天文历法满洲官员，务令加衰精勤。此后习熟之人方可升用，其未经学习者不准升用。[1]

康熙皇帝的洋教师

南怀仁凭借着他在观测天象与治历著书等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格外恩宠。由于南怀仁通晓汉文和满文，康熙皇帝任用他为清廷翻译拉丁文文书。

通过历法之争，康熙皇帝对天文历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南怀仁才学渊博，从1669年（清康熙八年）起康熙皇帝经常把南怀仁请到内廷，虚心地向他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南怀仁每天清晨就进宫，被引入皇帝的内殿，经常要到下午四点钟左右才

---

① 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第51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告退。他为康熙皇帝讲书，讲解各种问题，经常留下与皇帝共进晚餐，皇帝赏赐他金、银餐具。南怀仁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可以称得上是康熙皇帝的第一位洋教师。南怀仁也是康熙皇帝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老师。康熙皇帝非常喜欢数学，要求南怀仁为他讲解从西方带来的数学仪器和天文仪器的用法和几何学、静力学。南怀仁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地加以讲解。

在南怀仁的悉心指导之下，康熙皇帝用了较短的时间就学完几何、代数和三角等各种数学科目。由于有了较好的数学基础，康熙皇帝后来才能倡导科学地治理黄河，才能够亲自主编《数理精蕴》这样大型的数学丛书。

1672 年，康熙皇帝应南怀仁的请求，又把熟知天文、数学和音乐的西方传教士徐日升从广东香山县召到北京。徐日升除了参加钦天监的工作外，还教授康熙皇帝欧洲的音乐和乐理知识。

南怀仁对于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与重用非常高兴，他在 1678 年 8 月 15 日写信给欧洲全体耶稣会士，说："中国人所重视的科学中有天文学、光学、力学，最感兴趣的是数学……当我把这种数学带进宫廷内时，我常常是居于御座之旁，而最高贵的大臣们则远远就须下跪。"

1682 年南怀仁奉旨随康熙皇帝巡幸关东，1683 年又奉旨扈从视察塞北。主要进行测量绘图工作。

1685 年南怀仁介绍传教士安多从澳门到北京，接替他为康熙皇帝讲授几何学、代数。1688 年，南怀仁又把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李明、刘应、洪若翰介绍给康熙皇帝。他们在 1690 年任宫廷教师，入宫为康熙皇帝讲授西学，并在宫中设立了实验室。康熙皇帝和这些西方传教士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康熙皇帝周围的西方传教士比顺治皇帝时期的更多，这些传教士所从事的职业也比以前更加广泛，康熙皇帝的御用教师将近 20 人。

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为清廷服务了几十年，他们领取清政府

的俸禄，接受清廷授给的爵位，他们自称为清政府的“西洋远臣”。通过给康熙皇帝进课，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了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与桥梁，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发展教务

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以向中国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媒介，得到了康熙皇帝和清政府一些官员的赞赏。这为他们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天主教，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1676 年，南怀仁升任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他利用这个职务，积极发展教务，修建教堂，收纳教友。他写了《教要序论》62 篇，《善恶极略说》等宗教方面的书籍。他还通过各种途径，使不少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加强传教的力量。南怀仁从法国耶稣会中选中了精通天文、历法、地理的白晋等五位传教士，他们在 1688 年带着天文仪器来到中国。

南怀仁也想寻找一条由俄国贯通欧洲于中国相通的道路，以便罗马教廷向中国派遣更多的传教士。由于种种原因，这条通道最终没能打通。

南怀仁与康熙皇帝的师生关系以及他的声望也给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带来极大的便利。据说当时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只要举着上写“工部右侍郎南”的旗帜就可以畅通无阻了。1682 年康熙皇帝谕旨：“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技制造兵器，效力勤劳……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因此，“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旧行走，不必禁止。”[1] 这实际上是允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为西方传教士们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提供了方

① 黄伯禄：《正教奉褒》第 2 册，第 115 页。

便。

1684年和1689年康熙皇帝两次南巡，在南京、济南和杭州等地访问了天主堂，接见了传教士。

康熙皇帝在1692年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使天主教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享有同等的待遇。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统计，从1664至1701年不到4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受洗教徒增加了几乎一倍。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共有传教士117人，教士住屋114处，大小教堂250处，教徒达到30万人之多。

制造大炮

清朝初年，中国边疆形势不稳，战事较为频繁，对于火炮的需求显得十分迫切。南怀仁精通铸炮技术，对于康熙时期大炮的制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673--1681年(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清政府用了8年的时间镇压了“三藩之乱”，其中南怀仁所制造的大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云南)、靖南王耿精忠(福建)和平南王尚之信(广东)，他们在康熙年间发动的反清战争，史称“三藩之乱”。清廷对吴三桂等人进行征讨，所需大量火炮，康熙皇帝命令南怀仁铸造。南怀仁很快就向康熙皇帝进呈了炮样。经过试射合格后，大量依样制造送往前线。他还亲自培训了200多位中国炮手。

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11月初，清政府把旧炮化成铜，让南怀仁制造新炮。南怀仁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在康熙二十年八月就制造出323门“神威将军炮”。1681年8月21日在卢沟桥试放，试炮时发射2万多发，命中率极高，令亲自视看的康熙皇帝兴奋不已。康熙皇帝脱下御服貂皮大衣，赏赐给南怀仁。康熙皇帝对南怀仁说：“尔向年制造大炮的陕西、湖广、江西等省都已有

功效，今之新炮较为更好。"[1]

南怀仁还充分利用西方先进的物理、化学和军事知识，制造成功威力强大的大炮，又称红衣炮。这些炮除了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发挥过强大的威慑力量外，还在后来反击沙俄侵略者的雅克萨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南怀仁制造的大炮很有特色。他能够将西洋大炮的制造技术与中国的军事实际相结合。他制造的大炮射程远、命中率又高，特别适用于山地作战，受到了中国官兵的好评。据《熙朝定案》和《清朝文献通考》等书记载，在康熙年间由南怀仁所设计和监铸的大炮有566门之多，占当时中国大炮总数的62%。

除了铸炮外，南怀仁还写了一本详细介绍铸炮技术、大炮的构造、炮兵的训练以及炮台建筑知识的军事著作——《神威图说》70卷，把西方军事技术引进到中国。1682年，他将这本书进呈康熙皇帝。因铸大炮有功，康熙皇帝在这一年晋升南怀仁为工部右侍郎，官阶二品。

除了为清政府铸造大炮，南怀仁还利用机械学原理为清政府制造过起重机和滑车，在建筑工程和运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671年（康熙十年），工部在建筑明孝陵大石牌坊时，南怀仁用所制造的滑车把10万多斤重的石柱子等石料顺利地运送到目的地，节约了运费一万多两黄金。

南怀仁还在1678年制造了一艘用燃汽轮来推动的轮船，比欧洲同类实验要早100多年。

南怀仁受命视察北京万泉庄河道，亲自勘测地图，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程。作为翻译，南怀仁参加了中俄条约的谈判，参与测量了中俄边界。

---

(1) 黄伯禄：《正教奉褒》第2册，第83页。

科学著作

作为西方传教士，南怀仁不仅在神学方面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在天文、数学、制器方面也颇有造诣，来到中国后他刻苦学习汉文、满文，因而能够把自己的著作熟练地译成汉文，甚至可以直接用中文撰写科学著作。

在中国期间，南怀仁撰写了许多科学著作。他与利类思、安文思合著《西方纪要》，介绍了西欧的一些国家及其重要人物、民俗风情、主要产品以及距离中国的远近等等。这本书弥补了利玛窦所著《山海舆地全图》和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的缺点与不足。1671 年，南怀仁出版了《坤舆全图》，第一次把世界分成东、西两个半球，介绍了南北极、地震、山岳、海水运动、潮汐、河流。以及巴比伦空中花园、爱琴海里德岛的太阳神巨像、埃及金字塔、奥林匹亚灯塔等世界七大奇观，书中附有很多插图，介绍了各国的主要物产、珍禽异兽、水产及气象特点等。

1674 年（清康熙十三年）当北京观象台的一批天文仪器制成之后，南怀仁撰写了《灵台仪象志》16 卷，将这些天文仪器的结构、原理和制作方法、安装方法及其用法都绘制成图，作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为后人使用这些天文仪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还结合仪器的安装、使用，介绍了不少物理学、地理学方面的知识，以及伽利略的力学研究成果和当时西方的光学研究成果。

1677 年（清康熙十七年），南怀仁用长达 10 年的时间编定了《康熙永年历法》32 卷，包括金、木、水、火、土星、交食等多篇，对康熙以后两千年的天文数据进行了准确的推算，为以后的天文观测提供了参考，很有实用价值。《康熙永年历法》又名《预推七政交食表》，南怀仁因此著作于 1678 年被加封为通政使司通政使衔。

南怀仁还著有《测验纪略》、《赤道南北星图》、《简平规总星图》等一大批科学著作。

南怀仁对中国书法颇有研究，有人把他的文学及书信集成《南怀仁之汉文书法与汉文尺牍》。

死后殊荣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南怀仁坠马受伤，从此一病不起。在他病重期间，康熙皇帝曾多次派太医为他治病，也常派内侍前去问候。南怀仁非常感动，他在去世前给康熙皇帝上疏："臣怀仁远西鄙儒，……蒙皇上命臣治理历法，未效涓埃，过遇殊恩，加臣太常寺卿，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具疏控辞，未蒙俞见；寻又加臣工部右侍郎。……臣扣心自揣，三十年来，并无尺才微劳，仰极皇恩于万一。今闻太皇太后遐，皇上圣孝诚笃，哀毁过情，臣以卧疾，不能趋侍禁廷，持服哭临，悲感依恋，五中焚裂；痛臣病人膏肓，命垂旦夕，自此永辞天阙，然犬马恋主之心，不能自已。"1688年南怀仁病逝后，康熙皇帝赐银750两进行安葬，又让国舅亲自去墓地致祭。康熙皇帝赐南怀仁谥号"勤敏"。南怀仁是唯一有谥号的外国传教士，这在康熙时期的外国传教士中是极大的殊荣。

康熙皇帝还赐南怀仁御制碑文："尔南，远来海表，……久掌星官，学擅观天，克验四时之序，识通治历，能符人政之占，非惟推步无差，抑且艺能兼备。铸为军器，较旧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兴而制胜。恪恭不怠，奉职惟勤，术数咸精，造思独敏……念夙夜之成劳，良深轸悼，稽仪文于旧典，特示褒崇"。[1] 对南怀仁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

① 刘准：《天主教流行中国考》，第325—326页，1937。

1688年3月11日举行了南怀仁的葬礼。葬礼是经过礼部的审议,安排得非常隆重。南怀仁的葬礼是中西合璧的。祭台上的十字架表明死者是一个天主教神父的葬礼,但却加入了中国式的仪式:点香、磕头、哭丧。送葬的传教士们,也按中国人的习惯穿上了白色的丧服而不是西方的传统丧服——黑衣。南怀仁的墓地在利玛窦墓地的西墙之内,在北京阜成门外车公庄的三塔寺。后来,人们把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的三块碑放在一起,汤若望的碑和南怀仁的碑立于利玛窦碑的左侧和右侧,供人们瞻仰、凭吊。

南怀仁的家乡也为他铸立了铜像。在他出生地毕登的教堂前,在比利时国立根特大学科技博物馆里都有他的塑像:身穿中国清朝的官服,后背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身旁有一座天文仪,塑像上刻着他的中文及比利时文名字。南怀仁也是中比人民友好的使者,他的家乡以他在中国的业绩为荣。

参考书目:

(法)安田朴、谢和耐:《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岳麓书社,1983。

《康雍乾三帝评议》,紫禁城出版社,1986。

周燮番:《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1。

钱宗范:《康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方 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

(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马 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8。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2。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康熙年间的法国传教士
——张诚、白晋与蒋友仁

张诚、白晋和蒋友仁都是康熙、乾隆年间来到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

1685年3月3日，张诚、白晋一行6人登上从法国布列斯特启程的远航船，其中塔夏尔在中途被暹罗（泰国）国王挽留，白晋、张诚等5人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7月到达中国的宁波港，在康熙皇帝的直接过问下，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2月7日抵达北京。康熙皇帝命白晋、张诚留在宫中服务，另外3人分赴外地传教。

张诚，字实斋，原名 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1654年6月11日生于法国凡尔登。父母笃信天主教，他17岁入修院学习数学、哲学。由于家庭和教会学校的影响，他也很早就产生到远东传教的志向。

白晋，又作白进，字明远，原名 Joach Bouvet，1656年7月18日生于法国勒芒市，年轻时即入耶稣会学校就读，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尤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浓厚。求学期间，他对沙勿略欲到中国传教却在上川岛上抱恨终生的故事有所耳闻，也受到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卓越成就的巨大鼓舞，于是便萌发了步他们二人之后尘，到遥远的中国去传教的愿望。

他们二人以类似的志向、经历和同样出类拔萃的才华，一道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的称号，选入首批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团中。在北京，他们都做过康熙皇帝的西学教师，但又有各自不同的贡献。

白晋出使欧洲

白晋曾作为中国皇帝的使者出使欧洲。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6月4日，康熙皇帝由于对传教士在中国的表现十分满意，决定派白晋以皇帝钦差的身分回欧洲，去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白晋随身带有皇帝赠予路易十四的珍贵礼物，其中有49册装潢精美的书籍。白晋经过漫长的旅途，4年后才抵达法国。他本来期待着法国以中国的钦差大臣的身分来接纳他，但因为他没有一封康熙皇帝签署的正式的外交信件，只好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归国传教士。

尽管如此，白晋的归国还是在当地引起了轰动。由于好奇而来拜访他的人们络绎不绝，为了满足法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应付他们没完没了的提问，也为了获得国王的支持，以便顺利完成招募传教士的使命，白晋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地介绍了康熙皇帝本人和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白晋以赞美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尤其着力颂扬了康熙皇帝的睿智英明、豁达大度，称他除了不信天主教以外，是堪与路易十四媲美的伟大君主。这在当时的法国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这份报告后来以《中国皇帝历史画像》为题公开出版，对法国，乃至全欧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法国人由来已久的对中国的好奇进而发展为仰慕和向往，把法国的“中国热”又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后来，该书从日文转译成中文，书名为《康熙皇帝》，1980年中国学者又根据1699年版的古法语原本翻译成中文。这本书对中国人研究康熙皇帝的生平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招募传教士的使命很容易地就完成了，前一节所提到的康熙皇帝的人体解剖学教师巴多明、参与绘制《皇舆全览图》的雷孝思等一行8人随白晋踏上归途。他们此次乘坐的是一艘法国商船，

临行前国王还向船长交代了另一项任务——多多搜集中国的海岸、港口、潮水、风向等航海资料，以及中国人的经商习惯等，为以后扩大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依据。这次在路程上耽搁的时间不多，船行半年便抵达澳门。康熙皇帝得知白晋返华并带来法国国王礼物的消息后，特派两名传教士从北京专程到广州迎接他。

白晋这次出使的巨大成功，深得皇帝的赞许。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罗马教皇特使多罗来到中国，为颁布教皇关于“礼仪”的禁令，即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祭祖、祭孔的活动，禁止将GOD翻译为“天”和“上帝”。这使康熙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将其逐出北京。但皇上认为教皇的错误决策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又听信了坏人的谗言。为了争取教皇改变其决定，他决定派在中国的传教士前往罗马，向教皇作解释。多罗提出要一中文名字叫做沙国安的传教士承担此任。而康熙为了更准确表达自己的意见，任命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对中国的典籍较有研究的白晋为正使、以沙国安为副使，携带他赠予教皇的珍珠、人参、貂皮等礼物，到广州待船出发。后来由于多罗的僵硬态度和他对沙国安的偏爱，终于把彼此谅解的道路堵死。康熙皇帝颁旨将白晋召回：“览多罗所奏，朕知道了，无用再谕。但白晋已与沙国安不和，叫回白晋如何？”白晋再度出使欧洲的使命虽然被取消了，但皇帝对他的信任则是十分清楚的。康熙曾说过：“在中国之众西洋人，并无一人通中国文理，唯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义……”[1]

白晋受命研究《易经》

正因为白晋能“稍知中国书义”，所以康熙命他深入研究《易

[1] 《康熙与罗马使节文书影印本》，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279页。

经》。方豪所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收集了康熙皇帝与白晋关于学习《易经》的若干史料。

其一：七月五日，皇上问："白晋所释《易经》如何了？钦此！""你可以对白晋说：必须将古书细心校阅，不可因为不同意其中的观点就不看。所释之书，何时能完成，一定要完成才是。钦此！"①

其二：圣旨："问白晋，你所学《易经》如何了？钦此！"白晋答道："臣子承蒙皇上问及，但是臣系外国的一名'愚儒'不通中国文义。凡中国的文章，道理深奥，难以搞懂。况且《易经》又是中国书里更为深奥者……今承蒙皇上问及，所学《易经》如何了？臣愚昧无知，倘若皇上不嫌弃，再给我半月时间，容我与傅圣泽（白晋的同伴，另一名法国传教士）仔细研究，如果有了心得，再呈给皇上御览，请求皇上赐教。"②

其三：白晋上奏："臣前日呈给皇上《易学总旨》。臣发现，《易经》的内容与天主教有很大的相同。所以臣前些时奉旨所作《易经稿》一文内，有该书与天主教相关的话。后傅圣泽来，与臣一同修改前稿，又增加一些内容……我们二人专心研究《易经》之深奥涵义多日，与西方学者古传秘籍互相考证，认为此书无不与天主教相吻合，所以将自己的心得，写成《易经稿》，恭请皇上圣裁。"③

从利玛窦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都对中国古籍经典有所研究。利玛窦认为，要想让中国的学者和官员皈依天主教，最有效莫过于努力证明天主教的教义与儒家经典并不矛盾。他自己也就是这样做的。然而白晋走得更远，他认为中国古代经典不仅与天主教教义完全吻合，而且简直就是教义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从中不但可以悟出其教义，甚至还能找到《圣经》中的故事和人物。

---

①②③《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280—282页。

他提出，中国古籍中包含着两层意义，其表层意义是一般中国人所理解的字面意思；面其深层意义则是中国人所不了解的，只有深刻理解天主教义，对《圣经》耳熟能详的教士才能发现和理解。他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就是在做透过表层，揭示深层的工作。他说："真正的宗教（指天主教的整个体系）都包含在中国的古籍经典中。圣子降生、救世主的生与死及其行为等主要秘密，都以预言方式保存在这些珍贵的中国典籍中。"他对《诗经》、《礼记》、《史记》等书都作了附会的解释，说姜源就是圣母玛利亚，后稷就是耶稣，帝喾其实就是上帝。更有意思的是，他从汉字"船"中推导出，中国人早就知道《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了，因为"船"是由"舟"、"八"、"口"而组成，其含义是"八人乘舟而行"，便是诺亚方舟故事最为简略的表述。

白晋的这些认识，不仅我们今人看来是过于牵强了，当时的多数外国传教士也表示不能苟同。然而这也是他企图沟通中西文化的一种假说。虽然这种假说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有益的启示，但他的另一种假说，却为一个科学的创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要从他与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莱布尼茨的交往说起。

莱布尼茨于1646年出生在德国莱比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教授，留下了丰富的藏书。莱布尼茨从小就博览群书，好学不辍。他15岁进大学，17岁获得硕士学位，20岁时完成博士学业，学校因为他太年轻而不肯授予博士学位。1667年2月他转到另一所大学才拿到学位。1671～1672年期间莱布尼茨设计出能作四则运算和开方的手摇计算机。1672年，在选帝侯府供职的莱布尼茨出使法国，在当时欧洲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的法国住了4年。这期间，他结识了诸如牛顿、波义耳、惠更斯、列文虎克、斯宾诺莎等著名学者。1675年，他发明了微积分。1700年他促成了柏林科学院的建立并任第一任院长。

莱布尼茨一生中，一面从事社交活动，一面献身于科学与哲学的研究，他很早就接触到来华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报道，对在那个遥远国度所发生的一切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689 年，莱布尼茨在罗马期间结识了从中国回国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与他多次促膝长谈，如饥似渴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后来他又与包括闵明我、白晋在内的多名在华传教士保持通讯联系。1697 年，他主编了《中国近况》一书。

白晋在与莱布尼茨的通信中，介绍了中国的《易经》，他认为莱布尼茨提出的“二进制”所依据的就是中国古代关于数的科学所依据的原理。他把传说为伏羲所画的八卦中的阳爻“—”比作二进制的“1”，阴爻“--”比作“0”。莱布尼茨在 1701 年，即与白晋通信之前就撰写了关于“二进制”的论文，但是他认为还不太成熟，不主张马上发表。但是当他与白晋在书信中就“二进制”与《易经》进行了多次讨论之后，便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于 1703 年将题为《关于仅用 0 与 1 两个符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其应用以及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的论文正式提交法国科学院。这篇论文于 1705 年正式发表。如果我们说，白晋将八卦与“二进制”联系起来的假说，为莱布尼茨的科学创见提供了营养，恐怕不为过分吧。

白晋——康熙皇帝的西学教师

白晋曾作过康熙皇帝的教师。康熙从一次患病后，便十分想“了解人体组织及其机能动因，和这些组织中发生的那些有益作用的原理”[①]，于是就命白晋等人给他讲授人体解剖学。当时在欧洲，英国医学家哈维揭示了血液循环的秘密，人体解剖学有了重大突

① 《康熙帝传》，第 189 页。

破。白晋在编写教材时，以一位丹麦解剖学家的著作为原本，吸收了这些科学的最新发现。他在向法国皇帝路易十四报告时说："我们把本世纪最珍贵最有价值的发现全都写进解剖学讲稿里。"①

1691年（康熙三十年）9月，白晋将讲稿和铜版印刷的解剖图谱准备就绪，后来由另一名法国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来讲授。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命白晋、张诚据西医的道理对他所患的几种疾病做出解释。白晋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写出多篇短文，呈给皇上。康熙看了很满意，对文章中涉及到的有关化学制剂的内容尤感兴趣。于是下令在皇宫内开设了一间化学实验室，置办了一些必要的设备。实验室建成后，康熙皇帝多次前往观看。白晋根据法国国家实验室的药典，制出了干燥剂、糖浆制剂、流浸膏等西药制剂。康熙将其视为珍品，装在旅行药壶里，随身携带。

1730年（雍正八年）6月8日，白晋在中国度过了46个春秋，客死在远离故乡法兰西的异国土地上。

张诚主要活动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张诚在中国的活动。

张诚和白晋一道被康熙皇帝留在宫廷服务。他刚到北京不久，就参与了极为艰苦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当时，中国北部边疆的局势日趋紧张，沙俄屡次侵犯我国，酿成边境冲突。清政府决定派遣以钦差大臣索额图为首的使团前往北疆，与沙俄代表谈判。康熙皇帝出于对张诚和徐日升的信任，命他二人作为翻译，随团同行，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皇帝还嘱咐索额图，要与

① 《康熙帝传》，第181页。

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他们商量。

1688年5月31日，张诚随中国谈判使团向谈判地点色楞斯克进发。他们在邈无人烟的荒漠中长途跋涉了4个月，不料遭到叛匪、强盗的袭击，不得不返回北京。第二年6月13日，使团在2000名士兵的护卫下再度北上，终于7月31日到达尼布楚。

谈判开始后,张诚和徐日升就承担了紧张繁重的联络工作。他们每天陪同中国使团人员渡过湍急的石勒喀河，奔走于双方驻地之间，有时一日要走几个往返，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也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张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直到午夜以后，人人都极其疲乏的时候，才得以进入在尼布楚约两里处的宿营地。特别是我自己更是疲惫不堪。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而过去八天内每天只能像偷窃一样匆忙地吃点睡点，简直没功夫休息和进餐。因为我们日夜都须听候差使，或奔走传话，或翻译双方使节所拟的文件，再不然就和他们本人进行商谈。"[①]

当时中俄两国都是具有实力的强国，谁也不可能屈就对方，而且旷日持久的边界冲突，造成两国间很深的成见，双方使者的态度都很强硬，互不相让，难以调和。俄方的全权代表戈尔文狡诈专横，妄图在谈判桌上谋求更多的利益。这都使此次谈判变得异常艰难。

张诚和徐日升一起发挥了他们作为中间人的调解功能。为了使谈判不致破裂，张诚巧妙地把握两国利益的基点和使者的心理，力求找到既能被中方接受，也不为俄方反对的"折衷点"。他了解到俄国人急于要和中国增加贸易，便说服俄方放弃一些领土要求，接受中方的意见；中国人担心的主要是中俄边境发生战事，会导致俄国与新疆的叛匪噶尔丹联盟，而使中国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

---

① 《张诚日记》，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五辑，中华书局，1984。

他就说服中方代表也放宽条件。张诚敏锐地洞察到，双方尽管都很强硬，但也都有和谈的愿望，达成协议是双方利益的所在，于是把握住这一契机，通过私下串联，向双方晓以利弊。

中国代表团虽然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签订国际条约的谈判，缺少经验，但在张诚等人的协助下，在谈判中坚持民族尊严，挫败了沙皇鲸吞我国大片领土的阴谋，虽然也放弃了贝加尔湖以东的一些领土，但换取俄方撤离雅克萨的让步，终于使两国实现了边境的和平。《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基本上维护了我国的主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康熙皇帝对谈判的结果和张诚等传教士的工作均感到满意。他颁旨表彰他们“对议和的实现多有帮助”，“朕知你等如何出力为朕效劳……朕知道由于你等的才干与努力而和约才得以缔结。”

张诚等传教士作为中国使团的翻译，在谈判中对俄使的贪得无厌与欺诈行为做了坚决的斗争。如8月25日，俄使已同意放弃雅克萨，但两天以后他们又推翻前议，出尔反尔，对此张诚和徐日升十分气愤，责备俄方滥用了中方的诚意，他们当即警告俄使，除非俄方遵守放弃雅克萨及其附近地区的诺言，否则谈判将无法继续，并以退出谈判相威胁。在这一情况下，俄使为了避免导致谈判的破裂，只好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划界方案。在誊写条约的拉丁文副本时，俄方向张诚提出偷偷写进不利于中国的额外条款的要求，被张诚严辞拒绝了。但是另有史料记载，张诚在俄使私下对他进行拉拢时，曾“欣然同意为俄罗斯服务”，表示“将在传递信件时报告必要的消息”，也确实曾将康熙皇帝钦定的划界方案透露给俄使。

中国使团首席代表索额图事后说，中俄谈判“如此艰巨之事，最后之所以能够成功，张诚立了大功啊！”张诚则回答说：“我等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劝人入教。不料近年来皇上连颁圣旨，严禁百姓信教，感到很失望。大人如能出力保护，胜过一

切赐予。”[1] 可见张诚在中俄谈判中不辞辛劳，尽力奔走，折冲樽俎，促成双方和谈成功，主要是为了取悦于中国政府，使其信奉的天主教能在中国生存进而求得发展。

果然，张诚在中俄谈判中的付出，得到了中国政府在放宽对天主教限制上做出的回报。1691 年（康熙三十年），浙江巡抚厉行禁教，张诚请索额图出面斡旋。索额图再三恳请皇上开恩，皇上才批转了礼部的奏疏。

礼部奏疏曰："查得西洋人仰慕中国，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允许人们进香出入，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此命下达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2]

中俄交涉之后，张诚一直担任康熙皇帝的御前进讲教师，讲授过数学、哲学、医学和人体解剖学。

张诚与白晋还参与了第一次用西方科学方法绘制中国地图的工作。康熙皇帝在其执政期间，曾组织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官员一道完成了测绘全国地图，即《皇舆全览图》的浩瀚工程。

方豪先生评论说："明末中国天主教人士，在科学上做了一件集体大工程，那就是崇祯年间的修历；清初中国天主教人士，在科学上也完成了一件规模更大、在科学上成绩也更卓著的伟业，那就是康熙年间的测绘全国地图。”[3] 康熙皇帝关于测绘全国地图的

---

①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 263、265 页。
②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 263、265 页。
③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 298、300 页。

设想，首先萌发于平定三藩之乱时。在战争中地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暴露出很多缺陷。有些地图粗略模糊，有的含混不清，有的甚至错误百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诚的建议使康熙认识到测绘新地图的重要性。张诚在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时，曾痛感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地理情况不清，给国防和外交造成的困难，于是向康熙建议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大地测量。康熙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1708 年(康熙四十七年)，康熙派遣西方传教士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大地测量，绘制地图。先后参加此项工作的有白晋、雷孝思(J. B. Regis)、杜德美(Pierre Jartoux)、山遥瞻(Fabre Bonjour)、麦大成(Joao Francisco Cardoso)、汤尚贤(Pierre Vinecent de Tartre)、费隐(Ehrenbert Xaver Fridelli)等，还有两名在北京学习过测算的藏族人奔赴西藏测绘地图。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1717 年(康熙五十六年)，这些中西测绘人员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后，聚齐在北京，康熙命白晋、杜德美、雷孝思与中国官员一道负责汇总。又经过中外人士一年的辛勤劳动，于 1718 年(康熙五十七年)制成《皇舆全览图》和各省分图稿共 32 幅，并刻印成册。康熙对这项酝酿多年的夙愿得以成功，十分欣慰，他对臣下说："《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①] 专家评论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全国性测量。在这次测量中统一了长度单位，发现经纬长度上下不同，证实了地球为扁圆形。"[②]

后来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将此图带回法国，收入他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于 1735 年出版。欧洲人从此对中国的地理概貌有了比较正确、完整的了解。而这部地图在中国的命运却不佳，长

①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 298、300 页。
②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第 166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期深锁在宫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皇帝得了疟疾，太医院的御医们都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发展，满城张贴求医求药的皇榜，还召了一些疟疾病人到宫中试药。恰好这时张诚等两位传教士来到北京，他们携带有一种叫做金鸡纳霜的西药。这种药是用产于南美洲秘鲁的金鸡纳树的树皮磨制而成的，由半个多世纪前在那里传教的耶稣会士首先发现的，因此也叫做“耶稣会树皮”，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他们先在一般病人身上试用，并无副作用，然后就给皇帝服用。康熙皇帝很快就痊愈了，他非常高兴，赐给神父们最渴望的礼物——靠近北海西岸的一处房产，为他们建造了一座教堂，就是现在北堂（西什库教堂）的前身。

后来，“礼仪之争”造成中国政府与教皇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也导致在华传教士的分裂。张诚是主张依“利玛窦规矩”行事的，他为了调和双方，曾多方奔走，竟一病不起，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3月22日在北京去世。

蒋友仁在北京的活动

乾隆年间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中，非常值得一提的还有蒋友仁。

蒋友仁（Michel Benoist），法国耶稣会士，1744年来华，先在钦天监协助修历，后因同人推荐，被任命为“造办处行走”，负责设计、监造圆明园的一处喷泉——“水法”。在皇帝宝座台基的后面，立着高大的石雕屏风，两边有巨型水塔和一个大水池。水池周围分列着12只石制生肖雕像，用来表示一天的12个时辰。每个石雕分别喷水一个时辰，周而复始，情趣盎然。这一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独特景观，来源于蒋友仁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也表现了他天才的设计能力。不仅当时的中国人，就是在来华西方

传教士中，也没有第二个能掌握其中的奥妙。他死后，喷泉出了故障，就没人会修理了。

蒋友仁第二个贡献在地理方面。康熙年间绘制《皇舆全览图》时，西藏部分是由目测成图的，不够精确；新疆一些地区因地方叛乱，未能全部测量。1755 年（乾隆二十年），乾隆平定了准噶尔部，即命蒋友仁、何国宗、明安图等携仪器测量新疆各地的经纬度。蒋友仁等人为此到达伊犁等地。后来，他受命负责总汇制图，将新测的数据补充进《皇舆全览图》，新图命名为《乾隆内府舆图》，最终完成了我国全部版图的实测绘图工作。

蒋友仁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传播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于 1543 年发表的，但直到 1727 年，才由科学家根据实际观测的数据给予了验证，而后科学界才普遍予以承认。罗马教廷也于 1757 年取消了对"日心说"的禁令。1773 年（乾隆三十八年）蒋友仁在献给乾隆皇帝的《坤舆全图》中，介绍了这一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理论。《坤舆全图》是一幅长 12.5 尺，高 6.5 尺的世界地图，四周配有各种天文图和文字说明。其中部分文字介绍了西方的四种天文学说。第一种是托勒密的"地心说"；第二种是第谷的吸收了部分哥白尼学说的地心说；第三种是承认地球自转的地心说。蒋友仁说，第二、第三"二家虽有可取，然皆不如歌（哥）白尼之密。"[1] 然后就介绍第四种学说，即日心说。他对此作了较多的论证，并指出当时欧洲著名的科学家——开普勒、牛顿等人"皆主其说"。他在向乾隆皇帝讲述地球运动的时候，特意说明了为什么地球自转而地面上的人不摔倒的道理，据说皇帝很容易就听明白了。

就在蒋友仁在中国致力于宣传哥白尼学说的这一年，罗马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这对热衷于学术传教的蒋友仁来说，无疑是

① 阮元：《畴人传·蒋友仁》。

一个沉重的打击。为此他抑郁成疾，于第二年，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10月23日中风而逝。蒋友仁死后，葬在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

雍正年间的洋监正
——戴进贤与刘松龄

戴进贤在清廷任职

戴进贤（Iguatius Kogler），字嘉宾，日尔曼人，16岁入耶稣会。如今在他的故乡德国巴伐利亚莱希河畔的小镇兰茨贝格中心市场旁，一幢哥特式小楼的墙上，还嵌着一块石碑，上写："Iguatius Kogler 于1680年诞生于此屋，1716年作为天主教传教士前往中国，被中国皇帝任命为钦天监正，二品官，1746年逝世于北京。"戴进贤并非出身于名门显贵之家，他的父亲是个制皮衣的匠人。他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成长为继汤若望之后最有影响的来华德国籍传教士，在天文历算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戴进贤加入耶稣会后，进入大学深造，修哲学、神学、数学及东方语言，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所大学在天文观测方面有相当的水平，他在其中也受到熏陶。不久他就以才华出众和工作卓有成效而闻名。学校所属的教区准备授予他好几个职务，他都谢绝了。他只有一个愿望："前往中国，传播主的福音。"戴进贤正是由于他精通数学和天文，才博得教区总会长的赏识，使他得到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

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处境，已经与康熙初年不同了。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玄烨一改从前态度，实行了禁教。

尽管如此，康熙对利玛窦和能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传播西方科技之功，还一再给予肯定。1720年（康熙五十九

年)，他对留在中国的耶稣会士说："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廷，曲赐优容致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也无关涉。"[①] 同时康熙皇帝对外宣布：只有精通一门技艺的传教士才能进入中国和留居在中国。后来，雍正和乾隆也基本上继承了康熙皇帝的这一政策。

戴进贤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来华，第二年奉召入京，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有幸进入畅春园专门研究数学等科学的蒙养斋，并以其工作踏实，为人谦和而获得皇帝的信任。后到钦天监任职，1725年（雍正三年）授以"监正"之职。1731年（雍正九年），雍正皇帝命他为礼部侍郎，官居二品。

鉴于当时中国的情况，戴进贤在传教方面不可能有所作为，这就迫使他专注于天文历算上，因而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台湾学者方豪评论说："在介绍西洋天文学方面说，南怀仁亦不如戴进贤。"[②] 这除了由于戴进贤来华较晚，所带来的西方科学的学术水平必然较新较高之外，也不能排除戴氏自身勤勉、聪慧的因素。康熙年间，清政府曾修订了明代末年徐光启、汤若望所编的《西洋新法历书》，定名为《历象考成》。到了1730年（雍正八年），按照该书推算的日食就发生了误差，而戴进贤推算的结果则与实际分毫不差。1737年（乾隆二年），朝廷任命以戴进贤为首，包括中国学者梅瑴成、明安图、何国宗等，一道编纂新的历书。他们协同工作了五年，编成10卷本的《历象考成新编》。这部书吸收了欧洲新的科学成果，如太阳半径，以前采用的是地球的5倍值，此

---

① 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二。

②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75、77页。

次采用的是 96 倍值，比过去科学多了，也进步多了。此外，关于日月及五大行星的轨道，旧说是平圆，此书采用开普勒的天文三定律之一，即行星运行轨道改椭圆，且太阳是焦点的新观点。这部新历书题名为《癸卯元历》，一直用到 1911 年清王朝灭亡时。

《历象考成新编》脱稿后不久，戴进贤便酝酿对南怀仁的《灵台仪象志》进行修改。1744 年（乾隆九年）他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称：按《灵台仪象志》所载测量星辰，“每年约差五十一秒，合七十年差一度，今为时已久，理应改定。”[①] 乾隆皇帝及时准奏。这时另一名德籍传教士刘松龄已来华，成为戴进贤的重要助手。此外，参与修订这部书的还有：德籍传教士鲍友管（Anton Gogeisl）、葡萄牙籍传教士傅作霖（Felix da Rocha）以及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 20 多人。改定的新书题名为《仪象考成》。

与此同时，戴进贤为观象台制造了一件大型天文观测仪器——玑衡抚辰仪。就在戴进贤任钦天监监正的时候，有一次，皇帝到观象台参观天文仪器，他认为一件明代制作的天文仪器——浑天仪，式样最为古朴，可惜所用的数据多已陈旧，屡出误差。钦天监于是心领神会，着手制造一架两全其美的仪器，“用今之数据，合古之型模”，这就是戴进贤设计的玑衡抚辰仪。这仪器用青铜制成，重 5 吨，分为 3 层，外观雄浑，圈圈相套，两侧以盘龙的柱子托起，雕刻得精致细腻，富于中国民族特色。制造玑衡抚辰仪整整花了 10 年的功夫，是中外科学家智慧的结晶。这件仪器至今仍与南怀仁所设计制造的 6 件仪器一起，安放在北京古观象台上，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珍品。

1746 年（乾隆十一年）3 月 31 日，戴进贤于北京病逝。乾隆皇帝赏赐 300 两银子、10 匹绸缎作治丧费用。遗体安葬在滕公栅栏墓地。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父子两人关

①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 75、77 页。

于他的圣谕——康熙说："非通晓历法之人，不能细查微小的增减，不知不觉就会发生错误。戴进贤虽然新来不久，还没完全通满、汉语言，但他在历法、计算上学问很深，为人也沉重、老实。可代替纪理安的职务。"[1] 雍正说："戴进贤治理历法，授钦天监监正，加礼部侍郎官衔，钦此。"[2]纪理安（Bernardus Kilian Stumpf），日尔曼籍耶稣会士，1694 年（康熙三十三年）来华，曾任钦天监正，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客死北京，葬在滕公栅栏墓地。

《仪象考成》一书和玑衡抚辰仪两项大工程都是在戴进贤死后才最终完成的。

刘松龄在北京地区的活动

继戴进贤之后任钦天监监正的，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耶稣会士刘松龄。刘松龄（August *von* Hallerstein），1721 年入耶稣会，曾是伦敦皇家学会的客座会员，1739 年（乾隆四年）到北京，进钦天监协助戴进贤工作，因在编纂《历象考成后编》中贡献突出，1743 年（乾隆八年）升任监副。《历象考成后编》一书中吸收了牛顿的科学成果，专家认为主要是刘松龄起的作用。戴进贤在《仪象考成》一书的编纂开始不久时就去世了。乾隆皇帝随即将刘松龄升为监正："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病故员缺，着监副刘松龄升补。"[3] 由戴进贤开始的编纂《仪象考成》和制造玑衡抚辰仪等天文仪器的工程都是在刘松龄手中完成的。其中玑衡抚辰仪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上。

奉乾隆皇帝的旨意，刘松龄参与了新木兰图的绘制一事。木兰围场是康熙、乾隆时期皇帝狩猎的地方，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

---

①② 参阅《历史遗痕》，第 78 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 263。

长城古北口以北、内蒙东南部和辽宁西南部。平定伊犁之后，乾隆派遣刘松龄及中国学者明安图等人前往测绘，以此增补、修订了《皇舆全览图》。他还命刘松龄等制造新的地球仪，将新近归入大清版图的新疆准噶尔地区画进去。乾隆皇帝喜爱天球仪和地球仪，多次下令制造，但在刘松龄去世后，失去了得力的指导，清廷内务府承造这些仪器就感到困难了。

刘松龄还曾受命承办过外交事务，1752 年～1753 年（乾隆十七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华，就由刘松龄主持接待的。乾隆因此赏给刘松龄三品官的俸禄，外加白银 2000 两。

刘松龄与中国官员建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有一次，他邀请著名的历史学家、《廿二史札记》的作者、军机章京赵翼等人，下朝后到他所住的南堂访问。刘松龄和傅作霖、鲍友管等外国传教士一道，热情地招待了赵翼一行，请他们参观教堂里的西洋画、千里镜，用管风琴演奏了西洋音乐，使中国官员大开眼界。赵翼事后撰写了题目为《西洋千里镜机乐器》的短文和题为《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的长诗。

短文介绍了教堂圣像、望远镜和管风琴。文中写道："天主堂在宣武门内，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高慎思等所居也。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耶酥（稣），彼中圣人也。像绘于壁而耍出，似离立不著壁者。堂之旁有观星台，列架以贮千里镜。镜以木为筒，长七、八尺，中空而嵌以玻璃，有一层者、两层者、三层者。余尝登其台，以镜视天，赤日中亦见星斗；视城外，则玉泉山宝塔近在咫尺间，砖缝亦历历可数。而玻璃之单层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两层者悉倒，三层者则又正矣。有楼为作乐之所。一虬者坐而鼓琴，则笙、箫、磬、笛、钟、鼓、铙、镯之声，无一不备。其法设木架于楼，架之上悬铅管数十，下垂不及楼板寸许；楼板两层，板有缝与各管孔相对，一人在东南隅鼓鞴以作气，气在夹板中尽趋于铅管下之

缝，有缝直达于管；管各有一铜丝击于琴弦；虬须者拨弦则各丝自抽顿，其管中之关捩而发响矣。铅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窾窍，以象诸乐之声。故一人鼓琴而众管齐鸣，百乐无不备，真奇巧也。又有乐钟，并不烦人挑拨，而按时自鸣，亦备诸乐之声，尤为巧绝。”①

诗中写道：

郊园散直归，访奇番人宅。（散直：下朝。）

中有虬髯叟，出门敬迓客。（虬髯叟：指西洋人。）

来从泰西洋，官授羲和职。（羲和：羲氏、和氏古代传说中掌管天文的官吏。）

年深习汉语，不烦舌人译。（舌人：指翻译。）

引登天主堂，有像绘素壁。

靓若姑射仙，科头不冠帻。（科头：不戴巾帻。）

云是彼周孔，崇奉自古昔。

再游观星台，爽垲上勿幂。（爽垲：地势高，且明亮。勿幂：没有顶盖，露天。）

玻璃千里镜，高指遥天碧。

日中可见斗，象纬测晨夕。②

全诗共50韵，以大部分的笔墨渲染了西洋琴演奏时的情景，以及诗人当时的感受。

这一文一诗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它们是刘松龄等西洋教士与中国官员友好交往的实证，又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并产生良好影响的证明。

刘松龄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病故，被追封二品侍郎。他在钦天监供职35年，任监正29年，是西洋传教士中任此职务时间最长的。在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务府档案中，存有两件与他的

①② 赵翼：《簷曝杂记》卷二。

去世和安葬有关的文件。

其一，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高慎思（Jose d'Espinha）所上的奏疏："窃因西洋人刘松龄熟谙天文算法，于乾隆四年进京，八年补授钦天监监副，十一年升补监正，十八年蒙皇上赏给三品食俸，在监行走三十二年，今于本年九月二十五日病故，年七十二岁。查从前西洋人在监办事者，病故情由俱有奏闻之例，合将刘松龄病故情由遵例奏闻，谨奏。"圣旨批曰："交福（隆安）查办，钦此。"[①]

其二，就是福隆安的奏折："遵旨查从前西洋人苏霖、费隐、戴进贤、监副鲍友管病故，奉旨各赏银二百两。又西洋人郎士宁病故，奉旨赏银三百两。今病故之三品衔监正刘松龄、西洋人蒋友仁，奴才酌拟赏刘松龄二百两，蒋友仁一百两，谨奏。"圣旨批曰："着照拟给赏。钦此。"[②]

刘松龄遗体也葬在滕公栅栏墓地，墓碑上的铭文称他接送葡萄牙国使臣有功；称他对钦天监的事务勤奋聪敏，对上级恭敬，对属下宽恕；称他品德与学业兼得。皇上为此赏赐内库200两白银，作为安葬的费用。

---

①② 内务府杂档357号，转引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第53、54页。

参与设计、修建圆明园的传教士——郎世宁

郎世宁原名约瑟·迦斯提里纳阿（Giuseseppe FR. Jos Castiglione. 1688～1776年），是清朝著名的画家兼建筑家。

郎世宁于1688年1月19日出生于意大利的米兰，他从小就笃信天主教。19岁时取得了教士的资格，加入了耶稣会，在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8月27岁时由欧洲耶稣会的葡萄牙传道部派来中国。先坐船到达澳门，后到广州，于同年12月22日到达北京。此后改汉名郎世宁，曾用过士宁、石宁，字若瑟。

郎世宁具有深厚的西洋绘画的功底，又受到中国画法的长期熏陶，集中西画法为一炉，他服务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在中国工作生活超过了半个世纪，是继马可·波罗、利玛窦之后又一位沟通中意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宫廷画师

郎世宁来到北京后住在东华门外天主教东堂（又称圣若瑟堂、王府井天主堂）。他曾经系统地学习过绘画，在欧洲的一些教堂画过基督像和圣母像。到北京后，郎世宁被在京的传教士引见给康熙皇帝。他奉命学习中国画，在康熙朝供职7年。

为了讨皇帝的欢心，画好中国画，郎世宁在作画时改用中国画具，虽然不使用投影，阴暗对比，却能依然保留西洋画的立体效果。他的画别具一格，以中西掺用法而闻名于清朝画坛。

郎世宁于1712年（清康熙六十年）为北京宣武门内天主教堂

画东西两壁的人马凯旋图，这些画取自于君士坦丁大帝时的题材。他也曾画过耶稣圣心像多幅，非常精美，供在北京圣若瑟堂（东堂）的圣心祭台上。

1723年（清雍正元年），郎世宁奉召入内廷供奉，在如意馆中作画。他白天在如意馆作画，晚上还要住在东堂，十分辛苦劳累，但他从无怨言。第一幅有年款的作品是《聚瑞图》，画的是禁池内的并蒂莲和双穗稻。这幅画上题字为："皇上御极元年，符瑞叠呈，分歧合颖之谷实于原野，同心并蒂之莲开于禁池。臣郎世宁拜观之下，谨汇写瓶花，以记祥应。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海西臣郎世宁慕画"。是年又作了一幅《嵩献英芝图》，画面上鹰、松树、灵芝画的精细逼真，很有立体感。

郎世宁的作品题材广泛，他画的花卉、鸟兽、人物栩栩如生，尤其擅长画马。《清史稿·艺术传记》中说郎世宁"凡名马珍禽、奇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1]。雍正很欣赏郎世宁的艺术才华，让他为养心殿木架作美人图，即《雍正妃画像》12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727年1月6日（清雍正五年），皇帝宣召二千名传教士共进晚餐，郎世宁也被召见，席间雍正皇帝对郎世宁所画的画大为赞赏。是年7月21日清晨，郎世宁等10名西方传教士一同去圆明园。

郎世宁与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比他的爷爷、父亲更热爱艺术，所以郎世宁在乾隆年间备受宠爱。乾隆在当太子的时候，就经常到如意馆看郎世宁作画，对他的作品很欣赏。即位后乾隆皇帝又多次去如意馆，并

① 《清史稿·艺术传三》。

自称是郎世宁的学生。乾隆皇帝还常常给郎世宁出题目，画出的画也非常使他满意，因此他对郎世宁格外的宠爱，曾赐郎世宁正三品奉宸苑卿位，造办处行走，赏赐他银两、锦缎。

1738年（清乾隆三年），郎世宁身患重病，乾隆皇帝赐他一百两银子治病。

1741年（清乾隆六年），郎世宁作《哨鹿图》。1743年作《百骏图》，画面上有一百匹骏马在山间草地，三五成群，神态各异。为了画好马，郎世宁以真马为模特，细心观察马的各种姿势，因此画的马形象逼真，富有很强的立体感。后来，郎世宁又画了一幅《十骏图》，乾隆皇帝十分喜爱，让人特制了一个红漆画金龙的箱子珍藏起来。

1744年（清乾隆九年），郎世宁还与其他画家合作《亲蚕图卷》，画的是孝庄皇后亲临西苑先蚕坛鞠衣献蚕。人物形象逼真。

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郎世宁为来华在京的60位西洋人画像。

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郎世宁为41岁的乾隆皇帝画肖像。

郎世宁也曾为乾隆皇帝的11位后妃画像。因为不敢看她们，结果画像上妃子们长得十分相像。

作为宫廷的首席画师，郎世宁在宫中奉旨创作了许多以当时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用他的画笔作了真实的纪录。他所创作的巨幅历史画卷场面宏伟，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乾隆年间，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准噶尔部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分裂势力进行叛乱已达80多年，清政府多次出兵进行平叛，直到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边疆叛乱才最终被平息。喜讯传来，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亲自写诗树碑，命郎世宁等人绘制图画。郎世宁奉命与其他宫廷画家王致诚、艾启蒙等人前往承德作画，他不顾年老体弱，辛勤耕耘，完成了《万树园赐宴图》、《马术图》、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格登鄂拉斫营图》、《平定伊犁回部得胜图》等多幅历史画作。这些作品现在都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万树园赐宴图》画的是乾隆皇帝设宴款待少数民族的杜尔伯特部首领的场面，宴会的场面很大，乾隆皇帝端坐在正中，两旁是文武官员，被接见的人都是跪着，表明对清朝皇帝的臣服、忠诚。画面庄严而又隆重，布局合理，人物众多，达40余人，却不显得拥挤。这幅图用了50天画完。

《马术图》画的是乾隆皇帝率领文武官员和杜尔伯特部的贵族在避暑山庄观看大型马术表演，驯兽员勇敢刚健，在马背上做出各种各样的高难度动作，画面非常生动活泼。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和《格登鄂拉斫营图》画的是阿玉锡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的故事。阿玉锡胜利后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郎世宁奉旨为他作画。这两幅画赞颂了清朝时期的民族团结和统一，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色彩，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乾隆皇帝对这些作品十分满意，命令把《平定伊犁回部得胜图》悬挂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内。

郎世宁与其他传教士共同绘制的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图16幅完成后，在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送到法国制成铜版，使这些画具有浓厚的西洋画风格，每一张图印了100幅。平定准噶尔、回部为乾隆朝的一大盛事，而把描绘这一历史画卷制成雕版也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

由于郎世宁画技超群，不仅是御用画家，皇室的洋事顾问，也是一批年轻画家的导师。雍正、乾隆皇帝都派了一些中国画家跟郎世宁学习油画，如班达里沙、孙威凤、王琦、葛曙、永泰等人，这些学生跟随郎世宁多年，大都学到了郎世宁的西洋画法。

年希尧（ ～1738年）早年曾向郎世宁学习几何学的画法，郎世宁借给他一本讲解透视学的书。1729年年希尧完成了《视学》一

书。成书后，郎世宁与年希尧“往复再回，究其源流”，郎世宁又补了50多幅图，加以解释，于1735年修订后发行。《视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画法几何学的论著，也是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透视学原理的第一部著作。郎世宁参与了这部书的成书和修订工作。

郎世宁的弟子沈源、唐岱于1740年合绘《圆明园四十景》80幅，描绘圆明园一年四季的秀丽景色。这些图于1860年9月被英法联军掠走，现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参与设计、修建圆明园

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郎世宁奉旨与传教士王致诚（1702～1768年）、蒋友仁（1715～1774年）一起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使圆明园成为我国最大、最典型的中西合璧的建筑。

圆明园是明代遗留下来的故园，1710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皇帝加以修整赐给皇储允祯（雍正）的别墅，题名“圆明园”。1725年（清雍正三年）雍正皇帝扩建圆明园。此后，历朝皇帝不断扩建圆明园。乾隆皇帝在幼年时曾被雍正皇帝赐居在圆明园的“长春仙馆”，乾隆即位后扩建为长春园，据说是他想长生不老，故以长春来命名。有一天乾隆皇帝翻阅西洋画册，看见上面有非常精美的建筑图，让郎世宁为他讲解。乾隆问郎世宁在北京的西洋人中有没有擅长建筑的，郎世宁回答说有。于是乾隆命令郎世宁在圆明园内建造一组西洋式宫殿建筑，位于长春园的东北部，形成一个西式的园林景点，被称为“西洋楼”。西洋楼于1747年（乾隆十二年）开始修建，郎世宁是主要设计者，多才多艺的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是他的得力助手。在布局上用一座土山在长春园北端把西洋楼和其他中式建筑隔开，使它们互不干扰，设计者可谓是匠心独运。

西洋楼东西长840米，南北宽70米，总面积8公顷多。西洋楼在施工过程中经过中国建筑师的修改，全部使用汉白玉石，艾叶青石砌成，墙身是西式的罗马花纹，房顶是中国所特有的紫色琉璃瓦，可谓是中西合璧，在中国园林建筑中是首创，这在世界造园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西洋楼的建筑形式丰富多彩，既充分吸取了中国园林及其建筑的优点，又引入了意大利热那亚宫殿的格局，而雕饰纹样和壁炉、壁柱的设计接近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建筑风格，端庄凝重与华丽纤巧相结合。西洋楼是我国最大的西洋式建筑，为圆明园添了一道异彩。可惜的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的焚毁下，西洋楼与圆明园内其他建筑没能幸免于难。如今她只剩下了残垣断壁。西洋楼是圆明园遗迹中留下最多的地方，从现在残留的遗迹中仍然可以看出当年她是何等的雄伟，雕刻又是多么的精美。

西洋楼有12景：谐奇趣、蓄水楼、海宴堂、大水法、黄花阵、万花阵、养鸟笼、方外观、竹亭、远瀛观、观水法、线法山和花园。

西洋楼的建筑形式采用了西方的建筑风格和造园艺术，并巧妙地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相结合，西洋楼的建造使西方的园林艺术和建筑风格第一次大规模地引入到中国的皇家园囿，可谓是独具一格，被欧洲人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她的设计者郎世宁功不可没。

谐奇趣是西洋楼中最早建成的一处景观，也是中西建筑风格相结合。正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三楹，下层七楹。楼房石柱都用汉白玉石，柱头和柱身仿罗马式，镶嵌着彩色玻璃浮雕花砖，楼顶为紫色圆形琉璃瓦，楼前左右有两座西洋狮子。两侧有八角八色亭形楼，为奏乐用，正楼两侧山墙有角门，出门有月形或西洋式游廊，由顶上可以通到亭楼内。楼前有一个巨大的海棠式喷水池，池中央有一条西洋翻尾大石鱼，池中水由石鱼嘴中喷出，可

高达5丈多。环池有18只铜雁，水由铜雁口中呈弧线形喷向水池，沿池还有四只铜羊向池中喷水。池外东西两侧有两座小型喷水池，楼下也有二座小喷水池。水池周围是叠石堆山和花砖铺地。

远瀛观建成后成为乾隆皇帝的宠妃——容妃（香妃）的住所。据说乾隆皇帝怕香妃思念远在新疆阿克苏的家乡，命郎世宁按照伊斯兰教的建筑风格营造的。远瀛观气势宏伟，石柱刻工精美，虽历经沧桑仍保留着当年的风韵，令人赞叹不已。

远瀛观建在高台上，在全园中位置最高，坐南朝北，全部是由汉白玉雕刻而成。

大水法北边有西式牌坊，紧靠在远瀛观台基之下，在牌坊前有一座半圆形的七级吸盘，可以层层喷水，水喷到岸上后就流入水沟中。左右岸上各有一条翻尾石鱼，池中左右也各有一条翻尾石鱼，水由岸上鱼口中喷入池中鱼口中。水池正中有一只铜鹿，鹿角分成八杈，由各个角尖上喷水，东西各有五只铜狗，水从狗口中喷向铜鹿。

大水法的南部有一座13级方形喷水塔，塔底有八根大喷水管，塔顶有80根小喷水管，水射高度为6米，13层可以节节喷水，非常壮观。大水法是西方传教士第一次大规模地把西式喷泉引入到中国皇家园林，很好地烘托出皇家园林的气氛。喷泉是郎世宁仿效当时西欧的宫廷格局构思的，喷泉的机械部分是由蒋友仁设计的。喷泉中的青铜雕像用的是我国的12生肖，也是东西合璧。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分别代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12个时辰，组成一个大时钟。每个时辰由代表这一时辰的铜兽口中喷水，至正午时12个铜兽同时喷水，周而复始，往返不已，可谓是构思精巧。

大水法建成后，乾隆皇帝十分满意，题咏道："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转飞扇。泠泠瑟瑟、非丝非竹，天籁遥闻，林光逾生净

绿”。

方外观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香妃做礼拜的地方，在它的大理石墙上雕刻着“古兰经”，具有浓厚的阿拉伯建筑风格。现在这里还矗立着几根精美的方型石柱。据说当年香妃在方外观做礼拜时，乾隆皇帝就在外面静静地等候。

郎世宁不仅参与西洋楼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和建造，他还抽时间完成了圆明园各处室内的装饰画、隔断窗内透花画、珐琅、漆器画的设计工作。

西洋楼的设计和建造是18世纪中叶东西方建筑文化和造园艺术相结合的成果，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郎世宁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功不可没。

1758年郎世宁70岁生日时，乾隆皇帝下令为他举行盛大的生日宴会，赐给他朝服、绢、玛瑙等许多东西，西直门堂和郎世宁所住的东堂都贴上了彩带。可见，由于郎世宁参与设计、修建圆明园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

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7月16日，郎世宁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乾隆皇帝赐给他侍郎衔，赏银300两为他料理后事，葬于北京阜成门外外国传教士墓地。乾隆皇帝的谕旨写道：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奋，曾赏给三品顶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着照戴进贤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内务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抚恤。这道谕旨就刻在郎世宁墓碑的左面，右面是拉丁文的墓志铭。

郎世宁在中国生活、工作了51年，大半生在中国度过，他勤勉谦逊，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画作，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把这一时期中国的工艺美术和民间艺术传播到了西方。不愧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友好使者。

参考书目：

《郎世宁之艺术——宗教与艺术讨论会论文集》，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91。

穆景元、陈文、房汉禄：《圆明园风云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圆明园》，北京出版社，1980。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齐鲁书社，1987。

《圆明沧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编辑部编：《北京文苑》（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83。

林克光、王道成、孔祥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在清朝历局任职的传教士
——邓玉函、罗雅谷与龙华民

邓玉函的主要活动

对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事迹研究有素的台湾学者方豪先生认为：明末来中国的传教士中，邓玉函（Joannes Terrenz）是最博学的。未来中国之前，他已名扬日尔曼，医学、哲学、数学无一不精；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葡萄牙文、希伯来文无一不晓，还兼修过动物、植物、矿物等学科。与其说他是个传教士，倒不如说是位科学家。

1603年意大利的一位科学家楷西亲王（Federico Cesi）和几位年轻的朋友创立了著名的“灵采研究院”，取山猫目光远锐的意思，又称为“山猫学会”。研究院成立后，曾广泛招收欧洲除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尤其看重善于理性思维的日尔曼人。这样，邓玉函、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罗雅谷（Jacobus Rho）就都成了该研究院的院士。这所研究院属于教会管理。当时著名科学家伽利略是利玛窦的母校——罗马学院的教授。鉴于伽利略的突出成就和崇高威望，楷西亲王也吸收他加入灵采研究院，成为第六名院士。在该院院士的排行榜上，邓玉函紧接着伽利略而名列第七。他们两人曾经是关系极为密切的挚友。后来邓玉函加入了耶稣会，伽利略很为他惋惜。当楷西院长将此讯通知伽利略时，他说：“玉函的消息，使我颇为不快，这是我院的损失。但他决定进耶稣会，而不入别的会，还可以使我感到欣慰，因为我

最重视耶稣会。”[1]

1613年，前面提到的为利玛窦整理札记的传教士金尼阁，奉新任中国教区会长龙华民之命，回欧洲履行重要使命，一是请求允许用中文做弥撒，二是物色杰出的数学家来华，三是募集大量书籍运到中国。邓玉函即以数学家和医学家的身份加入即将到中国的传教士行列。1616年5月邓玉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在起程赴中国之前，伽利略能告诉我推测日月食的新方法。因为他的方法比第谷（Tyco）的方法为精……希望他至少能预告我一二次未来的日月食，我可以考验他和第谷推算方法的准确性究竟相差多少。”他还托人捎信给楷西亲王：“希望借助他的力量，使我能在起程之前，向伽利略请教若干事，以便利在中国推算日月食的工作。”[2]1618年3月31日，邓玉函在他离开欧洲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还要求他的朋友帮他搜集伽利略和其他学者的新著。可见邓玉函一直站在欧洲自然科学的前沿阵地上，他具备的科学素养比利玛窦要更高一筹。

西方关于天体运行的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亚里士多德体系，即“地心说”，它是天主教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基础。第二阶段是第谷体系，它认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是围绕太阳转动的，而太阳则是围绕地球运动的。第三阶段就是哥白尼的“日心说”。第谷体系在当时的欧洲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了，邓玉函也多少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对中国的天文学理论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

1618年4月16日，邓玉函随金尼阁携七千部西洋书籍登船东渡。同行还有汤若望、罗雅谷等共22人。在漫长的旅途中，传教士们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逢周二和周五就由邓

---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221页，中华书局，1988。

②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222页。

玉函讲授数学课，周三和周六是金尼阁讲中文课。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7月，当他们到达澳门时，同行的22人中竟有7人死在途中。

邓玉函在澳门小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邓玉函行医并做病理解剖。这是西方医学家在我国所做的最早的人体解剖。不幸的是，这时他自己也已经疾病缠身了。不久，邓玉函应嘉定进士孙元化之邀，到他的家乡居住并学习汉语，继而又随李之藻迁至杭州，结庐西湖之上，谢绝应酬，专心译书。

邓玉函到李之藻和杨廷筠的家乡杭州，是为了避难的。因为那时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已经不像利玛窦活着的时代了。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2月3日，就是那个破格将利玛窦留在北京，并赐予他墓地的万历皇帝，颁布了将在北京和南京的西方传教士统统遣回本国的圣旨。要明了其中缘由，还要从"南京教案"说起。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采取"易佛补儒"的策略，他认为天主教与儒学并不矛盾，有些地方大同小异，有些地方可以互相补充。但他对佛教则是极端反对的。他在南京和北京都与佛僧辩论过，写文章时也从未放过批驳佛学的机会。"南京教案"的首发难者，是南京礼部侍郎沈潅。他曾经是江南一位著名的佛教高僧的弟子，早就有尊佛而排斥天主教的思想基础。这是原因之一。

明朝末年，朝廷内部派别斗争激烈而又复杂。最主要的对立双方是东林党一派和反东林党的一派。东林党人士多是江南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读书人，思想相对比较开朗，有不少东林党人如叶向高、邹元标、曹于汴等，与利玛窦等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建立了友谊，对他们传教也不持反对态度。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教的中国官吏，虽然厌恶党争，但在国计民生等很多问题上与东林党人看法一致，并和他们保持了友好合作的关系。反东林党的有三派，分别以他们的籍贯而称为浙党（浙江）、齐党（山东）、楚党（湖北），他们为反对东林党结合在一起，后来更拜

倒在大太监魏忠贤门下，成为人人痛骂的阉党。沈漼就属于浙党，他以煽动反对外国传教士作为排挤东林党的重要手段。这是原因之二。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利玛窦死后，在华西方传教士过激传教行为，也是导致教案爆发的重要原因。有的学者把这叫做“快车脱轨”。前面谈到，利玛窦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在发展教徒问题上一直取极为谨慎的态度。他主要是在学者和官员及其家属中扩大教徒，为的是通过他们为中介，以便接近皇帝，请求皇帝批准合法地在中国传教。所以他一方面主张“易佛补儒”，一方面传布西方科学知识，来博得中国学者和官员的好感。同时他对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活动也取容忍的态度，不反对人教者参加这些仪式。应该说他的这一方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他的这一做法却遭到一部分教会人士的非难，嫌他教徒发展得太慢，嫌他太迁就中国传统习俗。

龙华民就是个激进派。利玛窦到北京后，他主持韶州的教务，三四年中就有 300 多人受洗，占了当时全中国教徒的大多数。教徒骤增，宗教活动声势扩大，引起了部分中国官员的疑心，发生了多起反教风波，以致他几乎不能在韶州立足。利玛窦死后，龙华民主持全国的教务。他不仅加快发展教徒的速度，而且常常在公开场合集合下层民众布道，于是激起守旧官员的普遍反感，使像沈漼等守旧派发动反教风潮时，能够得到较多的响应。在南京主持教会的是龙华民的支持者王丰肃（Alphose Vagnoni），他不仅积极发展教徒，还经常聚众举行礼拜仪式，引起以沈漼为首的部分南京官员的强烈反对。

1615 年 5 月，沈漼等人联名上奏，指控西洋教士以“大西”对抗“大明”，将“天主”凌驾“天子”，“暗伤王化”，恳请皇上遵照“太祖高皇帝《祖训》”，明确“夷夏之防”，下令查办，以正人心。疏上之后，皇帝并未立即批复，但却在传教士和教徒中引起

恐慌。他们辗转相告，秘密串联，有的教徒还手持小旗，上街游行，表示愿为教殉难，将事情越闹越大。沈漼等便下令逮捕了王丰肃等 22 人，并接二连三地上奏要求禁教。一时间，与他一派的士大夫、官员，包括在北京的内阁大学士方从哲等，趁机南北呼应，上下串通，推波助澜，这才导致了皇帝下旨，将王丰肃等南京的教士"督令西归，以静地方"，北京的庞迪我等"亦令归还本国"。实际上这些传教士并没有回国，他们多数躲避在澳门，有的则在奉教的士大夫家中潜藏。徐光启、李之藻等与西洋传教士关系密切者，也一一遭到排挤。在这期间，北京、南京等地的教堂院落则都被官府封禁。

邓玉函就是在杭州李之藻家中，躲避过这次风潮的。

在杭州期间，邓玉函与几位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人身说》上、下卷。上卷论及骨骼、肌肉、韧带、皮肤、血管等；下卷论及神经系统和行为语言等。书成之时，恰逢由"南京教案"引发的全国性的禁教高潮，西学的介绍也因此而中断，所以不能出版问世。书稿一直在汤若望处保存。直到邓玉函去世之后，经中国学者毕拱辰润饰了文字，并与另一传教士罗雅谷所翻译的《人身图说》合编，以《泰西人身说概》为题刻版印刷。

毕拱辰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道，我在京师遇到了汤若望，对汤说："贵邦人士对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实在是登峰造极了！只有关于'人身'方面的事，还没有看到有著作论及。"汤若望于是拿出一幅《西洋人身图》给我看。此图内容极为精详，绘图技法也高超绝伦，实在是中土未曾见过的！汤氏还取出亡友邓玉函在李之藻家中翻译的《人身说》二卷。我早就听说邓玉函先生的大名了，他博学多闻，聪明绝顶，足迹遍天下。在与西洋名士比较中，称得上是'冠军第一'，就像中国的状元一样，也是利玛窦的好友。书中所论述的，'条分缕析，无微不激'。如骨骼、皮肤等，使人一目了然。人体的四百多块肌肉，'分布运动'；'细筋为知觉之司，

髓骨有利益之用'，等等这些，中国学者曾经论述过吗？书中还谈到，人的记忆器官，'悉在脑囊'，这听起来好像很荒唐，其实人每当思索时，'瞑眉蹇目，每向上作探取状'，便可证明。山东方言，将记忆力不强者谓之'没脑子'，就足以证明邓玉函先生的道理是正确的。"[①]

毕氏论道，我曾经读过一些中国的医书，论述经脉之说，觉得有些空虚，哪像本书这样条理分明，就如印泥印的一般，真实可信，将笼罩在人自身的神秘的"千年云雾"顿时驱散。他说，听说西洋的"格致名流"（即著名科学家），将重刑死囚买来，进行解剖，一骨一肉，一毫一发，认真研究，所以他们的著述特别精详。中国古代也有人体解剖的事例：汉代王莽时代，曾有太医与屠户联手将犯人解剖，量度五脏，寻找脉络，研究其所以能够治病的原因。宋代庆历年间，有个叫杜杞的抓到湖南的盗贼数十人，处以磔刑，在剖腹的同时，叫医生和画家在旁观察，绘成图形。这与西洋的人体解剖相似。但在"精思研究"，"不做一影响揣度语"上，则比不上西洋学者。[②]

毕拱辰写这篇《序》的时间是在1634年（崇祯七年），当时邓玉函已经去世四年了。

二三年后，由"南京教案"导致的禁教风潮有所松动。其直接原因之一，是西洋的大炮能够帮助明廷抵御进犯东北边疆的后金军。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皇帝崩天，他的儿子明光宗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也匆匆死去。新上台的是仅有十几岁的光宗之子熹宗，年号为天启。这时大明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1622年（天启二年），后金大军直逼山海关，威胁京师。徐光启、杨廷筠

① ② 《泰西人身说概序》，载于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03页，中华书局，1989。

等上疏，言澳门葡萄牙之兵能操红夷大炮，勇猛无敌，可以借来御敌。又言耶稣会士皆博学宏深、多才多艺之人，宜来京城，于保国大有好处。天启皇帝遂命传教士进京，又有葡军400余人携红夷大炮乘舟北上。后来，葡军半路返回，龙华民等回京，料理教务，以致皇帝责备徐光启曰："汝等推荐天主教士为将官，教士岂能懂得军旅之事？"但大炮运抵山海关后，则确实发挥了巨大的威力。[1]

天启六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包围了山海关外的孤城——宁远。守卫宁远的明军将领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上城墙。没想到这种西洋大炮威力无比，把每战必胜的八旗铁骑打得落花流水。连努尔哈赤也被打成重伤，不久便忧郁地死去了。证实了西洋大炮的厉害之后，明廷在天启、崇祯年间又几次派人赴澳门购买，另一方面则在徐光启、孙元化等精通西洋科学的官员主持下，由汤若望等传教士协助，进行仿造。

西洋大炮的使用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明军原来在善于骑射，长于野战的后金八旗面前一筹莫展，屡战屡败。自从有了西洋大炮，他们创立了"凭坚城用大炮"的新战术，多次击退后金的进犯，致使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数年不敢再围攻装备有西洋大炮的宁远、山海关等战略重地。

1623年（天启三年），借助西洋大炮给传教士们带来的好运气，邓玉函也来到北京，与汤若望一起学习和研究中文。几年后，他与另一中国学者王征合作翻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于1627年刊印。《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分为三卷，卷一论述了力学及与其相关的基本知识，讨论了地心引力、重心和几何图形重心的求法，还有比重、浮力等共61款；卷二阐述各种简单机械的原理

① 《泰西人身说概序》，载于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03页，中华书局，1989。

和计算方法，如杠杆、滑轮、齿轮、螺旋、斜面等共 92 款；卷三为图说，绘有起重、取水、转磨、解石、解木等机械及水日晷、水铳等图共 54 幅。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是邓玉函根据当年从欧洲带来的七千部书的内容中精选出来的，主要参考了伽利略的《力学》之第一章，以及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Pollio Vitruvius）、比利时静力学家西蒙·史特芬（Simon Stevin 1548～1620）、德国人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 1490～1555）和意大利学者拉梅里（Agostino Ramelli 1530～1590）的著作。另外该书的体例也很有特点。书中的概念清晰，原理明确，结构严整，而且附有参考文献、使用方法和插图，是一部充满近代气息的学用结合的著作。

帮助被赶到澳门的西洋传教士又返回北京的，除了是西洋威力巨大的火炮之外，还有他们技高一筹的天文历算知识。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历来以农立国，靠天吃饭，因而崇拜上天。中国的皇帝也自称为天之子，所以历朝历代都特别重视天文历法。中国曾有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天文记载，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天文学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为了远航导向的需要，欧洲的天文历算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把中国甩到了后面。

利玛窦早在寄居南昌时就准确地预报了 1596 年（万历二十四年）9 月 22 日的日食。他在进入北京的当年，即 1601 年（万历二十九年），又预报了 6 月 5 日和 12 月 9 日的两次月食；1603 年（万历三十一年）5 月 1 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又与利公测算的时间吻合。而朝廷中专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这几次预测的时间都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意味天朝代天而言的权威性受到了动摇。

利玛窦逝世后，正巧徐光启也因丧亲在乡守制。当这年（1610 年）12 月，他回京复职的第一天，恰好又发生日食。钦天监预报

初亏始于3时42分36秒，而实际始于4时整；预报复圆在5时，而实际是在日落后，无法确认。这次误报，招致了举朝的非议，改历之说由此而起，且众议非徐光启及西洋传教士不能担此重任。后因有“南京教案”的发生，此议归于夭折。

1624年（天启四年），京师再次风云突变。大太监魏忠贤收罗浙、齐、楚三党，迫害东林党。东林人士7人遇难，330多人被贬出京师，徐光启、叶向高等都在其中。1627年，天启帝崩。崇祯皇帝上台后，清除阉党，重新起用东林党人，命徐光启为礼部左侍郎，钦天监在其管辖之下。1629年（崇祯二年）6月2日，钦天监再测日食失误，所报初亏和复圆的时间均与实际相差两刻（一刻为15分钟）。皇帝怒责钦天监，有关官员上奏说，目前测算天象还是依照太祖朱元璋建国初规定的，沿用元代郭守敬之授时历。此法时经260多年，未经校正，出现错误是必然的。即使郭守敬再世，也是“无可奈何”。如果继续循照旧法，今后也不能保证不发生误差。也就是说，改历势在必行。在这一情况下，崇祯皇帝才批准礼部之请，由徐光启主持，开始修改历法的工作。

1629年9月1日，徐光启奉旨督领修历事务，筹建历局，编纂《崇祯历书》。他明确提出，此次修历要“用西法”，主张起用精通西学的李之藻和外国传教士龙华民与邓玉函等。邓玉函由此被揽入历局工作。

11月6日，设在宣武门内南堂以东的原“首善书院”内的历局正式成立。邓玉函、徐光启与他们的其他同事们投人紧张的译书工作之中。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翻译出《测天约说》、《大测》、《同率立成表》等天学著作七卷之多，另有各种换算表十卷。其中《测天约说》一书详细地介绍了伽利略对太阳黑子的观察结果。邓玉函还指导历局人员制造“七政象限大仪”两座、“测星纪限大仪”一座，并担负了历书总体框架设计的重任。他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高的。

为了将改历一事办好，邓玉函多次写信到欧洲，希望能得到伽利略等著名科学家的帮助。伽利略出于对教会的顾忌和反感，对他的要求反应冷淡。邓玉函就又向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求救，同时将中国古代典籍《尧典》中有关星辰的记载告诉开普勒。开普勒回信表示愿意协助他。可惜的是，这条高水平的科学热线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两位学者便过早地相继去世了。

早已痼疾缠身的邓玉函，终于因为劳累过度而一病不起，于1630年(崇祯三年)5月在京逝世。他出生于1576年，享年仅仅54岁。他在华只生活了短短的十年。这十年中，他几乎无暇顾及宗教事宜，全部精力都用于翻译科学著作和参与修历之中。徐光启在给皇帝的奏疏中称："此臣(指邓玉函)历学专门，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他的突然病故，使我痛失左膀右臂，恐怕修历的工作不能按时完成了。"[①] 由此可见邓玉函在历局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邓玉函逝后，人们为他举行了中西结合式的葬礼，送葬的队伍从宣武门内的南堂出发，走到阜成门外，将他安葬在利玛窦坟墓的左侧。墓碑上以中文和拉丁两种文字镌刻着他的姓名、来华及谢世年代。

明末崇祯年间出版的尤侗、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也记述了邓玉函的一些情况。作者显然对邓玉函很熟悉，说他精通西医，所著的《医说略》称：西药是从该国草木中"蒸取其露"而得，"所论治法，每及人体精微"。他只要尝尝中国草药的味道，便可知"叶形花色，茎实味香"。他曾打算将中草药"遍尝而露取之"，[②] 即今人所说的"中药西制"，并撰写成书，然而却未竟而卒。

---

①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2页。

② 《帝京景物略》，第207页。

罗雅谷与龙华民

在邓玉函之后相继去世，并葬于利玛窦墓地的，是与邓玉函同船来华的罗雅谷和继利玛窦之后任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的龙华民。

罗雅谷，意大利米兰人，生于1593年，与金尼阁、邓玉函等同船来华后，先在山西传教。1630年（崇祯三年），徐光启为了弥补由于失去邓玉函而造成的历局人手不足，将罗雅谷和汤若望调进历局，直到1634年（崇祯七年）改历工作全部完成。徐光启对他的工作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638年（崇祯十一年）4月26日，罗雅谷在京逝世。他更为短命，享年仅45岁，在华近20年。

罗雅谷所著的中文科学著作有：《测量全义》十卷、《五纬历指》九卷、《月离历指》四卷、《日躔历指》一卷、《历引》一卷、《比例规解》一卷等。其中《五纬历指》和《月离历指》完全取材于伽利略的《星际使者》一书。《五纬历指》介绍了“日心说”与“地心说”相互对立的观点。书中以“曰”的口气陈述了哥白尼和伽利略的主张。有的地方还直接出现“加利娄曰”的文字。其《比例规解》一书也取材于伽利略的《比例规使用法》。

1633年，天主教会宣布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为禁书，伽利略因写了《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集》而遭到宗教法庭的审讯，被判永远监禁在家。而罗雅谷的《五纬历指》就成书于1636年。可见罗雅谷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时，具有多么大的勇气。

与邓玉函和罗雅谷不同，龙华民却是个寿星。他1559年生于意大利的西西里，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到中国，直到1654年（顺治十一年）才以95岁的高龄死于北京，在华共生活了58年。送葬那天，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宗教殡葬仪式，大清皇帝爱新觉罗·福临还特意为他赏赐了银两。龙华民在华期间主要精力都用

于传教，虽被徐光启揽入历局，但不久便退出，到山东等地传教。他所著科学著作仅有《地震解》一卷。

邓玉函、罗雅谷与龙华民的遗体都埋葬在“滕公栅栏”利玛窦墓地之中。现在前两者的墓碑仍完好地矗立在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利玛窦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墓地”的碑林里，而后者的墓碑则遗失了。

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的设置

京师同文馆位于崇文门内东堂子胡同，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址的东跨院，始建于同治元年（1862年）。它以中国官办的新式学堂肇端和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而闻名于世。

1861年1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负责办理和局与英、法等国多方周旋的恭亲王奕䜣针对当时清政府对外交涉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易受人欺蒙"[①]等状况，奏请在北京设立同文馆，以便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培养翻译人才。奏折呈上后很快就获得同治皇帝的批准。于是，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6月11日正式成立，附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只设英文馆，1863年又添设法文馆和俄文馆。英文馆学生最初只有10人，招收的是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法文、俄文馆成立后，学生增至30人。课程设外国语言文字和汉文两科。教员除聘请了几位外国人教授外语，每馆设汉教习一人，负责教授汉文。教学管理则仿照乾隆年间开办的俄罗斯文馆章程，设提调管理日常事务，实行分期考试、限年严考的考核制度。每届三年举行大考一次，"优者授为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②]可见同文馆初期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初级学校。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10页。

日转星移。随着洋务企业的陆续兴办，主持总理衙门的奕訢等人，逐渐认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1866年冬，奕訢等人以西方国家制造机器、枪炮"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①]为由，奏请皇帝批准在北京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为保证教学质量，提高了入学条件，规定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和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并厚给薪水。消息传出，立刻在朝廷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的一场激烈论争。

顽固派是一批恪守儒家伦常，惟祖宗之法是尊，惟古圣先贤是尚的毫无革新意识的守旧人物，他们闭目塞听，排斥一切新事物。他们搬出"严夷夏之大防"的老祖宗遗训，连篇累牍，对洋务派进行攻讦。顽固派官员声称国家自强之道在于"养气"，天文、算学、轮船、枪炮都是不重要的。科举出身的人只应"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②]同治皇帝的师傅、顽固派领袖大学士倭仁也亲自披挂上阵，主张同文馆不宜设。他大讲特讲"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现在舍本求末去"奉夷人为师"，即使学到了洋人的技艺，充其量不过是个"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使国家振兴的。他耸人听闻地说："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使之奉夷人为师，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③]如果照此下去，将会出现"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④]居然荒谬地把向外国学习提高到卖国投降这个吓人的高度。与此同时，北京城内怪论四起，有一副对联写道："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

① ②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46、47。

③ 《清史列传》卷46，《倭仁传》。

有人“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句：未同可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1] 对同文馆大肆攻击。天文算学馆设立过程中的这段插曲可以使我们对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国情有进一步的了解。

奕䜣作为同治帝皇叔、领班军机大臣当然不会收回成命。他斥责倭仁“以道学鸣高”，故作危言耸听之论。入木三分地刻画出顽固派是一批“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极端腐朽人物。指出设立天文算学馆的目的“无非欲图自强”。如果听任倭仁的言论，将会妨碍自强大计。[2] 由于奕䜣的坚持和慈禧太后的支持，天文算学馆总算于 1867 年 6 月正式开办。同文馆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课程设置较前大大扩充了，许多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都被逐渐介绍进来。

同文馆的英文馆的第一任教习是包尔腾牧师，他后来是香港维多利亚主教。第二任是傅兰雅博士，他曾在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兴办的江南制造局任过翻译，后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汉文教授。继任的第三人是丁韪良博士。

丁韪良与同文馆

丁韪良（1827—1916 年），字冠西，出身于美国印第安纳州里沃尼亚。父亲威廉·马丁是长老会传教士。还在丁韪良七岁时，他的大姐跟随丈夫漂洋过海到非洲传播“福音”。从大姐的来信中，他了解到传教士在国外的许多冒险和新奇的故事，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个宗教家庭的氛围对丁韪良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

① 徐一士：《倭仁与总署同文馆》，见《一士谭荟》。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8。

用。1843 年至 1849 年，他先后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和新阿尔巴尼神学院。在学习期间即立志当传教士，特别向往到东方的中国或日本传教，并向长老会差会部提出申请，1849 年毕业。同年 11 月，他和他的哥哥被长老会差会部派遣来中国传教。

1850 年 4 月，丁韪良等一行抵达香港，经几次辗转，定居于宁波。他一面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一面开始传教，足迹遍布奉化、杭州等地。在此期间，他出版了用中文编写的传播基督教义的《天道溯源》一书。该书从 1854 至 1912 年，以中文、日文和高丽文印行了 30 余版，成为长老会海外布道会和其他新教派来华传教士学习的中文范本。该书也被神学院采用，流传极广。1907 年，在广学会举办的一次投票评选会议上，被评为中文最佳著作。

1853 年 3 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发展。丁韪良一度对太平天国运动表现出很高热情。他关注着太平军的动向，主张基督教应当对太平天国施加影响，理由是“难道一个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的统治者，不比自封为‘天子’的皇帝更有可能皈依圣父吗”?[1] 为了更多的了解这个新生的政权，他打算到太平天国辖区进行考察，因途中受阻，未能如愿。这以后，他曾三次写信给美国司法部长顾盛，建议美国政府同情和承认太平天国政权。信中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太平军的赞美之词，说起义者奋起反抗可以“同克伦威尔的义举比美”。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与西方的不同，他进行辩解说：“或谓他们的基督教是假的，因之形式不同，然而基督教在开始时期，其形象何尝不是假的呢？……今所指为假的基督教，又有谁敢说它将来不会极有助于真正的基督教的发展呢?”他认为洪秀全“现正操持着重生中国的惟一机构”。他确信“这个革命运动的成功，对

①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203--204 页。

于基督教是大有用处的”。[1] 认为支持太平天国，必将有利于美国的在华利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丁韪良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的翻译。1858 年 6 月，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在这次谈判中，他强行胁迫清政府代表桂良，接受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并将其写入中美《天津条约》中。他兴高采烈的表示：“人们已经意识到传教士已成为世界上的一股势力。”“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必定要对中国起作用。”[2]

1860 年 1 月，丁韪良乘船回国休假，在国内住了两年多的时间。1861 年 10 月，在纽约参加了东方学会的学术会议，在大会上作了《中国人的伦理哲学》的学术报告。同年，获拉斐特大学的荣誉学位。他总结自己在中国十年的传教活动，认为要发展美国基督教在华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经过休整过的丁韪良，于 1862 年夏再度来华，在上海重操传教旧业，并着手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当时最流行的国际法书，作者亨利·惠顿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此书译成后，由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转呈恭亲王。恰巧此时普鲁士公使来华就职，所乘军舰抵达大沽口时，见到三艘丹麦商船，便将其扣押。恭亲王奕訢根据万国公法向普鲁士提出抗议，指责其不应在中国领水内对丹麦商船采取行动，尽管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这一事件获得圆满解决。恭亲王大喜过望，认为《万国公法》一书确有价值。丁韪良也因此得到奕訢的青睐。奕訢赐他“冠西”二字，称赞他为来华西人之“冠”。翌年，他在蒲安臣的帮助下，来到北京为美国长老会开辟传教区。由于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参加与清政府的修约谈判，不少认识他的清朝官员给予关照，因而传教进展比较顺利。他开始实行他以教育发展

①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203—204 页。

②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202 页。

基督教在华势力的梦想。1864 年 5 月，他创办了教会学校崇实馆。这所学校的经费是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提供的，学生的学费、伙食费由学校负担，毕业后充当传教士。然而真正愿意从事布道传教的人并不多，崇实馆只招收到 6 名男生。1865 年，同文馆英文馆教习傅兰雅辞职赴沪，由蒲安臣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丁韪良替补傅兰雅的遗缺，继任同文馆英文馆教习。当时，外籍教员的待遇是相当丰厚的，每天只需工作两小时，年俸是 1000 两银子。这里景色宜人，院子里枣树、黄刺梅长得郁郁葱葱。丁香花香气四溢。院中还有一座小钟楼和一个八角亭，坐落于绿树丛中。在这优美的环境中，丁韪良开始了他新的生涯。

1867 年 12 月，同文馆聘请丁韪良兼任万国公法的教习，他表示愿意承担，但要求先回美国去进修一段时间。1868～1869 年间丁韪良专赴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课程。1869 年 9 月，因赫德去函催促返回北京。赫德征询他是否愿意担任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回答："擦擦灯盏，我是愿意的，但条件必须是你要供给灯油。"[①] 赫德应诺经费不成问题，可以由海关方面拨付。同文馆虽然附属于总理衙门，但实际上在财务出纳、重要馆务等方面都要受赫德的牵掣。这反映出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特色。丁韪良 1907 年写的一篇《同文馆记》中这样说："当赫德爵士奉派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时候，他发现这所学校已经存在。但是，这个婴儿是如此孱弱，要使它活下去，就不得不施行一种人工呼吸法。正确的估计了它的潜在能力之后，他就把它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且替它的发展订下了远大计划。"丁韪良还讲过，对同文馆来说，"赫德可算是父亲，而我只是一个保姆而已"。[②]

1869 年 11 月 26 日，丁韪良到同文馆就职，全面负责馆中的

---

①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210 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243 页。

教学工作。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1894年他因健康原因离职，他担任总教习的职务达25年之久。如果从1865年他担任英文教习算起，在同文馆任职则长达30年，几乎与同文馆的历史相始终(同文馆存在时间为1862～1902年)。可以这样说，同文馆的发展与丁韪良是密切相关的。1907年他写的《同文馆记》中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尽管在外国人眼中微不足道，中国当局对于他们尝试的结果，却是满意的。这可见于1885年的一个奏章中对这一段历史的评述，他们说：'设立同文馆以来，迄今二十余年，历年以来，洋教习等均能始终不懈，各学生等因而日起有功，或随带出洋充作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者已不乏人，实属著有成效。'"这是清朝官方对外国教习的总评价。那么，丁韪良本人为同文馆做了哪些工作呢？

丁韪良曾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和新阿尔巴尼神学院，又在耶鲁大学进修过一年，这种经历使他对西方教育模式较为熟悉和了解。他就任总教习后，按照西方的模式对同文馆的教学进行了一些改造，进一步拓宽了"西学"课程。如在1871年，同文馆增设了医学和生理学讲座，聘请了伦敦教会的德贞博士担任第一任讲师。1877年，开设天文学课，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海灵敦任教。海灵敦因健康关系辞职后，聘请俄国观象台的费理饬博士接任，到1879年由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的硕士骆三畏继任。这些新的课程的设置，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为学生提供了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并且由于同文馆的特殊地位，又起到开学习西学风气之先的作用。

丁韪良在任总教习期间，会同各馆教习认真研究，在教学上实行了分年课程的改革。针对同文馆学生来源不同、程度参差不齐的特点，制定出两套课程表。一套供"汉文熟谙，资质聪慧者"使用，学制八年。前三年主要学习汉文经书和一门外语，打好基础，从第四年起学习西学。这一套课程有：

首年：认字写书、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第二套课程学制定为五年，是为那些“年龄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籍译本而求诸学者”设立的。除学习汉文经学外，开设的西学课程如下：

首年：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二年：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三年：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四年：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五年：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①]

从以上两套课表可以看出，丁韪良任总教习期间，已将西方自然科学的很多学科引进同文馆的教学，有的课程的分类已相当精细。比如算学就包括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微分积分等。这种分年课程的设置，使“各项课程，均有次第可循”。[②] 教学能够由浅入深，符合教育规律。根据学生基础不同采用两种学制，因材施教，就是在教育科学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也仍有其值得借鉴参考的意义。

同文馆是中国官立学校引进资本主义文化的肇始。由于很多课程尚属首次在中国开设，缺乏教材，在教材建设方面，丁韪良

---

① 《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刊。

②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文馆章程中并无教习编书一项，丁韪良任职期间，建议外国教习授课之余从事译书，并组织同文馆的教习和学生翻译、编写了一批教科书。据史料记载，从1862～1898年同文馆译书28种，其中丁韪良本人编写、翻译和审定的就有11种。[1] 除上述的《万国公法》外，较重要的有《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其中《公法会通》是根据瑞士布伦执礼的《国际法法典》翻译的，其他都是丁氏的著述。以上教材的编写，一方面解决了教材缺乏的燃眉之急，一方面在翻译教材的实践过程中，锻炼提高了学生的翻译能力，有稗学业的发展。同时，也为当时的其他洋务学堂，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提供了教材。

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丁韪良对同文馆的教授方法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讲解和识记为主，教学中缺乏实践环节。丁韪良注意把近代西方的教学方法引入同文馆的教学活动中。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意学用结合，让学生参加各种与学业有关的实践活动。比如化学教学中，采用了实验方法，让学生做一些基本的化学实验。同文馆八年制的学生，从第五年起开始在教习指导下练习翻译。其中优秀者，经过训练后能独立译书。上面提及的同文馆翻译的教科书，有些即出自学员之手。同文馆要求学生除正课外，须为总理衙门兼任翻译，按班轮流当差。从学生考试情况看，“翻译汉洋各文词意均属符合，于格物、测算、天文、算学、公法、化学、医学等项尚见用心讲求”，“考以各国语言，亦能应答无误”。[2] 可见，这种重视实践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是比较显著的。

丁韪良在任总教习期间，为同文馆的教学设施的完善也做出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64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同文馆类档案资料》。

了成绩。在他的建议下，“1876年有一个拥有七部印刷机和四付铅字的印刷所附设在这个馆里，它取代了武英殿印铸局的地位”。[①]用于印刷同文馆翻译、撰写的著作及总理衙门的文件等。这之后，在丁韪良的建议下同文馆还设置了星台，专供学生进行天文观测之用。增设了实验室和博物馆，兴建了藏书阁，收藏汉文经典、算学及外文图书达三千余册。

随着同文馆的发展和洋务企业对新型人才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同文馆招生名额也逐年增加。1871年，同文馆增设德文馆。中日甲午战争后，于1896年设东（日）文馆。招收学生也由原来的四五十名逐渐扩至100名。1887年学生名额增至120人。以后，学生基本保持这个数额。招生范围也由原来的八旗子弟扩展到招收“满汉年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和不受年龄限制，精通天文、算学、外语的“满汉之举贡生监”[②]入学，同时接收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的学生入馆进修。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见丁韪良在任总教习期间，同文馆从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进行了一些改革，使同文馆具备近代欧美学校的某些特点。同文馆由一个规模很小的初级翻译学校，发展成为一所文理综合性的新式洋务学堂。几十年中，为清政府培养了不少有较高水平的外交、翻译人才。例如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在校期间便与丁韪良一起翻译《公法便览》，此书于1877年出版，以后曾任出使日本大臣。他翻译的《富国策》（即法塞特的《政治经济学》）和《英文举隅》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在同文馆的历届学生中，担任过出使外国大臣的还有张德彝、庆常、赓音泰、刘式训、荫昌、杨枢、杨晟、吴宗濂、陆征祥等人。张德彝还当过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著有《航海述奇》，记述了他的

① 丁韪良：《同文馆记》。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63—64页。

海外见闻和目睹的巴黎公社壮举。至于担任驻外使馆领事、参赞者，更是不乏其人。在国内沿海和边疆地区的重要衙署，有同文馆学生充任翻译；各洋务企业，有同文馆学生担任总办、会办或做翻译，其中佼佼者如熊方柏一身兼广东船政局总办、机器局总办、军械所会办三职。在天津、湖北、四川等地的洋务学堂，有同文馆学生充任教习，其中蔡赐勇担任过湖北自强学堂总办。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凤仪、庆常、联芳、长秀、杨枢等翻译的《公法便览》、《星轺指掌》、《各国史略》、《公法千章》和《俄国史略》等书籍，介绍了西方法律、历史、外交等各方面知识，其中有些书也被其他洋务学堂选作教科书。鉴于丁韪良任职期间同文馆取得的成效，1885年，清政府予以嘉奖，赏加三品官衔。1890年5月，他休假离华，总理衙门大臣和提调“连日饯以华筵”，同文馆学生百人“盛服齐集考棚公饯”为他送行，称赞由于他“殚心竭虑，惩劝兼施，以致馆务日有起色”，而同文馆自建立至今“规模略备，人才辈出，赖总教习分门析类，督课有方”。[①] 翌年4月他返回北京时，再次受到同文馆师生的热烈欢迎和主持总理衙门的奕䜣的盛情款待。由此可见，总理衙门对他是极为推崇的。

应当指出的是，丁韪良办学和著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教。他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几个月后，曾以教“十来个学生仅仅学点英文”太没出息了，提出辞职。总理衙门派来的大臣董恂和谭廷襄对他说：“那你便想错了，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10个。而且就是这10个学生，他们的前程也是未可限量啊！我们一天天地老了，他们10个人之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外语，难道你的学生便不会被召去教吗?”这一番劝说，还真打动了丁韪良的心，使他放弃了离去的念头，决定留下来教英语并兼管教务。后来他回忆说：“我之所以留任，是认为同文馆的

① 《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先生纪略》，《万国公报》第18册。

影响，远比北京街头上的教堂的力量大得多。”①“因为它会获得一个有利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我能在上帝的保佑下，更加有效地推进（基督教）事业。”“考虑它对这个国家重要人物的影响，我并不认为拒绝是聪明的。”②

丁韪良曾经说过，他是一名终身传教士。他认为“科学是福音传播的辅助物”，“科学有如为箭添翼，但信教应是科学的目的。”③ 同文馆本来有禁止传教的明文规定，可丁韪良却利用教学之便传播宗教。他写道：“以同文馆的性质而言，正式讲授宗教本是不许可的，但我却常常和学生们谈到宗教问题，并且要求别位教习，如课本中遇到有关宗教的课文时，尽可不必删去。”④ 他还说过他编写《格物入门》的目的是为了树立这样一种“基本真理”，即“上帝作为自然界的造物主和主宰是客观存在和统一的”。⑤ 像这种在科学中掺杂神学的情况在他为同文馆编译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丁韪良在同文馆还以讲授万国公法而闻名，使用的教材即他所译的《万国公法》。他说他翻译《万国公法》是为了使清政府“这个不相信上帝的政府认识上帝及其永远的真理，并使他们接受一些基督教精神”，⑥把“公法”说成是上帝的旨意。他除了讲解国际间的和战原则、规则及外交惯例外，还宣扬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是有“理”合“法”的，鼓吹大国有权干涉小国内政，公然说：“欧罗巴诸大国有管理小国内政主权”；西方列强“征服蛮夷之地，而令其归化，于理无损”；宣称“无化之人服从

①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211 页。

② 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中山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③ 叶凤美：《丁韪良》，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 3 卷，第 379 页。

④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211 页。

⑤ ⑥ 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中山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有化之人，势所必然”,[1] 体现出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他也曾设想通过同文馆发展教会势力，但收效甚微。同文馆学生没有一人愿意接受洗礼入教的。

在清末诸多来华的传教士中，丁韪良属于主张基督教与中国儒教相通的一派。其理论根据是东方和西方的“理”是相通的，普天下的“理”是人类所共享的，因而，西方的基督教属于全人类。他阐述说：“至理可以通到中国外国。就如孔子六经，从鲁国出来，通行齐、卫、晋、楚各国，并且传到后代。这不是单重他这个人，是重他说的话，合乎道理。况且东方有盐、南方有金、天生百物，各有各地方，不能独聚在一处，必须彼此对换，民间才有用度。道理也是这样，如果见了书就念，那就打开书本，都有益处。念中国书，听我所常听的，既可添我的知识；念外国书，看我所没有看见的，更可长我的学问。现在这书，是个西人做的，书中所讲的道理，却不是他创的，乃是天所显明的道理。所说的天，不是看得见的天，乃是天地万物的大主宰。”(《天道溯源直解》)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他提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一个明智的儒者以耶稣作为世界的福音而接受之，这并不需要他放弃对中国来说孔子是特殊导师的信念。‘孔子加耶稣’这一公式，对儒者来说已经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2] 因此，他对儒家思想采取兼容并蓄态度。在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是否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祀孔的争论中，他是主张允许其祭祖祀孔一派的代表。丁韪良认为祭祀祖先是后人对先人表示一种敬意，并没有偶像崇拜的意义。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时，他在提交的论文《祖先崇拜——一个请予宽容的恳求》中，系统地阐述了以上的观点。文中指出：“祭祖的事基于人性中几点极好的原则，以及与死去之

① 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中山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②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267 页。

亲人契合的心愿。孩童很自然地跟随父母，效法其思想与形象，为何不能契着奉献祭品以表现他寻求及学习已逝的双亲，像他们在生的一般?”“祭祖能联合其家庭和家族的成员，像树根连系繁多的枝干。”认为华人用肉食和蔬果祭祀祖先和西方人用鲜花悼念先人，其意义是相同的。[1] 丁韪良的观点遭到反对者的激烈反对，但却触及到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轨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所关注。

1894年，丁韪良因身体状况不佳辞去同文馆总教习的职务，回美国治病。1897年初又重返中国。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京师大学堂成立，他出任西学总教习，官衔由原来的三品晋升为二品顶戴，至1902年被辞退。这以后他又重操旧业，从事传教和著述。1916年12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9岁。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他是“在华最前列的美国人”。[2] 清代人周家楣在《西学考略》序言中这样评价他：“同文馆冠西丁总教习本西儒之魁杰，而于中学西学博涉深造，皆有心得。”认为“自西儒之入我中华有声于时者，大抵以天文算学专门名家，而总教习则学具体要，不专一长，在华既久，习知中国政教本末，而于泰西各国用人行政之端特详察而著明之”。[3] 甚至有人说他：“较之从前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诸公，倍有光彩。”[4] 对丁韪良可谓赞赏有加，推崇备至。文中说他“在华既久，习知中国政教本末”的确不假，义和团运动时期，他主张对中国只能实行“以华治华”的方案，不同意列强正式瓜分中国，认为“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

---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269页。

②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00页。

③ 丁韪良：《西学考略》，周家楣序。

④ 《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先生纪略》。

办法，则不可能达到目的"[1]的言论和前述他对儒学的态度便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中国通，说他的学识超过"入我中华"的每位"西儒"，甚至超过利玛窦等人，审视丁韪良在中国的生平言行，读者不难看出其中的溢美成分，但丁韪良为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对清末学校传统教育的改革付出的努力及其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无疑是值得书写一笔的。

参考书目：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同治朝）。

丁韪良：《同文馆记》。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叶凤美：《丁韪良》，见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章艺：《晚清同文馆与近代学校教育》，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五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中山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216 页。

为求知而入教的中国信徒——徐光启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最早把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介绍到我国，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人就是徐光启。

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明末直隶松江府上海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据说，在他出生以前，他的家庭曾以经商致富，同时还有少量的土地。后来因种种灾祸而陷于破产境地，成为独立的小农家庭，其祖母和母亲不得不忙于纺织、养蚕和家务，其父亲亦要从事一些田园耕种以维持生计。徐光启在少年时代也时而参加一些家里的辅助劳动，因此使自己得到了锻炼，为日后的科学研究储备了较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

青年时期的徐光启敏而好学，基础知识扎实，学习兴趣广泛，除古文、律诗、写作和书法外，还学习研究兵法、数学、农学和其他科学技术，于1581年（明万历九年）考中秀才。以后，他把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读书和研究，同时也从事教书工作和一些田间劳动。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徐光启中了顺天府的第一名举人，因此而名声大震。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徐光启中进士并考人翰林院，成为庶吉士。明代的翰林院是封建统治阶级用封建政治和庙堂文学来培养为封建政府服务的人才机构，在这里，“徐光启必须学习翰林院的课程，要作馆课，并花费一部分时间来

阅读时务书籍。他曾利用馆课大胆发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揭露当时政治上的各种腐败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1]表现出徐光启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正是在翰林院学习的这一时期，徐光启结识了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他向利玛窦学习了西方的天文、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知识，并且与利玛窦合译西洋科学书籍，包括数学、测量和水利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徐光启对西方自然科学的介绍，大开了人们的眼界，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明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开始重用徐光启。1629 年（明崇祯二年），徐光启升任礼部左侍郎，紧接着受命主持修改历法的工作。同年 12 月，因后金兵进攻北京，徐光启暂时放弃历局的修历事务，全身心地投入制造火器和保卫京师的工作，又被委以朝廷要职，升任宰相。徐光启积极主持并参与修历工作，他一方面研究我国古代历法；一方面进一步学习西方科学，并且同西方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大学联系，吸取当时欧洲的最新科学知识。他还引进欧洲的时辰钟和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对天象进行精密观测，绘制出一幅《全天球恒星图》。3 年之后，一部凝聚着徐光启心血的新历法书终于编成。我国沿用至今的农历便是在这部新历法书的基础上形成的。

徐光启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科学研究。在晚年，他还写出一部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该书共 60 卷，50 多万字，包括农本、农事、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 12 章。内容十分丰富，大致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摘引前人的文献资料，另一是徐光启自己的实践体会和思想见解。该书被称为农业百科全书。

1633 年（明崇祯六年）11 月 8 日，徐光启在北京病逝，享年

[1] 王重民：《徐光启》，第 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2岁。

徐光启与外国传教士

徐光启生活在我国明朝晚期，是时正值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之时。与此同时，欧洲近代科学却迅猛发展，明王朝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希望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使国家富强起来，适逢此时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便试图通过与西洋传教士的接触，学到富国强兵的知识，以振兴祖国。

明代末年，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纷纷来中国传播基督教，这在当时可谓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件大事。但是，明末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背景和动机却与唐、元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15、16世纪，随着欧洲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各国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因此面临严重的危机，天主教会的权威受到挑战。为了挽救危机，天主教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耶稣会成为最重要的工具。耶稣会乃是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在1534年创立的一个新修会，其目的是企图在宗教改革运动后重振天主教势力。耶稣会士不着僧衣，深入到欧洲世俗社会各个领域。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天主教传教士被派遣到海外配合其殖民侵略，耶稣会的势力因此扩张到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在南北美洲和亚洲各地均可见到耶稣会士的足迹。因此，这个时期到中国来的一批传教士是作为当时西方殖民势力海外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从客观上看，传教士来华传教时所附带的西方科学文化与思想却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及以后的科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徐光启便是中国封建士大夫中和西方文化相接触的第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明末来中国的传教士中，较有名的有罗明坚、利玛窦、郭居静、熊三拔和汤若望等。1541 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和依纳爵·罗耀拉应葡萄牙王若望三世的请求，派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到东亚传教。方济各·沙勿略于 1552 年到中国，但因无法进入广州，不久病死于上川岛。1579 年，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c Ruggicri）被派往澳门。1582 年，利玛窦（Matteo Ricci）也受耶稣会派遣到澳门。次年，罗明坚与利玛窦让郭居静留下，自己却脱去僧服，换上儒服北上，他们先后在南昌和南京建立了住院。

西洋传教士来中国以后，教徒人数不断增加，据载，利玛窦居留北京之后，信教者明显多起来。1608 年，有 2000 多人。[1] 其中有的是明朝的官员和儒士。徐光启出于爱国，开始接近和拥护基督教，以便从教士那里学得有用于祖国的东西。他是明末官员和儒士中第一个信天主教的人。

徐光启受洗入教

利玛窦来中国时，徐光启并不知道有其人。后来他看到赵可怀和吴中明翻刻的《山海舆地全图》，才知道是利玛窦将此世界地图传入中国，由此也开始对利玛窦产生仰慕之情。1596 年，上海人赵凤宇任浔州知府，约徐光启随其到浔州开馆。浔州在广西，他们途经韵州（广东韵关），曾去天主教堂拜访。此时利玛窦已经北上，徐光启未能与之相见，但却认识了郭居静，并从郭居静那里获知了一些天主教和西洋的情况，徐光启与郭居静面谈得很融洽。1600 年春天，徐光启在南京与利玛窦相识。此时的利玛窦正在南京宣传基督教，因他掌握一些西洋科学知识并随身带有一些科学

①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 8—9 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仪器，当地的士大夫多喜欢与之聚谈，甚至以此为荣。西洋科学引起了徐光启浓厚的兴趣。1603年，徐光启回上海时路过南京，此次没有见到利玛窦，只见到仍留在此的传教士罗如望。徐光启与罗如望晤谈，得到利玛窦写的《天学实义》一书。该书是一本结合某些儒家思想并且否定别的宗教的天主教教义书，共上下两卷，采用"中士问，西士答"的体例，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儒家之经典，严厉驳斥佛教，以先儒驳近儒，逻辑严密，哲理性强。徐光启用了几天的时间研究了这本书，深受影响，并因此认为天主教的一切戒规均合天理人情，甚至表示愿意受洗入教。罗如望同意了徐光启的请求，使其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天主教徒，并且获得了一个圣名"保禄"。因此，在天主教内徐光启被称为"徐保禄"。

应当说，徐光启信仰天主教的动机是爱国的。"徐光启生于晚明之世，是个有抱负的人。他从事科学研究，关心国家命运，看到国家存在着危机，立志为强国富民做一番事业。他不是保守的，是求进取的。但是明朝的闭关政策，使徐光启这样的有志之士能从哪里去找除儒家思想之外可学习、可吸收的新东西呢？"[①] 在此时的徐光启看来，西洋传教士便是他可以向之学习新东西的人，受洗入教能为自己学习新知识提供更大的便利。此外，徐光启信教时对天主教并未全部了解，他所能看到的天主教只是利玛窦等几个传教士的宣传和《天学实义》等天主教书籍的片面解说，因此，徐光启不可能正确识别传统的天主教教义的本质和近代西方社会的历史现实，只是在对古代中国的正统封建唯心主义理论感到不满时，幻想从天主教教义中寻求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②] 的东西。事实上，徐光启接近和拥护天主教是想通过传教士学到一些富国强兵的知识，而他的入教的确为日后学习西洋

①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9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②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10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科学并翻译有关书籍提供了方便。

沟通中西文化的徐光启

徐光启信天主教之后，一面向传教士学习教义，一面从传教士那里了解欧洲科学文化知识。1604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徐光启考中进士并考进翰林院做庶吉士。在这里，他花费不少的时间学习科学，专心研究天文、兵法、屯盐、水利以及工艺和数学等，结识利玛窦之后，不断地求教学习，倡导并亲自参与翻译西学的工作。

利玛窦来中国之前，曾在罗马学院（今罗马额我略大学）师从当时著名的天主教学者克拉维神父，学习数学、地理和天文历法等。克拉维（Christoph Clavius、1537～1612）是当时学院中对利玛窦影响最大的教师，他生于德国，学识渊博，是全世界现行公历（格雷高里历）的主要制订者之一，他一生多著述。后来，利玛窦将克拉维讲授过和出版过的一些课本带到了中国，他曾向愿意向他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讲解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一书。该书是古希腊的一部杰出的数学著作，是公元前4世纪至3世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希腊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得撰写的一本几何学教本。全书共13卷，卷1--6为平面几何学，卷7—10为数论，卷11—13为立体几何学。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但堪称古代西方科学的典范，而且影响了整个人类科学思想的进程，为各国数学家所称道，因而长期作为标准教科书使用，先后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从希腊文译为阿拉伯文，又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再从拉丁文译成欧洲各国文字。早在13世纪，《几何原本》就曾传入我国。当时，蒙古人的征战使中国和阿拉伯这两大东方文化有了更广泛的接触，该书可能是由中亚地区天文学家带到中国的当时最新的阿拉伯抄本，但却未得传播，而是被

湮没在元朝的宫廷藏书中，直到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携此书来华，该书重又传入我国。利玛窦在华授课时便使用此书，他在向中国的士大夫讲解该书时，并非人人都能听懂。此时徐光启虽已45岁，但他却是学懂者之一。利玛窦在中国传播西学时，传播渠道是私人交往，以文会友；传播方式则是由利玛窦用汉语口授，徐光启等人作笔记，然后整理再作修辞润色，交私人付梓印行，在一些士大夫中传看、转抄或翻刻。徐光启认为，在已经印刷了一些西方的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之后，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而《几何原本》一书在首选之列。因此，他想将该书翻译成中文。经过与利玛窦的多次商讨与辩论，终于促成了该书的翻译。

《几何原本》的翻译大概开始于1605年冬或1606年初。在此之前，利玛窦曾告诉徐光启，除非是有突出天分的学者，没有人能承担这项任务并坚持到底，因此徐光启自己担负起了这项工作。徐光启的译本是根据克拉维的注解本，由拉丁文译成中文的，这是中文的第一次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徐光启与利玛窦密切合作，一个口传，一个笔录，多次反复地推敲、订正和修改，以符合本书之原意。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奋工作和长时间的虚心学习，徐光启进步很快，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科学知识认真翻译，一丝不苟，用优美的中国文字译出原稿。使译本文字通顺，无大错误，一次翻译即成定本。此外，在译文中他创造出一套专业术语，如点、线、面、直角、四边形、平行线、相似和外切等等。这些术语十分恰当准确，至今仍为我国现代数学沿用。1607年春，《几何原本》的前6卷翻译完成，并且印成一册出版。徐光启还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第一篇以利玛窦的名义撰写，介绍了原著的作者并赞扬了克拉维对原著所作的阐述说明与注释，还解释了对各个问题和定理的应用并附录了其他数学数据。在第二篇序中，徐光启赞扬了欧洲的科学与学术，以便当时的国人了解西方科学。在

译完《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还向利玛窦请教“水法”的知识，利玛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诎焉者，何也？身被主上礼遇隆恩，思得当以报。顾已久谢人间事矣，筋力所用，无所可效。有所闻水法一事，象数之流也，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私愿以此为主上代天养民之助。”利玛窦还概要地介绍了欧洲水利工程技术的情况，使徐光启感到甚是奇妙，为中国所不及。同年，徐光启因家父去世，不得不扶柩南归，回上海守制三年。离京时，他随身带回利玛窦十年前翻译的关于测量法的一部草稿。守制期间，他利用《几何原本》的定义，参照中国古代书籍《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再加整理和说明，编成了《测量法》一书。随后，他又根据该书加以引申，写出了《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两本书，1610年和1611年，徐光启还与李之藻合作，按照编译《测量法义》的方式方法将《同文算指》整理成书。

1610年，徐光启重返北京，此时利玛窦已病逝。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勾股义》的著成，徐光启对中国数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几何原本》的中译是我国科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几何学著作，该书的引进对当时已经落后于欧洲的中国数学起了推进作用。后来，到19世纪末，该书由清末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和英人伟烈亚历合作补译完。

徐光启在家守制期间，主要从事研究农业科学与会通中西算学，并且邀请耶稣会士郭居静到上海来传教，后来还让自己的全家均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徐光启回京之后，于1611年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合作进行了《泰西水法》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徐光启结合我国原有的水利工具，选择书中有用的或先进的部分加以翻译，并且边译边制器边试验。这种密切联系实际并不断总

结经验的翻译方法十分有效，它使该书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612 年该书译成后不久便出版面世，并且很快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对发展我国古代农田水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促成明朝政府修改历法，利用西方现有的科学成果来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徐光启还在 1611 年整理出了熊三拔的一部旧稿《简平仪说》并且为之写了一篇长序。

自从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以来，人们对此事的态度各不相同。当时有的人接受并拥护其传教，也有不少的士大夫反对其传教，有些城市的居民还曾捣毁其教堂或殴打神父。1616 年 6 月至 7 月沈漼在南京掀起的南京教案便是反对其传教的一个实例。南京教案在当时的中国朝野间引起了一场大的争论。一些封建士大夫从自己本身的利益出发，顽固地持排外态度。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会像白莲教那样酿成农民起义；有的人则因重视科学、主张洋为中用而采取保护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徐光启属于后者。由于时代的局限，徐光启不可能很好地区别政治、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看不清西洋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真实目的，因而在南京教案中，徐光启曾为传教士辩护。1616 年 8 月至 9 月，徐光启听说传教士要被捉拿，连忙给在上海的儿子徐骥写信说，如果有西方传教士逃到上海，应设法帮助他们，将西堂收拾一下以作为传教士的住所。1617 年 2 月，明万历皇帝下令将庞迪我、熊三拔等人押解出国，庞迪我和熊三拔出境之后死于澳门，龙华民与毕方济（Francois Samhiasi）二人则受到徐光启等人的庇护，因此而得以滞留内地。

徐光启主持修订历法

1627 年，明崇祯皇帝继位，清除了敌对势力，徐光启受到重用。不久，因钦天监推算的日食时刻不准，明王朝决定参用西法

修正原来的《大统历》。1629年，崇祯下令修改历法，由徐光启负责修历事务，筹建历局。徐光启受命之后，"随即上了《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疏中首先批判了"日度失行"的观点，并对"宋儒言天必有一定之数"予以驳斥，还具体拟出了修改历法的步骤与方法、急需的仪器及人员调配等，得到了皇帝的一一准允。同年11月6日历局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宣武门内东墙下的首善书院旧址。开局后，传教士龙华明、邓玉函（Joannes Terrenz）参与修历事务，投入紧张的译书工作，直到12月11日，著译出《测天约说》、《大测》、《通率立成表》等草稿7卷。邓玉函还把伽利略望远镜以及使用望远镜所获得的新发现介绍到中国来。后来因历局事务繁多，人手缺乏，徐光启又将两名西洋传教士罗雅谷和汤若望安排进了历局，协助徐光启从事"推求测验，改正诸法"的工作。历局成为当时西法的一个中心。

中国的天文历算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曾制定《授时历》，使中国的历法精确度有较高水准。明代又依据《授时历》制定出了《大统历》并且长期沿用。到15世纪末，《大统历》因年久未修而出现明显的误差。钦天监预报当天下午的日食，预报的初亏时间比实际早30分22秒；预报食甚时间在3时42分36秒，实际出现在4时整，复圆时间预报在5时，实际在日落之后，无人确认。与此同时，欧洲的历法已进入准确度较高的时期，1582年出现的格雷高里历（Gregroam Calender）有着较高的精密程度。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不断宣扬西法的优越性，同时将西洋历书大量介绍并带到中国，这便为徐光启的修历工作提供了借鉴的机会。在修历过程中，徐光启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的测天制品中的优秀方法，一方面学习西洋历法，努力汇通中西，以便超胜西洋历法。为达此目的，他坚持扎扎实实地工作，尽管此时他已是70高龄，但他仍事必躬亲，亲自实践，登上观象台亲临指导或亲自进行观察测验，有时甚至在夜间率领历局一班人马一

同登台，守候在仪器旁观测，因此不慎从观象台上坠下，伤了腰膝。在观测日月食时，为精确时刻和食分，徐光启极力主张使用世界上新发现的望远镜。早在改历一开始，他就拟定了制造仪器的周详计划，专门上书提出急用仪象十事，建议制造地球仪、七政列宿大仪（即天球仪）、平浑悬仪、交食仪、60度纪限大仪、90度象限大仪、日晷、星晷、自鸣钟以及望远镜等十种仪器共27件。他是我国第一个制造望远镜并将它用于天文观测的人，他所使用的观测日食的这种精确方法，正是现代观测太阳黑子的方法，它比历史上所使用的其他方法更为准确。说明了徐光启善于接受新事物，努力采纳并应用最先进的技术与方法为己所用。

1632年6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日常公务非常繁重，常常工作到深夜，因此而病倒。此时历法修正方案已基本形成。在他去世前的一个多月里，他仍然不停地为修历工作忙碌，并且为了修历工作的后继有人而操心，先后上书向皇帝推荐人才，荐请李天经接任历局工作，并上书请求对在修历工作中有贡献的人给予"恩叙"，充分表现出徐光启对科学工作的兢兢业业和奉献精神。虽然他的修历工作没能最后完成，但却为后来的修历者提供了基础，以后清代的历书基本上就是徐光启带领修订的《崇祯历书》。《崇祯历书》中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在我国文化史和中外交流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徐光启——西学东渐的先驱者

徐光启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的一生。"在15世纪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始终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是人类历史长河的导航船"，[1] 对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自中世

---

① 郝侠君：《中西五百年比较》，第15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

纪后期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西方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中国科学却开始落后于西方。与此同时，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配合西方殖民者的扩张来华传教，随之传来了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如自鸣钟、望远镜、水法和历法运算等，这些在当时是对中国有用的先进的东西，它们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激起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徐光启自从与西洋传教士接触以后，就通过他们学习西洋的科学，翻译西洋科学书籍，吸取西方科学的长处来充实丰富自己，使之与中国科学的精髓结合起来，融会书本理论与实践知识，从而形成了一套具有近代科学倾向的思想体系，用于民生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徐光启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型的知识分子，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当时西方天主教教士及其代理人的本质不可能正确理解与认识，中年以后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是崇洋媚外者，他信教以后并没有拜倒在外来势力的脚下，而是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立场，不懈地追求科学，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达到富国利民之目的。因此，徐光启毕生为热爱祖国、献身科学、以科学强国富民而努力，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引进和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先驱者。

因病而入教的中国信徒——李之藻

李之藻（1565－1630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振之，号我存、凉庵居士，又称凉庵子、凉叟、存园叟。李之藻是明代信奉天主教的著名人物，与徐光启、杨廷筠合称为明末天主教会的“三大柱石”，也被称为“圣教三杰”，也是明末较早地与西方传教士进行科技、文化交流的封建士大夫之一。他协助传教士翻译过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在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潜心学习西学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士大夫不满意于当时理学明心见性的空谈学风，提倡实学。当时，外国传教士利玛窦以传播西学来提高天主教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这是西方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主要方法之一。

李之藻天资聪颖，从小就勤奋好学，尤其喜爱地理学。少年时代他曾写过地理书，绘制过中国十五省地图。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中举。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参加会试，中第五名进士。后任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被誉为“江南才子”。

16、17世纪伴随着一批批外国传教士入华，西方科学技术也被带到了中国。李之藻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在与西方传教士交往、接触西学后，他决定跟随传教士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

李之藻于155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到北京。两年后，1601

年利玛窦也到了北京，李之藻与利玛窦在北京朝阳门外的金台相遇，很佩服利玛窦的学识。后来他常到利玛窦的住处，以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请教。

1602年，李之藻重刻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改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宽361厘米，高171厘米，由李之藻雇工刻制，可展可合，刻印十分精美，印了几千份。利玛窦在新图上加了一些注释和说明文字。《山海舆地全图》不仅流传中国，还远传到国外，现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罗马梵蒂冈图书馆都有《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刻印的版本。

1603年，李之藻奉命与翰林院编修陈子龙在福建主持乡试。第二年，他从工部转到都水清吏司，被派到山东张秋（今阳谷县）主持治水。后又去开州（今河南濮阳）做知州，回京后升任工部都水清吏司员外郎。

利玛窦在北京生活了10年，李之藻是与他交往最密切的京官。利玛窦对李之藻的评价很高，说“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李之藻）、徐子先（徐光启）二先生耳”，称李之藻为“良博士”。

1610年，46岁的李之藻生了一场大病，利玛窦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躬身调护，亲切如家人”。李之藻原本是佛教徒，病好后接受了利玛窦的劝告，弃妾改信天主教，取圣名“良”(leo)。当时的著名传教士艾儒略描述了利玛窦为李之藻受洗的经过：“李公我存，久习利子（利玛窦），服其器识。……忽患病，京邸无家眷，利子朝夕于床第之间，躬为调护。及病苦笃，已立遗言，请利子主之。利子力劝立志奉教，得幡然于生死之际而受洗，……而李公之疾亦痊矣。”入教后，他捐献了100两黄金，让利玛窦维修北京的天主教堂。

奉洗入教后，李之藻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

作。一个不懂外文的中国人，要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李之藻不怕困难，他和利玛窦一个口传，一个笔录，完成了《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

修历、购西炮、保教

李之藻是较早地系统地接受西学的中国学者，力主借西洋先进的历法摆脱明末的历法危机。徐光启主持修历工作，召用10个精通天文历法的天文学家参与修历。李之藻是第一个被召用的天文学家，也是明末修历的骨干。

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李之藻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向神宗皇帝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力荐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洋天文、历法书籍，参与修历工作，他指出，“但系有益世用者，渐次广译，其于鼓吹休明，观文成化，不无裨益”。书疏建议在礼部下馆设局翻译西书，把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西方传教士的天文学著作译成汉语。

明朝末年女真族崛起后，东北多次告急，1619年10万明朝军队大败于辽阳。徐光启在通州总理练兵事务，委托李之藻、杨廷筠购买西洋火炮，招募西洋炮手。1620年李之藻派弟子张焘去澳门，找西方传教士购买大炮。西方传教士捐了许多钱，终于购买到4门红夷铜铳，运到江西广信。张焘还请来葡萄牙炮兵长官4名，通事6人，炮兵100多人，帮助训练中国的炮手。这些西洋火炮，对抗击后金起了很大作用。

1612年在宁远之战中，明朝将领袁崇焕指挥明军，使用张焘购买的西洋火炮，挫败后金的进攻，使之死伤17000多人。努尔哈赤亦遭受重伤，不久病死。

但是，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人，却引起保守势力的反

对。1616年5月、8月、12月，礼部侍郎沈潅三次上疏明神宗，认为西方传教士崇奉天主，不祀祖宗，教人不孝，私习历法，淆乱纲纪，从而掀起了反教风潮。是年7月，徐光启在北京上《辩学章疏》，极力为西方传教士进行辩护。李之藻当时在高邮担任“高邮制使”，杨廷筠在杭州致书南京官员请求保教。

1621年山东白莲教起义，沈潅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勾结宦官魏忠贤指责天主教是白莲教，在南京逮捕传教士和教徒。李之藻与徐光启、杨廷筠冒着风险，将许多传教士接到自己家中保护起来。南京教案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受到了排挤，李之藻被贬到广东任左参政，两年后告老还乡。直到1623年，沈潅被内阁首辅阁臣叶向高排斥，南京教案才告平息。

杭州开教，发展教务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即李之藻信奉天主教一年后他的父亲病逝，李之藻回到杭州奔丧，临行前他邀请耶稣会士郭居静、金尼阁、钟鸣仁等一同到杭州传教。他的请求得到了当时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龙华民的同意。是年5月8日在圣弥额尔瞻礼日，李之藻请郭居静、金尼阁、钟鸣仁在杭州李之藻的家中举行了杭州第一台弥撒礼，追悼李之藻的父亲。

李之藻在自家附近建造了一座小教堂，属于私堂。这座教堂是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外观是西式的，内部又有中国式的木柱，别具特色。这是明末杭州最早的教堂。

杭州开教以后，李之藻在杭州设立了会馆，使杭州成为当时全国五大会馆之一。从此，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杭州，据统计先后有19人，他们或担任教授，或进行译书工作。

李之藻积极在杭州发展教务，不仅建立教堂、会馆，还劝他的亲友奉洗人教。杨廷筠是李之藻的同乡好友，他来到李之藻家

见到郭居静、金尼阁，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向他们请教天主教的教义，想入教。但是杨廷筠有侧室，郭居静、金尼阁不给他付洗。天主教规定一夫一妻制，后来杨廷筠毅然弃妾，郭居静、金尼阁才为他付洗，起圣名“弥额尔”(Michael)。杨廷筠加入天主教后，他的亲戚朋友100多人也先后奉教。到1621年，李之藻在杭州发展了1300多位新教徒。

在李之藻的支持、帮助之下，杭州的天主教在明末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末杭州天主教的活动在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主持翻译出版的重要著作

李之藻晚年主持翻译、编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是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人物。他不顾年高体弱，一只眼睛没有视力，仍手不释卷，被誉为“失明而不倦”。

1607年，《浑盖通宪图说》2卷，在北京刊印。由利玛窦口授，李之藻加以整理的这部书，说明平仪制作的原理，讲解了星盘坐标系统的投影法。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天体学的著作，推动了我国17世纪天文学的发展。

1614年利玛窦口授，李之藻编辑的《圜容较义》在北京出版。这是一部几何学的专著，论圆的内接外接，说明天地浑圆之说。同年，利玛窦口授，李之藻笔译的《同文算指》刊印，共10卷。前2卷讲数学的运算方法，从加减乘除到开方，比例级数的西方笔算方法，弥补了中国传统算法之不足，对于中国科技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8卷为例题，译自克拉维厄斯的《实用算术简要》。这部书是最早译成中文的西方算术著作，是中国从传统数学向近代数学转变的标志。西方的笔算简便易行，对我国算术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傅汎际（Franciscus Furtado，1587～1653）是与金尼阁、汤若望一起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从1623年起他和李之藻在李宅的“存园”内专心翻译西书，历时5年，译成《圜有诠》6卷，于1628年在杭州出版。此书讲述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逻辑学的专著。

李之藻还和傅汎际共同翻译亚里斯多德《辩证法大全疏解》，名为《明探理》。1630年李之藻去世，书未译完。傅汎际为他作了终傅礼后，继续翻译这本书，译出10卷，于1631年在杭州刊印。余下的20卷由南怀仁继续翻译。成《穷理学》60卷，完成了全书的翻译，进呈康熙皇帝。1626年杨廷筠在杭州设立一所学校，就把《明探理》作为教材。

李之藻认为“西学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盖缘彼国不以天文、历算为禁”，而中国学术，“两千年来，推论无证，漫云存而不论，论而不议，夫不议则论何以明，不论则存之奚据”？中国传统科学的“不论”、“不议”缺乏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作基础。《明探理》论述“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即形式逻辑和演绎推理的方法。李之藻希望将它译成中文，用西学的优点来纠正中国学术中的弊端，改变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发展方向。

1629年，李之藻在去世前一年刊印了中国天主教第一部丛书《天学初函》，收集明末西方科学译著20种，52卷。这部书分理编和器编，理为宗教、道理、器为科学、技术。涉及天文、数学、历法、水利。其中，熊三拔所著《泰西水法》，和王征编译的《奇器图说》、《诸器图说》被列为明末三大技术书。

《天学初函》中所涉及的书籍有的是传教士口授，李之藻笔录。他原计划把散在唐朝佛教书籍中有关天主教的书，以及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比利时传教士）带来的7000部书汇编起来。由于李之藻去世及明清的更迭，这个宏伟计划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天学初函》的刊印，还是保存了许多西方天主

教、科技书籍。《天学初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介绍、传播西学的丛书，对西方学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光启在1629年再次奉旨成立历局，主持修历工作。李之藻决定进京相助。走到半路突发重病，于1629年6月29日抱病到京。由于工作过于劳累。不久，于1630年11月1日去世，終年65岁。李之藻的灵柩后来归葬于杭州。

李之藻由秀才、举人到进士，逐步进入封建官僚集团的上层。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我国著名学者陈垣称赞李之藻"其文雄劲，明世罕觏"，"其文汪洋浩瀚，才气四溢"。[①] 李之藻学贯中西，通过翻译、编辑、出版西方著作，把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传人中国，为中国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值得后人学习与怀念。

参考书目：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法）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方豪：《天主教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

王漪：《明清之中学西渐》，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法）安田朴·谢和耐：《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83。

①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78页，中华书局，1980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87。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齐鲁书社,1987。

精通西学的著名天主教人士
——马相伯与英敛之

马相伯（1840—1939年），原名建常，又名良、志德、钦善、绍良，字相伯，亦作湘伯、芗伯，别号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原籍江苏丹阳，生于丹徒（今镇江）马家村。其父名松岩，精通医学，开过药铺，后又开米布店。其兄马建勋，曾为李鸿章幕僚，生卒年不详。其弟马建忠（1844—1900年），中国近代著名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名噪一时，著有《马氏文通》和《适可斋记言记行》等。

马家先人，早在明朝利玛窦来华传教之后，已信奉天主教。马相伯出生后不久，就受了洗礼，取教名若瑟，也称若石。他小的时候，聪颖好学，很爱动脑筋。传说他看到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洒下一片银辉，便问乡间父老："月亮是活的，还是死的？它生于何处？"看到月亮隐去，天色昏暗下来，总要问："月亮去哪儿啦？"乡里有人觉得他可笑，有人呵斥他，也有人谎称月亮是被老虎吃掉了，对这些回答他全不满意，于是立志要研究天文，探寻其中的奥秘。11岁那年，他瞒着父母，从镇江独自跑到上海，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读书，学名叫"马斯臧"。第二年，马建忠也入该校学习。依纳爵公学开设拉丁文、希腊文、英文、法文、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声、光、水、电、昆虫、草木等课程，使马相伯眼界大开，他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花蜜，"国学与科学皆大进，尤嗜度数"，[1]并学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293页。

会了拉丁文和法文，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受到校长晁德莅的器重。马相伯本欲走清代大多数读书人走的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的道路，但太平天国革命风暴阻断了他的进身之阶。因太平军前锋进抵上海，江南科举暂停，他只好与弟马建忠继续留在学校里，并兼任国文教员。1859 年马相伯 19 岁时，上海法国领事得知他懂法语，想聘他当秘书，他以“我习法文，为祖国用也。”[①] 回绝了，表现出他要报效祖国的崇高志向。

1862 年，马相伯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学习，后又入大修院攻读哲学和神学。1870 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教会授职为司铎，开始了传教生涯。1872 年，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在教学之余，仍孜孜不倦、潜心钻研哲学及数理科学，译著数理书百余卷。1876 年经教会调往南京任编撰，从事译著。他记述此事说：“教会中人把我调到南京，派我译数理诸书，余颇不耐，因为余在徐家汇已译著有数理书百余卷，不为余印行问世，多译多著何益？兼之当时在南京教会中，一个厨子是一个极龌龊的外国人，他做的饭食简直不能下口，而且极有碍于卫生，于是我就不辞而别，自己一个人跑到上海。”[②] 就这样，他离开了耶稣会，经大哥马建勋的介绍，到山东布政使余紫垣处掌理文案，从此步入仕途。1877 年，余紫垣委派他接办山东潍县机器局，负责制造军火。在此期间，又奉李鸿章之命调查了全省矿务。1881 年，清政府派黎庶昌任出使日本大臣，马相伯随同前往，任驻日使馆参赞。不久，改任神户中国领事。同年秋，因兄患病而回国，过南京时去拜谒李鸿章，李鸿章命他随至天津任事。此时马建忠正从法国留学归来，也在李鸿章幕府。

19 世纪下半叶，中、朝两国之间存在着宗藩关系。从 70 年代

---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 293 页。

②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481 页。

起，由于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朝鲜社会危机四伏，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1882 年夏，朝鲜国王李熙之父李昰应发动政变，朝鲜官员呼吁清政府过问此事。在清政府援护下，朝鲜国王李熙复位。朝鲜政府向李鸿章要求推荐办理新政人才，李鸿章以马相伯"谙习公法，洋情明练，心地耿直"[①] 派其前往协助，马相伯遂以襄理朝鲜海关商务的名义赴朝。在朝鲜，国王待他以师傅之礼，他建议国王"编练新军，整理外交"，[②] 还上了一系列条陈，包括省刑罚、定刑典及求才、废奴、兴学等内容。但朝鲜政府积习难除，新政难以推行。翌年，他回天津述职，向李鸿章表示不愿再回朝鲜，并向李鸿章推荐袁世凯接替其职。

1884 年，李鸿章委派马建忠出任上海招商局总办，同时派马相伯调查招商局各地分局财产、账目。马相伯奉命到天津、烟台、上海、汉口、厦门、广州等地仔细核查。在他离广州北返时，应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去了台湾，他向刘铭传建议借款开发台湾，未被采纳。1886 年，李鸿章电召马相伯回天津。他回津后，李鸿章跟他和马建忠说，朝廷命我筹建海军，但只拨给 500 万两白银，怎样办得好？马氏兄弟建议他借外债办银行、办海军。李鸿章遂派马相伯到美国去借款。他到纽约后，美国答应借给五万万美金。消息传来，朝议大哗。清廷发布上谕："前有人奏李鸿章与美国洋商米建威订约股开华美银行……此事流弊甚多，断不可行，现在交章论劾，众议沸腾，该督如果有与美商订约之事，著即行罢议。"[③] 于是，借款办银行之举只好遵旨停办，马相伯深为惋惜。他离美赴欧，游历了英、法等国。1892 年，他出任驻日本长崎领事、驻日使馆参赞等职。归国后，与弟建忠同寓居上海。当时梁启超也

①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 294 页。

③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46。

在上海，因跟从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由马氏兄弟引见“得遍交当时谈洋务之人士”，[①] 与马相伯交往甚厚，达到“几于无日不相见”[②]的程度。在此期间，马相伯还结识了北京天主教著名人士英敛之。

英敛之生平

英敛之（1867～1926年）名华，号安蹇斋主万松野人，生于北京西城，满族。幼时曾习武，后喜诗文。18岁时作第一首诗《贫病吟》。他自述说：“弱冠前后，交结多穷苦无聊辈，酒酣耳热，相与抵掌谈天下事。遇奸贪误国，豪暴虐民诸行为，未尝不发指眦裂，痛恨唾詈，为之结轖终宵也。”[②]19岁时看到汤若望著《主制群征》一书，自此对天主教发生浓厚兴趣。1888年，22岁的英敛之信奉了天主教。马相伯在《万松野人言善录》序言中说：“万松野人者与余同教，尤与道有宿契。自幼天性沉毅，独皇皇然以求道为己任：偏求之于三教，弗慊也；于耶稣新教终亦未慊。弱冠后，始得耶稣旧教之书而读之，读之既久且多，因多而疑、而问、而思、而辨、弗慊、弗信，信岂苟然已哉？”[③]可见他入教，不是盲从，而是经过一番苦心钻研，认真思考、比较和辨别，最后确定了自己的信仰。马相伯与英敛之相识后，两人对天主教内很多问题有共识，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爱国之举

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有关文教改革方面，梁启超请马相伯主持筹建

①②③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294、306、307页。

译学馆。他出面邀请传教士相助，拟设馆于上海，因戊戌政变突发而终止。是年冬，他与弟马建忠合著的《马氏文通》初版行世，马相伯爱弟才华，令独署其名。它以西洋文法，于中国“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被当时学者“推为古今特创之作”。[1] 翌年，马相伯全力投入翻译《新史合编直讲》一书。1900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以“启民智、宣民隐”[2] 为宗旨，马相伯力助其成。与马相伯相同，英敛之身上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大公报》筹建时，法国主教樊国梁向他转告法国公使也愿意入股，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深恐由于法国使馆的介入而受其牵掣，丧失其办报自主权。对于清末中国天主教会处于法国政治势力庇护之下的殖民主义色彩，英敛之也是愤懑和不平的。他说：“法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法，意、德等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意、德，……演出形迹，使其人竟如虎伥，使其教竟同菲薮”。[3] 作为天主教中之人，表明如此鲜明的态度，在当时可谓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他强调中国神父和教友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前岁比国被德残毁后，该国枢机主教某公，发出勉励国民书一篇，反覆比喻，谆谆以爱祖国为训，至理名言，无论有识无识，莫不痛感。至于我国宣教者，从未闻有提及爱国者，或有之，吾未闻也。岂圣教道理，独于中国教民，当使之爱外国乎”？[4] 其爱国之情浸透于字里行间，真是掷地有声。

---

① 《清史稿·马建忠传》。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307页。

③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81页。

④ 英敛之：《劝学罪言》。

教育兴国

马相伯早有创办中国新式大学的思想，并且是一位“教育富国”论者。1903年，他通过与天主教耶稣会协商，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了震旦大学，以实现其多年来的理想。震旦大学以“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1]作为办学宗旨，首届学生共20名，马相伯自任监院。他刊行了《拉丁文通》，“出以中国例证，一扫西人教拉丁文之弊。”[2] 编著了《致知浅说》、《法文关键》和《尺算征用》，翻译了《英法文通》等书。当时马君武、邵力子、于右任都是该校的学生。1905年，震旦大学的外籍教士趁马相伯生病之际，改变办学方针，迫使马相伯愤然离校，学生也集体退出震旦。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马相伯招集离校学生，与严复、袁希涛等另立复旦公学，两江总督周馥提供吴淞营地作为该校校址。马相伯自任校长，并教授法文。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立宪派组织政闻社。邀请马相伯出任总务员（相当于总理或总裁），他为此东渡日本，在神户、横滨、东京等处发表演讲，宣扬君主立宪的主张。不久，政闻社本部随同他从东京迁往上海，仍推举他主持社务。1908年3月，政闻社在上海召开披露会，到会的有上海各团体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马相伯发表重要演说，指出中国的病根，在于无民选议院监督政府。鼓吹“在未有民选议院以前，不可无政党以要求政府，以运动国民；既有民选议院以后，不可无政党以监督政府，以自当政局”。但政党有两种：“使其主义而为反对朝廷，排斥君主，是

[1] 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第363页。

[2]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295页。

之谓革命党；使其主义唯在取立法、司法、行政之三大机关而改造之，则为宪政党。”他披露，政闻社就是后面这种“主张宪政之团体也。”[①] 可见，政闻社的政治色彩是比较温和的。但即使这样，仍然为腐朽的清政府所不容。8月，清廷下旨查禁政闻社，说它“内多悖逆要犯”，“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谕令各地“严密查访，认真禁止”，[②] 政闻社只得解散。在此期间，复旦校长曾改由严复、夏敬观、高凤谦等人担任，1909年，马相伯复任复旦校长。翌年，任江苏谘议局议员。

中华民国成立后，马相伯出任江苏都督府外务司长，并曾一度代理江宁都督。是年8月北上，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10月至12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此时内蒙古喀喇沁王福晋及夫人爱新觉罗淑仲等人筹划在香山静宜园兴办女子学校，推举英敛之具体办理，马相伯给予了大力赞助。马相伯和英敛之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天主教在中国能够设立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培养教会的人才，以提高天主教人士的学术素养。同年9月，二人联名上书罗马教廷，建议在中国兴办大学。文中称：“乃在我华提倡学说，而开大学堂者，英、德、美之耶稣教人都有，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岂不痛哉！即以北京而论，我圣教不独无大学也，无中学也，并高等小学而无之，只有一法文小学，学费之巨，只可招教外人求学而已！学成之后，只可依法国人谋生而已！前清亦尝以京师大学托我传教士矣，讵竟辞不受，致使耶稣教人代之；由是该教生徒，自旧清已踣政府，于今更盛，而我教独见摒焉；非见摒也，盖来华传教士喜用学术诱掖者有几？只观在会与不在会之修道生，其肯遣往罗马攻书者有几？则其培养教友之存心，不愿追步利、南等可想。……倘我罗

① 《政闻社上海披露会纪事》，《政论》第4号。

②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93。

马圣教，不我遐弃，不终莫然置之于异教人之手，则亟望多遣当今博学良善而心谦者，广为师传。其奉遣之人，能不拘何国，不限在会，似更相宜。"[1]这封上书可看作以后倡建辅仁大学的先声。次年，英敛之在静园成立辅仁社，招收教中的子弟研究国学，有教中青年二十余人参加。马相伯及其好友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也时常来讲授经史百家之学，所拟的研究题目有：《太古中西同源考》、《唐景教碑考》、《元也里可温考》、《清四库总目评论教中先贤著述辨》等。辅仁社即辅仁大学的前身。马相伯还曾与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人筹设"函夏考文苑"，准备"网罗全国积学之士，校勘古籍，编纂词典，奖励著述，表彰硕德"，[2] 其宗旨与规模，类似研究院，但未办成。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开场锣鼓敲响后，一时尊孔复古浊浪翻滚。袁世凯在《大总统祭圣告令》中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宣称："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并企图尊孔教为国教。面对这股狂热的尊孔逆流，马相伯"乃益倡导宗教，屡为公开演说，痛切陈词。"[3]这一时期，他将搜求到的明末教会的名著《七克》、《明探理》、《利玛窦行迹》等，一一校阅刊行。他认为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没有沾染上19世纪盛行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思想，具有纯真的宗教感情，其著作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马相伯身上强烈的民族意识。对于当时要尊孔教为国教的一派言论，他"力言信仰自由之重要"，[4]加以反对。为了让国民更多地了解宪法真谛，他翻译了艾士萌的《宪法大全》。1918年，发表《民国民照心镜》三篇文章，洋洋数万言，详尽地阐述民国与民国国民的权利义务，表达了他主张立宪共和的思想。1920年冬他南归上海，

① 《辅仁生活》1939年第2期。

②③④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296、297页。

时年已 81 岁。但他“仍手不停笔，笔不辍书，所言皆斥军阀，反内讧，培养民德，促进民治，并主张行联邦制”,[1] 又重译了《福音》刊行。他一直热心教育事业，对启明、培根等校的兴办，皆倾囊相助。1925 年辅仁大学成立时，他亲译该校宣言书。1926 年，将旧稿《致知浅说》整理出版。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目睹国土的沦丧，痛感“国亡无日，非朝野一心，武力抵抗，无以自救”。[2]“乃日以人民自救告国人，委代表出席国难会议”,[3]积极参加救国工作，被尊为爱国老人。他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对不许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4] 主张实施民治，促进宪政，以纾国难，并发起中国民治促进会、不忍人会等。1937 年 3 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 10 月上海沦陷，他西迁桂林。次年冬，于右任请他移居昆明，他在赴昆途中因病暂留居谅山。1939 年 4 月，马相伯在病中度过百岁生日（虚岁），全国各大城市为他举行了遥祝会。国民党政府还颁布褒嘉令，祝贺他“寿登百龄”。[5]11 月 4 日，马相伯病逝于谅山。其著作经整理，大部分收入《马相伯先生文集》中。

马相伯好友英敛之于 1926 年 1 月 10 日去世，罗马教廷曾授予他圣大额我略骑尉爵位。他的著述除前述《万松野人言善录》外，还有《也是集》、《也是集续编》、《安蹇斋丛残稿》、《劝学罪言》、《覆友人驳劝学罪言书》、《敝帚千金》、《蹇斋剩墨》、《安蹇斋随笔》、《万松心画》等行世。

---

①③⑤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 297 页—298 页。

②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 227 页。

④ 转引自娄献阁：《马相伯》，见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第 364 页。

参考书目：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方豪：《马良》、《英华》，《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8。

娄献阁：《马相伯》，见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一卷，中华书局，1978。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9。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北京地区的教堂和传教士墓地

北京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
——房山景教十字寺

今日房山十字寺及传说

北京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房山景教十字寺，坐落在北京西南郊房山区周口店地区车厂村北面的猫耳峰三岔山下，距离北京市区100多华里，由车厂村到房山区的县城也有18华里之遥。因为房山景教十字寺位于偏远的西山猫耳峰三岔山下，所以交通极不方便。如果有专车的话，只需二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景教十字寺了。

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的所在，与位于房山区内的金代皇陵遗址仅隔一道山梁，越过十字寺东边的山梁就是金代皇陵的遗址。在景教十字寺的南面是闻名于世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十字寺与燕山石油化学工业区毗邻，地处猫耳峰下的一个小山凹中。十字寺三面环山，山坡上到处都是核桃树、柿子树、栗子树、梨树，茂密的果树成林。四周柏树绿荫覆盖，山涧小溪盘山而行，常年流水不断。在车厂村村东头山涧旁有一条上山的羊肠小路可直达景教十字寺，这条曲折的羊肠小山路也是上山的惟一道路，沿着羊

肠小道走三里多山路，走到羊肠小路的尽头便可看见景教十字寺的山门。在山路的东面山坡上有一片塔林，20多座小白塔零落地坐落在半山坡上，其中一座高大的白塔最为引人瞩目；在山路西面的山坡上有一座红塔与白塔遥遥相对。穿过一片柏树林，景教十字寺的山门才展现面前，十字寺后面的三座白塔亦映人眼帘。金灿灿的山菊花开满了山，房山景教十字寺被山菊花装点得令人心旷神怡，置身于山野之中别有一番情趣。

房山景教十字寺因为历经沧桑，年久失修，所以寺内的礼拜堂、殿宇已经全部毁坏，荡然无存。惟一可见的是那残破的十字寺殿宇的地基。不过由地基还可以辨认出十字寺原来的概貌，看得出当年的景教十字寺有二排坐北朝南的殿宇。依地基可辨认出当年的十字寺每排有三间殿宇，二排殿宇相隔近10米左右。靠北面的殿宇是正殿，因为其地基比前面的殿宇地基略大些。由残存的地基可看出景教十字寺的东西两面各有配殿四间，与二排殿宇恰好组合成一座严谨的四合院。距前排殿宇约三米多处即是山门，山门外有一影壁。影壁正好对着上山的小路，把清净的十字寺与羊肠小路上的行人隔离开。

据当地居民讲，景教十字寺在民国年间还是完好无损的，十字寺内的殿宇是在民国28年（1939年）遭到破坏的，当年突降大雨，十字寺的殿宇被大雨冲塌了一间，因为事情来得突然，还吓死了一个种地的雇工。民国年间房山景教十字寺“由僧人龙海售与民人张云浦为私产，张氏改为山庄”。[1]十字寺殿宇被冲塌后，整个殿宇便被寺主张云甫拆毁变卖了。据说这位张云甫（当地居民称其为张恩浦）因此发了横财，仅由殿宇拆下的楠木柁就赚了不少的钱。走出十字寺的山门，至今依然可以看见的是在十字寺的前面有两个小池，山上的泉水被引人池中；泉水流经水池后，再

---

① 《燕京学报》第10期，民国20年7月至12月国内学术消息。

顺着山涧小溪流下山去。十字寺恰好坐落在这山清水秀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整个十字寺殿宇的地基基本没动，如果恢复十字寺的原貌是有条件的。遗憾的是繁盛一时的十字寺经不住历史长河的洗礼，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当年的十字寺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与十字寺共患难的古银杏树却依然枝繁叶茂，风姿卓卓，好像在向世人述说着景教十字寺的沧桑。据专家考证，这棵高 30 多米、树围 5. 24 米的古银杏树是元世祖中统年间所栽种的，至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了。如今这棵古老的银杏树依然挺立在正殿地基的前面。由殿宇的地基可以看得出来，原来正殿的殿门，恰好在这棵古老的高 30 多米的银杏树与一棵只有 3 米多高的小银杏树的中间。

关于十字寺内的银杏树还有一段美妙的传说。当地百姓们相传，景教十字寺内的两棵一雌一雄银杏树原为一对生死相恋的男女青年所变。男的叫银生，女的叫杏儿，为了抗婚双双跳下了山崖。但是村里的人们都说他们没有死，而是变成了两棵银杏树仍然活在人间。遗憾的是那棵常年果实累累的雌银杏树，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枯死。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年的秋天，一伙年轻人在十字寺内看秋，一时兴起捉拿树上的松鼠，为薰松鼠出洞，便在雌银杏树的树洞中点起火来，结果将果实累累的雌银杏树给活活的烧死了。也许杏儿姑娘实在舍不得离开她的银生哥，如今在死去的那棵雌银杏树的地方又长出了一棵银杏树，那棵已经有 3 米多高的小银杏树正偎依在那棵古老的雄银杏树旁。车厂村的百姓都盼望着那棵小银杏树是雌银杏树的复生，盼望着杏儿姑娘能与她的银生哥永远相伴在人间。如今这两棵枝繁叶茂的银杏树，似乎在给残破的景教十字寺看家护院，盼望着十字寺和银杏树一样复生。

十字寺内与银杏树常年相伴的，除了残破的寺庙外，还有那每年金秋时节必开的野菊花。秋高气爽时节山菊花一开，十字寺

内外和三岔山上顿时变成了金黄的海洋、菊花的香气不仅怡人，而且醉人。野菊花异香亮丽，引得蜂飞蝶舞。山里人传说，这野菊花是爱慕十字寺景教修士列班·扫马的黄菊花姑娘变的。据当地百姓们讲，在元朝年间一个深秋时节，景教修士列班·扫马上三岔山采药时，曾将奄奄一息的黄菊花姑娘救活，背回了十字寺中，将这位无家可归的姑娘收留了下来。日久天长，黄菊花对救命的列班·扫马修士产生了爱慕之情，遭到列班·扫马修士的回绝后竟用刀割腕以死相许。菊花姑娘殷红的鲜血一滴连着一滴，从十字寺一直向三岔山洒去……，鲜血流淌之处，陡然生出一丛丛野菊花来。青翠的枝叶，簇拥着金灿灿的菊花。十字寺内不仅到处都是山菊花，而且还有名贵的百合。栽种在十字寺药园内的百合和野菊花一样，也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十字寺内药园的百合，是由一株被寺内主持人救活的百合繁衍下来的。后来三岔山连年干旱，颗粒无收，车厂村的人只得外出乞讨。十字寺的主持人仍然留守寺庙不肯出山，饿得皮包着骨头。有一天主持人突然饿晕了过去，朦胧中见一少女飘然而至，对主持人说："百合根茎洁白似蒜瓣，可药用，也可食用，在这荒年难月，何不用来充饥，以度难关。"主持人因食百合而度过了难关，他无限感慨地说，百合花儿也有情。如今三岔山里仍然有野生的百合。十字寺的药园内，除了种植百合外，还有能止血、化淤、消肿的山漆（三七）和能养生补气的黄精等多种药材。这些药材都是由精通医术、善识山中草药的景教传教士引种的，景教传教士常常用它们为附近的老百姓治病。

房山景教十字寺所在地实在是太美了，不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美丽动听的故事，就连这三岔山的水也有着神奇的传说。这传说和景教十字寺列班·扫马修士仍然息息相关，在车厂村地区几乎人人都会述说这段神奇的故事。相传在元朝时候，畏兀儿族的景教修士列班·扫马由汗八里（元大都）来到了房山县车厂村

北面一个群山环绕的猫耳峰山的小山凹中，想找一处幽静的地方过静修的生活。列班·扫马修士在山凹中发现了一座破败不堪的佛教寺庙，已经无人居住和经营。寺庙坐北朝南、向阳背风，四周花草繁茂，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令人遗憾的是寺庙附近没有水，列班·扫马修士正思忖着如何把山上的水引到寺庙来的时候，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来到面前讨饭。列班·扫马修士出于博爱之心，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取出奉献给老人享用。老人见列班·扫马修士心地善良，便带着列班·扫马修士向猫耳峰山顶走去。一路上，乱石峥嵘，荆棘抡掠，艰难攀登，大汗淋漓地来到山顶的乱石沟中。只见老人用手在一块大青石上连划了三个直径为二米左右的圆圈，接连吹了三口气，霎时间山顶上冒出三个水盆。涓涓泉水从水盆中向外流淌，一直流到寺庙的门前。老人告诉列班·扫马修士说："一盆水用来洗浴，一盆水用于浇地，一盆水可食用。"由于得到老人的帮助，列班·扫马修士决心在三盆山猫耳峰下破败不堪的佛教寺庙的旧址上建立景教十字寺。车厂村的传说件件与景教十字寺的创始人列班·扫马修士有关，由此可见这位景教传教士其影响之大。

十字寺的历史遗存

值得庆幸的是，房山景教十字寺内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两通汉白玉石碑。石碑上的图案和文字依然清晰可见。这两通石碑，一通是辽朝时期的石碑，一通是元朝时期的石碑。辽碑碑高 204 公分，宽 91 公分，厚 20 公分。元碑碑高 307 公分，宽 92 公分，厚 20 公分。这两通石碑都是明朝嘉靖年间重新雕刻而重立，两通石碑记载着房山景教十字寺的历史。

正文：

大都崇圣院碑记

朝奉郎守司农少卿范阳郡开　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王鸣凤撰

涿州学　廪膳生员卢进达书

大觉垂慈，圣人利物，是故发源，西国则优，填创其始，移教东域，则汉明肇其初，导四生于宝所，运三有于大乘。巧使现权之教，以救未来蒙迷。时有范阳僧人惠诚，俗性张，母孙氏，岁礼惠华寺玉藏主为师，授以天台止观。携锡纵游，经过此处地名三盆山崇圣院，见其山名水秀，地杰人丰，林树郁茂，果株滋荣。殿宇颓毁，古迹犹存石幢一座，乃晋唐之兴修，实往代之遗迹。惟见一僧，耆年老迈病患相，仍叹之不已，嗟之不息。遂乃发心募化众缘，郡公王希道、张仲剑、肖名远、杨从实等同发诚心，各舍己资，于大辽应历二年戊辰岁三月内兴工，应历八年甲戌岁八月中秋，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佛，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三堂，两廊僧舍二楹，钟鼓二楼，晨昏梵呗，用宣佛化，引导群迷。上祝皇王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今则殿宇一新，金壁灿烂，山门廊庑具已克备，厥此真石为千石之丛林，万代不磨者矣，是为记，铭曰：应历年间重建，多亏众信施财，殿宇金壁文辉，圣容灿烂争鲜，钟声朗朗响山川，鼓韵咚咚霄汉，碑石万劫不磨，芙名古代留传，人人瞻礼福无边，鹫峰灵境不换。

大辽应历十年丙子岁四月吉日立碑：

生持惠诚同徒清良、清真、清宝、清实、清江、清彤。徒孙净堂、净受、净铎、净海。

坛越芳名，王希道李氏，张仲剑刘氏，肖名远郝氏，杨从实卢氏，李伯通韩氏，刘字翼邵氏，郝少达钱氏，卢

进学崔氏，王古文盛氏，田福通康氏，崔福铭乐氏，史永成高氏。

镌字石匠段得聪

碑阴刻有：

东晋建武元年丁丑岁二月上旬，僧人慧净开创，结庐精修，净业

弘展参究，终于宁康二年甲戌岁，无疾忽睹金莲三圣来迎。异香满室，奄然而逝。

大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岁僧人义端来往此山，修饰院宇，专意禅。咸庆五年庚申岁重阳日，别众坐脱而化。帝代有僧，未显其名，难以具述，照依碑中前文，留书碑阴，语为后者矣。

大明嘉靖十四年乙未岁二月吉日重立

僧人德景同徒住持元实同立。

碑镌字匠张宝

元碑碑文

碑额顶端圆球内刻有十字，左右各有一条龙。正中刻有“敕赐十字寺碑记”。

正文：

大元敕赐十字寺碑记

翰林院讲学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经筵黄　撰

翰林学士资善大夫和知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谕德，李好文书

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兼国子祭酒　赵其颐篆

盖闻大圣应迹有感，必形荫覆十方，化周三界，是四生之导首，乃六趣之航航，惠日既明，光清入狱、立功化，惠照含生，敷演一音，名随频，解像教攸兴，其

来久矣，有斯利益，是以修大都城西百里有余地名三盆山崇圣院。实晋唐之遗迹，乃大辽三修营，已经多载，兵火焚荡，僧难居止。见有碑幢二座。时有僧静善，原系大兴县巨族名家，俗姓范，髫年祝发礼昊天寺禧讲主为师，誓修禅观。时逢夏末，前谒此山，住僧欢迎，话谈良久，天色将曛，临幢独坐，面睹一神，绿服金铠，青巾皂履，赤面长须，历声而言，和尚好住此山，吾当护持，言毕隧隐。后见古幢十字重重发光。欣然起左，偶成一偈：特来游此山，定中遇神言，十字发现，此地有大缘。敬发誓言愿成精兰，遂回都城往谒淮王铁木儿不花，赵伯彦不花，丞相庆童，寺被言定中现神发光应验古刹事迹，共言罕有。各捐已资，于大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岁八月内，陆续营办木植砖瓦灰石等件，至正二十三年祭卯岁起立大殿五间，中塑三净身佛十八罗汉，壁绘二十诸天四王殿宇，东西伽篮祖师二堂，钟鼓二楼，两楹僧舍，庖厨山门，中立石碑一统，圣事已完，淮王铁木儿不花举奏请圣恩，敕赐十字寺，慈云遍于大千，法雨均诸品汇不尽功德，专为上祝：皇王寿延万岁，祈营摭千载安康，四夷拱手归降，八方黎乐业，永为万代龟鉴者矣。

大元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岁正月吉月立碑，

住持净善同徒文惠、文迪、文聪、文胜。

徒孙从湛、从晓、从敏、从献、从爱、从明。

大功德主淮王铁木儿不花、赵伯彦不花、丞相庆童、察汗铁木儿不花、哈喇不花、脱脱不花、观音奴不花、普贤奴不花、……

邻山近处坛越芳名信士王廷梁氏……

大功德主锦衣卫指挥高荣太夫人左氏……

碑阴额“万古流芳”

碑文：[1]

夫此碑者经代深远，雨霖日曝风吹字尽模湖，难以辨认，是以抄写前文，磨洗镌刻 观视，以为明鉴者矣。

大明嘉靖十四年乙未岁二月吉日重立碑

僧人德景同徒住持园实、园茂、园玺、园安、园朗、园观、园成，徒孙悟琪、悟学、悟时、悟春、悟秀、悟进、悟达、悟逊、悟远、悟祥、悟存。

首座

在石碑附近，还发现了十字寺遗存的汉白玉雕刻的龟蚨石二个，石柱础四个，每一个柱础边长为78公分，直径为54公分，柱高20公分。在柱础上雕刻着精美的葵花图案，葵花图案的花纹仍然清晰可见，花盘平整没有划痕，在花盘周围雕刻有16个花瓣，每片花瓣上都雕刻着团状云纹。在石碑旁边，还发现了一个直径为48公分的圆柱基石。经专家鉴定，现由南京博物馆收藏的两块景教十字石刻，是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正殿东南和西北角的两块抱柱基石。两块抱柱基石的上方雕刻着十字架，其中一块下面雕刻着叙利亚文字。据专家鉴定为：“仰望他，寄希望于他”之意。[2]

十字寺的建置沿革

由辽代石碑和元代石碑的碑文可以看出，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是在佛教寺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此佛寺始建于东晋建武年间，最初是由东晋僧人慧净在建武元年丁丑岁（317年）二月上旬

---

① 碑文引自于新粒主编：《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第36—39页（内部发行）。

② 《南京博物馆珍藏》，第78页。

开创的。寺庙建成后一直由慧净和尚主持。慧净和尚在三盆山寺庙修道，无疾奄然而逝。据传临终前慧净和尚“忽睹金莲三圣来迎，异香满室”。房山三盆山寺到了唐朝初期已经十分破旧，在贞观十二年戊戌（638年）年间，经僧人义瑞重新修建后，三盆山寺庙庙宇焕然一新，再度辉煌。后经晋唐，又逢五代战乱，便无人修整。一直到契丹人进驻北京下令重整寺庙后，北京房山三盆山寺才被再次重建。在辽代应历年间，范阳僧人惠诚来到三盆山，将寺庙重新修建。惠诚僧人不仅修好了寺庙，而且还立了碑。碑文记载了惠诚与众僧人，以及寺庙的佛教信徒捐资修建寺庙、安放佛像的经过，记载了当年三盆山寺庙殿宇金碧交辉，一尊尊佛像圣容灿烂争鲜，诵经声响彻山川的盛况。自唐朝以来，三盆山寺一直是佛教的圣地，是佛教僧人主持的佛教寺庙。

13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后，元大都成为世界文化、贸易的中心。元朝皇帝对中国和外来的各种宗教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基督教随着蒙元帝国的建立而传入了北京。北京房山三盆山的佛教寺庙才变成了外国传教士静修的地方，十字寺才成为景教——基督教修士及信徒的礼拜堂，改称崇圣院。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基督教早在唐朝贞观年间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了中国，当时中国人称其为景教或聂斯托利教。景教在中国曾昌盛一时，到唐朝高宗年间，已经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①] 但是到了845年（唐会昌五年），唐朝武宗诏令灭法毁寺，此举也波及到大秦景教和袄教等教。景教传教士被勒令回原籍，从此景教在唐朝流传了近二百多年后，在中原地区销声匿迹了。不过在鞭长莫及的中国西北边陲，仍然有景教在流传。直到1215年蒙古军队攻克金中都后，景教再度传入北京。

基督教在元朝时被称为也里可温教，这是蒙古语对基督教的

① 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第30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称谓。蒙古语称“信福音之人”、“有缘人”和“福分人”为也里可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北京已经是基督教的一个大主教区，当时元大都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多，基督教在皇宫里有不少皇室信徒，元宪宗孟哥和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都是基督教信徒。基督教大总管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比他年长的同事列班·扫马都出生在中国北京。列班·扫马是畏兀儿族人。父昔班，当过教会视察员。列班·扫马自幼受宗教教育，长大成人以后做了汗八里教堂的司事，30 岁时由汗八里著名的基督教神父马·吉沃吉斯（Mar Giwargis，即 George）大主教给他举行削发仪式，正式做了一名景教修士。7 年之后，列班·扫马离开主教，独自一人来到了距离汗八里一日路程的深山过静修生活。“那里有一山洞，紧靠洞旁有一清泉”。列班·扫马安然居此。列班·扫马静修的地方，据载距离元大都有一天的路程，而且山上有一个山洞，紧靠山洞还有一股清泉等情况，这与北京房山三盆山猫耳峰景教十字寺的地理形势极为相似。[①] 列班·扫马选择了“山清水秀，地杰人丰，林树郁茂，果树滋荣”之地为静修的地方，这里不仅环境优美，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座古老的寺庙没有人居住，正好作为他与信徒讲道和静修之所。元朝时候北京房山车厂村三盆山上的寺庙，从列班·扫马居住后便成为景教十字寺了。元朝石碑碑文记载：“解像教攸兴，其来久矣，有斯利益，是以修崇都城西百里有余地名三盆山崇圣寺。碑文中所说的解像教，无疑是指不崇拜偶像的景教而言”。[②] 列班·扫马重新修整了寺庙，为寺庙取名崇圣寺。他在这座寺院居住了 19 年，静修收徒，传播景教。约在 1275 年（至元十二年），列班·扫马赴耶路撒冷朝圣，后应伊利汗国阿鲁汗之

①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 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 4 章，第 108--146 页，中华书局，1984。

② 于新粒主编：《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第 39 页（内部发行）。

命，出使罗马教廷和英、法等国，自此再也没有返回北京，后在叙利亚逝世。在北京的景教信徒为了纪念列班·扫马修士，不但重新修建了景教十字寺，而且还由黄晋与李好文二人撰写了碑文，记述了景教业绩和崇圣寺建立的经过。

如前辽代与元代两通石碑碑文所述，碑文皆为明朝嘉靖年间重新篆刻，故碑文难免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因为明朝建立以后，基督教再次随着蒙古帝国的失败而销声匿迹，究其原因恐怕与基督教在元朝过于依附元朝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元朝的基督教信徒多为蒙古贵族和色目人，没有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自元朝灭亡以后，一直到明朝末年利玛窦进驻北京之前，基督教在北京也就湮灭无闻了。由于明朝自建立初期便崇尚佛教，基督教传教士随着蒙元帝国的败北又全部由北京撤离回国，房山三岔山崇圣寺没有景教修士信徒经营，所以三岔山景教十字寺自然又变成了佛教的寺庙。也许迫于当时明朝统治的形势，不得不将原来石碑的碑文进行修改以适应当时的形势，极力说明十字寺一直就是佛教的寺庙，没有被基督教信徒改建过，与景教无关。岂不知历史就是历史，无论如何掩饰，也难以自圆其说，掩盖历史的真相。十字寺遗存的石碑和两块十字架石刻就是历史的见证，它们好像在向人们诉述着十字寺在元朝时候是基督教静修和讲道的场所。从辽代石碑碑文“大觉垂慈，圣人利物，是故发源，西国则优，填创其始，移教东城，则汉明肇其初，导四生与宝所，运三有与大乘，巧使现权之教，以救未来蒙迷”[①] 可以看出，有些景教信徒虽然不敢公开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他们的心中仍然保持着对基督教的坚定不移的信仰。虽然被迫将崇圣寺又改回佛教的寺庙，但是他们要“巧使现权之教，以救未来蒙迷”。也就是说他们要利用佛教的形式，继续保持基督教的信仰与传统，等待时机重

① 于新粒主编：《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第36页（内部发行）。

新恢复基督教，使十字寺变成当年景教静修与讲道场所。并巧使机关，借神明显圣、皇帝敕赐之名，将崇圣寺改为十字寺，不仅保住了元朝石碑顶端的十字，而且还将带有叙利亚文字的“仰望他，寄希望于他”的两块十字石刻，砌在了殿宇的墙内，借以提醒众人这里曾经是景教寺庙，景教信徒不要忘记自己是景教的信徒。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北京房山车厂村三盆山猫耳峰十字寺的遗址已成为中西文化彼此互相交流的历史见证。

北京市房山车厂村三盆山景教十字寺的遗址，是全国唯一的一处有遗址、有十字碑刻、有文献记载、有古老的银杏树等文物和很高宗教价值的景教遗址，因而愈来愈引起国内外专家与学者的关注。自 1919 年房山景教十字寺的碑文与“古刹十字寺碑林”匾额被发现以来，已经有无数有关人士前来考察，从各个方面表示关注。如今房山景教十字寺已经成为北京市房山区区级保护单位。景教十字寺所在的周口店区和车厂村，为保护景教十字寺遗址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和人力。据悉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保护景教十字寺遗址已经投入了 15 万元人民币，用于修筑十字寺的围墙、修筑通往景教十字寺遗址的公路和复建景教十字寺博物馆。最后，让我们衷心地祝愿北京景教十字寺博物馆早日建成。

(本文所用资料系于新粒牧师提供)

参考书目：

(英) 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

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

于新粒主编：《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内部发行)。

北京最大的基督教教堂
——崇文门教堂

教堂的建置沿革

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教堂，又称亚斯立教堂，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内大街后沟胡同丁2号，对面就是以眼科而闻名于世的北京同仁医院，正南面是哈德门饭店，西南面是崇文门和新侨饭店。这里是个比较繁华的地方。

崇文门教堂是北京城南最大的一座基督教教堂。教堂的大门是红漆的，上面有圆拱，左右刻有精制的雕花。大门右侧的牌子上写有金底黑字：

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它的下方是一块英文牌子：BEIJING CHRISTIAN CHONG WEN MEN CHURCH。右下方镶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上写绿字：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亚斯立堂　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布　北京市文物管理局一九九零年十月立。

教堂的人口处是传达室，它的北面是一排平房，依次是牧师住所、教会事务室、售书室、接待室、静祷室及教会办公室。院墙南端有四个橱窗，从西到东依次是：崇文门教堂每周各次定例聚会时间表、各次圣餐时间表、广告栏及感谢信。院内有两棵粗大的槐树，据教友说它们大概有百年的历史了。

崇文门教堂也是北京市现存的最大的一座基督教新教教堂，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声誉。崇文门教堂的建筑风格别具特色，教

堂呈瓦灰色，庄严古朴，塔楼上加以锥形尖塔，上面竖着一面金色的十字架，将观者的视线引向天空，在强烈的对比之下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基督教的神圣，耶稣的圣洁。

崇文门教堂占地面积为8246平方米，教堂内又分为正、副两堂。正、副两堂的屋顶上都建有天窗，便于空气流通。还建有地下室，当教堂内没有座位时教徒可以到地下室进行宗教活动。

正堂设有800多个座位。中间有可以上下活动的闸板相隔，可以分开也可以联用。

崇文门教堂内部全部为木质结构，整体呈半扇形。建筑风格独具特色，新颖别致，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1990年2月23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崇文门教堂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崇文门教堂的外观不像天主教堂那样豪华气派，它的内部装饰也不像天主教堂那样高大华丽。它的外部样式很一般，堂内也十分简朴，圣台上只挂了一个十字架。这大概是因为基督教不注重形式，而更注重内心信奉基督。正堂的圣台上写着以马内利四个红字，圣台左侧写着：

今日经文Lessons For Today

路1：26—56

CK

歌诗 75 76 85

HY mns

圣台右侧是一个立式的大空调，座位上方有三个吊扇，使教友们在夏天进行宗教活动时比较凉爽。堂内四周墙上共有38盏兰花型的壁灯，还有16盏日光灯，窗户有大小27个，以便使堂内能够射入较多的光线。这些窗户造型各异，很有特色。四周墙上还挂着8幅油画，上面分别画的是圣经故事、圣诞树、葡萄、风铃等。

副堂的入口处右侧是一个电视，左侧是一个褐色的奉献箱，它的后面是一个立式空调。堂内为木地板，折叠椅。圣台上方写着

以马内利四个金字，圣台右侧是电视、风琴及扩音设备。副堂有10个日光灯和29盏壁灯，四周墙上有6幅油画，分别画着圣经故事、花卉和风景。座位上方的柱子上分别有两个电视，座位后面有三个立式空调和很多暖气片，使教友在冬天进行宗教活动时不会感到寒冷。

崇文门教堂始建1870年，她是由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乃至于在整个华北所建立的第一所礼拜堂。

卫理公会是基督教的一大宗派。由于这个宗教流派是英国人约翰·卫斯理创建的，又称为卫斯理宗。

1869年美国传教士卫维廉、刘海澜、达志瑞、李安德等人来到北京。为了便于在北京开展传教活动，1870年由美国美以美会拨款（美以美会是卫理公会在美国的一派，其他两派为美普会和监理会，1939年三派合并，在中国译为卫理公会）在崇文门内孝顺（小顺）胡同购买了一处房产作为会址，称美以美会布道年议会。

同年在美以美会布道年议会的会址上建立起亚斯立堂，即崇文门教堂。当时华北年议会也设在崇文门教堂内，下设6个连环，管理北京城里的牧区堂会和北京远郊区县以及河北省部分的牧区堂会。崇文门教堂建成后不久，美以美会也向北京派遣了一些女传教士。据统计，到1872年在北京有11位女传教士。为此，在布道年议会里设立了女传道部。随着女传教士的增多，1893年又成立了美以美会女年议会。在女传教士当中，有不少兼做医生、护士和教师。

崇文门教堂最初建成时在崇文大街红叶服装店的地方，后来迁到现址，外观和现在基本一样，只是规模比较小，仅能容纳四五百人聚会。

随着教会信徒人数的不断增加，参加礼拜的男女信徒越来越多，教堂渐成无法容纳之势。1880年，卫理公会决定在崇文门教

堂的原址上进行扩建。新堂在两年后，即于1882年正式落成。新堂基本上保持了初建时的原貌，只是比旧堂大了许多。

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外国传教士集中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当时的传教士不仅组织有2000多名信徒构筑工事，抗击义和团。有的传教士还充当炮手，对义和团进行血腥镇压。美以美会的贾非力牧师甚至担任炮台主任。一些传教士如宝复礼牧师还充当八国联军的情报官，英国远征军司令情报处曾颁给他如下的委任状：

命令 1900年7月20日 天津

委任状 第102号

自本月20日起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

此证

英国远征军司令情报处

诺利（签字）[1]

宝复礼后来在《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中写到："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虏（义和团）……敢于逃跑的就立即枪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这些俘虏，把所知道的情报汇报给情报处……"

他还回忆起自已为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所出的主意说："我认为他们从永定门打进城里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要使英军多走3英哩路，这将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坚固得多，我建议从沙窝门（即广渠门）打进城去，我的意见被采纳了。……"[2] 由此可见当时一些外国传教士确实充当了八国联军的急先锋。

1900年夏在义和团运动中，崇文门教堂被一场大火焚毁。八

---

① 王毓华：《北京基督教史简编》，第17页。

② 王毓华：《北京基督教史简编》，第17～18页。

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美以美会趁机强占地盘。他们不仅抢占了清宗室英宅府院、太山行宫、真武庙、关帝庙，还强买附近的民房。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900多户居民被迫搬迁。他们甚至派一些信教学生去占据孝顺胡同的一所民房。就这样，崇文门内城根下银线胡同、2/3的船板胡同、3/4的孝顺胡同被占，面积达268亩之多。1902年，迫使清政府拨款在这里重新修建崇文门教堂，还盖起办公楼、汇文书院、校舍和大片传教士的住宅楼区，以及卫理公会北京神学院、两所中学及一所妇婴医院。从此以后，卫理公会在北京的势力范围以东南城为主。

新崇文门教堂在1904年建成，即是今天的崇文门教堂。这座教堂迄今已经有94年的历史了。

按照卫理公会组织法规定，亚斯立堂有主任牧师，在他之上还有牧师议会，又称布道会。

崇文门教堂从建立之初的1870年至1904年，主任牧师都是由外国人担任。从1904年新堂建成之后主任牧师才开始由中国人担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1897年至1909年，崇文门教堂在中国牧师陈维屏和刘广庆任职时曾经筹划自养。1909年，刘芳任崇文门教堂主任牧师时，由于信徒捐款较多，成为自养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多见的。

1949年建国初期，牧师议会主席由北京教区区长李连颖兼任，郑汝冈任崇文门教堂主任牧师。

当时的崇文门教堂除了拥有教堂及办公室、牧师住处外（在崇文门大街后沟胡同二号、三号），另外还有孝顺胡同1～2号房产，崇文门内大街43号银丝胡同、2/3的船板胡同及三块坟地：两处在安定门外，一处在崇文门外的白桥。占地总面积达268亩。

孝顺胡同1～2号原来是“美国海军青年会”会所，(Navy'Y)，于1945年改名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青年会”。

1947年秋，美国大使馆把这个会所赠给了北京卫理公会，

1948年春改名为“德瑞园”，这是为了纪念第一任中国牧师德瑞。“德瑞园”常年举办许多青年活动，如团契会、诗歌会、查经班、主日学、晚祷会和读书座谈会。到德瑞园参加活动的除了崇文门堂的信徒以外，还有卫理公会各堂的信徒，以及附近的慕贞女中、汇文中学的学生，妇婴医院、同仁医院、仁光护校的医生、护士。

美国卫理公会不仅在崇文门建立教堂，传播基督教，而且还兴办了一些幼儿园、学校及医院等公共卫生事业，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

随着传教士的大量到来，信徒的增多，以及教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卫理公会在崇文门教堂附近先后成立了同仁医院、妇婴医院、汇文小学、汇文中学、汇文幼儿园、慕贞女中、仁光护士学校及汇文大学（后来合并于燕京大学）、汇文神学院（后来改名为北京神学院）。

新中国建立初期，美国卫理公会主办的医院、学校等都由政府收回，改为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1958年夏，北京市各宗派在新堂进行联合礼拜，崇文门教堂也因此暂时停止使用。教堂及附属房屋给了北京市第十三女子中学（原为慕贞女中，后改为北京市第一二五中学），崇文门教堂也被用做了学校的礼堂。

从1966年8月21日开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全国各地的宗教活动都被迫停止。崇文门教堂也被占用，教堂内的各种宗教设施也遭到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逐步落实了宗教政策。1982年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多方的交涉，将崇文门教堂归还给教会。从1982年6月起，北京市人民政府拨款对崇文门教堂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正式改名为北京基督教教会崇文门堂。修葺一新的崇文门教堂于1982年12月20日举行开堂典礼，同年圣诞节重新恢复宗教活动。

“基督将军”冯玉祥与崇文门教堂

杰出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1882－1948年），因为信奉基督教，被称作“基督将军”。他就是在崇文门教堂受洗，皈依了基督教。

据说1900年，冯玉祥在保定当兵，一天身患恶疮，用了好几副中药都不见效，后来在教会办的医院治好了病。他问医生需要交多少钱，医院说：“不用交钱了，但愿你知道上帝仁慈，特派我来给你治病。”冯玉祥听后深受感动。

1911年，冯玉祥刚刚30岁就担任了北京近卫军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当时美国传教士穆得博士来北京传播圣经，冯玉祥经常去听讲。他被圣经中的故事所吸引，决心皈依基督教。

以后，冯玉祥经常到崇文门教堂去做礼拜，听教堂的主任牧师兼北京教区区长刘芳牧师讲道。散会后，他常常和刘牧师谈话。以后，冯玉祥就在崇文门教堂受洗，皈依了基督教。在他的影响下，身边的几位军官也信奉了基督教。从此，人们经常能看到冯玉祥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些军官到崇文门教堂去做礼拜。

1918年，冯玉祥奉命调离北京，前往湖南常德驻防。他还给刘芳牧师拍电报，让刘牧师去常德给部队官兵们讲道。讲道后，刘芳牧师为一百多名官兵施洗。当时的常德县知事薛笃弼，也跟着受洗入教。

1922年，冯玉祥调回北京驻防。他发起成立了北京基督徒祈祷会，宗旨是爱国救国。北京的一些名流王庞惠、颜惠庆、王延廷、余日章（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和孙中山的秘书徐谦等，都参加了祈祷会，他们开会的地方，经常就在刘芳牧师的家里。

刘芳牧师同冯玉祥将军的关系十分密切，曾经担任过冯玉祥

的不受薪顾问。1924年2月，在冯玉祥将军的邀请下，刘芳牧师曾到通州，为其部下张之江旅长一本烫金书的《新旧约圣经》题字，并为1000多名官兵施洗。同年3月，刘芳牧师又在北京为冯玉祥将军的5000多名官兵施洗。因为受洗的人太多，施洗的牧师就有十几个人。

由于冯玉祥将军奉教非常虔诚，又刻苦研习圣经，同年3月下旬，刘芳牧师邀请他到崇文门教堂讲道。消息一传开，人们蜂拥而至，想亲眼目睹他的风采。从那时起，冯玉祥将军就有了一个别称——“基督将军”。

冯玉祥及其几千名部下成为基督教徒后，为了便于做礼拜，冯玉祥就在他的部队中建立了一个教堂。这样，官兵们可以不出营房就做礼拜，听牧师讲道。冯玉祥鼓励其他官兵们奉教受洗。大批的官兵受洗后，部队纪律更加严明，没有一人吸烟、饮酒、赌博。冯玉祥将军常常为士兵们购买圣经，真道问答等书。冯玉祥将军还亲自编写了一本军人问答书，书中多次引用经训。冯玉祥将军用基督教的某些精神治理军队据说颇为奏效。

1923年冯玉祥的妻子病故，后经人介绍，与燕京大学毕业、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小姐相识。1924年3月，冯玉祥将军与李德全在崇文门教堂举行了婚礼。教堂的主任牧师兼北京教区长刘芳牧师就是他们的证婚人。

崇文门教堂的现状

1982年底，崇文门教堂重新恢复了宗教活动。许多中外信徒经常到崇文门教堂进行礼拜等宗教活动。

美国前总统布什70年代中期到中国就在崇文门教堂进行礼拜。他的小女儿也在这里受过洗。1998年夏，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也在这里进行礼拜。他还和主任牧师石泽生和一些年轻的

牧师促膝长谈。

由于崇文门教堂地处城南，来这里进行礼拜的大多是附近的教徒。在星期天，通常有3000多名教徒参加宗教活动。

现在崇文门教堂有8位牧师，其中6位是年轻人，他们都是神学院的毕业生。

崇文门教堂的经费一般由信徒奉献。一些年轻的牧师也可以去国外短期学习、交流。

崇文门教堂的宗教活动安排得比较紧张：周二和周五来的教徒最多，外宾在星期日最多。崇文门教堂在圣诞节这一天最热闹。一般在每年的12月25日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有时从凌晨就已经开始了。除崇拜活动之外，还在教堂内演出圣诞剧，举行庆祝音乐会，演唱圣诞颂歌。

由于工作突出，崇文门教堂在1988年、1997年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第三次、第五次宗教界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先进集体。

崇文门教堂多次组织本堂信徒进行赈灾活动，笔者于1997年底在参观崇文门教堂时看到有不少信徒为宽街教堂（因平安大街改建拆迁城外）祈祷、捐款。1998年秋，笔者在崇文门教堂南墙的玻璃橱窗当中发现了一封粉红色的感谢信，上面写到：

“崇文门教堂：

今年6月以来，湖南、湖北等省市区遭受了特大洪水灾害，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害。目前灾区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正在积极抗洪抢险。灾区的情况牵动了您的心，您的慷慨解囊，捧出了一片赤诚心，体现出火一样的同胞情。您以实际行动为党分忧，为灾区人民解囊，弘扬了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您的行动给灾区人民带去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此谨代表东城区委、区政府及灾区

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您的捐赠我们将及时全部转交给灾区人民。

顺致

崇高敬意！

东城区接收站

1998年8月11日”

崇文门教堂的隔壁是北京市第25中学，笔者1997年11月初第一次来崇文门教堂的时候，25中的新教学楼刚刚施工，到1998年12月中旬，它已竣工。这是一座白色的6层高的大楼，矗立在崇文门教堂的南边，和灰色的较低矮的崇文门教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教堂里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25中的学生们在操场上的踢球声和呐喊声、上课的铃声以及教室传出的朗朗读书声。这些声音与教堂里悠扬的钢琴声、祈祷声交织在一起，使人感慨颇多。过去的教会学校如今已经成为普通的北京市民子弟学校，而且学习条件十分优越。从中不难看出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今非昔比。

现在崇文门教堂是由毕业于金陵神学院的年轻主任牧师吴巍主持工作。笔者几次去崇文门教堂都受到了牧师的热情接待，他为笔者介绍崇文门教堂的情况，提供了一些资料，使我深受感动。

参考书目：

王毓华：《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北京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办公室印，1996。

《天风》，1988年第12期。

姜志勤、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北京基督教会西堂
——缸瓦市教堂

今日缸瓦市教堂

北京基督教会西堂位于北京西四南大街57号，由于教堂坐落于缸瓦市地带，所以京城的百姓习惯地称之为缸瓦市教堂。

缸瓦市教堂坐落于繁华的西单商业街上，离北京著名的西单商场仅有一站地之隔。从西单商场向北步行只需七八分钟就可到缸瓦市教堂。缸瓦市教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在琳琅满目的霓虹灯和布满商业招牌的商业街上，缸瓦市教堂显得不大引人注意。在缸瓦市教堂的右边，是出售鲜花的艺苑鲜花店和历史悠久的北京市家具公司西四家具店；在缸瓦市教堂的左边是华联包装食品机械服务中心，华联包装食品机械服务中心与艺苑鲜花店把缸瓦市教堂夹在了中间。在本来就不够宽敞的教堂门前，还经常有位盲人穿着白大褂在教堂门前行医，为人按摩，惟一引人瞩目的是镶嵌在白色墙壁上、金灿灿的“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十个大字，使人一看才知这就是缸瓦市教堂。教堂的大铁门平日总是敞开的，任人随意出入，不像天主教宣武门教堂和崇文门教堂门户那么严。缸瓦市教堂也不如天主教宣武门教堂和崇文门教堂那样高大，显得过于简朴，从外观上看确实让人几乎认不出教堂的模样。在缸瓦市教堂的门前，还有一块金底黑字的标牌：上面用中文写着：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下面英文写着 BEIJING GANGWA SHI CHRISTIAN CHURCH 西四南大街57号。缸瓦市教堂时常有外

宾来做礼拜。

缸瓦市教堂坐东朝西，收发室和传达室位于铁栅栏门的南北两侧。售书室、会议室、外宾接待室、小礼拜堂位于教堂的北面；幼儿班、神职人员办公室，西城基督教三自爱国小组的办公室位于教堂的南面。缸瓦市教堂的礼拜堂正对着铁栅栏门，教堂前面也没有平台设置，只有十几级台阶。登上台阶就是缸瓦市的主礼拜堂，走进主礼拜堂的门厅，迎面面来的是一面长方形的大镜子，在镜子下面摆放着一盆盆四季常青的花卉。镜子上面书写着进堂礼拜须知的规则，规则条文如下：

经文，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哈巴谷书二：20）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十四：40）

1. 进入堂后要轻步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2. 服装要整洁，不可穿背心、超短裤，短裤，拖鞋进堂。

3. 仪表端正，虔诚，礼貌，安静，不得交谈阔论；

4. 请主动脱帽，关闭BP机；

5. 请保持堂内卫生，不得吃东西，保持堂内秩序，不得占座位；

6. 任何人不得在堂内擅自宣讲或散发宣传品，进行对本堂不利的活动。未经本堂允许，任何人不得在堂内摄影、摄像。

7. 本堂活动时间表和信徒须知请看院内宣传橱窗；

8. 如有问题咨询，会后请到办公室联系。

以上各项谢谢大家合作。

本堂启

1996年8月15日

穿过门厅，进入主礼拜堂立即给人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圣台上“神爱世人”四个红色的大字和在圣台的正中间供奉着的又高又大的金色十字架。在圣台上方除供奉着基督教信仰的标志架——高大神圣的十字架外，既没有供奉那种在十字架上钉有基督受难的“苦像”和耶稣的圣像；也没有供奉着圣母玛利亚的圣像。整个教堂没有供奉任何圣徒的雕像和苦像。缸瓦市教堂与天主教教堂的风格完全不同。因为基督教新派不崇拜任何偶像，所以他们的教堂既不供奉耶稣的圣像，也不供奉圣母玛利亚的圣像。

在圣台的前方是讲道台，数十盆鲜花把圣台点缀得庄严、肃穆和文雅。在圣台前方讲道台的下面是施浸水礼池，基督教把洗礼礼仪看成是最重要的圣事。基督教认为圣洗圣事是灵魂得救绝对需要的，没有领过水洗的人其灵魂不能进天国。领洗后表示受洗人完全归属基督，灵魂得到了“永生”。据笔者采访，目前缸瓦市堂是具有施浸水礼设施的教堂。施浸水礼仪时，主持施浸水礼的主任牧师与领受施浸水礼的信徒都要浸人水池。在圣台的上方，悬挂着三盏五彩玻璃吊灯，在圣台的左前方摆放着一架钢琴和一架由美籍韩国信徒在1994年捐赠的电管风琴。据缸瓦市堂主任牧师杜凤英讲，本堂至今还保留着缸瓦市最早用过的一架旧风琴，在所有的琴中，这架风琴资格最老，历史最悠久，它伴随着缸瓦市堂经历了风风雨雨，是缸瓦市堂历史的见证。风琴如今虽然已经很破旧，但是它的音质却很好。教堂里的钢琴，是为教堂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

在圣台左、右两侧的墙壁上，悬挂着两幅大型的油画。圣台右边是一幅耶稣降生的大幅油画，描绘牧羊人按天使的指示来到伯利恒，见到圣母玛利亚、约瑟和刚刚诞生的圣婴耶稣正卧在马槽里的情景。圣台左边的油画描绘了来自东方的三位骑着骆驼的博士在星星的指引下到伯利恒寻访刚刚诞生的圣婴耶稣的过程。

圣台的对面是播音室，播音室的两侧是主礼拜堂的大门。每一座大门的旁边都安放着一个奉献箱，接受信徒自愿的捐赠。缸瓦市教堂主礼拜堂除圣台上方悬挂着的三盏吊灯外，其他用来照明的都是日光灯，没有宣武门天主教堂和西什库教堂那样华丽的彩色吊灯。相形之下，缸瓦市主礼拜堂过于简朴。整个主礼拜堂安放着四五百个座椅，最边上座椅的扶手上还挂着"马扎"，这些马扎是供来缸瓦市堂做礼拜没有座位的人准备的。主礼拜堂最多可容纳700多人做礼拜。据缸瓦市堂于新粒主任牧师讲，由于信徒建立教会的热情空前高涨，自发捐款达120多万元，所以缸瓦市堂于1996年在主礼拜堂的南侧建立了300多平方米的副礼拜堂，可容纳近四百多人。副礼拜堂建好后，缸瓦市基督堂可以同时容纳一千多人做礼拜。新建的副堂还建有地下室，地下室设有图书馆，信徒们可来堂阅览。唱诗班的练歌厅也设在副堂下面的地下室内。

在主礼拜堂和副礼拜堂内的墙壁上，安装着十几个玻璃壁灯。在每一个壁灯上都装饰着一个花环，一个个用柏树枝做成的长青花环上装饰着三、四个用红绸子系成的大小不等的蝴蝶结，显得十分漂亮。每一花环上还装着一对金色的铜铃。白色的墙壁配着红、绿、金色的花环，使主、副礼拜堂充满了活力，呈现出一派生机，似乎使古老的主礼拜堂返老还童。这些红、绿、金色的花环把过于简朴的教堂点缀得恰到好处。教堂外面凌空而起的五色彩灯，又给圣诞之夜的缸瓦市教堂增添了几分节日的气氛。鲜花、松柏、彩灯、烛光使人们忘记了圣诞之夜是在隆冬季节。圣诞之夜的缸瓦市教堂人群川流不息，圣歌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每年圣诞节，都有万人来到缸瓦市教堂参加教务活动。使能容纳近千人的教堂显得过于窄小，来教堂做礼拜的信徒只能在铁门外等候着分批进教堂做礼拜。

绕过缸瓦市主礼拜堂向北向东行，即可看见一片灰瓦房，俗

称缸瓦市教堂的后院。著名文学家老舍当年就住在西边第二排平房中，如今已经是人走房空，一片荒凉的景象。据缸瓦市堂神职人员介绍，后院房产属于教会，如今这二三十间灰瓦房住着十几户居民，是1966年－1977年“文化大革命”使缸瓦市教堂的后院变成了居民大杂院的。除一位86岁的“执事”（分圣餐）一直住在后院外，其他住户是在“文革”期间搬进来的。据说，后院的居民由于长期住在教堂，有些居民逐渐成了信仰耶稣基督的信徒。

缸瓦市教堂杜凤英主任牧师向笔者介绍，缸瓦市基督堂的信徒承办的慈善机构养老院设在香山。养老院里有50多位老人，这些老人年龄多在70岁以上，大部是无儿无女的孤寡信徒，还有一些是双眼失明的残疾信徒。教会定期去看望这些老信徒。养老院所需经费，是由信徒们自己捐助和募捐而来的。

缸瓦市堂的建置沿革

缸瓦市教堂是由英国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创办的。英国伦敦布道不是英国基督教的一个教会宗派，而是一个差会。这个差会是一个专门向英国殖民地和海外其他地区传教的机构。在1792年时，由于英国人威廉揆立（William Carey）经常在报刊上宣传他在印度传教的成绩，所以引发了英国各宗派海外传教运动的热潮。1795年基督教公理会的几个首脑人物组成了伦敦布道会，决意到中国传教，他们希望使基督教能立足于中国社会。

基督教新教起源于16世纪德国神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自成不受罗马教皇统治的基督教新派，在发展中标新立异，逐渐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宗派。在北京的基督教就是由不同国家的不同宗派差遣传教士传入而发展起来

的。欧美各宗派的基督教会派遣传教士的组织称为差会，伦敦布道会是其中之一。最早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差会就是伦敦布道会。伦敦布道会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传教士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而第一个进入北京的传教士则是雒魏林（Willian Lockart）。

1838年，耶稣教传教士雒魏林来到中国。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雒魏林奉命跟随英国侵略军到定海。中英《南京条约》签定以后，他在上海开办了“仁济医院”，企图通过施医给药，医治疾病来博得中国人的信任与好感，从而达到发展外国教会势力和缓和、消除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人入侵的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定，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英国依据中英《天津条约》在北京设立使馆。雒魏林以英国使馆高级医官的名义进入了北京，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和负责英国公使的健康，一方面又积极地与伦敦传教会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帮助在北京开设一所伦敦会的医院。为了接触中国人，他在英国使馆旁设立了一个医疗室，并对外应诊，以便借此机会接触中国群众，并暗中向他们传教。

耶稣教传教士雒魏林在北京活动了三年，渐感身体不佳，遂恳请伦敦会再派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前来协助他的工作。英国伦敦会于1863年（清同治二年）派耶稣教传教士杜德贞来到了北京，雒魏林遂将教会诊所（实则教会）的工作交给了他负责。

英国传教士杜德贞（John Dudgeon）来到北京后，在缸瓦市租了一处房子，将雒魏林创办的医疗室从英国使馆迁出，正式成立缸瓦市教会医院，名为看病，实则暗中传教。

因为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法国公使拉萼尼与中国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中有关传教自由的条款只指“天主教”，并指出其特征是供奉十字架和圣像，不代表基督教新教，当时英国领事也拒绝干预此事，所以基督教新教尚不敢公开传教。

1863年清政府正式宣布解除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禁令，伦敦会传教士杜德贞在缸瓦市教会医院公开进行传教，并暴露其伦敦会传教士的身份。伦敦会先后在北京购置堂产，建立礼拜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英国伦敦会相继派传教士文卓志（George Gron）和石敦豪（J. Stonehouse）到北京扩展教会工作。他们真正的使命是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用基督教文化征服中国文化。为完成这一使命，伦敦会与基督教新教其他派别一样，主要在京以开办教会医院、创办学校等形式传教，他们租民房为课堂，千方百计吸收中国儿童入学。有时竟从街上召集一些穷苦儿童，以提供免费吃、喝、住的条件，来吸引中国人将孩子送入教会学校学习，从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先后在北京东单北大街（米市大街）东堂子胡同、东直门外关厢、崇文门外东柳树井买下房产，盖起了医院、学校、住宅和礼拜堂。

基督教新教各差会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资本主义各国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涌入北京的。耶稣教借助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在北京日益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接踵来华的传教士越来越多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帮凶。随着西方教会的日趋政治化而引起了中华民族积蓄已久的"仇教"心理，不断掀起反洋教运动，终于酿成了席卷北方大地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天主教、东正教、耶稣教在中国所办的基督教会，成为被义和团运动激烈攻击的对象和目标。缸瓦市基督教教堂也受到了冲击。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下失败了。当时西方传教士和八国联军一起，疯狂地冲出使馆与教堂，犹如"困兽"出笼，公然四处抢劫。

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清政府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与英、美、法、俄、德、日等十一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十一国赔款达4.5亿两，英国伦敦会与其他教会一样纷纷向清政府索取赔偿，索要重建教堂、医院、学校和死难教徒的抚恤金。

在义和团运动后，英国伦敦会曾将耶稣教教会和缸瓦市教会医院，由缸瓦市迁往旧刑部街一处大宅院，在缸瓦市教堂的旧址，举办了萃文男、女小学校。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伦敦会利用索赔之款在缸瓦市教堂旧址周围征地扩建后，伦敦教会遂迁回缸瓦市教堂。新建的缸瓦市教堂仍然由英国传教士主持，原来的萃文小学校改为中学。

老舍与缸瓦市基督教教堂

基督教来自于西方，其教会的设立、经费的来源、对基督教教义的阐释等诸方面，都与中国人的心理和中国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隔膜。基督教教会的管理权亦操纵于西方传教士之手，因此最终酿成了庚子事变的发生。义和团运动后，不少爱国爱教的中国基督教信徒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要把教会的管理权从西方传教士手中接过的想法，提出教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理的要求。

从19世纪初期，中国的基督徒要求西方传教士交出教会的管理权遭到拒绝后，纷纷主张自养、自立和自传，掀起了成立“自立的中华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这场自立运动首先在天津掀起。北京的伦敦会、公理会基督教信徒，随即联络了圣公会、美以美会、长老会的基督教信徒，发起组织“中华基督教教会”的自立运动。著名文学家老舍（舒舍予）与缸瓦市基督教堂的中国牧师宝乐山一起也在缸瓦市教堂发动自立自养运动，理直气壮地要求英国伦敦会交出缸瓦市教堂和教会的管理权。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1966），北京人，满族正红旗。用老舍自己的话说："名舒舍予，字老舍，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示什于寒贱也"。[1] 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清朝皇城的一名护军，1900 年 8 月 15 日惨死在八国联军的枪口下。老舍"九岁时承蒙宗月大师的资助上了小学"。[2] 老舍在《宗月大师》中写道："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3] 贫困的童年，父亲的惨死使民族自尊的种子很早就植根于老舍先生幼小的心灵深处。

1921 年，老舍在缸瓦市基督堂举办的英文夜校认识了北京缸瓦市基督堂的中国牧师宝广林。宝广林牧师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神学系，当时刚刚由英国归来，在缸瓦市基督堂任牧师并主持缸瓦市基督堂举办的英文夜校工作。他积极主张把缸瓦市基督堂从英国伦敦会手中接管过来，自养自立办教会，"一个英国留学生，硬把英国教堂从英国人手中夺过来，宣布不再依赖英国，这种独立的民族精神强有力地吸引了老舍"，"这件事引起了老舍自幼孕育的民族自尊心的共鸣，使他对宝广林牧师刮目相看"。[4]

从此，老舍加入了缸瓦市基督堂宝广林牧师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1922 年，老舍在缸瓦市基督堂正式领洗加入了基督教，并担任缸瓦市教堂"西北城地方服务团附属铭贤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的教务主任。同年 12 月，老舍搬进了北京市缸瓦市基督教教堂，住在缸瓦市基督堂主礼拜堂后跨院西边第二

---

① 舒济、舒乙、金宏编著：《老舍》，第 1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② 刘小枫主编：《基督教文化评论》，第 266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③ 舒济、舒乙、金宏编著：《老舍》，第 36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④ 刘小枫主编：《基督教文化评论》，第 267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排坐北朝南的三间平房里。老舍的教友许地山因常常去教堂，因此也常住在缸瓦市基督堂里。老舍受洗入教后住进缸瓦市教堂以后，曾担任缸瓦市教堂的执事，协助缸瓦市教堂主任牧师宝乐山先生做了许多对教会有益的事情，并积极参与了基督教的自养、自立、自传的工作。老舍居住在缸瓦市教堂期间，曾协助宝乐山主任牧师策划缸瓦市基督堂的自立运动。1922 年 7 月，老舍以教徒的身份起草了《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草案，经过中国缸瓦市基督堂基督徒的讨论，这一章程被正式采纳，大家约定两年内教会实现自治、自养。老舍在《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第二条中写道："本会以信赖耶稣基督尽力使天国的实现于人类社会为宗旨"，"人教无国籍种族之分"。[①] 1924 年老舍还用舒舍予名字，在当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7 期上发表了《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一文，强调"独立自养之计，受良心的驱使，有不可不冒险尝试矣。"指出西方基督教组织，"以此（伦敦会）形成之物，施之东方"，[②] 很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因此教会要自立、自治、自养。

从 1928 年起，由伦敦会下属各个教堂组成的"中华基督教会"与长老会下属各个教堂组成的"中华基督教会"，联合组成了"中华基督教会北京区会"。经过中国基督教徒的共同努力，英国伦敦会与缸瓦市基督堂达成协议：英国伦敦会将其所有西四砖塔胡同 77 号住房和缸瓦市基督堂产全部交中华基督教会北京区会。老舍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会任职期间，无论是参加宗教活动还是发表有关宗教活动的文章，都是用"舒舍予"三个字，老舍第一次用"舒舍予"发表的文章是《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在老舍看来，

① 刘小枫主编：《基督教文化评论》，第 268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② 中华基督教协会编订：《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 年，第 7 期，舒舍予《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

要实现社会的大同，必须像耶稣那样“舍己”；要使“教会为社会之中心”并“服务于社会”，也必须像耶稣那样“舍己”。老舍用过的“舍予”、“非我”、“舍”、“老舍”等笔名，正是他舍己救世济贫的宗教思想的体现。1923 年，25 岁的老舍担任了缸瓦市教会举办的“儿童主日学”（Sunday School）主任，在担任“儿童主日学”主任期间，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并没有丧失理智，没有完全沉浸在宗教活动中。他曾在《真理周刊》发表一篇《儿童主日学和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一文，他主张对儿童不搞赎罪祷告，不背诵圣经，不唱圣歌圣诗，不搞信仰早熟。他主张给儿童一些实实在在的知识，让儿童自己动脑筋，动手去探索，使他们德智体都发达，成长为有道德、对社会有用的人。由此可见，老舍在信仰上已经显露出对传统的“叛逆性”。[①] 老舍先生对基督教信仰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后来，老舍在缸瓦市教会结识了英国伦敦会牧师埃文斯。当时埃文斯受命于英国伦敦会，在伦敦教会举办的燕京大学任教。1924 年，老舍由埃文斯牧师推荐，前往英国伦敦，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从此老舍几度出国，又几度回归（1930 年从英国回国后，又去美国，1949 年又从美国回国），他与北京缸瓦市基督教会的关系渐渐终止。1966 年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老舍却横遭迫害，为了维护不可侮的人格气节，投水自尽，含冤而死。

缸瓦市基督堂的新生

在老舍与中国基督徒的共同努力下，英国伦敦会虽然将教会的管理权以及教会的财权都交给中华基督教会，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基督教会实际上是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自主权。

① 刘小枫主编：《基督教文化评论》，第 270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英国伦敦会仍不断地派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仍然住在缸瓦市基督堂，参与和干涉教会的工作。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有的回国，有的被日本人集中到山东潍县，缸瓦市教堂一度由中国基督教信徒自己管理。但是在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以后，英国伦敦会又相继派来一些传教士，分别住在缸瓦市基督堂、米市大街教堂和礼士胡同的教堂。这些基督堂名义上虽然自立，实际上与伦敦会传教士关系仍十分密切。伦敦会英国传教士经常在缸瓦市基督堂讲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才在 1950 年相继回国。"1950 年 7 月，宗教界人士吴耀宗等 40 余人，联名发表了重要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宣布了中国基督教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方针"。[1] 1954 年 7 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1956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的北京市基督教第一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章程，自此北京基督教界的领导权才真正回到了爱国的中国基督徒手中。

1966 年—1976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缸瓦市基督堂被迫关闭，一度被北京市煤气公司占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重新恢复工作。北京市煤气公司由缸瓦市教堂迁出，1980 年 7 月 18 日缸瓦市基督堂重新复堂，由祁廷铎任主任牧师主持日常工作。继祁廷铎主任牧师之后，杨毓东于 1986 年任缸瓦市堂主任牧师，但此人反对独立自主办教会的三自原则，于 1994 年被缸瓦市教会免去主任牧师的职务，改任于新粒为主任牧师负责主持教堂的日常工作。

今日之缸瓦市基督堂，每个礼拜天都有 3500 多人来堂聚会，参加宗教活动。缸瓦市基督堂有老、中、青三结合教牧人员与义工近 100 多名。现在，教堂的管理权、财权都掌握在中国基督教

① 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第 369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教徒的手中，基督教信徒们在教堂里自由地进行着宗教活动。

参考书目：

姜立勋等著：《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编订：《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刘小枫主编：《基督教文化评论》第4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王毓华：《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内部发行）。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舒济等编著：《老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北京基督教会南堂——珠市口教堂

北京基督教会珠市口堂位于北京繁华的前门外大街，临街而建。因为她坐落在北京的城南，又称为北京基督教会的南堂。这是与天主教的南堂（宣武门教堂）不同的另一座教堂。

珠市口教堂交通十分便利，乘25路、53路、66路、105路、822路公共汽车都可以到，从正阳门向南走步行约两站地也可以到达。这一带十分热闹，教堂外面汽车的喇叭声，小贩们的叫卖声，以及从隔壁电器商店传出的流行歌曲声交织在一起，形成北京城南特有的一种市井文化气氛。

教堂的建置沿革

珠市口堂始建于1904年，是在1900年以后美国卫理公会开设的八座教堂中的第一座，这座教堂建在闹市区，庄严肃穆的教堂与外面的喧嚣极不协调，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教会见缝插针，竭力向中国人民传播基督教的情况。

与崇文门等教堂所不同的是，珠市口堂从建堂一开始就由中国牧师主持。第一任主任牧师是陈大镛。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教徒的增多，珠市口堂容纳不下，在1921年进行了扩建，把旧堂改建成楼房，由北京教区长李连颖牧师兼任主任牧师。

从1926年开始珠市口堂实行自养，但仍然通过华北年议会接受美国差会的津贴。1951年再次实行自养，由祁廷铎牧师担任主任牧师。

1958年北京市各宗派教堂实行联合礼拜，信徒不分宗派远近

在东西南北城各堂会参加礼拜。珠市口堂被定为南堂，也称为北京基督教会珠市口堂。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基督教堂除保留了米市大街的教堂外，珠市口堂和其他教堂一样皆被关闭，并被挪做他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落实了宗教政策，1988 年北京市基督教两会收回了珠市口堂，于同年 6 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于 12 月 20 日圣诞节前夕举行了隆重的恢复开堂典礼。

教堂的现状

为了了解珠市口教堂的现状，笔者在 1998 年底曾前往采访。发现这座教堂外观并不惹人注意，十分简朴。堂内陈设也极简单，圣台摆在显要的位置，上面只挂了一个十字架，却显得十分庄严，且面向教徒，缩短了牧师与教徒之间的距离。教堂内部呈长方形，没有廊柱，扩大了空间，也能容纳更多的教徒。教堂是三层楼房，能容纳 1000 多名教徒。教堂内的风琴、圣歌的悠扬与教堂外马路上汽车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倒也别有一番情致。

1998 年底为了庆祝珠市口教堂恢复开堂 10 周年，同时也是为了迎接圣诞节的到来，珠市口教堂粉刷一新，教堂原来沉闷的瓦灰色被刷成了活泼的雪白色，烘托出了几许节日的气氛。教堂的左上方挂着一块牌子，由灰色的花砖镶边，上刻白底紫色的字：北京基督教会珠市口堂。与之相对应的教堂右上方也挂着一块牌子，同样用灰色的花砖镶边，上刻英文 BEIJING ZHU SHI KOU CHRISTIAN CHURCH. 教堂的左下方竖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子：北京基督教会珠市口堂。右下方是一块金底黑字的牌子：北京基督教会珠市口堂。大门的两侧上方南北各有一个造型别致的街灯，一个电门铃（因为教堂外面声音嘈杂，在门外敲门一般里面是很难听到的）。教堂大门只有五级台阶，不像有些天主教堂那

样建在高高的台阶上。

珠市口教堂共有三层。第一层共有200多个座位，都是比较简陋的折叠椅，不像天主堂内有粘着红色天鹅绒的坐凳和跪凳，地上也不铺红地毯，而是绿色的橡皮垫，显得非常的简朴。圣台上方红色绒布上挂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圣台上摆放着几瓶淡紫色的小花，显得非常肃穆。

圣台左上方写着：12：19（12月19日）

经文：SERMON 哈该书

1：1—8

2：4—9

北京基督教会珠市口堂

圣台右上方写着：赞美诗HYMNS

134

122

129

北京基督教会珠市口堂

字均为白底黑字。圣台的左侧是库房，右侧是售书室。圣台的左下方是一棵圣诞树，树上挂满了圣诞老人泥塑、小糖果、圣诞卡，以及风铃、彩灯等五颜六色的小饰物，十分惹人喜爱。

一层南北两侧墙上共有四个玻璃镜框，北墙靠西头的镜框里写着：圣灵是谁？北墙东头的镜框里写着：教会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什么是教会的根基？南面墙上西头的镜框里写着：圣经是怎样的书？南面墙上东头的镜框里写着：上帝是谁？上帝能看见吗？上帝在哪里呢？

一层的北墙东头是一个葡萄园地，上面写满了教徒们的学习心得，迎接圣诞节的文章，还有圣诞查经题目、“见证”、“施比爱更为有福”、“心灵触摸的真实感受”、“圣诞的钟声敲响”、“圣诞感恩”等。南面东头是传达室，在传达室旁边的墙上写着圣诞节

活动安排表：

一、12.6 施洗礼拜。

二、12.20 复堂十周年感恩礼拜。

三、12.21 复堂十周年座谈会。

四、12.23 青年聚会庆圣诞。

五、12.24 姐妹会庆圣诞。

六、12.25 圣诞大礼拜。

七、12.24、12.25 晚烛光圣乐崇拜会。

在上楼入口处南、北各有一个奉献箱，二楼门口也有一个奉献箱。窗台上摆满了绿叶植物，给堂内带来了缕缕生机，融融春意。入口处南北墙上分别挂着一个玻璃镜框，南墙镜框里写着几个大字："以耶和华为圣。珠市口堂复堂纪念 1988 年圣诞节 刘澍年。"北墙的镜框里是同样的篆字。

二楼的圣台上摆满了鲜花，正中是一个金色十字架。圣台南北两侧各有一架风琴。圣台下南侧摆放着一棵圣诞树，上面挂满了惹人喜爱的小饰物。

堂内十分简朴，只是地面上铺了很一般的褐色瓷砖。

三层是办公室，为了迎接圣诞节，挂了许多彩带，从三层一直垂到一层，节日气氛比较浓厚。

12 月 19 日下午没有宗教活动，但为了迎接圣诞节，有不少唱诗班的教友在风琴的伴奏下，练习演唱圣曲，悠扬的歌声飘出了堂外，使不少行人驻足聆听。

现在来珠市口堂参加宗教活动的教徒比较多，大多来自城南的宣武区、崇文区、丰台区，甚至更远的通县、大兴县。在教徒中，老、中、青年约各占三分之一，女教徒更多一些。

珠市口堂现在有牧师 4 人，义工 50 多人。在每年的 12 月 25 日圣诞节，珠市口堂都要举办各种节目，吸引了教徒和附近的居民前来观看。

参考书目：

王毓华：《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北京基督教爱国运动委员会、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1990。

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北京天主教北堂——西什库天主堂

今日北堂

北京天主教北堂原名为救世堂，取天主教耶稣救赎之义。因其位于北京西什库大街的南端，所以京城的百姓称之为西什库教堂。救世堂位于北城，所以人们又习惯地称其为北堂。沿着西什库大街往北走就可以看到那高大的天主教教堂。

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不仅涉及到社会文化界，同时也涉及到宗教界。1958年时，在全国加快建设的“大跃进”的形势下，北京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了压缩。因此北堂一度曾被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占用，成为中学生学习的校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已经由教堂迁出，北堂又恢复了昔日的宗教活动。每逢星期天教堂里人流不息，诵经声朗朗地飘扬在教堂的上空。

走进北堂的大门，通过绿荫甬道，迎面而来的就是那高大宏伟壮观的教堂。整个教堂通体洁白，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教堂的顶端镶嵌着护守天神，三座雕刻着莲花图案的红漆大门非常耀眼。正门旁边的墙壁上镶嵌的是基督耶稣的四位门徒圣保禄、圣伯多禄、圣玛窦和圣若望的雕像。墙壁上“路、亚、阿、来”四个大字非常醒目。正门的前面是一座由大青石建成的平石坛，平石坛的四周是由用汉白玉石雕刻的56个神采各异的小狮子组成的围栏。由五彩缤纷的鲜花围成的大花坛坐落在石坛的中央。二座古朴的中式建筑黄亭耸立在教堂的两旁，金黄色的玻璃瓦覆盖着双顶十二柱四角亭亭顶，因此在官方的记载中称其为黄亭。每

一个十二柱双顶黄亭中立一石碑，二块石碑记载着北堂迁徙的原因和经过。二座石雕巨狮威严地矗立在教堂石阶的两旁。教堂的右边是圣母山，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矗立在百花丛中，好像正在慈祥地接受信徒对她的朝拜。走进教堂首先映人眼帘的，是那用五颜六色的花玻璃组成的耶稣圣像，一根根高大笔直的红漆顶梁立柱，一幅幅悬挂在教堂墙壁上的描述《圣经》故事的油画。整个教堂有一千多个座位，可以容纳二三千人同时做礼拜。教堂里面色彩鲜艳，豪华壮观。主教公署就坐落在绿荫甬道的东边。其他神职人员的办公室位于绿荫甬道的西面，正好与主教公署遥遥相对。教堂售书室和传达室设在一进教堂大门的两旁。

北堂的建置沿革

在明代，这里并没有教堂，而是明朝皇室内务府所管辖的十个库房。这十个库房是：

（1）甲字库，贮藏银朱、黄丹、乌梅、藤黄、水银诸物。

（2）乙字库，贮藏奏本纸等物及各省所解胖袄。

（3）丙字库，贮藏丝棉布匹。

（4）丁字库，贮藏生漆、桐油等物。

（5）戊字库，贮藏弓箭、盔甲等军器。

（6）承运库，贮藏黄、白生绢。

（7）广盈库，贮藏纱、罗、绸缎，及诸帛匹。

（8）广惠库，造、贮巾帕、梳笼、钱贯、钞锭之类。

（9）广积库，贮藏焰、硝、硫磺等物。

（10）赃罚库，贮藏没收人官的财物。

这十大库房，因地处皇城的西北隅，故称西什库。西什库大街之名由明代一直沿用至今。1644 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兵在占领北京后，便把明朝的西什库库房封存起来。据史料记载：至清

初三十余年，十个库封锢不开，尘土堆积，“库后古木丛茂，居人鲜少，众鸟翔集，以数万计”，[1]荒芜不堪。一日，康熙皇帝游幸至此，才命令内务府把它打开，并清查立档。自此西什库库房改作为清朝的库房。

北堂，原来地址在北京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的中海西畔，因其地名叫蚕池口，所以北堂最初也称蚕池口教堂。清康熙年间建堂时，其地尚不属皇宫禁苑范围。北堂建堂的缘起，据史料记载，在公元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清康熙皇帝在研究解剖学时偶患疟疾，吃御医中药数剂无效，太医见状束手无策。当时在京的耶稣会教士张诚、白晋神父闻之，立即献上所带金鸡纳霜西洋之药，使康熙皇帝恢复了健康。康熙皇帝大悦，在这年的7月4日召见了张诚、白晋等神父，赐张诚住宅，并把蚕池口之地赐与耶稣会传教士以示酬谢。他除允许传教士在蚕池口建天主教教堂，还赐白银数万两，以备建堂之用。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北堂建成后，康熙皇帝亲笔撰书“万有真原”匾额、长联及律诗一首送至堂中。其长联：

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
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

其诗曰：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
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禅，真儒若个不钦崇。[2]

四年后，北堂建成。外国传教士这样描述它：“这座教堂一进

---

① 《京师坊巷志》卷上，第45—46页。

② 匾额、长联、诗皆引自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64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门是一个四十法尺(十法尺等于一丈)宽、五十法尺长的院子,……教堂主楼造在院子的尽头，长七十五法尺，宽三十三法尺，高三十法尺。教堂内部建筑有两个层次，每一层次有十六对涂成绿色的柱子；下层的雕像的底座都是大理石的，上层的雕像的底座都是镀金的，还有柱子的顶端，柱顶盘的上楣、中楣、下楣也都是镀金的。柱顶盘的中楣上有许多装饰画，其他的顶饰凸凹不齐，色彩和光度也有所不同。上层两边各有六个很大的拱形光窗，使得整个教堂非常敞亮。教堂顶都画满了。它分三个部分：中间是一个敞开的结构复杂的穹顶，大理石圆柱带着一排拱形光圈，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大理石本身和一些置放得当的花瓶一起被摄入另一幅美丽的图画之中；永恒的天父手里捧着地球，被一群天使蜂拥着高高坐在云彩之中”。这些洋教士宣称：他们“花了四年时间建造教堂及装潢，终于建成了东方最美，活动最频繁的大教堂”。[1] 中国一些史料也记载：“此堂（北堂）长七丈五尺，宽三丈三尺，高三丈，堂内无明柱，……此外，并建造了天象台一座，图书馆数间，规模不大。”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12月9日，北堂隆重地举行开堂典礼，命名为“救世堂”，[2] 并举行了祝圣大典。北堂的规模虽不甚大，但是在当时已属相当宏伟的建筑了。

清康熙年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受到礼遇和重用。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蒸蒸日上。据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的统计，“全国13个省共有传教士117人，教士住屋114处，大小教堂250处，教徒达30万人”。[3]

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逐渐引起中国各地官吏和缙绅的疑忌，反教的风潮时有发生。先后有不少官吏上疏反教。除

---

① 宋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50—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② 1950年12月3日《教友家庭》报。

③ 任继愈主编：《中国的基督教》，第99页，商务印书馆，1997。

了中国社会对天主教的排拒之外，而在天主教教会内部，又发生了如何对待中国礼仪的争端。大多数的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和耶稣会士对中国祭孔、祭祖和使用“天”和“上帝”的名称是否属于异端的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以后，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争论，发展为罗马教皇和清朝皇帝的直接冲突。在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皇发布禁令七条，其主要内容是：不许信仰基督教的中国百姓祭孔、祭祖；不许信仰基督教的中国百姓以“天”或“上帝”称天主等。这一禁令激怒了康熙皇帝，他颁发谕旨：教皇的禁令“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皇所可禁止。……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 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皇帝去世后，其第四子胤禛继皇帝位。雍正皇帝继位后，严厉地执行了他父皇的禁教命令。此后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政府的禁教政策一直没有改变。由于清朝政府数次明令禁教，位于中海西畔蚕池口的北堂，因长久无外国传教士居住而基本废置，1827年（道光七年），被没收入官。后来清政府把北堂卖给一位姓于的官员，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下令将教堂拆除。至此，历经135年的北堂完全毁圮。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以基督教新教人华为起点，基督教各派各差会凭借殖民势力才再次涌入中国。正如西方传教士所说：“不管这场战争（鸦片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被用来开辟我们同这个巨大的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2] 在清朝政府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中法《黄埔条约》第22条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这年阳历12月28日，道光皇帝正式批准废除对天主教的禁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的基督教》，第111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②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22—1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令。西方各国传教士便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并进入内地开展传教活动。

1858年（清咸丰八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为时四年的战与和交错的过程中，清朝政府被迫与俄、法、美、英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这些条约中，不仅重申“给还旧产”，还允许法国传教士可以随便在各地传教建堂。条约签订后，法国侵略军总司令葛罗依据《北京条约》向清朝政府索回东、西、北三处教堂。由于北堂住地的居民反对搬迁，清朝政府拨给教会八千两白银为北堂的赔偿费。但事隔不久，法国又再次索要北堂。在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的百般要挟下，清朝政府只得将东、西、北三处教堂全部归还给教会。但拨给教会的八千两白银，孟振生却分文也没有退回。

1866年（清同治五年），教会在蚕池口地址上第二次重新建起北堂。新建的北堂新堂长50米，宽21米，比原来的教堂大得多，而且非常华丽壮观。自此天主教北京枢机主教公署就设在北堂。

北堂迁移西什库始末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朝皇帝为了扩建皇宫，给圣母皇太后修建游览区，决定给价银圈禁宫廷附近的地方。在蚕池口新修建的教堂也在圈禁的范围之内。为了拆除北堂，清朝政府拨给教会西安门内西什库南首三分之二地方，作为另建新堂之地，并赐帑金作为修建之费。北堂左边十二柱双顶黄亭里边的碑文详细记载了清朝政府与驻京公使、外国传教士商定迁建北堂的经过。

其碑文全文如下：

上谕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上谕：李鸿章奏蚕池口教堂与教士定议迁移，并与驻京公使商定互送照会一折奏均悉。西安门内蚕池口教堂，该教士于康熙年间钦奉谕旨准令起建，迄今百数十年。该教士等仰戴朝廷怙冒深仁，咸知安静守法。上年修理南海等处工程，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几余颐养之所，西南附近一带地势尚须扩充。该处教堂密迩禁苑，经李鸿章派英人敦约翰前赴罗马商酌，并令税务司德璀琳与教士樊国梁定约，迁於西什库南首地方，申画界址，给资改造。该教士复声明，改建之堂以五丈为度，比较旧建之楼减低三丈有余，钟楼亦断不令高出屋脊。议定后，樊国梁又赴罗马，告诸教会总统贵雅德。据覆文历叙感激中朝覆帱保护之优，有激发天真图报万一等语，情词尤为肫恳。李鸿章现复與公使恭思，当互相照会。亦据覆核，称无不依照办理和谐邦交。深知大体、实堪嘉许。此事既据李鸿章详细商定，均无异词。即着照所请行，其改造经费亦着分期拨给，俾资营建，余均照议办理。候补道恩佑於创办之初奉委出力，着交军机处记名遇缺题奏。主教达里布诚心报效，教士樊国梁，英人约翰远涉重洋，不辞劳瘁。达里布着赏给二品顶戴，樊国梁着赏给三品顶戴，敦约翰着赏给三等第一宝星。樊国梁、敦约翰并着各再加赏银二千两，由李鸿章发给税务司德璀琳。领事林椿往来通词，昭终奋勉。德璀琳着赏换二品顶戴，林椿赏给二等第三宝星。其余出力之英商宓克等，着李鸿章查明，奏请奖励。该衙门知道。

钦此

光绪十四年岁在戊子十月之朔 立

碑的背面碑文如下：

天津税务司德璀琳：

照泽商定合同 北堂教士 樊国梁：

为商议移让北堂在西什库改建酌鉴，仍应祇候。

大清国大皇帝

大罗马大教皇 御览批准谨遵奉行。

事计五端，详细列於后。

一、自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以二年为限。凡北堂仁慈堂地基、房屋及树木等，均於限内交付。除傢具外，一概不准移动、损坏。

二、应请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将西什库内南边地方酌给三分之二，丈量四至交与北堂主教收管。该地现有树若干一并交代，不可折损、移动。

三、查北堂地方，系康熙年间蒙圣祖仁皇帝赏给教士等居住，并派员相助起建大天主堂，又颁发敕建天主堂金字匾额。中外同深钦感。今因朝廷欲扩禁地，教士等遵敕移让，复蒙赏西什库内地方另为建堂。朝廷厚泽深仁，后先一辙，教士等尤深感激。应请奏明，按照康熙年间办法，明降谕旨，俾中外咸知。教士等永远遵守，则仰荷恩宠，益无涯涘。

四、如蒙查照康熙年间成法办理，颁发谕旨，教士等於西什库新堂成后，照南堂式恭刊诏旨於碑，护以黄亭，以汉白玉石制匾，以昭诚敬。至在西什库建造大堂，自地至梁，以五丈高为度，钟楼亦断不令高出屋脊。

五、此次在西什库改建北堂，教士等甚愿官家按照北堂仁慈堂原样代为盖造，房屋一切均照原式，是为最要。如官家不肯照样代办，只得由教士等画图，自行起造。此项工料银两，应请於付西什库地方时付给三分之一，过六个月再付一次，又六个月付讫。分作三次，为时十八个月，似较轻便。

按此敕建北堂仁慈堂工料等项，实需用至四十五万余金。奉中堂谕令核减，教士等於无可减之中，勉力酌减银十万两，共需库平宝银三十五万两。此系格外报效，伏祈亮察。再北堂所有百鸟堂内禽兽及一切古董物件，钟楼内风琴、喇叭等，樊教士愿请教皇吩示，概行报效，奉送中国国家。

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会同商定画押。

以上所议各条款均经：

大清国皇帝

大罗马大教皇

大法国伯理锡天德圣味增爵会总统费雅德先后批准施行。[1]

由以上碑文不难看出清光绪年间，清朝统治者不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为慈禧太后修葺三海，以供其享乐。因"百鸟堂"邻近中海，由位于中海蚕池口教堂的钟楼上即可窥视皇家御苑。虽然高筑围墙，但是也不能掩蔽皇家御苑之景。为此，清廷决定将蚕池口教堂圈进中南海之内，遂与法国公使签订了《迁堂条款》，将西什库三分之二面积（约 20 英亩）供传教士迁建新教堂之用，同时拨给迁移费库平银 35 万两等等。由此可见清朝政府是何等的腐败。

北堂用了二年的时间，由旧址迁移到西什库新堂。新建的北堂既华丽又壮观。据《燕京开教略》记载："其堂之格局，堂内空地总长二十五丈四尺有余，正圣台前后左右计宽十丈。进堂时，必经三排铁栅而入，铁栅正中据有铁门，系巴黎巧匠所制。堂之正门，建于高四尺五寸的青石平台上，台三面皆有汉白玉栏杆绕护，

[1] 以上碑文系本文作者笔录于北堂黄亭内石碑。

台的正中及左右，有台阶三起。楼正面有长一丈二尺、宽四尺八寸的汉白玉一方，镌刻着耶稣善牧圣像。大堂正面两旁，有中国式黄亭各一座，内藏皇帝圣谕石碑各一块。堂之首层，其墙砖每块俱重六七十斤。堂中明柱三十六楹，柱基石皆为汉白玉，柱顶俱镂菘菜叶形，玲珑可观，每柱计高四丈九尺，皆为美国运来的桧木。堂之正身，有双尖洞牖十二扇，高约三丈，蔽以五色烧花玻璃，灿烂夺目，系巴黎所产。在大堂后面，建有耶稣受难小堂，与大堂相通，间以玲珑隔扇。雕镂精致，金碧辉煌，尤为美观；正圣台外又有配台九座，油漆描金，亦颇艳丽；正圣祭台后三面俱列歌座。在大堂正门内，建有乐楼，楼上设置巨琴，系法国所制，琴座为北京巧匠所雕（解放后，巨琴收藏于中央音乐学院）。这样，西什库教堂成了北京最新、规模最大的教堂，成为北京地区天主教堂活动的中心"。[1]

在动工修建教堂的同时，还修建了主教公署、修道院和育婴堂等。在新建的北堂前面右边十二柱双顶黄亭中的石碑上，用汉文与满文雕刻着《迁建天主堂碑记》。正面汉字碑文如下：

> 伏维王者以孝治天下，亲其亲而仁其民，正教以道。人心敬於神，亦尊乎君。仁其民，斯远人来服，尊乎君，故奉令惟寅。京西安门内蚕池口地方教堂，乃康熙年间泰西教士航海来东，精于天文历算诸学，在钦天监供职，蒙圣祖仁皇帝恩赏居住。颁赐，敕建天主教堂、金字匾额，敬谨悬挂以昭久远者也。二百来年，荷深仁莫可铭状。光绪十一年适畿省亢旱民多难食，皇上乃以工代赈修理南海等处，为慈禧端佑康颐豫庄诚皇太后戲馀颐养之所。西南附近一带，地势尚须拓展，而教堂密尔禁苑，不得不筹度迁移。乃命太傅、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

[1] 《燕京开教略》下篇，第76页。

大臣李派员相商，拟在西什库南首地方申尽界址，赐币改建。教士等久沐恩膏，情殷报效，而事难擅专。因遣教士樊国梁远涉重洋，分诣罗马、巴黎请命教皇法廷并圣味增爵会总统，均蒙喻允。乃商订合同五端，由李傅相奏明。奉旨着照所议办理，发给帑金，克期经始，准署敕建。天主堂匾额一如康熙年间故事颁发。谕令中外咸知。俾教士等得以永远柢守此一举也。

大皇帝法祖孝亲仁民而兼柔远，一举而四善备美，千秋万世，炳若日星。所谓以孝治天下者，孰逾於斯哉。嗣因所订，钧期尚缓。欲致速成，经总理衙门会同驻京法国大臣慕恩当一再商酌，由教士允从於约订之期提前一年，早行移让，其余各节仍行逐一恪遵。惟迁徙之期既迫，则西什库建造之工所费滋钜，复经总署允补羡费二万金，并将西什库南之尼庵一所，既兹云寺及该庵北官道，与西什库原基毗连者均让与教堂营业。教士等督工昼夜兼办，於光绪十三年十月一律迁移。由总署五大臣暨大法国钦使李君派员，会同教士，三面公同文清，乃藏厥事。越维教堂，虽云奉旨迁移，而新堂轮换，更美於前，且黄亭并峙，御旨高悬。所谓敬於神，而亦尊乎君者，不亦并见乎哉。教士等伏密尔宫，愿效竭埃之报，屡蒙新赐，弥增戚戴之诚。谨将斯事缘由来诸贞珉，用垂不朽。

大清光绪十四年孟月　　　　圣味增爵会教士恭记[1]

---

[1] 此碑文系本文作者笔录于北堂右边黄亭中的石碑。碑的背面是用满文书写的《迁建天主堂碑记》。

庚子年间的西什库教堂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五六月间便进驻北京，这场反洋教的斗争很快达到了高潮。义和团斗争的锋芒集中到北京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北堂。在6月13日（五月十七日）这天，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民从崇文门进城，开始围攻外国使馆，焚烧教堂。15日（十九日），继东堂、西堂被围攻后，天主教活动的中心北堂也遭到了围攻，北堂的东、西、南三面霎时间被义和团团民包围。义和团团民个个义愤填膺，高声呐喊，要教堂将“樊国梁和林懋德二人交出……不然，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斩首不赦”。[1] 北堂主教樊国梁派教徒在“西什库大门两侧各置枪眼六口，日夜守备；又派教徒沿西什库周围墙根深挖壕沟，以防义和团埋地雷；在内堂，构筑短墙，严加守护；在外墙之内，以木板搭架，挑选青壮年教徒六百人，手持花枪，时刻防守；洋兵们荷枪实弹，守卫四周要塞”。[2] 并亲赴法国公使馆请求派兵保护北堂。当时从北京城内外躲进北堂的传教士和教民达3000多人，法国公使馆派出法国武官恩利保率领30名士兵，进驻北堂。樊国梁又请来意大利10名水兵，加强北堂的守卫。围攻北堂的一万多名义和团团民，“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着关帝神马；汗衫之外围上大红粗布兜肚；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持长矛大刀、腰刀宝剑等器械，呼啸呐喊着，一路冲杀上去”。[3]“法军开炮射击，团民47人身亡。团民大愤，纵火焚烧了教堂南面的房

---

①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517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② 《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106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第12页，中华书局，1978。

屋”。[1] 霎时间火光冲天，杀声震地。“义和团团民趁势以火油灌入水龙内向起火之处喷射不止，火势益猛，烈焰冲天，火光怒发，光明如昼。……团民还向堂内发射尾部带有火种的一种新式‘火箭’，这种武器内装炸药两公斤，燃烧可达15分钟之久，‘力大穿屋，一如炮弹，犹有失火之患’。……堂中已失所恃，乱成一团”。[2] 据当时一个被围困在北堂内的外国传教士回忆说：“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杀喊之声，实令人惊魂动魄。此时余等自忖必死无疑，人人面孔煞白，坐以待毙”。[3] 义和团团民为了攻下北堂，在教堂四周设立了大炮阵地，在东面的旃坛寺前、北海南门、西皇城根、北皇城处，南面惜薪胡同口和西安门城楼上都安置了以杉木为架的大炮。大炮齐发，顿时轰塌了教堂的钟楼，打断了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义和团团民还在北堂的四周挖地道，从四面八方伸向北堂。北堂附近的老百姓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义和团的战斗，他们不但给义和团团民送粮食和蔬菜，而且还配合义和团捉拿到北堂外面来寻找粮食和求援的传教士及信徒。

在这场席卷整个华北地区的反洋教运动中，清朝政府表面上支持义和团的斗争，发给义和团口粮和军火等物资；但暗中却指使部下属员寻找借口制造事端、设置种种障碍，来破坏义和团对教堂的进攻。在紧要关头，又下令停止对义和团的供给，扣押义和团急需的大炮、军火及粮食等物资，想借洋人之手剿杀义和团。为了消灭义和团，清朝政府从斗争的一开始就与洋人暗中往来。在义和团团民攻打北堂的时候，清朝政府最高的统治者慈禧太后暗中派人偷偷地给北堂送菜、送粮、送冰块；还送去弹药。慈禧自己供认：“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处处都留着余地，

---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188页。

②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517页。

③ 《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106页。

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1]在清朝政府的保护下，北堂的传教士和信徒们度过了难关。1900年8月14日（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外国传教士及其信徒纷纷冲出教堂，四处活动。他们怀着复仇的恶念，与联军一起进行疯狂的反扑。传教士、教民与八国联军疯狂地在北京街巷抢劫。他们常常是三人一组，一个洋兵持枪开道，一个修道生计数并押车，一个车把式赶车。就这样，北京的银子、玉器、古玩、珠宝等珍贵财宝，便源源不断地流进西什库天主教教堂。主教樊国粱竟亲自到礼王世铎府、户部尚书立山家去抢劫。当时就有人统计说，主教樊国粱从礼王世铎府拉到北堂去的元宝就装了四十车。1901年1月9日的《钮约先驱报》登载文章说：主教樊国粱从户部尚书立山家拉走的珠宝财物约值一百万两。为了掠取更多的珍宝，主教樊国粱还用支票收购八国联军抢来的金银珠宝，"北京教区会计葛珑璧在三天内就发出了四十五万法郎的记名和不记名的支票"。[2]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北京的法国教会还让法国公使馆与清朝政府交涉，要求中国赔偿北京教区和教徒的损失和丧亡。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只得向北京的法国教区和整个宗座代牧区赔款达五百万金法郎。[3] 主教樊国粱用清朝政府的赔款，重新修建了北堂。第二年的7月14日（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北堂修补竣工，是为今日的北堂。

---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438页。

② 《近代史资料》，第98页，1963年第3期。

③ 《零落孤叶》，第48页，（台）天主教主徒会，1980。

北堂的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基督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后，我国宗教界人士开展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神职人员和教友都热心地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得到国家和政府的保护。因北堂年久失修，教堂尖顶已损坏，195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下令进行整修，再将哥特式的尖顶整修为方形的屋顶。当时顶上保留有八根立柱，后在1976年地震中拆掉。今日的北堂，是天主教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年轻的方朔主教，主持北堂的宗教活动。

参考书目：

《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天主教主徒会，1980。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九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劳允兴、丁守和：《北京文化纵览》，北京师范学出版社，1990。

林克光、王道成、孔祥吉：《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北京天主教南堂——宣武门天主堂

今日南堂

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内北顺城街的天主教教堂，是无玷始胎圣母堂。由于教堂位于宣武门大街的南端，京城的百姓便称之为宣武门教堂。又因其方位在北京城的南部，与北堂遥遥相对，所以人们也习惯地称之为南堂。据京城的百姓们讲，南堂之称始于明末清初，北堂和东堂相继建成之后，人们才把宣武门教堂称为南堂。由前门沿着前门西大街往西走，就可以看到那壮丽的大教堂。

南堂的大门宛如中国佛教寺庙的山门，不是欧式的建筑风格。中式的山门、欧式的教堂二者交融在一起，堪称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走进南堂的大门，迎面而来的是圣母山和那屹立在鲜花丛中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慈祥的圣母玛利亚好像正在为瞻仰她的信徒们祝福。经过圣母山向东走，穿过月亮门，进入东跨院，顿时那古朴的教堂便赫然矗立在面前。不难看出，南堂里的大教堂的建筑风格为罗马式半圆拱形的西式建筑，整个建筑磨砖对缝，饰以浮雕，十分古雅。古老的大教堂坐北朝南，从上往下看，整个教堂以瓦灰色为基调，除了教堂的三座大门是红色的外，就连教堂的窗户也是用灰色的油漆涂成的。高大的十字架镶嵌在教堂的顶端，一些象征着吉祥、美好的图案分别镶嵌在教堂的墙壁上。教堂的建筑工艺，十分精湛。教堂的前面几乎被绿地和高大的古树占满，十字形的小路，仅能容纳两个人并排而行。两块残损的碑石，分别矗立在教堂的左边和右边，不过石碑上的文字已经一点也看不清了。据史料记载，教堂东侧石碑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

年），即丁酉二月立的，碑文是清世祖即顺治皇帝亲自为南堂写的《御制天主堂碑记》。

清世祖御制天主堂碑记全文如下：

易序卦，革而受之以鼎。革之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鼎之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是以帝王膺承历数，协和万邦，所事者皆敬天勤民之事，而其要莫先於治历。定四时以成岁功，抚五辰而熙庶绩，使雨阳时若，民物成享，道必由之。矧开创之初，昭式九围，贻谋奕叶，则治历明时固正位凝命之先务也。粤稽在昔，伏羲制干支，神农分八节，黄帝综六术，颛顼命二正。自时厥后，尧钦历象，舜察玑衡。三统迭兴，代有损益。见於经传彰矣，而其法皆不传。若夫汉之太初，唐之大衍，元之授时，俱号近天，元历尤为精密。然用之既久，亦多疏而不合。盖积岁而为历，积月而为岁，积日而为月，积分而为日，凡物与数之成於积者不能无差。故语有之曰：铢铢而称之，至石必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况天体之运行，日月星辰之升降，遲疾未始有穷，而度以一定之法，是以久则差，差则敝而不可用。凡历之立法虽精，而后不能无修改，亦理势之必然也。自汉以还，迄於元末，修改者七十余次，创法者十有三家。至於明代，虽改元授时历为大统之名，而积分之术实仍其旧。及乎晚季，分至渐乖，朝野之言佥云宜改，而西洋学者雅善推步，於时汤若望航海而来，理数兼畅，被若召试，设局授业。奈众议纷纷，终莫能用。岁在甲申，朕仰承天眷，诞受多方。适当正位凝命之时，首举治历明时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台测验，其时刻分秒起复方位，独与若望预奏者悉相符合。乃乙酉孟春之望，再验月食，亦纤毫无爽。岂非天

生斯人以待朕创制立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历，敕名时宪，颁行远迩。若望素习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祇承朕命，勉受卿秩，存历三品，仍赐以通微教师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职。都城宣武门内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复取锡赉所储而更新之。朕巡行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於玄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尝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微佳境，而为之记。铭曰：大圆在上，周迴不已。七精之动，经纬有理。庶绩百工，於焉始终。有器有法，爰观爰纪。惟此远臣，西国之良。测天治历，克殚其长。敬业奉神，笃守弗忘。乃陈仪象，乃构堂皇。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凡尔畴人，永斯钦式。[①]

教堂西侧石碑的碑文记述着利玛窦和汤若望两人的事迹及建堂的历史。

教堂的南面是一座西式建筑的门楼，高高的十字架矗立在门楼的顶端。这座西式的大门平常是不开的，只有在举行重大的宗教活动时才打开，以便疏导川流不息的人流。在西式大门的两边，是两座出售圣物工艺品和圣经等书籍的平房。沿着平房间的小路，可直达教堂门前的长方形的平台。平台不大，没有任何装饰与雕刻，实在是无法与北堂的平台相比。步人教堂，给人的第一感觉，

①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3册，第779—78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也与北堂迥然不同，那就是南堂不如北堂华丽。不过，整个教堂虽然不如北堂那样的富丽堂皇，但是却多了几分古朴与素雅，显得更为庄严与肃穆。教堂的建筑空间十分宏大，宽阔的横厅和纵深的中殿使整个教堂的大堂呈纵长方形的拉丁式十字架式。教堂在整个建筑上是以厚实的石墙，来支撑那高大的圆形的穹隆。教堂里半圆形的拱券和那层层叠叠的连拱柱廊，使教堂里各个部分均可独立自成单元，却又彼此相连，浑然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的主体建筑，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未做改变。与原来建筑不同的，只是教堂里14楹明木立柱如今已改成砖砌的，四周镶以水磨石，柱顶上有木刻的浮雕镏金花纹。如今教堂的堂顶，悬挂着18盏华丽的五彩吊灯；14幅油画仍然悬挂在教堂两侧的墙壁上。这14幅油画描绘的是耶稣受苦，直至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教堂最北面正中，是镏金花纹装饰的讲经台。讲经台后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画的是“圣母无染原罪像”。在“圣母无染原罪像”的左右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对联，上联是“吁玛利亚无原罪之始胎”，下联是“我等奔尔台前为我等祈”。其大意为，除圣母玛利亚外，我们人类都是有原罪的，只有祈祷天主保佑，将来灵魂才能升入天堂。圣母玛利亚画像两旁，悬挂着两幅天使的画像。圣母像前是圣台，圣台上，供奉着烛台、灯具等祀器。讲经台的西侧圣台上，供奉的是耶稣的画像，那是一幅描绘耶稣圣心的巨幅油画。“耶稣圣心”和“矜怜我等”8个大字分挂在耶稣像的两旁。圣台的正中，摆放着一架十字架、六根烛光和几束绢花。讲经台的东侧圣台上，供奉的是若瑟的画像，那是一幅描绘若瑟抱着圣婴（即幼小的耶稣）的巨幅油画。“大圣若瑟”和“为我等祈”8个大字，分挂在若瑟画像的两旁。画像前的圣台，也是圣诞节时迎来的“圣体”的安放处。圣婴、马槽、羊羔都放在圣台的前面，但是平时圣台前面只摆放着一颗圣诞树。在教堂南部建有乐楼，乐楼上安放着钢琴。教堂举行重大宗教活动

弥撒时，唱诗班在此唱圣歌。乐楼与北部正圣台遥遥相对，在乐楼上可将整个教堂尽收眼底。在主圣台的上方，是用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镶嵌的天窗，这些五彩缤纷的玻璃天窗，使古朴的教堂显得更为庄严、美丽。教堂大厅里摆放着一排排木椅，可同时容纳四五千人来堂做弥撒。在一进教堂大门的东、西两侧分别摆放着一个“献礼箱”，那是接受信徒捐献用的。天主堂是东跨院的主体建筑，也是南堂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堂由东跨院和西跨院两部分组成。西跨院主要建筑群，是圣母山和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及雕像前的圣台。圣母山正中，供奉着圣母玛利亚的彩塑雕像。圣母山也是天主教信徒参拜的重要场所。

在圣母山的旁边，立着两个玻璃橱窗，一个玻璃橱窗陈列着用中、英文字书写的南堂的简介，另一个玻璃橱窗内陈列着用中、英文书写的有关南堂的历史资料。橱窗内的有关南堂的史料简介如下：

“顺治九年御制匾额《钦崇天道》。

顺治十四年皇帝赐御书堂额《通玄佳境》。

康熙时“玄”避讳改为“微”字。

康熙十四年皇上两次临幸天主堂。命侍卫大臣

赵昌等在堂叩拜天主。回朝后御题“万有真原”

匾额，命悬挂天主堂内。又命摹写若干份分送

各省天主堂一体悬挂。别又御题“敬天”二字之匾，

亦命悬挂。

康熙三十八年为宣武门天主堂作律诗一首：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知由来是化工。

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圣母山后，是北京教区大主教傅铁山主教和本堂神父居住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神父院。神父院内有两排平房，院内北面有十几间房屋，居中的房屋是客厅，客厅布置得很典雅。神父院内的西面有八九间房屋，这些房屋是神父们居住、生活的主要区域。傅铁山主教就居住在这里。据院内的神职人员介绍，神父院内共居住着八位神父，最年长的神父是罗福林神父，他已经 86 岁了。神父院院内被一块块长方形的绿地铺满，到了春、夏之际，绿树成荫，小路两边一盆盆鲜花将神父院点缀得更加美丽，显得格外恬静。也许是为了保持神父院的幽静，一块木影屏遮住了人们的视线，把喧闹的人群与神父院隔开。

除神父外，南堂还有不少神职人员，他们负责南堂的日常工作。神职人员的办公室就设在南堂一进大门的东、西两侧。天主教“天光”报的编辑部和“天爱诊所”也设在南堂。“天爱诊所”还设有口腔科、按摩科。南堂的神职人员对人们的来访非常热情，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总是盛情接待，不厌其烦地回答着来访者的问题。

平日到南堂来的人并不多，但是一到星期天，来南堂做弥撒的信徒便络绎不绝。每当举行弥撒时，教堂钟声响起，神父高亢的声音在教堂里回荡，圣歌队的歌声飘扬在教堂的上空。圣诞节时到南堂来的人就更数不胜数了，教堂里，圣母山旁，院子里，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每逢圣诞节之际，南堂便张灯结彩，彩灯彻夜不息，大门洞开，迎候着四面八方的宾客。尽管是寒冬季节，教堂内外仍挤满了人。圣诞之夜的南堂，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真可谓是北京一大人文景观。到南堂来的大部分人，主要是中国和外国天主教的信徒，还有一些是前来考察的搞社会学的大学生，当然还有一些是好奇的群众前来看热闹的。

南堂的建置沿革

南堂最初建于明朝。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批允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留居、传教，南堂最初就是他的寓所。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获准在京居住后，以五百金在宣武门内购地置屋。为了过宗教生活，利玛窦还买下寓所旁的"首善书院"（原为明东林讲学之所），将其改建成一座经堂。传教伊始，信徒为数不多，所以初建的经堂规模很小。当时，利玛窦在经堂内摆放了由西方带来的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画像，将一架十字架摆放在圣台的中央。与众不同的是教堂外观和西式的内部陈设，使北京人十分好奇，经常有人进入经堂观瞻浏览。利玛窦神父是来者不拒，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地与众人交谈，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

1582年（明万历十年）利玛窦奉命来到中国后，就废寝忘食地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字，研究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民俗习惯，而且穿上中国的儒服，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利玛窦，尽可能地使自己像一个中国人。为了吸引中国人到教堂来，利玛窦有意把教堂称为寺庙，并且对基督教的教规作了重大的变通，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如在举行天主教的弥撒时，不要求中国信徒脱帽致敬；在中国神父主持宗教活动时，让他们使用本国语言。利玛窦这种顺应中国文化而传教的做法，使基督教在中国得以顺利的传播。为了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立足，利玛窦还广泛结交士大夫和上层人士，将世界地图、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日晷仪、报时钟、西洋琴等赠送给他们，并且向他们介绍西洋文化和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瞿太素、李心斋、李卓吾、李公素、叶向高等学子文人，郭应聘、徐光启、王应麟、李之藻、赵心堂、杨廷筠等

公卿显宦，都在利玛窦的影响下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领洗入教。一些尚未入教之达官贵人、鸿儒硕学、督抚司道，亦皆踵门请见，殷勤结纳。利玛窦于是又首创了基督教信徒团体——天主母会。随着信教人数的增加，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又建造了一座比较可观的教堂，即宣武门南堂。“堂（南堂）在宣武门内东城隅，大西洋奉耶稣教者利玛窦，自欧罗巴航海九万里入中国，神宗命给廪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稣像其上，画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次，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有瞩，口容有声，中国画绘事所不及。所具香灯盖帏，修洁异状。右圣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儿，耶稣也。衣非缝制，自顶被体，供具如左”。[①]宣武门教堂（南堂）是基督教在北京建立的第一座教堂。

利玛窦于1610年5月11日病故于北京。他被安葬后不久，南京教案便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爆发，自此明朝政府严禁中国人信教，并令在京之耶稣会士俱归澳门，南堂遂被官府封禁。1629年（明崇祯二年）礼部尚书徐光启受命主持开局修历。他举荐一些精通天文历法的传教士来北京，参与修历。南堂才又成为传教士的住所，并恢复昔日的宗教活动。

1630年（明崇祯三年）经徐光启的推荐，明崇祯皇帝同意将精通天文历法的日尔曼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从西安调进京城到历局任职，从此汤若望在朝廷任职，开始了修订历法、编辑《崇祯历书》和铸造大炮的工作。汤若望在为明朝政府服务期间，抓紧时机在紫禁城内传教，并将一些后妃、太监吸收入教，还在紫禁城中建立起一座小教堂。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汤若望被晋升为北京耶稣会传教区区长。

---

①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153—15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明清易代后，汤若望在中国的地位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汤若望在兵荒马乱中仍然坚守在南堂。清朝攻占北京后，汤若望上疏清政府，奏曰："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帙，付工镌刻，尚未完竣，而版面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理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1]第二天清朝统治者便法外施恩，并下令保护汤若望和教堂，诏谕天下"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2]清政府特颁布满文告示，并张贴在宣武门教堂的门前。清朝入主中原后，出于修历的客观需要，对这位通晓天文、历法的德国传教士十分器重。清顺治元年八月（1644年9月），汤若望精确地推算出全国各城市的日食时刻，使他在清朝的地位得以巩固。汤若望曾多次奉召入宫，与摄政王多尔衮论说新历之长。摄政王多尔衮鉴于清初"旧历岁久差讹，西洋历法屡屡密合"之事实，遂于顺治二年（1645年）将汤若望等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钦天监监正，"定造时宪新历"。在汤若望的掌管下，钦天监不仅成为研究天文历法的机构，而且也成为耶稣会会士活动的中心。天主教在北京的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北京的天主教信徒达15000人之多。清顺治皇帝亲政后，"诰授汤若望光禄大夫，并恩赏若祖先三代一品封典"。[3] 1650年（清顺治七年）顺治皇帝又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原天主堂旁空地一块，准许汤若望重新修建新教堂，而且还赐银一千万两为建堂之用。[4]当时满朝文武大臣亦

① 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第55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② 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第56—58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③ 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第56—58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④ 《基督教》，第16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争相捐助，连顺治皇帝的母亲也为在宣武门修建大教堂赏赐了银两。汤若望亲自绘画了大教堂的草图，并制定具体的施工计划。在他的精心策划与辛勤劳作下，一座位于北京南城热闹地区的大教堂，在1652年（清顺治九年）终于建成。“一年之内，城里长出了一座在远处一望而知的20米高的巴罗克式教堂。教堂上边一座圆顶，内有三间大厅，五座圣坛。……沙尔的同志及接班人南怀仁这样评价教堂的建筑，‘连罗马都会为这样一座教堂的建筑而骄傲的，这是伟大的建筑艺术之一’。”[①] 新建的大教堂很宽阔，圣堂长8丈、宽4丈四尺，以无玷圣母为主保。除了正式的圣堂外，东西院还设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和传教士的住宅等。4米高的铁质十字架矗立在教堂的顶端，使人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教堂竣工后，汤若望立碑记其事。在大理石石碑上刻着：“至万历时西士利玛窦等，先后踵人中国传教，译有经典，著有书籍，传衍至今。荷蒙清朝特用西法，定造新历，颁行历务，告竣。谨于都城宣武门内虔建天主教堂，昭明正教。时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为大清顺治七年次庚寅。修政历法汤若望。”南堂落成后，顺治皇帝曾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匾额，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御笔亲书了“通微佳境”门额和御制天主堂碑铭，对汤若望作了高度的评价。在南堂的“西边为时宪书局，有扁曰勤慎可嘉，世祖章皇帝御书”。[②]《檐曝杂记》曾这样描述南堂：“天主教在宣武门内，……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所供天主为美少年，名耶稣，彼中圣人也。像绘于壁而突出，如‘似’离立而不著壁者。堂之旁有观星天，列架以贮千里镜”。[③]

① 《通玄教师汤若望》，第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②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第3册，第77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③ 陈宗蕃主编：《燕都丛考》，第4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南堂数百年之沧桑

南堂建成以后，出于对汤若望的尊敬和关怀，顺治皇帝在1656和1657两年（清顺治十三年—十四年）之间，曾24次到南堂巡视，并与汤若望长谈。顺治皇帝亲切地称汤若望为“玛法”（玛法是满语尊师之称）。由于得到顺治皇帝的厚爱，汤若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南堂也成为京城众人瞩目之圣地。

但在1664年（清康熙三年）顺治皇帝去世3年后，一场灾难降临到汤若望的身上。汤若望被杨光先参劾而入狱，南堂也因此一度被毁。汤若望获释出狱后不久，于1666年（清康熙五年）8月15日在宣武门内的南堂去世，享年74岁。康熙皇帝亲政以后，重新审理汤若望案件，并亲自为他平反昭雪，还将所占用的教堂、墓地全部归还给天主教，当年顺治皇帝授予汤若望的官职和“通微教师”（为避玄烨的玄字，改“通玄教师”为“通微教师”）的称号亦予以恢复。1670年12月（清康熙九年十一月），康熙皇帝又恩准在北京修建南堂和东堂两座教堂，允许恢复宗教生活。

继汤若望之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深得康熙皇帝的恩宠与厚爱，钦天监监务皆由其掌管，并允准他在南堂居住。1675年（清康熙十四年），康熙皇帝两次亲临南堂看望南怀仁和传教士，回朝后还为南堂御题“万有真原”匾额和“敬天”匾额，命悬挂于南堂大堂中。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北京被划为主教区，康和之任北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将南堂作为主教座堂。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康熙皇帝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又为南堂御笔亲书律诗一首。后来，由于南堂曾两次遭地震的破坏，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特

赐国库银十万两，"饬工部重建大堂"。[1] 南堂重建后，康熙皇帝还为它题写了长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意，聿昭拯济大权衡"以及门额"天文历法，可传永久"、堂中匾额"密合天行，尽善尽美"、后厅匾额"声清气和"和对联"云从高处望；琴向静中弹"。[2] 后因罗马教皇颁布禁止中国天主教信徒祭天、祭祖和尊孔的6条禁约，康熙皇帝曾明谕禁教，直至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均不曾有所改变。不过，清政府虽然颁布禁教令，但是并没有消灭天主教的意思，而且继续留用大批西方传教士，容许年老体弱的西洋人留居中国。并允许南堂仍然由传教士居住。至雍正年间，北京还有传教士20多人，南堂与东堂有神父11人、修士5人，北堂有神父12人、修士11人。新建的西堂由雍正皇帝的西学教师德理格居住和使用。乾隆皇帝也留用一大批精通历法、绘画、医术和物理的西方传教士在朝廷任职。北京四大教堂不但完好地保留着，而且还让神父们自由举行教会礼仪，信徒也可以瞻礼。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在南堂的东、西两壁上画满了宗教历史画，彩绘形象逼真，栩栩如生。1775年3月（清乾隆四十年二月），南堂由于传教士管理不善而失火，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为南堂御书之匾额及对联全都被烧毁。乾隆皇帝又赐库银一万两，饬令将天主堂照康熙例重建。"所有匾额和对联，又都由皇帝亲笔御题，完全恢复旧观"。[3] 直到道光年间，南堂一直由葡萄牙籍传教士高守谦和毕学源主教居住与管理。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毕学源主教临死前，将南堂堂产契据交与了在北京的东正教教会的手里。当时一些居住在南堂的传教士，常常偷贩鸦片，所以在毕学源主教病死后，清朝查封了南堂，将其宅院拆毁变卖，只剩下

---

① 姜立勋等：《北京的宗教》，第32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②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第3册，第77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③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63页，台湾光启出版社，1993。

了一座空空的教堂。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法国派使臣拉萼尼前来中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迫使道光皇帝废除对天主教的禁令。西方传教士获得在中国传教的权力后，进而要求发还被封闭的教堂。从此保护西方传教士和发还教产的问题，便成为中国与法国交涉的主要问题之一。1856年（清咸丰六年），英国与法国向清朝政府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1860年（清咸丰十年）攻克了北京，清朝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清政府不仅重申“给还旧产”，同意发还被查封的天主教教堂，而且还允许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传教建堂。法国政府依据这个不平等条约，催逼清朝政府首先归还南堂。南堂随即启封，由毕学源主教死前托付的俄国传教士的接班人归还南堂契产。北京的北堂、西堂和东堂亦相继归还给了天主教会。

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孟振生在英法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充当帮凶，不但参加攻打大沽口的战斗，而且还出任法国外交使团的谈判翻译。1860年（清咸丰十年）10月23日，孟振生等来到法国大营，又充当了法国侵略军和恭亲王之间的联络员。法国侵略军中将司令官孟托班（Wontauban）决定在已经关闭20多年的南堂，为侵略军阵亡士兵举行“追思弥撒”。当时南堂一片荒芜，部分屋面已经损坏，铁十字架已被拿走。孟托班“派一队工程兵，带了必要的工具，在四十八小时内把教堂装修就绪”：不到两小时，原来的十字架便被“重新放到了教堂顶上”，还放上了钟。29日，孟托班“由全体幕僚和一大群军官陪同坐着轿子进入南堂”，由一个法国随军神父为法国侵略军阵亡士兵举行了追思弥撒，这一天

也是南堂重新开堂的日子。[1] 1860年（清咸丰十年）南堂重加修葺开堂后，主座教堂即由南堂迁至北堂。

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飞扬跋扈，为非作歹，肆意欺压中国百姓。传教士的不法行为终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仇教情绪日益增长，各地反洋教的斗争迭起，终于酿成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南堂遂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6月14日被愤怒的义和团团民焚毁。不久，在八国联军的进攻之下，清朝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德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支付大量赔款。外国传教士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了南堂，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重新建成。若瑟会总院和仁爱会管理的万生医院等慈善机构仍然设在南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南堂就是当年修建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南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堂成为中国天主教信徒自己的教堂。1959年，北京教区在南堂举行主教祝圣大典，姚光裕主教成为新中国北京教区第一任自选自圣的主教。南堂再次成为主教府，并成为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即使在1958年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历史悠久的南堂和北堂也没有被挪作他用，国家仍然将南堂交给教会使用与管理。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南堂虽然被移交改为玩具加工厂使用，但是教堂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南堂首先对外开放。1972年南堂开始接待外国来宾与教友。1978年南堂

[1]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54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对外开放，并且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成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教堂。现任正权主教傅铁山，于1979年被自选自圣。北京天主教教区和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就设在南堂，北京教会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接待工作，每年接待外国来宾达17000多人。今日的南堂已经成为重要的外事服务窗口，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重要场所。

新中国建立后，曾对南堂多次进行修缮。这座古老的宣武门南堂，如今已经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书目：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

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陈宗蕃主编：《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北京天主教西堂——西直门天主堂

天主教北京教区西直门天主堂坐落在北京市西直门大街130号，是北京天主教四大堂中建筑最晚的教堂。

西直门天主堂又称圣母圣衣堂，以表示对圣母玛利亚的敬意。圣衣是指天主教徒衣服上所佩戴的圣物。因其位于北京西城，所以京城百姓又称之为西堂。西堂东临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邮电部北京设计院，西临北京西桥宾馆，马路对面是北京教育学院西城分院。

西直门天主堂今已破烂不堪，如果不是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着“西直门天主堂”几个字，很难以看出这里曾经是规模宏大的教堂。

西直门天主堂始建于1723年（清雍正元年）。教堂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具有典型的意大利式建筑风格。教堂的修建者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德理格神父。他1693年入遣使会，即圣味增爵会，1701年由罗马传信部指派，随铎罗特使来华。1711年（康熙四十九年）到达北京。德理格曾教授皇子西学，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不但博学，而且精通音律，还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来中国前曾经为意大利的皇宫作过曲，他不仅教授皇太子（雍正）西学，还教授西方乐理、五线谱的编制、用法。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作品手稿10卷。从德理格以后，西方音乐及乐器陆续传入中国，可以说德理格是继马可·波罗、利玛窦之后又一位沟通中意文化交流的使者。

西堂建立之初直属罗马传信部管辖，后来由外方传教会主持，再以后奥斯定会的德天赐也居住到这里。

当时西直门地区离北京城区较近，附近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也

较多。为了方便教徒们的宗教生活，德理格神父就买下了40多亩地，在那里建造西直门教堂，又称圣母七苦堂。由此可见，当时西直门教堂的规模是多么的宏大。

1764年12月10日，德理格神父因病去世。死后也像他的前辈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外国传教士一样，被埋葬在阜成门外马尾沟的天主教墓地。

从雍正到咸丰，清政府采取的是与清朝前期不同的禁教政策。嘉庆和道光两朝，清廷也经常颁布不准传教的禁令，北京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严密的监视。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清政府下令只允许在朝中供职的外国传教士继续留居北京，其他的外国传教士必须迁居外地，不允许外出传教，违反禁令者将被驱逐出境。就在这一年，西堂的传教士违反禁令，清政府遂下令把西堂全部拆毁，堂内的4名传教士被驱逐出境。直到1860年，西堂和住房才还给了天主教会，7年后的1867年（清同治六年），西堂重建。

在义和团运动中，西直门天主堂同样遭到团民的攻击，未能幸免于难，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6月15日被焚毁，片瓦无存。后来在1923年西直门教堂建堂200周年时重建，才基本上恢复了原貌，现在教堂的东侧，仍然比较完好地保存了当时的建筑风貌，奉圣母圣衣为主保，墙上雕刻的花纹清晰可见。

西直门天主堂当时还兴办了一所小学，一所幼稚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先后改为北京市钮扣厂、电扇厂。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教堂也变成同仁堂制药厂的仓库。

“文革”结束后，西直门教堂是北京四大天主教堂恢复宗教活动最晚的一个，直到1994年才重新开堂，恢复了正常的宗教生活。复堂后的第一位神父是张继雄，现在南堂作副本堂。

西直门天主堂是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中规模最小的一座，但它却享誉京城。西堂目前可容纳500多个座位，重大的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时前来参加宗教活动的信徒可达1000多人。教徒来自

西直门附近，海淀、清河、西三旗，甚至门头沟、香山、西北旺、东北旺、平谷。大部分教徒是受家庭影响而入教的，他们的知识层次较高。教徒中老年人占了一半，中年人约占 30%，青少年约占 20%。教堂附近一些外国公司的职员会讲汉语的也到这个教堂做礼拜，不会讲汉语的则去南堂做礼拜，因为南堂每周日上午 10 点有英文弥撒。

西直门天主堂坐南朝北，共有两层楼，外观呈瓦灰色，不像南堂、东堂、北堂和东交民巷教堂那样豪华气派，倒有点像基督教堂的建筑风格，样式非常一般。教堂的西侧（原来的钟楼）是教堂的综合办公室，办公室入口处有一个黑板，上面写着西堂的弥撒时间、圣诞节的活动安排。

与其他几座天主教堂所不同的是，西堂每月都要举行一次集体傅油（又称病傅）。时间是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在早晨 6 点半开始的弥撒中举行，领受人是堂区内患有严重疾病和年龄较高的教友。傅油是天主教的七件圣事之一，傅油圣事的作用是通过神父给患重病和面临死亡危险的教友覆手和擦圣油，赋予领受人内心的力量与平安，以减轻病人的痛苦甚至恢复健康，或准备去见天主。

傅油和坚振、圣体、圣秩、婚配称为善人的圣事，因为领受这些圣事的人必须心灵上没有大罪，已有宠爱在心。为此，领受这些圣事时可以增加天主的宠爱。傅油可领多次，且不印神印。

教堂的入口处有一块《改建圣母圣衣堂碑记》的黑底白字的碑贴，记录了西堂的盛衰：

> 竊維圣教永存苍生，洪济数千年。轶发轶舆，诚天主之灵佑在焉。遣使会司铎理格尔于一千七百二十三年，独输钜资，购置斯基，募建圣母七苦堂一座。一千八百一十一年，适清嘉庆间圣教蒙难，全堂被毁。迨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主教孟慕理重为购筑，宏工钜制，规模

一新。讵意一千九百年六月十五日遭拳匪（义和团）之祸，本堂金思铎遇害，堂宇院落，一炬无遗。一千九百十二年，仁爱会修女博郎西耶氏复捐资新并刱，更易今名。落成之日，北京林主教饬勒石以志颠来云尔。

西历一千九百十三年二月

勒石

与之相对的东侧是一块拉丁文说明的石碑，也是黑底白字。

教堂内部呈长方形，高大宽敞，有十六楹绿色的木柱，柱子上方雕刻着精制的木花纹。东西两侧墙上挂着14幅耶稣受苦图。圣台上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即圣母圣衣像。画中间是头戴金冠，身穿白衣红裙的圣母怀抱着圣婴，神态慈祥。淡蓝色的天空中飘浮着七位可爱的天使，远处是一座圣城。画面十分圣洁、高贵。圣台的正中是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圣台的两侧各有6根蜡烛，几束绢花。圣台下面第一楹柱子上，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塑像，造型逼真。二楼正对着圣台的是唱经班。堂内全部为木制跪凳和凳子，上面贴着红毡子。

西直门天主堂星期一至星期日，每天都有宗教活动。教堂还组织了唱经班，经常演唱宗教歌曲。

西直门教堂是自养堂，资金由教徒们自愿奉献。教堂多次组织教徒们进行赈灾、扶贫活动，把教徒们捐献的棉衣、棉被等物品送到延庆、内蒙、河北省张北地区，帮助灾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1998年秋，笔者第三次来西堂时发现在堂内入口处放着一个抗洪赈灾的捐款箱，有不少教友慷慨往箱里捐钱，可见教友们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心系灾区人民。

目前西直门天主堂有神父一人，毕业于北京神学院。义工十多人，由教徒自愿担任，不领薪金，为教徒们服务。

北京天主教区已经提出申请，要求恢复西直门天主堂初建时的风貌。1991年初，北京市政府做出一项决定，将对北京近代以

来的西洋建筑进行维修、保护，西堂也在其列。教徒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那时北京又将增添一处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参考书目：

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北京天主教东堂——王府井天主堂

王府井天主堂，又称为东堂、圣若瑟堂，是继宣武门教堂(南堂)后北京第二座天主堂。她坐落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76号，东安门外八面槽路东，坐东朝西，虽身居闹市却显得非常的悠静，原因是东堂的进深很大，距马路有四五百米远，可谓是闹中取静。

教堂的建置沿革

东堂原来是意大利与葡萄牙传教士的住地，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P・Tudovicus Buglio 1606－1682)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de Uagalhaens 1609－1677)在明朝末年曾在四川传教，后被清军掳到北京，在肃王府当差。后来，这两个传教士为信徒买了几间房屋作为小教堂。顺治皇帝即位以后，任用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担任钦天监，天主教受到保护，1655年(清顺治二年)，顺治皇帝赐给利类思和安文思一所宅院作为府第，这就是今日东堂的所在地。同年，利类思和安文思便在此修建了东堂。

东堂又称为圣若瑟堂，是为了纪念耶稣的父亲圣若瑟而命名的。天主教会认为若瑟具有朴实、勤劳、仁义、谦逊、安贫、忠厚和善良等许多美德，他是教会的主保，即教会的保护人，是人们“痛苦的安慰”、“病人的希望”和“邪魔的恐惧”，能够除恶扬善。

我国天主教徒对若瑟十分崇敬，上海也有以圣若瑟命名的教堂，位于上海四川南路36号。中国也有不少信徒在受洗后取若瑟

为教名，著名的教育家、天主教爱国人士马相伯的教名就是若瑟。当时建东堂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住在北京东城的天主教徒们的宗教活动。清初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晚年就住在东堂，南怀仁、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也在东堂住过。郎世宁曾经为东堂做过耶稣圣心像，非常名贵，挂在圣心圣台上。他还为东堂画过多幅圣像、彩画，十分华丽。1720 年（清康熙五十九年）东堂因地震而倒塌，第二年费隐用葡萄牙国王费德立克三世的赠款扩建成欧式教堂，一度充作耶稣会传教士的住所。1801 年（清嘉庆六年），葡萄牙的遣使会士李拱辰、福文高接管了这座教堂。可惜的是，1807 年（清嘉庆十二年）教士因夜间运书，打翻灯火，引起火灾，教堂和圣像悉被烧毁。当时东堂的福文高、李拱辰神父在钦天监任职。失火后，他们上书引咎，自请处分，同时请求皇帝按照“乾隆四十年南堂失火，帝赐银一万两，敕工部重建前例”，赐银重建。但是，嘉庆皇帝不仅没有赐银两重修东堂，反而命令福文高、李拱辰两位神父移居南堂，将东堂没收，将未被烧毁的大堂拆除，把东堂的堂基赏赐给了一位大臣。

1814 年（清嘉庆十二年），教堂东侧的藏书楼失火，教堂再度被烧毁。后来重新进行修建。嘉庆和道光两朝，清廷下令严禁传教，命东堂神父搬到南堂居住，将东堂的房屋没收，拆除大堂，东堂遂被废弃。直到 1860 年（清咸丰十年），清廷才把东堂发还给教会，修建了几间平房。1884 年（清光绪十年），田类斯主教募集巨款，重新修建成一座罗马式的天主教堂，显得非常豪华，气度非凡。但在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6 月 13 日，这座新盖的天主教堂又被焚毁。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教堂第三次重修，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教堂，它中间部位还清晰地刻着“1905”几个字。

今日之东堂

我们现今看到的是1905年所建的教堂，外观宏伟高大，以灰色为主，用白色作为点缀的石质的罗马式建筑。教堂上方正中是一个大十字架，两旁各有一个小十字架。据说当时这几个十字架都是铁铸的，刻有花纹，造型十分精美，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拆毁，现在改为木制包铁皮的十字架。文化大革命中，教堂曾被天安门管理处占用当作仓库，所以保存基本完好，内部设施基本未遭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宗教政策，将教堂归还教会。1989年12日23日，圣诞节前夕东堂重新开放，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

走进东堂的大门，通过绿荫荫的甬道，迎面而来的是高大雄伟的教堂。

教堂的下方镌刻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庇民大德包中外"，下联是："尚文宏醺冠古今"，横批是"惠我东方"，即让耶稣的恩泽惠顾东方古国中国之意。教堂两侧，原有刻制精美的中西风格相结合的装饰花纹，可惜有些花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掉了。

教堂内部宽敞明亮，富丽堂皇，呈圆拱型，非常高大，达14米。正前方是圣心圣台，上面供奉着圣若瑟怀抱耶稣像，堂中心有镏金装饰的讲经台，两侧是18楹金丝楠木柱子，后面的两楹更粗一些，柱子上面刻有精美的云彩花纹，柱顶有木刻的浮雕。彩色玻璃镶嵌的窗户十分华丽，墙壁的两面悬挂着描绘耶稣受苦情景的14幅油画。教堂可以容纳1000多人。教堂南北两侧各有两个浅黄色的告解亭，这是供犯罪的教友表示悔改和接受罪教之处。

圣台上圣若瑟怀抱圣婴像的两侧是一副对联，上联是："病者之仰望"，下联是："苦者之安慰"。圣台前两楹柱子上也写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基督圣爱充满人间"，下联是："上主神光普照大

地”。圣像的左右两侧是两个分圣台，左侧供奉的是圣若瑟像，他身穿红衣，背景是粉红色，上面飘浮着白色的云朵和和平鸽，左右是一副红底金字的对联，上联是：“倾流宝血点点恩波”，下联是：“披示慈心焱焱爱火”。分别有两个烛台，6根蜡烛和4瓶绢花。圣像的右侧供奉的是圣母像，她身穿白衣，背景为天蓝色，上面也飘浮着白云和和平鸽，左右也有一副对联是蓝底金字，上联是：“我等奔尔台前为我等祈”，下联是：“呼玛利亚无原罪之始胎”。也分别有两个烛台，6根蜡烛和4瓶绢花。

圣台左下侧是为了庆祝圣诞节建造的圣诞山，在蓝色的天幕中闪烁着许多星星，山下是6棵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圣诞老人等饰物。笔者看见一位老年女教友，正在给一对母女讲述耶稣降生的故事。她说“耶稣没有生在王宫里，也没有生在自己家里，更没有生在产科医院里，却生在旅途中，生在一个荒凉山洞的马棚里，生在深夜的严寒里。耶稣诞生在如此贫困的环境中，忍受着潮湿、阴冷和骚臭味，告诉我们他来到世上是为代人受苦赎罪。我们今天也不要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荣华富贵都是暂时的，不能长久。”

教堂的二楼是唱经班，星期日和重要的节日、主日、圣诞节都要唱经、敲钟，钟楼在唱经班的后面。1998年12月中旬，笔者到东堂参观，看见了唱经班的教友们在练习演唱庆祝圣诞的宗教歌曲，歌声优美动听。虽然不是正式的演出，每当唱完一支曲子，在堂内活动的教友们都为他们热烈鼓掌。女指挥潇洒自如，男中音浑厚有力，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一天的上午10点半，东堂的神父在为一位小姑娘和一对老年夫妇进行洗礼，宣读福音后施洗。神父先率领全体教友为受洗者祈祷，求主光照他们的理智，认清他们所犯的一切罪恶，感化他们的心，让他们痛改前非，做天主的好儿女。然后同受洗者一道念痛悔经，再为他们傅领洗圣油，并为他们覆手，领他们进入圣洗礼，施洗后，神父为新施

洗者傅圣油，授白衣，授蜡烛，傅圣油叫坚振圣油，表示主教为新受洗者祝圣，由圣神赋予受洗的恩惠，使之与基督相合为一，以求永生。授白衣表示新受洗者已经获得新生，心灵圣洁，应该经常保持心灵的圣洁如同这件白衣一样，以获享永生。授蜡烛表示新受洗者在基督内已获光明，应更加努力，在言行上成为光明之子，点燃自己，照亮别人。洗礼非常庄严、神圣。洗礼过后，老教友要向这几位新受洗者表示祝贺。天主教规定，一个人受了洗就成为永久的，不能再受洗，受洗的人因圣洗圣事皈依了基督，在他的心灵上印上了属于基督的不灭神印，任何罪恶都不能消灭他。

王府井天主堂每天早晨都有两台弥撒，星期六有晚弥撒。来东堂做礼拜的，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居民，星期日也有一些外国信徒前来参加宗教活动。

王府井天主堂现在有 2 位神父，3 名义工。教堂经常组织一些赈灾、扶贫等公益活动。教友们也自发地捐款捐物，集资维修教堂。笔者在 1998 年 6 月初来这里进行采访，就亲眼看见不少教友义务为东堂修建厕所与采暖设备。

由于王府井天主堂历史悠久，建筑风格独特，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于 1990 年 2 月 23 日将它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90 年代初，教友们集资在东堂的西北侧修建了一座西洋风格的圣若瑟怀抱耶稣的白玉雕塑，与旧堂相呼应。

北京最小的天主教教堂
——东交民巷天主堂

东交民巷天主堂，位于北京市东交民巷东街甲13号，又称圣米厄尔天主堂。圣米厄尔是天神之意，是教会的保护神，专门射杀魔鬼，保卫教会。据说教徒们死后灵魂升入天堂，也由圣米厄尔来引导。

《圣经》中记载，圣米厄尔有许多伟绩，他曾经带领天国中由天使们组成的三军打败了魔王撒旦和他的党羽，把他们打入了地狱。中国经文中称圣米厄尔为三军之帅，总领天使。每当天主教徒感受到魔鬼撒旦的侵扰时，他们除了向天主、圣母祈求帮助外，也常常祈求圣米厄尔给予帮助。由于天主教十分崇敬圣米厄尔，北京的天主教会修建了这座圣米厄尔教堂。另外，青岛也有一座圣米厄尔大教堂。

教堂的建置沿革

东交民巷天主堂始建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由当时的法国传教士高加理神父主持修建，后来又由法国人靳利国扩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东交民巷旧称江米巷，《辛丑条约》签订后，东交民巷地区成为法属租界，它的范围很大，东起崇文门大街，西至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北至东长安街路南，四周建有围墙，租界内建有使馆、兵营和碉堡。那里居住着许多外国人，而且集中了一些外国使馆和外国银行，如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

银行、法国的汇理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和德国的德华银行等。这里还有仅次于北京饭店的六国饭店，以及德国医院、法国医院、外国洋行等。为了满足这些外国人的宗教生活，修建了这座教堂。它实际上也是中国近代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一个有力见证。

东郊民巷天主堂是近代北京修建的最后一座天主教堂。但它的规模与南堂、北堂、西堂相比小得多。可谓是小巧玲珑，别具特色。最初这座教堂专供外国人使用，后来东郊民巷附近的中国教徒也可以进入教堂内参加宗教活动。

东交民巷天主堂和北京四大教堂相比，它的规模虽然最小，但是它的建筑风格却非常讲究。院内北侧是一座二层灰砖砌的西式楼房，供神父与神职人员居住。圣堂在西部，坐北朝南，堂顶南面为两座锥形尖拱。钟楼有三层，塔四周均有塔花。正门两侧均有壁龛，为圣贤阁，东龛供奉若瑟，西龛供奉圣母。堂东西两侧墙上，镶嵌着彩色花玻璃，据说这些花窗的彩色玻璃还是清末从法国运来的呢！堂顶为斜坡形，上覆灰琉璃筒瓦。东交民巷天主堂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远远望去两个对称的尖顶建筑耸立在绿树丛中，周围是一组小尖顶的建筑，错落有致，很有特色。东郊民巷天主堂呈垂直形状，给人以伟岸挺拔，高耸入云，至高无上的感觉，更加突出了天主教的圣洁和神秘感。

东郊民巷天主堂在1958年曾被关闭，文化大革命中被东交民巷小学和松鹤楼饭店占用。1989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重新开放，恢复了宗教活动。

教堂的现状

东交民巷天主堂占地2656平方米。大门是墨绿色的铁门，门的左侧墙上镶着一块白色的石碑，上面写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圣米厄尔教堂 北京市人民政府1995年10月20日公布，北京

市文物事业管理局1996年10月立。”大门的右边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书：东交民巷天主堂。

一进大门，是传达室，与之相对的是由教友在1990年集资捐献的圣母像，在黑色的基座上面站立着通体洁白的圣母，四周是鲜花环抱。院子里有十几只和平鸽正在悠闲自得地吃着食物。天主堂坐北朝南，建在高台上。主体呈瓦灰色，墙上刻有三幅白色的大理石雕像，正中是天神圣米厄尔，他身穿铠甲，高举右臂，两手紧握一根长矛，挺胸抬头，目光炯炯，直视前方。他的左下侧是圣徒伯多禄，右下侧是圣徒圣保禄，据说这两位是天主的宗徒。

教堂有两个圆拱形的红漆大门，大门入口处左边放着一个白色的献仪箱，上面写着英文红字：OFFERING BOX，右边是本周的活动安排表。进入教堂看到一个红色的献仪箱，上面写着英文金字：OFFERING BOX。与其他教堂不同的是，这个献仪箱上面有一个小圣母像，圣母身穿白衣，头上写着：“我乃始孕无玷”。

教堂内部呈长方形，以花砖铺地，配上色彩斑斓的玻璃长窗，四周墙壁上是耶稣受难图14幅。堂内共有22楹红木柱子，凳子和跪凳上面都贴着绿色的毡子。圣台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在它的上方是白色的圣米厄尔雕像，造型逼真，神态自若，呈半蹲状，左手拿着天平，右手握着宝剑。圣台上有四个吊灯，左右各有一个大烛台，上面插着蜡烛，摆满了绢花。圣台的上方栏杆内供奉着圣体龛，它安放在堂内最尊贵之处。圣台两侧有一副紫色底白字的对联，上联是：“抬头瞻望救援就在眼前”，下联是：“俯身默想虔诚期待救主”。

教堂的东西墙壁上各有两个塑像，西墙上南面的一座是圣若瑟怀抱耶稣像，北面的是耶稣像。东墙上南面的塑像是圣女德勒撒，北面的是圣母玛丽亚像。这些塑像人物造型逼真，各具特色。唱诗班在二楼，正对着圣台。

东交民巷天主堂是北京市惟一用拉丁文做弥撒的教堂。弥撒每天早晨7点钟开始，先做拉丁文弥撒，尔后是中文弥撒。教堂也有唱经班，由教友自愿参加。

来东交民巷天主堂做礼拜的除附近的教徒外，也有来自远郊区县的教徒，还有在北京医院看病或住院的教徒。东交民巷天主堂每天早晨都有弥撒，星期日晚上是晚弥撒。星期日早晨10点半钟还有韩语弥撒，做礼拜的有韩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韩国留学生、韩国驻华商社如LG电子职员，大约有四五百人。

东交民巷天主堂可容纳1000多人，目前有1位神父，7位义工。

东交民巷天主堂对人教教徒实行点水礼。婴儿受洗，领洗者被称作婴儿的代父（母）。教友的终傅礼由神父进行，教友可以向神父进行忏悔。双方是教徒或一方是教徒，或双方都不是教徒的都可以在这里举行天主教的婚礼，但婚礼的规格是不一样的。天主教反对离婚，他们坚持夫妻的合一性。

东交民巷天主堂热心于公益事业，经常组织扶贫、赈灾等活动。笔者前去教堂采访时见到一位老教友，他的女婿是教堂的风琴师，不拿薪金。老教友让自己的小外孙一个月少吃两次麦当劳，用节省下来的钱帮助大兴县一位母亲身患重病的小学生上学。教堂还多次组织教友们把衣物送到贫困地区。

东交民巷教堂与外国宗教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每周日教堂都有韩语的弥撒。德国藻厄兰州无伴奏合唱团曾在东交民巷教堂与北京教区天爱合唱团在弥撒中同声歌唱，赞美天主。

东交民巷天主堂是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修建的最后一座天主教堂，也是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座天主教堂。从建成到现在，从未遭过火、水、兵等灾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堂由北京天主教爱国会正式接管。

由于东交民巷天主堂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北

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于1995年10月20日公布她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教堂可以称得上是北京市宗教文化的一处很好的景观。

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

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坐落于车公庄三塔寺。很多人不知道这里曾是一处举世闻名的所在，一处埋葬了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的墓地。

400 年前，位于大明帝国都城西郊的这一带方圆 20 亩的地方，最早曾是被称为“滕公”的贵族的私人花园，人们叫它“滕公栅栏”。

今天“滕公栅栏”却成了世界知名的地方，外国人称它为“Chala”。这是因为早在 17 世纪初，它与一个意大利传教士的名字首先连在了一起，之后又有不少从遥远的欧洲扬帆而来的上帝的使者长眠于此。这位最先陨落的“意大利之星”叫做“Matteo Ricci”，他中国名字叫利玛窦，表字西泰。

利玛窦与京西第一处洋人墓地

1610 年 5 月 11 日（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九日），积劳成疾的利玛窦在北京溘然而逝，终年 58 岁。

意大利离中国远达几万里，回故乡安葬是不可能的。当时客死中国的传教士都埋在澳门，已成惯例。与利玛窦共事的外国神父和中国教友们更希望将其就近安葬在北京，以此作为天主教在中国合法存在的证明。况且这也是死者生前的遗愿。他们经过协商，决定由耶稣会士庞迪我出面，给神宗上一份奏章，李之藻为他的奏章作了精心的文字润饰。

为了取悦皇帝，庞迪我在奏章中称：他们“经海上八万余里，

跋涉三载，艰苦备尝”，是出于对天朝德化的仰慕，并因其能朝见皇上，贡献方物，得到皇上“给赐廪饩（俸禄）”，“照例安插”，表示“感激不胜”、“捐躯莫报”。

奏疏继而写道：“不意，于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九日，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异域孤臣，情实可怜，道途险远，海人多所忌讳，必不能将榇（棺木）返国。”虽系远夷，但“生既蒙豢养于斗升”，“死犹望掩覆于泉壤”，就是说，虽然是从远方来的外国人，既然活着时候承蒙皇帝赐予衣食，死后也希望能够有一块墓地。

庞迪我言：“况且，臣利玛窦自从来到圣朝，逐渐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读书通理，朝夕恭敬地焚香祭天，为皇上祝福，愿以犬马报天朝恩典，他的忠赤之心，都城士民人所共知，我不敢说谎。利玛窦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前在本国时，已经是知名之士了；来到上国后，更为学者、官员、有识之士所称赞。”这样一个臣民，如果死无葬身之地，实在是可悲的。

因此他“恳求皇上大开天恩，赐给闲地亩余，或废寺闲屋数间。使异域遗骸得以掩埋，而臣等四人，也可得以与利神父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①

陈情奏章呈给皇上之后，庞迪我将一副本交给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叶向高在南京即与利玛窦过从甚密，到北京后也曾宴请过利神父两次。他说，尽管外国人在京郊求得一块墓地是没有先例和法律依据的，但是对利公来说，则是当之无愧的。他表示愿意促成比事。

明神宗原是个懒得出奇的皇帝，他已经很长时间既不上朝听政又不批答大臣们的奏章了。他每日深居宫中，从不与朝臣们见

①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第620页，中华书局，1983。

面，一切上传下达的事情，都通过太监联系（就连他向利玛窦他们了解欧洲的风土人情时，也全都是由太监来回传话的）。但是这次他却一反其拖拉懒惰之常态，及时地将庞迪我的奏疏转给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嘱其妥善处理。教士们认为，不是因为“全能全知的天主”产生的影响，就是“一直摆在皇帝视线之内”[1] 的利神父进贡的自鸣钟发生了效力。

叶向高以积极的态度，将公文交与专司这类事务的礼部。庞迪我神父于是又向礼部处理文件的推事递上了小小的礼物。与此同时，李之藻特意拜访了礼部尚书吴道南。李向他这位过去的老师长谈了很久，介绍了利神父的为人。吴道南当即慨然应允，大开绿灯。

一个月以后，礼部向皇帝提出了处理办法。他们在《大明会典》中找到了根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年六月十四日记载了他们奏疏。奏疏称，《大明会典》中规定，如果外国使臣来我朝进贡，尚未到京即去世者，所在省的布政司负责置地茔葬，立碑刻石，说明何国、何人、何时来华、何时谢世。另一款又规定，使者来到京师，进贡后未经领赏就病故者，由顺天府官属责成宛平、大兴二县给予棺木银两；如果是在领赏之后病故的，就听其自行埋葬。[2] 这就是说，如果外国使臣来大明京城朝贡期间，客死在途中某省，应由该省官员为他安排一块墓地。另外如果死者已经晋谒了朝廷，而尚未领赏，就由京城的地方官——顺天府尹担负其丧葬费用；如果已经领赏，就从赏金中支付。

礼部在给皇上的呈文中接着说，今利玛窦虽然未经该国差遣，然而因仰慕中国文化和大明德政而自泰西千里迢迢，远道而来，久经皇上豢养之恩……入京朝贡，领取天朝俸禄达十载之久。利玛

---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624 页。

② 《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年六月四日条。

窦已经接受中华学术的熏染，勤奋学习，知书达礼而且著述颇丰。一旦故去，家国远在万里之外，不可能回乡安葬，此情实在值得怜悯。西洋教士庞迪我上疏提出请求赐予墓地一事，臣等认为，利玛窦虽然与外国直接派遣的使臣有所不同，但已在京城住了多年，可以算是本国子民。生前既然朝廷供其衣食，死后岂能让他无地掩埋，而暴露尸骨？而且有庞迪我等四人愿以生死相依。

礼部认为，利玛窦应当给予抚恤，庞迪我等人的奏疏应予依从。恳请皇上将本部意见批转到顺天府，寻找一座空庙及一块土地，给予已故利玛窦为埋葬之所。并允许庞迪我等人就近居住，恪守教规，依其习俗，崇拜天主，也为皇上祈祷。

明神宗又以出奇快的速度，于接到礼部呈文的第二天将其转到阁臣们手中，以叶向高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们阅后，签一“可”字。这表明获得了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通过。有的官员对此持异意，他们以“从无此例”来诘问内阁。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曾这样反驳他们：自古来华的洋人，“其道德学问，有一人能比得上利玛窦的吗？不说其他事情，只凭翻译《几何原本》一书的功劳，就应当赐予墓地了”。[①] 为了感谢叶大人的帮助，庞迪我制作了用象牙雕刻的日、月、星辰图。在叶大人的府邸，庞神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这位大学士很快就学会了看星辰图，还学会如何调节倾斜角可以升降的日晷（中国虽然自古就有日晷，但其倾斜度一律为36度。而西方天文学认为，当倾斜角与所在地的纬度吻合时，日晷的计时才能比较准确）。

从内阁批下来的公文经过漫长的旅行后，到了顺天府尹黄吉士手中。庞迪我又带着礼物拜访了黄吉士。黄吉士非常合作，他向神父提供了四个地点，最后终于选择了“滕公栅栏”这块地方。当神父问及墓地的价格时，中国官员告诉他，这是没收获罪太监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82页。

的财产，由皇上赐予的，因此是免费的。黄吉士还为利玛窦神父送了一方匾，为“慕义立言”四个大字，上款为“泰西利玛窦”，下款为“少京兆　黄吉士立”。表达了他个人对利公道德学问的敬佩之心。

“滕公栅栏”归属于耶稣会士后，礼部尚书吴道南和顺天府尹黄吉士还分别在别墅的大门上张贴了告示。告示大意说，皇恩浩荡，泽被遐迩（远近），施及外籍神父，已若干年。现钦赐利玛窦一块葬身之地，一如本国子民，并作利氏之同伴永久居留之所。在此彼等可实习其宗教信仰。告示还申明：没有神父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该地骚扰，否则将受到惩罚。不久大门上还悬上书有“钦赐”二字的匾额，表明其不可侵犯性。

为了适合死者的身份和信仰，教士们彻底改造了原有庙宇。地藏菩萨被搬倒，墙上反映地狱各种酷刑从而劝人今世行善的彩绘被涂改了。取而代之的是天主教的祭台和耶稣救世主的画像。一座小小的圣堂就算建成了。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交涉和筹划，京师西郊的第一处洋人墓地终于准备停当了。1611 年（明万历三十九）年 4 月 22 日，利玛窦神父的棺木（为了防腐，棺木外面用沥青封得严严实实）从他的故居——南堂起运，由 24 人抬着迁往墓地。众多教徒在带有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的引导下，随后而行。棺木暂厝在圣堂的祭台旁。

利玛窦的墓葬也是中西合璧。他的坟墓是欧洲式的，而墓碑则是中国式的。高大的汉白玉碑体的上方，镌刻着龙的造型，并有代表耶稣会的标志——IHS。墓碑中间刻有一行大字：“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右边是中文小字：“利先生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国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华四十二年。”[1]

[1] 《历史遗痕》，第 2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标点符号是笔者所加）左边是横向书写的拉丁文字，内容与中文所写的大体相似。

5月3日，继任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总负责人龙华民（Nikolaus Longobardi）来到北京。葬礼要由他来主持。他亲自指导设计了在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墓地——在花园的一端，盖了一所圆顶六角底座的小亭，称为丧礼教堂。亭的两边，筑就两道半圆形的墙。在花园的四棵翠柏之下，为神父修造了砖砌的墓穴。这翠柏好像生来就是为这长眠的远方来客遮荫似的。

1611年11月1日，在被天主教称为"诸圣节"的那天的早晨，教友们都来到了圣堂。他们手持蜡烛，燃着乳香。气氛隆重而肃穆。先是在风琴的伴奏声中，举行了该日的弥撒，然后神父们站在利玛窦的棺木前朗诵了《死者祭文》，之后又是葬礼弥撒，最后致了悼词。

从此，这位来自泰西的外国友人就永远地与苍松翠柏为伍，"滕公栅栏"这一名字也逐渐闻名世界了。

《帝京景物略》中，有一节题目就叫《利玛窦墓地》。文中详尽地描写了利玛窦墓地的景色：利玛窦的坟与中国通常的样式不同，"下面是长方的而上面是半个圆柱体，下面像个方台，上面像半棵断木，"坟后为一六角"虚堂"（即亭子），供奉着十字架。后墙饰有花纹，"脊纹，螭之蚑其尾；肩纹，蝶之矫其须；旁纹，象之卷其鼻"。用白话文来说，这段短墙的上、中、下三部分的花纹各有不同：上边的像螭龙的尾；中间像蝴蝶的须；下边的像大象的鼻，砌得异常精美。

书中特别写道：在墓地南面的二重院落之前，立有一架石晷。石晷底座上刻有如下的铭文曰："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1]

---

[1] 《帝京景物略》第20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据笔者考证，这架日晷为利玛窦亲手制作。利公在1597年12月25日于南昌写给他的老师克拉委奥神父的信中，曾提及，他按照老师寄来的《天文学》中的蓝图，制作了两架日晷，并在其中的一架的底座上，刻下了这样的铭文："岁月如梭，已往者不能追回，未来者也不在我们手中。所以奉劝大家要珍惜现在的时日，多行善，勿做无益之事。"[1] 这几句由中文译成西文，又由西文译成中文的格言，与《帝京景物略》中记载的四言四句，意思基本吻合。利公在中国期间，制作了很多日晷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中国朋友，这一架也不例外。一定是那位朋友为了纪念死者，又将这架日晷还给利公，安放在他的墓前。日晷与他绘制的万国地图一样，以其承载的新奇的西洋文化而得到无数中国学者的青睐，成为不可多得的珍品。这架守护着它的作者的日晷，历经沧桑，《帝京景物略》中仍有关于它的记载，但在1958年文物普查的档案中，却渺无踪迹了。

安葬于墓地的邓玉函和罗雅谷

继他们的先驱利玛窦之后，第二个埋葬在"滕公栅栏"墓地的是日尔曼籍耶稣会士邓玉函（Joannes Terrenz）。

1630年（明崇祯三年）5月，早已痼疾缠身的邓玉函，终于因为劳累过度而一病不起，在北京逝世。他出生于1576年，享年仅仅54岁。他在华只生活了短短的十年。这十年中，他几乎无暇顾及宗教事宜，全部精力都用于翻译科学著作和参与修历之中。徐光启在给皇帝的奏疏中称：此臣（指邓玉函）历学专门，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他的突然病故，使我痛失左膀右臂，恐怕修历的工作不能按时完成了。由此可见邓玉函在历局中举足轻重的

[1] 《利玛窦书行集》，第250页，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

作用。

邓玉函逝后，人们为他举行了中西结合式的葬礼，送葬的队伍从宣武门内的南堂出发，走到阜成门外，将他安葬在利玛窦坟墓的左侧。墓碑上以中文和拉丁两种文字镌刻着他的姓名、来华及谢世年代。

《帝京景物略》一书，也记述了邓玉函的一些情况。作者显然对邓玉函很熟悉，说他精通西医，所著的《医说略》称：西药是从该国草木中“蒸取其露”而得，“所论治法，每及人体精微”。他只要尝尝中国草药的味道，便可知“叶形花色，茎实味香”。他曾打算将中草药“遍尝而露取之”。[1] 即今人所说的“中药西制”，并撰写成书，然而却未竟而卒。

在邓玉函之后相继去世，并葬于利玛窦墓地的，是与邓玉函同船来华的罗雅谷和继利玛窦之后任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的龙华民。

罗雅谷，意大利米兰人，生于1593年，与金尼阁、邓玉函等同船来华后，先在山西传教。1630年（明崇祯三年），徐光启为了弥补由于失去邓玉函而造成的历局人手不足，将罗雅谷和汤若望调进历局，直到1634年（明崇祯七年）改历工作全部完成。徐光启对他的工作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4月26日，罗雅谷在京逝世。他更为短命，享年仅45岁，在华近20年。与邓玉函、罗雅谷不同，龙华民却是个老寿星，一直活到95岁，在华生活了58年。为他送葬那天，“北京便又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殡葬仪式的目击之地了。皇帝赐治丧银，价值三百都卡(Dukaten)，并且令人把这位他所很敬仰的人物影像画了下来，画像穿着白色祭衣，坐于教坛上作讲道之姿势”。[2]

---

1. 《帝京景物略》，208页。

2. 魏特：《汤若望传》，下册，第536页，杨丙辰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

直到明末清初之时，“滕公栅栏”已经埋葬了四位传教士了。这处墓地就不再是属于利玛窦一人，而是属于客死北京的来华耶稣会士的了。

汤若望与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

使“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得以扩大的，是日尔曼籍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自利玛窦去世后，能与利玛窦齐名，堪称为“耶稣会之二雄者”，也是这位日尔曼籍的传教士。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汤若望与金尼阁、邓玉函、罗雅谷等一行人到达中国的时候，正值“南京教案”爆发期间，汤若望就在澳门认真学习汉语，积极为进入内地传教做准备。1622年（明天启二年），在西洋大炮的帮助下，朝廷对教会的禁令取消了，他才得以辗转广东、江西、浙江等省，1623年（明天启三年），进入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1630年（明崇祯三年），在历局供事的邓玉函不幸去世，主持改历工作的徐光启急需精通天文学的人才，为此专门奏上《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崇祯皇帝三天后就批示曰：“历法方在改修，汤若望等既可访用，着地方官资给前来。”[1]于是西安府官员特备轿子、轿夫，将汤若望送进北京。从此汤若望开始领取每月12两的钦天监俸银。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取代了朱明300多年的王朝，但汤若望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受到影响。由于汤若望精通天文、历法，很快就得到清政府的信任与重用。年轻的顺治皇帝亲切地称他为“玛法”（满语，意思是可敬爱的老师）。1654年

[1]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2页。中华书局，1988

(清顺治十一年),有一次,当皇上问汤若望需些什么的时候,汤若望便流露了想在利玛窦墓旁获得一块墓地的愿望。皇上欣然签应了他的要求,将那块珍贵的地产赐予了他。

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汤若望在皇上赐给他的茔地上建了一座圣母小教堂。

一些由于朝廷使用西法制历而被革职了的原钦天监官员,早就对汤若望怀恨在心,见此迹象,便开始参劾他。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2月,顺治皇帝病逝,即位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只有八岁。辅政大臣鳌拜等竭力主张"率祖制,复旧章",一改由多尔衮开创的,顺治皇帝继承的开明政策,尤其排斥西洋科学。这时一个叫作杨光先的首先出来发难,参劾汤若望等外国传教士三大罪状:第一,潜谋造反;第二,邪说惑众;第三,历法荒谬。

在鳌拜等辅政大臣的主持下,汤若望、南怀仁(Ferdinand us Verbiest),利类思、安文思等在京的四名外国传教士和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中国教徒,都被抓进了监狱。其中汤若望被判处了极刑。

顺治皇帝在利玛窦墓地旁赐予他的那块坟地,也被没收充公了。

康熙皇帝玄烨刚刚亲政不久便重新议定汤若望案,为他平反昭雪,认为他治历有功。但汤若望出狱后一年就病故了。康熙皇帝恢复了汤公"通玄法师"的封号(因避讳康熙名"玄烨",而改为"通微法师"),归还原顺治皇帝所赐墓地。特赐银524两,专派大员为汤若望在"滕公栅栏"的墓地上重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汤神父的墓地一反其前辈利神父墓的风格,完全依中国样式筑成:墓之北首有半圆土岗围绕,以象山阿,坟墓为圆形,皆以方石砌就。墓前有大理石石碑一通,高一丈二尺。

碑前有供案一面,上陈盘果等物。案前还设香炉一座,灯烛一对,供瓶一对,皆高六尺有余。再往前,是两匹石马、两头石

羊、两位石人，皆六尺多高，用大理石雕成，精致无比。这些供物都是康熙皇帝所赠，用以表彰汤若望的功绩。墓地入口处悬挂着一幅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钦赐”匾额。1726年（清雍正四年）《新世界报》载文评论说：“汤若望神父安息在一座真可以说帝王一般的墓地之中。”[①] 他的坟墓比利玛窦的更为壮观。

在葬礼上，特使在墓前宣读皇上的祭文，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人跪下聆听。一位外国神父还记述了玄烨曾经亲自前来吊唁的情景。他写道，“皇帝曾亲自随同他的皇祖母，以及朝中最高之大员莅临汤若望之墓前，依照中国之礼俗，向死者致敬。这在一位中国皇帝，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②]

从此，滕公栅栏的传教士墓地几乎扩大了一倍，在一道矮墙的东西两侧，汤若望与他的前辈利玛窦永久地相伴而眠。

安文思、利类思也相继于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和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在京病逝，安葬于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的利玛窦墓前。他们的墓碑上也分别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皇上也赐予他们二人各200两银子的安葬费。

清康熙年间，一位曾参与撰写《明史外国传》的文人——尤侗，吟诵了一卷《外国竹枝词》。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

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③]

由此可见，当时的“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的周围已建有教堂，周围大片的玫瑰花竞相开放。礼拜之日，钟、琴交响，前来做弥撒的人们将酒浇洒在地上，祭扫他们所敬爱的利玛窦神父。

---

① 《汤若望传》，下册，第556页。

② 《汤若望传》下册，第536页。

③ 尤侗：《西堂集》。

南怀仁与墓地其他传教士

另一位得到皇上赐碑殊荣的，是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

1656年，卫匡国、南怀仁等登上一艘开往远东的荷兰船，于1658年7月17日到达澳门，1659年（清顺治十五年）进入内地。

南怀仁先是被派往西安传教，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2月5日，主持钦天监的汤若望来信，要他到北京去供职，替代另一位病重德国传教士。奉旨进京的南怀仁于当年的6月9日抵达北京，开始给汤若望做副手。汤若望对南怀仁很满意，在一封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他对南怀仁在钦天监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他不仅掌握了这方面的科学，而且谦虚、坦诚；当他对这门学科从头到尾作了简明扼要的陈述后，我觉得无需再作任何补充了。

然而这种顺利、融洽的工作环境只持续了两三年，南怀仁就与他的长辈汤若望一起遭到了诬陷。

康熙亲政后，决心剪除鳌拜集团，首先从平反汤若望等人的冤案入手。康熙秘密指派大学士李蔚私访南怀仁等传教士，两天后，康熙皇帝宣南怀仁进宫，命他与杨光先分别以自己的方法测定天象，南怀仁以他熟练的操作与精确的计算，获得了与天象“逐款皆符”的成功，杨光先及其同伙则以“逐款皆错”而告全面失败。康熙在将杨光先革职的同时，当场起用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命他重新推算康熙九年的历书。

南怀仁在钦天监任职期间，与钦天监的中国官员们一道，先后制造了天球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共六种新仪器，于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完成。为了帮助中国官员熟悉使用这些仪器，南怀仁撰写了《灵台仪象志》一书。

南怀仁主持制造的这些仪器所体现的西洋天文思想，在外观

造型上，则完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上面雕刻的昂首向天，腾云欲飞的一条条苍龙，表现了中国人对驾御自然的世代梦想与追求。

南怀仁还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外交接触中担任过不可缺少的角色。1676年（康熙十五年），俄罗斯国沙皇派遣使者来到中国。南怀仁就担任翻译，成了连接中俄两国的桥梁。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南怀仁又为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一次翻译。

1688年1月28日（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怀仁病殁。康熙皇帝玄烨闻讯后非常痛惜。但因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于两天前刚刚去世，正值国葬期间，便将南怀仁的葬事推迟举行。一个月后，康熙派遣两位大臣前往南怀仁的灵堂致哀。他们在灵柩前跪下、叩头，然后高声宣读了皇帝的圣旨：

> 朕念南怀仁来自远方，为朝廷效力多年，编制历法，能够与天象吻合；监造火炮，有利于统一国家的战争。他尽心尽职，从不松懈；心地善良朴实，始终如一。朕历来是很赞赏他的。前些时，听说他卧病在床，还期望他能够痊愈。想不到现在突然去世了，朕十分悲痛。现特赐银二百两、绸缎十端，以表示对远道而来的臣民的优待抚恤之意。特颁布此谕旨。

3月11日，南怀仁的葬礼在京举行。皇上遣佟国舅及赵侍卫前去送殡。墓前树汉白玉石碑一块，螭首龟座，碑的正面镌刻着“耶稣会士南公之墓”八个大字，和他的生平简历；背面则刻着康熙皇帝亲撰的祭文。

康熙皇帝的祭文意为：

> “朕以为，古代设立太史的官职，是为了考察天的运行，以此来制订历法。如果太史能够尽到职责，编写出符合天时的历书，就是值得嘉奖，并且可以信赖的。如果还能发挥他的技能，对军国大事有所裨益，那么他活

着的时候，就应该得到高官厚禄，死后也将受到褒奖和崇敬。南怀仁就是这样的人。他心地质朴，学识广博，从遥远的地方漂洋过海来为天朝尽忠，为官效力多年。他制订的历书，没有发生过错误；他观察的天象，也非常准确。他既掌管钦天监，又协助制造武器。在他巧妙的构思指导下，造出了威力无比的大炮。这些大炮能摧毁坚固的堡垒，对天朝的争战极为有利。他可以称得上是办事精益求精，从无半点松懈了。突然听说他溘然而逝，朕顿生深切悼念之情。追念他卓著的功劳，朕赐予‘勤敏’二字的谥号。”

中国从汉代开始形成为死去的人封以谥号的习惯。得到谥号的主要是皇帝和大臣。古人曰：“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1] 就是说，谥号是用简单的两个字概括人物生前的功绩和操行。康熙皇帝所赐“勤敏”二字，恰好是对南怀仁在钦天监供职期间勤勉、聪敏的恰当评价。在明清之际来华而后来客死在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惟一一位身后得到谥号的。

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因为教皇粗暴地禁止中国教民祭祖、祭孔，康熙皇帝决定禁教。但仍允许“遵利玛窦规矩”的外国传教士在宫廷服务。对在京逝世的西方耶稣会士，如参与绘制《皇舆全览图》的杜德美、山遥瞻、麦大成、汤尚贤、费隐等，皇帝也照样赐葬在栅栏墓地。

1736年，爱新觉罗·弘历继位，年号为“乾隆”。乾隆初年，虽然仍主禁教，并进一步强化了肇始于康熙末年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耶稣会也被罗马教皇本笃十四世宣布解散。尽管如此，仍有一批传教士在宫廷从事科学和服务工作，其中三名有突出贡献的传教士为戴进贤、刘松龄和郎世宁。他们死后，遗体都安葬在

[1] 《逸周书·谥法解》，转引自《辞海》，中华书局1980年缩印版，第400页。

滕公栅栏墓地。皇帝还专门赐予白银和绸缎，以示褒奖。

百年屈辱中的滕公栅栏墓地

19世纪以后，欧洲发生了变化，天主教会发生了变化、古老的中国也发生了变化。“滕公栅栏”这块小小的墓地的命运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由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飞速发展，使欧洲成了世界的中心，它向外扩张的形式，不再仅仅是教会的十字架，而是更强有力的无敌炮舰和廉价商品。欧洲一步步把全世界都变成它的殖民地。

在欧洲各国中，早期海外殖民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被后来居上的英国和法国所代替。天主教的保教权也从葡萄牙国王转移到法国国王手中。络绎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一部分人完全抛弃他们的前辈——利玛窦的传统，渐渐地显露出殖民主义的嘴脸，而且越来越直接地为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政策服务。其中有的传教士甚至叫嚣“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声言要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树起光辉的十字架”[1]。

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在日益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下，中国则一步步地走向衰落。道光皇帝在1821年承继大统。在他当政期间，仍然实行禁教政策，将包括南、北两堂在内的北京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教堂都收归国有。滕公栅栏墓地改由俄国东正教代管。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随之而来的各国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各个不平等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自由。清王朝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传教禁令，被迫放弃了。清政府被迫将教堂

[1]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墓地全部归还外国传教士。各处教会依仗帝国主义的势力，不仅将很多“已改为庙宇民居”的旧址强行索回，还巧取豪夺并非教会旧有的房地产，搞得民怨鼎沸。

面对帝国主义日益严重的侵略与扩张，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各地教案迭起，终于酿成了席卷北方大地的义和团运动。

在义和团反洋人，反洋教的高潮中，滕公栅栏墓地也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砸碎，墓穴被挖开，尸骨被焚毁，其他建筑也被毁坏。

义和团运动毕竟是一次带有自发性的农民运动。它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不可能正确地区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不同，也不可能正确地区分帝国主义者与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对中国有益事情的诸如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两者之间的不同。毁坏死人的坟墓并不能减轻中国人民的苦难，残杀中国的信教群众也不能阻止洋教的传播。尽管如此，义和团运动仍不失为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各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计划，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它是中国人民在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漫长道路上的一次可歌可泣的尝试。

不久，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9 月，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第四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定，其碑由各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兹将建碑之坟茔，开列清单附后。”在条约的《附件十》中规定：京都左近被污渎之诸国之坟茔须建碑者有：“英国一处，法国五处，俄国一处，共计七处”。[1] 因前述法国

[1]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第 429 页。

取得天主教保教权，因此滕公栅栏墓地属于上述法国坟茔。

代表清政府处理善后的全权大臣奕訢，准内阁侍读学士张翼与主教林懋德商办具体事宜。俄国驻京参赞罗达诺夫斯齐克亦参与会商。后张翼另有任用，即由直隶布政使周馥和云南盐法道李毓森与教会接洽。周馥连日分往各处（坟茔）踏看。他在奏折中写道："阅法国茔地各碑，有顺治、康熙年间汤若望、南怀仁供职钦天监有功，恩礼优渥，予谥赐葬。以后效力外臣，赐葬银者甚多。今横遭此乱，莫不仆碑破冢，实属惨目。"[①]

按照列强的要求，中国政府出银 1 万两，重修了墓地。除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龙华民、索智能等 6 人的墓碑单独立起外，剩下有 77 尊墓碑被嵌入新建的教堂外墙。几名神父将附近被杀的中外教民的尸骨葬于一处，上面砌成 3 米高的六角形坟丘。坟丘上又建一六角形小亭。后来人们称此为"肉丘坟"。但被联军杀害的无数平民百姓和义和团团员则仍暴尸街头。

根据列强的要求，清政府在各国使馆的监督下还专门立一所谓"涤垢雪侮"而实际是铭刻耻辱的石碑。碑文写道："此处乃钦赐天主教历代传教士之茔地。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焚堂决墓，伐树碎碑，践为土平。迨议和之后，中国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侮涤耻，特发帑银一万两，重新修建。勒于贞珉，永为殷鉴。"[②]

从那以后以"滕公栅栏"为中心的教会产业又进一部扩展了。新的教堂盖了起来，那块耻辱石被高高地砌在教堂的大门上方。在原来的育婴堂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平面图形似"口"字的建筑，建立了法属遣使会修道院。1926 年，有 6 位中国神父升格为主教，辖领中国的 6 个教区，因此需要培养中国籍神父。正好这时遣使会修道院南迁至浙江嘉兴，于是就在"口"字楼中，创办了"文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 1075 页。

② 《历史遗痕》，第 17 页。

声大修道院”，来自北京和华北地区的修士，在这里攻读哲学、神学，这里成了培养中国籍司铎的高等学府。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修道院有在校学生 100 多人，负责管理和教学的外籍神父 8—9 人。

1910 年（清宣统二年），在教堂的正西修建一座平面图形似“山”字的建筑，原设在西安门真如镜的法国圣母会总院迁至此地。1918 年，圣母会在这幢楼中创办了“私立上义师范学校”，后又增设了附属小学。1927 年，上义师范迁到京西黑山扈，上义小学则一直延续至解放后。此外在“山”字楼南还建了葡萄酒厂，专门生产做弥撒用的葡萄酒。在整个滕公栅栏墓地的四周，种上了大片的葡萄。

在黑暗的旧中国，“滕公栅栏”成了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葬人这处墓地的中外籍神父也越来越多了。

古墓的劫难与修复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初，外国教会在华的产业，被当作外国侨民的财产予以保留。后来，根据政府的法令，将这些产业逐步转归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所有。人民政府惩治了隐藏在教会中的特务分子，驱逐了敌视新中国的外国神父，但同时保障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国家关于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1951 年，原上义小学由北京市教育局接收，改名为“进步巷小学”。1953 年，“文声大修道院”停办。按照国家教育与宗教分离的规定，原圣母会创办的“上义小学”由北京市教育局接管，更名为“马尾沟小学”。除此以外，马尾沟教堂和滕公栅栏墓地在解放初期基本依旧，教堂的宗教活动照常进行。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的西郊日渐繁华起来。在阜成门外仅二里的地方保留滕公栅栏这处墓地，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当时的主教李君武也意识到这一点，他

感慨地说："阜成门城墙开了豁口，马路也修起来了，建了很多新楼。看来墓地也该搬家了。"[1]

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开始筹建，北京市政府以10万元购买了山字形楼和口字形楼两幢建筑，安置了部分无业神职人员的生活。马尾沟小学，迁至车公庄大街以北，现名进步巷小学。酒厂迁至石景山区重建，即今北京葡萄酒厂。对于传教士墓地的处理，党校方面与北京天主教爱国会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党校主张将所有坟墓全部迁走，而有关人士认为，这样做一是会伤害信仰虔诚的教徒的感情；二是将影响对爱国进步的神职人员的团结教育工作；三是可能产生不利的国际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应将利玛窦等六至七位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传教士的墓碑保留在原地。

有关人员为此直接请示了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处。据当时党校负责基建的老同志回忆，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尊重中国人民传统习惯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做比较大贡献的耶稣会士的墓碑仍在原址保留，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等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而其他传教士和教民的遗骨及墓碑，则迁至海淀区西北旺乡新辟的16亩墓地内。当时迁走的坟墓一共有837个。原马尾沟教堂不仅保留，而且还照常举行宗教活动。而嵌在教堂外墙的77尊明清时代的传教士墓碑，也被留在党校院内。

1958年，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迫献出了除了北堂等4座教堂之外的北京市的所有教堂，包括历史最为悠久的南堂在内，用来"支援国家建设"。国家将南、北两堂等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教堂仍还给教会，但其他教堂则挪作他用。马尾沟教堂在这次"捐赠"行动中，成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① 北京市宗教房地产管理处档案。

的一座仓库。

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滕公栅栏”墓地的天主教堂就被拆除了。

1978年9月，中国政府派许涤新先生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举行的会议，会后到威尼斯、罗马等城市访问。主人常常谈到曾为在中国介绍几何学、天文学等西方科学做出过贡献的他们民族的优秀儿子——利玛窦。在罗马，代表团遇到了一位在利玛窦故乡的一所大学里讲授中文的柯拉迪尼教授，他就是这次盛情邀请和热情接待中国客人的意大利友人之一。柯拉迪尼教授对许涤新团长说：上半年，他与身为意大利政府交通部长和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科隆博先生一道访华时，了解到在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利玛窦墓地已被平毁。他转达了科隆博先生的一个愿望，即按照意大利保存的这座墓碑的仿制品，用大理石重新镌刻一尊新碑，赠送给中国，重树在原处，以表达对这位300多年前终生致力于意中文化交流的先哲的纪念。

许涤新回国后，即向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写了一份报告，汇报了上述情况，并且建议：“鉴于上述意大利学者和友好人士对利玛窦墓的重视，拟请院部向中央建议，对利玛窦被平毁的坟墓，加以修复，保存中西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史迹。是否有当，请考虑。”胡乔木阅后，随即上报给李先念副主席，并注上“请审批，拟同意”六个字。

笔者多方寻觅，终于在北京民政局档案室查阅到了这份报告的复印件。在报告的文眉间，不仅有李先念副主席圈阅的标记，而且，当时另外四位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圈阅的标记也赫然其上。

得到了最高领导层全体的认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即于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一份题为“关于请修复意大利学者

利玛窦墓"的函件。函件的全文如下："在我国元朝（应为明朝——笔者注），意大利学者利玛窦来中国讲学，后来死在中国，葬在北京现市委党校院内。现在墓、碑均已平毁。今年九月，我院副院长许涤新同志访问意大利时，意柯拉迪尼教授反映，意交通部长科隆博今年上半年访华得知利玛窦墓已被平毁后，表示愿意重新镌刻一个墓碑，希望重新树原处。考虑到利玛窦曾对沟通中西方文化做出过贡献，因此许涤新同志回国后向中央建议，修复利玛窦墓，并经华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批准。现将许涤新同志建议的批示的影印件附后，请批转有关单位办理。"

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毛联珏看到这一函件后，批示道："立功同志阅，是否让民政局主办为好。"便将修复利玛窦墓地的任务下达给了北京市民政局。

1979年新年伊始，元月13日，在月坛北小街2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内，许涤新同志主持召开了有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参加的，专门研究如何修复利玛窦墓地的会议。

在重新树立汤若望碑时，文物工作者颇费了一番心思。在文物普查的记录上，通常作为碑阳的，镌刻有"耶稣会士汤公之墓"大字的一面却朝阴，刻有康熙皇帝祭文小字的一面反而朝阳。在《北京图书馆馆藏碑帖全集》中，也是这样记载的。按照文物复原的原则，吴梦麟主张将错就错，保持墓碑被毁前的原貌。于是，不少中外学者参观后，常常提出"汤若望的墓碑为什么树反了"的疑问。

1984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助下，市委党校出重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在利玛窦等人墓地的东侧专辟一院，将原来嵌在教堂外墙，后来散落在院中的石碑中现存的60尊，以及那块作为历史见证的"耻辱碑"重又树立起来。北京市文物局还将所有碑文拓印存档。1992年，西城区文化局出资，将位于党校南墙的原马尾沟教堂的小石门移至利玛窦墓地的南面。1958年文物普查时记载的石虎、石马已不见了踪影，但没有记载的一只石羊却安详

地静卧在碑林院墙的门口。这样，原“滕公栅栏”墓地遗存的文物就基本上都得到了修复和保护。

到目前为止，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明清传教士墓地”共保留63名传教士的墓碑。其中14人来自葡萄牙，10人来自意大利，9人来自德国，9人来自法国，还有捷克3人、比利时2人、瑞士1人、斯洛文尼亚1人及不明国籍者1人，另有14人为中国籍教士。

这63尊墓碑，不仅铭记着那些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它们本身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石碑的顶部有的是龙盘，有的是祥云，这表示墓主身份的不同等级。碑的底座的二龙戏珠、鹤、鹿，这都是中国人心目中富贵吉祥、长寿的象征。而碑上的十字架、IHS字样以及拉丁文的碑文则是西方天主教和耶稣会的标志。

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滕公栅栏这处古老的墓地，作为一处启迪人们继往开来的所在，也愈益受到各界的关注，前来观光、凭吊和进行学术考察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总理、外交部长等官员也曾来此参观游览。

今天，利玛窦及明清传教士墓地成为北京市的一处重要的文物古迹，成为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

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位于海淀区四季青乡。1732 年（清雍正十年）始，这里成为一处专门埋葬法国传教士的公墓，张诚、白晋、蒋友仁等在中法、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传教士们，曾经安息在这里。

张诚、白晋等法国传教士与正福寺墓地

与康熙皇帝处于同一时代的，世界上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共有三位，一位是俄罗斯彼得大帝，一位是法国路易十四，另一位就是中国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不仅各自在中国和法国创造了可以用他们的名号命名的光辉时代，并且通过一批法国传教士为媒介，架起了早期中法交流的桥梁。

1678 年(清康熙十七年)，在大清朝钦天监任职的南怀仁向欧洲的耶稣会寄了一封信，呼吁派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与此同时，法国天文台台长卡西尼也提出派人到东方去进行天文观测的建议。柯尔贝尔看到南怀仁的信，认为派传教士到中国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于是就积极支持卡西尼，主张派遣法国传教士到中国去。当这一报告递交到路易十四手上时，这位极想扩大法国对外影响，增进与远东贸易的国王立即表示了赞同。不久一个由 6 人组成的赴中国耶稣会士的名单产生了，他们是：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李明和塔夏尔。不巧，1683 年柯尔贝尔去世，此事便搁置了两年。直到 1685 年（清康熙二十四年）3 月 3 日，白晋一行才登上从法国布列斯特启程的远航船，其中塔夏尔在中途被遣

罗（泰国）国王挽留，张诚、白晋等5人于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7月到达中国的宁波港，在康熙皇帝的直接过问下，于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2月7日抵达北京。康熙皇帝命张诚、白晋留在宫中服务，另外3人分赴外地传教。由于张诚、白晋的作用，从那以后中国的西学东渐开始染上了浓重的法国色彩。

张诚、白晋二人以类似的志向、经历和同样出类拔萃的才华，一道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的称号，选入首批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团中。在北京，他们都做过康熙皇帝的西学教师，但又有各自不同的贡献。

后来，“礼仪之争”造成中国政府与教皇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也导致在华传教士的分裂。张诚是主张依“利玛窦规矩”行事的，他为了调和双方，曾多方奔走，竟一病不起，于1707年（清康熙四十六年）3月22日在北京去世。1730年（清雍正八年）6月8日，白晋在中国度过了46个春秋，客死在远离故乡法兰西的异国土地上。

在来华的传教士中间，尽管都是信奉着一个上帝，但他们彼此也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就在耶稣会中，较迟来华法国籍教士与葡萄牙籍教士也有不和，平时居住和做礼拜也不在南堂，而在北堂。张诚死后，虽然起先暂时葬在栅栏墓地（即今在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利玛窦墓地），但法国教士还是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墓地。1732年（清雍正十年），即白晋去世后两年，他们终于在“正福寺”得到了一块墓地。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张诚的棺木迁人新建的墓地。白晋以及做过皇帝御前教师的巴多明、参与绘制《皇舆全览图》的雷孝思、冯秉正等，以及后来客死北京的法国传教士，都相继安葬在正福寺墓地。为了区别起见，栅栏墓地被称为“葡萄牙墓地”，正福寺墓地被称为“法国墓地”。

另一位被埋葬在“正福寺”墓地的著名法国传教士，是蒋友

仁。

就在蒋友仁在中国致力于宣传哥白尼学说的这一年，罗马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这对热衷于学术传教的蒋友仁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此他抑郁成疾，于第二年，1774 年（清乾隆三十九年）10 月 23 日中风而逝。蒋友仁死后葬在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

百年屈辱中的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

19 世纪以后，欧洲发生了变化，天主教会发生了变化，古老的中国也发生了变化。"正福寺"这块小小的法国传教士墓地的命运，也与位于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一样，经历几度沧桑。

在欧洲列强快速发展，急剧扩张的同时，中国则在封建制度的束缚和日益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下，一步步地走向衰落。道光皇帝在 1821 年承继大统。在他当政期间，仍然实行禁教政策，将包括南、北两堂在内的北京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教堂都收归国有。滕公栅栏等传教士墓地改由俄国东正教教会代管。

1840 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60 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又打进北京，英法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在《中法北京条约》的第六款中规定，"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公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

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

自 1732 年（清雍正十年）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建立时起，直至 1838 年（道光十八年）北京教区主教毕学源病故时，已有 106 年历史。在此期间，坟地周围种植了果树和葡萄，四周护以砖墙。毕学源死后，坟地无人管理，加之附近居民痛恨洋人，墓地遭到较大破坏。这时任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的孟振生，依仗英法联军的势力，坚决要求奕訢发给归还正福寺执照，企图借此逮捕周围居民，从重治罪。在孟振生的威逼、要挟下，清政府将归还正福寺的执照交给了他。执照曰：“……查得西直门外正福寺，旧有西洋人坟地一处，现交与大法国钦差，转交主教孟管业，专派人看守，并饬知地方官，禁止附近居民，不得侵毁。如有侵毁者，准该主教呈明地方官惩办可也……”②

孟振生为了防止周围居民再行毁坏墓地，决意要杀一儆百，给周围居民来一个下马威。在他的要求下，地方官绑着几名所谓曾经侵毁过墓地的村民到正福寺墓地前，当众进行审讯和惩处。审讯时，孟振生大发雷霆，对村民严加训斥，据他自己说，“直到迫使他们叩头领罚，才算完事”。③从此孟振生全部接管了教堂和滕公栅栏、正福寺两处传教士墓地。

当时，有 6 具法国侵略军的尸体需要掩埋。法军最初提出要埋在南堂周围的小院里。把死人埋在城里，这是公然违背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恭亲王奕訢闻讯后，表示不能同意，他恳求说，希望能顾及皇帝和他本人的面子，将尸体埋在京西的墓地。法军首领也许是怕激起公愤，同意了奕訢的请求，把被他们称作“可怜的遇难者”而实际上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死有余辜的侵略军，

① 梁为楫等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第 120 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②③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285、326 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先是埋在滕公栅栏，几个月后，待正福寺墓地收回后移至该处。本来象征着中西交流的，安葬着宗教文化使者的墓地，从此被武装侵略者的血迹玷污了。

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保存有名为《正福寺公教公墓记》的一帧拓片。全文为拉丁文。其内容很简单，标明正福寺传教士墓地的几个重要年代：

1732 年，（即清雍正十年）皇帝将此地赐予传教士作墓地；

1777 年，（即清乾隆四十二年）墓地建成；

1803 年，（即清嘉庆八年）重修墓地；

1863 年，（即清同治二年）被毁坏了的墓地又进行了重修。

碑文所指的最后一次重修，看来就是孟振生接管该墓地后进行的重修。

面对帝国主义日益严重的侵略与扩张，与清政府奴颜婢膝的软弱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反对教会成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剥削的一种方式，各地教案迭起，终于酿成了席卷北方大地的义和团运动。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夏季，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大队的义和团员涌入北京城，攻打东、西交民巷使馆区和几座天主教堂。在义和团反洋人、反洋教的高潮中，北京地区包括滕公栅栏和正福寺在内的七处外国传教士墓地也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砸碎，墓穴被挖开，尸骨被焚烧、扬撒，其他建筑也被毁坏。

不久，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9 月，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第四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定，其碑由各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各省每处五千两。"北京地区被污渎之诸国坟茔有："英国一

处，法国五处，俄国一处，共计七处。"①

因前述法国取得天主教保教权，因此滕公栅栏墓地和正福寺墓地同属上述法国坟茔。正福寺墓地重修后，周围又建起了教堂和教会小学。然而，笔者近日查阅《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发现，自1901年之后，这里就没有增加的新的墓碑。这说明，正福寺墓地在根据《辛丑条约》恢复重建后便没有再扩大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正福寺传教士墓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初，外国教会在华的产业，被当作外国侨民的财产予以保留。后来，根据政府的法令，将这些产业逐步转归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所有。人民政府惩治了隐藏在教会中的特务分子，驱逐了敌视新中国的外国神父，但同时保障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国家关于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在正福寺传教士墓地的教会小学，与另一所私立小学合并为"正福寺小学"。此外，正福寺传教士墓地在解放初期基本依旧，教堂的宗教活动照常进行。

1958年，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正福寺传教士墓地的教堂成了当地生产队的仓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横扫一切"的时期，科学文化形同粪土，外国人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天主教更属反动，自当难逃"横扫"厄运。这期间，正福寺的法国传教士墓地则被西城酱菜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四季青"公社的正福寺生产队三家单位占用了。作为仓库的小教堂也拆毁了。后来毛泽东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国掀起挖防空洞的热潮。

① 梁为楫等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第429、43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西城酱菜厂在修筑防空工事时，用墓地的石碑作了顶盖。北京市文物部门得讯后，专门拨了一笔经费，购买了建筑材料，雇了人工，将这些石碑替换了出来。于是张诚、白晋、蒋友仁等35尊原在正福寺墓地的石碑被迁移保护起来。1987年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这30多尊石碑重又被树立起来。尽管天主教与佛教曾经是水火不容的，但这些记录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物总算是有了安身之处，得到了适当的保护。

两年前，笔者到正福寺寻访旧迹，在一位姓马的天主教教友的带领下，绕原墓地一周。西城酱菜厂已成为著名的老字号“六必居”酱菜厂的一家分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原墓地的部分地面盖了宿舍楼。正福寺村占用的那部分目前是海淀区四季青乡曙光变压器厂。原墓地的东西院墙还保留着，一尊刻有“天主堂”三个字的界石仍在原地矗立。原墓地仅存的一处建筑——曾经当作神父宿舍一排五间瓦房，当了变压器厂的厂房。

法国传教士墓地与五塔寺

最近，我特意重游了安放着那些法国传教士墓碑的“五塔寺”——北京市石刻艺术博物馆。在北京动物园背后，从繁华的白颐路向东一拐，穿过一条僻静的小路，便找到了“五塔寺”。

五塔寺是“真觉寺”的俗称。真觉寺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寺内的金刚宝座塔竣工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目前，寺庙的大殿已经不存在了，但金刚宝座塔保存完好。塔身四周遍布石雕，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是一件巨大的艺术珍品。1961年，真觉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在真觉寺内建立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占地2万平方米。这是一座以露天陈列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陈列区按石刻学分类分为八个展区，耶稣会士碑就是其中之一。

在佛教的金刚宝座塔的东侧，有两排石碑是属于天主教神父的，一共有35尊。其中8尊的主人是中国人，其余几乎都是法国人；少数是“圣味增爵会会士”，多数是“耶稣会士”。白晋、蒋友仁、安泰、纪文、雷孝思等不少人的墓碑背后，还刻有皇帝赏赐的记录和“皇恩”两个大字。田嘉璧墓碑的背面，刻着有关其生平的长长的碑文。

第一排传教士墓碑的中心位置上，放置着镌刻着博物馆管理者说明的一尊石雕饰座。上写着：

耶稣会士墓碑陈列说明

> 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于一五三四年在法国成立。基督教各派曾在唐、元、明、清四次传入我国。明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进入中国，标志着天主教第三次在中国传播开来。本展区是以年代为顺序陈列第三次到中国传教并葬于北京的耶稣会士墓碑。他们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将西方的一些近代科学知识传到中国，并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和科学带回了欧洲，起到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博物馆的管理者对这些远方传教士的墓碑是尽心的。在这处包罗万象的石刻艺术博物馆中，传教士墓碑也确实融人了表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众多石刻艺术品之中，不论是佛教的、道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但是，他们的一些后人，包括法国驻中国使馆的合作专员顾美哲，希望能把这些墓碑移到“滕公栅栏利玛窦和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墓地”。他们的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要实现起来，却很不容易。

历史有时似乎像可以任人装扮的小女孩，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归根到底，它是最公正的。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历经260多年的风风雨雨，几番劫难，今天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可能像

滕公栅栏利玛窦墓地那样，恢复重建起来，但是那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贡献的张诚、白晋、蒋友仁及一切人，他们的历史丰碑将像那些饱经风雨劫难，却依然矗立的石碑一样永存。

基督教文化拾零

上帝——耶和华

“耶和华”是基督教对希伯来文上帝名字的音译，原意为“自有永有”。基督教从犹太教接受了创世说，也接受了犹太教的上帝。认为天地万物即整个世界和人类都是上帝创造的，他是万灵之父。为了救赎世人，他赐下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到人间受难流血，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来解救世人，替世人领罪。认为上帝主宰着整个人类历史，他惩恶扬善；使恶人入地狱，善人到天国。基督教认为耶和华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真神。他的使命就是救赎世上所有的人，要使人类没有诅咒，没有死亡；废掉冤仇，人人都变成新人。到那时，上帝的救赎之功也随之完成。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耶和华这个人物，他是基督教崇拜的最高的神。

“三位一体”教义

基督教授受了犹太教的上帝概念之后，就把上帝说与耶稣基督的信仰结合起来，使耶稣成为上帝的独生子。而圣灵是上帝与人的联系。基督教认为圣灵赐人智慧，圣灵在人心中工作，基督教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即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被基督徒所崇拜。基督教认为上帝只有一个，是独一真神。但是它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三者同尊同荣，同受敬拜。圣父、圣子、圣灵在创世和救赎的过程中是共同工作的。三者虽然各有特定的位格，但却是同一本体，同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神。但

不是三个神，而是三个位。这个教义被视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反对它，不赞同它，怀疑它的一概被斥之为异端。基督教认为只能靠信仰来接受它，而不能靠理性来领悟。

上帝的独子——耶稣基督

“基督”是希腊文的音译，“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音译，二者都是“救世主”的意思。但其原意准确地说应是“受膏者”。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君王、大祭司和某些先知，都要经过“膏立”，即用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表示正式从神受职。“受膏者”原指以色列人政治上或宗教上的领袖，后成为以色列人盼望的“弥赛亚”或“基督”，即从苦难中拯救以色列民族的“救世主”。

基督教认为耶稣是天父，是上帝的独生爱子，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即圣子。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下凡化为肉身。他就是耶稣。历史上确有耶稣其人，大约在公元 6 年左右，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一个犹太农民的家庭。后来在加利利地区的拿撒勒长大成人。父名约瑟，母名马利亚。耶稣和他父亲以木工为业，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基督教认为耶稣是其母马利亚未婚所孕。耶稣乃是从圣灵感孕，不同一般人。耶稣其名是天使给起的，意为“耶和华拯救”。因为马利亚在马棚里生下了耶稣，所以刚刚来到人间的耶稣只能睡在马槽里。一来到人间就开始了他“受苦仆人”的道路。犹太人仇视罗马统治者，多次发动反对罗马帝国的起义，因而遭到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他们无力改变现状，便盼望着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这个苦难的民族。约于公元 30 年左右，耶稣被迫害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认为他是代人受过，是救世主。并把希望寄托在基督再次降临世上，企望基督（救世主）消灭世界上一切不道义的行为，伸张正义，为他们报仇。因此，初期的基督教信徒大多数是贫民和奴隶。基督教教义认为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父所生，是独生的，即由父的本质所生的，是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他为拯救世人而降临，成了肉身的人，他受难，在第三日复活，升天。他是人们的救世主，会再降临人间。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是耶稣最推崇的人物。他为耶稣施洗，使洗礼成为基督教主要圣事之一。耶稣说他“比先知大多了”。并称赞说：“凡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在历史上也确有约翰其人。他比耶稣大半岁。父名撒加利亚，是亚比雅班的祭司，母名伊丽莎白，是亚伦的后代。据说约翰的母亲伊丽沙白与耶稣母亲玛利亚是表姐妹。“约翰”二字，按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恩慈”。基督教认为约翰是一位恩慈的神。约翰长大成年后，并没有继承父亲的祭司职业。而是独自住在旷野，身穿用骆驼毛织成的粗毛布衣服，腰束皮带，并以蝗虫、野果为食。他愤世嫉俗，主张财物公有，群居耕种放牧。他和他的门徒禁食悔罪，并举行特别祈祷。要求信徒履行公义，持守节操。约翰宣称：“天国近了”。“天国”即“神的国”，意为神作主，神治理，神作主宰。约翰指出：天国到来前首先要做的是“应当悔改”。因为基督的到来不只意味着拯救，同时也意味着审判。据说约翰的说教在整个犹太人中的影响是极为深广的，因此整个耶路撒冷地区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去忏悔，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因谴责统治者而被捕入狱受害。基督教认为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故也称其为先锋约翰。

十字架——基督教信仰的标志

十字架是罗马帝国处死犯人的刑具。但是用十字架处刑，只用于处罚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异国人，而不用于罗马人。罗马帝国在征服以色列王国后，曾一次将 500 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残酷的死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要经受很长时间的痛苦之后才会死去。罗马帝国统治者实施这种刑罚带有示众的用意，想达到杀一儆百之作用，以巩固其对异族的统治。

据史料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北边的各各他山。“各各他”意为“髑髅地”。据说从远处看那座小山，就像是一个骷髅头，这就是此山得名的原因之一。其二是这座山后来真的成为罗马帝国镇压和处死犹太人的刑场，使这座山其名与实相符，成为事实上的“各各他”山。按罗马刑法规定，被判钉十字架的人，要自己背着十字架，要在罗马兵丁押解下奔赴刑场。在向刑场行进的路上，边走边挨着兵丁的鞭打。到各各他刑场之后，受刑者家属可买通兵丁，拿苦胆和没药调和的酒给受刑者喝，据说这种酒实际上是一种麻醉剂，可以减轻受刑者被钉时的痛苦。受刑者被钉在十字架上后，执行行刑的兵丁把用罗马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3 种文字写的宣判书挂在受刑者的头顶上。据载耶稣当年受刑时拒绝喝那种麻醉酒，因此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从早上 9 点钟一直到下午 3 点钟才断气，在十字架上整整受了 6 个多小时的折磨。自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基督教就以它作为主要标志，象征着耶稣受难、死亡以救赎世人。因此“血腥的十字架”便变成了既代表基督本身又代表基督教信仰的标志。基督教信徒还行划十字的礼，表示信仰、祈祷、献身和祝福。作为一种标志，十字架有四种基本形式：拉丁式十字架下垂之臂长于其他三臂；希腊式十字架四臂一样长；三出十字架也

称圣安东尼十字架，呈丁字形；安德烈十字架又称侧置十字架，其状如罗马数字“×”。基督教信徒不但身上佩戴十字架，而且在建筑物上安置十字架。基督教把十字架看成是基督教的标志和圣号，而且在自己的身上佩戴十字架，在宗教活动中不时地在身上划十字符号。基督教认为耶稣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宁死不屈。耶稣是用十字架来战斗，因十字架而得胜。《默示录》记述：“天主的仆人在额上打印号”，教友也应在今世打上印号。人身部位，额头最显著，为表明自己是基督教信徒，要把十字架放在自己的额头上，因此常在额上划十字。

基督教天堂、地狱、炼狱说

天堂

基督教认为天堂是上帝和圣子、圣母、圣人、圣女及诸天神共同居住的场所，是基督教信徒向往的福地。也是得救的善人，在离开世界以后灵魂的归宿地，他将在那里与上帝共享永福。基督教认为天堂是上帝和真正信奉和追随耶稣基督的人的住所。天堂是永恒存在的智慧王国。天堂是“黄金铺地，宝石盖屋”；“那里阳光灿烂，鲜花遍地”。圣保禄以“不朽的花冠”象征天国的永福。在天堂里上帝耶和华坐在中央的宝座上，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宝座两侧众天使侍立。基督教认为天堂就是天国，天国是超性的，完善的，是永远的幸福境界与所在。在那里只有欢乐，没有烦恼和痛苦。在那里再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也没有哀号，更没有痛楚了。天堂福乐是永恒的，也就是说人们只要能到天堂，即一旦获得，将永远不会丧失这种永恒的幸福与快乐。如圣经上耶稣把善工的赏报，比作那不可失落的天国宝藏。在天堂里，圣

人犯罪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他们是不可能再犯罪离开天主和天国的。以上是基督教对天堂的解释。其实各种宗教都有类似的说法，只不过各种宗教对天堂的解释各不相同而已。中国道教认为天堂是玉皇大帝与诸天神仙女居住的所在，但是天神仍有犯罪的可能，犯罪之后将被贬下天庭。而且认为天福享尽还要轮回，还要受苦。犹太教认为天堂是义人死后、复活与上帝同住之地。而伊斯兰教则认为天国是虔诚的穆斯林要去的极乐世界。大乘佛教中的净土宗认为天堂是西方极乐世界。上座部佛教一般不讲天堂，而讲涅磐，即寂灭一切欲望的境界。天堂概念因各宗教认识不同而众说纷纭。

地狱

地狱之说在多种宗教中都有。基督教认为地狱是永远痛苦的所在和境界，是天主所诅咒弃绝的人永远受惩罚被囚禁的地方。即凡人临死身负重罪，而又未能痛悔获赦的，死后灵魂将立刻进人地狱受永远的惩罚。基督教认为地狱要么阴森可怕，寒冷黑暗；要么烈火融融，高热难熬；要么鲜血淋漓，残酷无比。地狱之火不灭，虫子不死，到处是“哀号和切齿”。认为地狱之苦也是永恒的，即地狱的罚是永远没有了期的。圣经上时常用“永远的羞辱”，“永火”，“永罚”，“永远丧亡”来强调地狱之苦果是永恒性的。基督教认为“那些怯懦者，失信者，可耻者，杀人者，奸淫者，邪术施行者，偶像崇拜者，以及一切撒谎者，他们的下场是陷在烈火与硫磺燃烧的坑中”（默示禄，甘一，8）；认为地狱是恶人和不信上帝的人的归宿。根据一个人生前的罪恶，他的灵魂将在地狱遭受不同的惩罚。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在他的名著《神曲》中把地狱分为九层，每层又分为环或沟等小层。但丁把出卖耶稣的犹大、刺杀恺撒的布鲁图都放在第九层地狱之中，使其永世不得翻

身。他把当时的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放在了地狱的第八层。基督教认为地狱的惩罚有火坑，有冰河，有沸腾的油湖。地狱使贪食者无法吞食，生前的暴怒者将被投入冰河。地狱之王是魔鬼之王撒旦。伊斯兰教也认为有地狱，认为地狱是一个大火坑，火坑上架窄桥，亡灵要先过此桥才能到天堂。印度教认为地狱只是灵魂所经历的一个阶段。中国道教则认为地狱有18层，根据人生前善恶受不同惩罚，是灵魂必经之地。地狱之王是阎王爷，地狱里还有判官和无数小鬼，他们掌管地狱。善人灵魂到此很快升天，恶人灵魂到此，根据其生前之罪恶将进行惩罚。地狱有刀山、油锅、蛇坑等苦不堪言。佛教认为地狱由地藏王菩萨掌管，是惩罚、涤罪的场所。但在地狱中仍可翻然改过自新，重新得救转世，地狱之苦不是永恒的。为此地藏王菩萨发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佛教认为地狱随着恶人灵魂的得救将会消失。

炼狱

炼狱是以有限时间的暂罚来净化灵魂的一种处所和境界。炼狱之说只有天主教承认。天主教认为，世人生前犯了没有经过宽恕的轻罪，已经蒙恕的重罪以及各种恶习，其亡灵升人天堂之前必须经过净化，这一净化的场所就是炼狱，或称涤罪所。炼狱中炼灵的亲友信徒，可为其祈祷，或者为其施舍、购买赎罪券、斋戒、献祭等善功，来援救炼狱中的炼灵，使其早日升人天堂。天主教认为炼狱之苦与地狱中相似。但是对于每一炼灵，如何确定它在炼狱中应呆的时间呢？天主教教义规定：是根据炼灵生前的罪、和应受的罪罚轻重、大小而定的，所以炼灵的期限自然不能一致。基督教新教、东正教都不承认炼狱说，但佛教、道教都相信世间信徒的修行、祈祷有益于亡灵，所以佛教、道教都有为亡灵举行的超度法会。

洗礼圣事

圣事是基督教重要的礼仪，是借以获得天主的恩宠与保佑的宗教形式。洗礼是基督教各宗派都承认的圣事之一。洗礼亦称圣洗、受洗或受浸。是信徒加入基督教必经的一种宗教仪式。基督教认为通过外在的水洗、赋予人圣化、圣宠，可使人获得灵性的重生，并取得领受其他圣事的有效资格。基督教认为圣洗是耶稣生前亲自制定的，并令宗徒们给相信他的人受洗。

洗礼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即浸水洗、注水洗和洒水洗三种方式。各教会根据各自的传统或信徒的要求自己选择洗礼的方式。（一）浸水洗：即受洗人全身浸人水中或半身站在水里，头部三次浸入水中。采用浸水洗时，我国基督教一般是在礼拜堂、教堂或聚会的地方设一浸池进行施浸。（二）注水洗：即由施洗人（牧师、长老、主教、神父）将水注倾倒在受洗人的额头或者身体其他的重要部位。（三）洒水洗：即由施洗人把水浇洒到受洗者的身上。关于洗礼，《使徒遗训》中写道："奉父子、圣灵之名，在流水中施洗，但是若没有流水，用别的水中施洗亦可；若不能在冷水中受洗，也可用温水。假如水不够用，那么只拿一点水，奉父、子、圣灵之名，三次浇在头上也行。"这说明基督教很早就允许行注水礼。基督教教义规定，受洗前，受洗人须禁食并宣誓要过基督徒生活。受洗后要尝一点混合的奶和蜜，象征着基督新生婴儿，随后在头上抹橄榄油，行按手礼，借以表明领受圣灵之意；披上白衣，象征着保持洁白无暇，避免犯罪，弃绝罪恶；手中拿着点燃的白蜡烛，象征着受洗者将永远面向光明。北京缸瓦市教堂、南口教堂多行浸水礼。崇文门教堂、珠市口堂、宣武门天主教堂、西什库教堂多行注水礼。婴儿受洗在6世纪后就已经流行。基督教认为，圣洗圣事等于给受洗者的灵魂打上了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

标记——“神印”，这个神印就好比是公民的身份证。没有领过圣洗的人，就不能算作基督教教会的人，也就没有资格去领受其他的圣事。

圣餐圣事

基督教各派都公认的圣事有二种，一是洗礼圣事；一是圣餐圣事。基督教认为这两种圣事都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天主教称圣餐为圣体圣事，东正教称圣体血，新教则称圣餐或擘饼，或称主的晚餐。无论是哪派都规定，必须是有效地领受过受浸的信徒才有资格领受圣餐——即圣体、圣事。圣餐中擘开的饼，代表耶稣基督为信徒所舍的身体。祝福的杯中所盛的葡萄酒或葡萄汁，代表耶稣基督的血，代表天主用血所立的新约。认为麦面饼和葡萄酒一经祝圣，就成为耶稣基督的体、血，耶稣便身在圣体、圣事中，他的体质的身体就在饼、酒之内。麦面饼和葡萄酒在成为圣体后，体质则完全变了，变成了耶稣的圣身宝血。基督教各宗派都要求领圣餐的信徒，身体要端正恭敬，衣着要整齐清洁，须庄重雅观。天主教还要求信徒敬守圣体斋，即在领圣体前一小时不吃固体食物，不饮液体饮料如牛奶、啤酒、汽水等，但清水则随时可饮。天主教认为圣餐是圣体圣事，同时也是一种祭祀，将圣餐俗称弥撒圣祭。

基督教的圣事

前面已经进过洗礼圣事和圣餐圣事，这两种圣事是基督教各派都共认的圣事。但是坚振圣事、告解圣事、终傅圣事、神品圣事、婚配圣事等却是天主教极为重视的圣事，并非是基督教所有教会教派都会奉行的圣事。

（1）坚振圣事：天主教认为是耶稣所立的七件圣事之一。是受洗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接受主教所行的覆手礼和傅油礼。天主教认为坚振圣事可使受洗者坚定信仰，振奋精神，使圣灵降于其身。已经受洗礼的人，领受坚振圣事，可使其超性生命更为圆满，更为坚强。天主教认为洗礼不一定非由宗徒们施行，但坚振圣事一定要由宗徒（主教）举行。施行坚振圣事，要用经主教特别祝圣过的橄榄油，行覆手傅油礼。覆手礼与额上擦圣油二者是坚振圣事不可缺少的，无论是西方教会，还是东方教会，在施行坚振圣事时，都必须实行覆手礼和傅油礼。

（2）告解圣事：被认为是耶稣为赦免教中人在领洗后所犯的罪过，使他们重新获得上帝的恩宠而亲自定立的。告解一词是中国天主教教会所采用的一个术语。“告”即犯罪的教友自动找某神父自我控诉，请求赦免，即“告”罪行为；“解”即接受教友告罪的神父，以基督所赋予的神权，赦免和解除他的罪和所应受的处分，即“解罪”。因此也称为“忏悔圣事”。

（3）终傅圣事：是天主教神父用经主教祝圣过的橄榄油，给重病的信徒赋予圣宠，一边祈祷一边用橄榄油敷擦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给他增加力量。认为通过终傅圣事，可以帮助受敷者忍受痛苦，赦免罪过，安心地去见上帝。

（4）神品圣事：是授予神职人员“神职”和“权力”的仪式。天主教神品圣事，由主教把手按在领受者的头上，使其圣化而奉献上帝，因此神品圣事也叫授神职礼或派立礼。这件圣事与其他圣事不同，即它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而是要经过考察，主教认可的领受了洗礼的人，才有资格可以领受的，而且只有洗礼的男性教友才可授予。按天主教规定，主教、神父和修女等神职人员是不能结婚的。新教各派称主教授职为祝圣，如圣公会。新教其他宗派称为“经教会正式按立的牧师或长老。”新教教堂管理形式是：每个教堂设主任牧师一名。它不同于天主教的是，主任牧师

亦可由领受洗礼的女性教友担任。派立礼指授一般圣职。天主教认为没有领受神品的人，也就没有行圣事的权力。只有受过祝圣的主教，才能是各级神品的通常施行者。

（5）婚配圣事：基督教信徒男女双方结为夫妻，要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天主教教会视其为七件圣事之一。但是天主教认为结为夫妻的男女，倘若只有一方是领洗者的婚姻是不能称其为圣事的。基督教新派虽然不把婚配作为圣事，但是教友结婚一般也多在礼拜堂举行，而且要由主任牧师为其主礼证婚。天主教教徒的婚配则必须在教堂举行，由神父主持婚礼。按天主教教会的规定，其礼仪是，首先由神父诵念规定的祈祷经文，并宣布："天文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然后对结婚的男女双方祝福。天主教把领洗过的男女教友的婚姻视为一种契约，而有效的婚姻契约就是婚配圣事，婚配圣事可使夫妇相爱之情成为圣洁的爱情。天主教认为教友在领婚配圣事时，天主仿佛赐予了圣洁的根子，使他们一生不断，帮助他们相亲相爱。婚配圣事一旦成立，婚姻的束缚将不能解除。

圣诞节

每年的12月25日是圣诞节。圣诞节是基督教信徒为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纪念日。因为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区是基督教盛行的地区，所以耶稣基督诞生的纪念日便成为欧美地区公民的重要节日。

耶稣是否出生于12月25日？其实在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早期基督教教会也无此节日。从有关史料来看，圣诞节起源于古罗马帝国，大概出现在公元4世纪。12月25日原是古罗马人供奉太阳神的大节日，基督教产生后基督徒们则借用这个日期作为耶稣诞生的纪念日。但是在初期并没有将

12 月 25 日认定为耶稣的诞生日。第一次把 12 月 25 日作为耶稣诞生日，在公元 354 年。是年西部教会年历上首次写明 12 月 25 日是耶稣生日，即把原来流行的纪念太阳神的节日定为耶稣诞生日。圣诞节为期一周，从每年的 12 月 25 日算起直至元旦。但是东方教会的圣诞节却定在 1 月 6 日，它相当于西方教会举行"显现节"的日子。据说这是由于历法不同而形成的。

圣诞节通常从每年的 12 月 24 日便开始了，即圣诞之夜。圣诞夜丰富多彩。据《圣经》记载：耶稣降生当夜，便有天使来到人间传报佳音。根据这一传说，欧美地区的圣诞节前夕，基督教信徒们便组成唱诗班，到各个信徒家中去唱圣诞节祝圣歌曲，互相问候，祝贺，也称报佳音。现今圣诞节已成为欧、美、大洋洲等地区各国的重大节日，如同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一样。圣诞节不仅是基督教的节日，而且也是西方各国全民的节日。节日期间家人团聚，亲友互赠圣诞贺卡和礼物。无论是教堂还是商店和家庭，都要摆放上一株圣诞树。人们在圣诞树旁唱歌跳舞，迎候着耶稣的降临。我国基督教信徒也过圣诞节，圣诞节定在每年的 12 月 25 日这天。在圣诞节期间，基督教的每一座教堂，彩灯彻夜不息，圣诞树上五彩缤纷。圣诞节虽然正值隆冬时节，但是鲜花却摆满了一座座教堂。教堂里五色的彩灯与烛光交相辉映，充满了欢乐的节日气氛。

复活节

复活节是基督教的另一重大节日，它的庆祝规模仅次于圣诞节。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而复活节则是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复活节来自于《圣经》关于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复活、升天的记载。基督教信徒坚信耶稣并没有死，而是复活了。并把它作为基督教重要的信条，否认这一条就被认为不

是真正的基督徒。据《圣经》记载：耶稣复活日恰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后的第3天，因此教会规定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即每年的三、四月间。基督教教会对如何过复活节也做了具体的规定。耶稣复活日，为基督教行宗教礼仪的日子，也称为“主日”。早期在复活节来临前40小时，基督教信徒要禁食，现在逐渐发展为复活节前40天为大斋期。新教多数宗派已经取消了大斋，只是尽量减少娱乐活动而已。欧美地区一些国家也视复活节为重要的节日。有的地区在这一天，人们要互赠彩蛋，象征着生命复活。有的地区父母常常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把彩蛋、玩具、食品或小动物等东西放在自家的花园里，令孩子们去寻找。教堂在复活节这一天常常举行圣烛游行，象征着基督的降临。

修女

通俗一点说，修女就是出家的女修道人。基督教也有在家的信徒和出家的信徒两种，修女宛如佛教中落发为僧的比丘尼（尼姑），所不同的是修女不落发而已。修女是天主教教会专职的女神职人员。按天主教教会规定，在成为修女之前，她们必须与神父、修士一样，首先要宣誓“守贞”。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派不同，对神父、修女有着严格的要求。在天主教内神父无妻，修女无夫，他们都无子女。他们的工作、生活都由教会安排，是专职的传道员。要想做修女，她们也必须同神父一样，“放弃财产，放弃婚姻，放弃一切私心、杂念”，即抛弃世间财富，专务神修生活，谨守神贫的誓言，进行修道生活。要想成为修女，首先要进修会——即修女院。修道院是专务修道的团体。参加这种团体的男性称为修士；女性称为修女，他们的住所称为修道院或修女院。进修道院的人，首先要接受严格的考验，并参加宣誓，教会称为“发愿”。发愿分为两种：一为“初愿”，或称“暂愿”，有一定的期限；二为“大

愿”，或称“永愿”，即终生不渝的永久性誓愿，发愿后才有资格成为修道院的正式会士。修道院和修女院都有统一的服装。一般修女的会衣是长袍大袖，头巾把头部几乎全包起来，只露出面孔。会衣多用黑色。修道院最初盛行于埃及、叙利亚。原因是罗马帝国颁布了“米兰敕令”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会也随之日趋世俗化。一些基督教信徒为抗议教会上层日益世俗化，掀起了修道运动。在4世纪末期，修道运动由北非传入西欧，并很快地席卷了欧洲各地，到处纷纷建立起修道院。但是这一运动并没有摧毁教会上层，反而很快地被教会上层利用。建立修道院成为教会一项重要的工作。教会把修道运动作为他们扩大影响、扩张自己势力的工具。修道院逐渐成为基督教传教的据点和活动的中心。随着一些外国女修会的修女来到中国后，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区建立起修女院，吸收中国女教徒，中国修女院亦随之而产生。19世纪末期，从全国来看，中国修女人数比中国神父少。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中国修女的人数却超过了中国神父的人数。文革以后，新建了修女院，北京的老修女们重新过上修会生活，并培养了新一代修女。

罗马教皇

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天主教，新教中的圣公会以及东正教形成了主教制。每一教区都有一名主教。天主教罗马教皇是罗马教区的主教，教皇也是主教，只不过他是罗马的主教而已。“教皇”这一名称并不是在基督教一产生就出现的，罗马主教和其他地区的主教地位、权力是一样的。即使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主教、耶路撒冷主教、亚历山大主教及安提阿主教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被通称为罗马五大主教，他们的地位是平行的，罗马主教只不过排在第一位而已。随着罗

马帝国的分裂，罗马帝国皇帝迁出罗马城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罗马主教成为罗马城最高的统治者。罗马主教不但管理宗教事务，还负责城市的修建、军队的供给，甚至还负责罗马城的保卫，与入侵者签订条约等，使罗马城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管理局面。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主教遂成为"教皇"，其权势迅速膨胀。后来"教皇"这个称号成为罗马主教的专用称谓。由于政治原因和历史原因，罗马主教的权力超过了其他教区主教的权力，不但其地位日益高涨，而且其权势日甚一日。8世纪时，罗马教皇还拥有了"教皇国"，罗马教皇在"教皇国内"实行着"政教合一"的统治。罗马教皇并不满足他在"教皇国"内的权势，随之把教权统治伸向基督教的统治区域，并规定各地区主教"必须由教皇任命"。基督教新派起源于16世纪德国神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公开反对罗马天主教教廷，形成了不受罗马教皇统治的教派，在其发展中标新立异，自成一派。基督教新派是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的。不过中国天主教却在罗马教皇控制中，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天主教内主教的任免权也不在中国天主教手中，因而出现了中国许多地区的主教都由外国人充当的奇特局面。罗马教皇在中国摆出了"惟我独尊"的架势，罗马教廷还下谕旨，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教区，"任命"了一个又一个外国主教，进而控制了中国天主教。中国基督教信徒处于无权而又受压迫的地位。这种局面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将一去而不复返。

红衣主教

红衣主教也称枢机主教，是罗马教皇的亲信助手和高级顾问，参与和辅助罗马教皇管理罗马天主教的行政事务和宗教事务。红衣主教有选举罗马教皇和当选罗马教皇的权力。

红衣主教并非只有一位，在15世纪以前红衣主教不到30人，20世纪70年代后多达上百人，构成了罗马天主教会最高权势集团。所以红衣主教亦称枢机主教。在罗马教皇下有一中枢组织——枢机团。枢机团的成员由罗马教皇亲自任命。枢机团成员分为三个等级，即枢机主教、枢机司铎、枢机助祭。这一机构在公元7世纪逐渐形成，"枢机"成为罗马天主教高级圣职人员的专称。1294年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给了枢机主教们在正式场合穿红色长袍的权利，并以此作为尊荣的标志，从此人们称枢机主教为红衣主教。16世纪中期罗马教皇发布通谕，宣布枢机主教是罗马教皇国最高级主教的称号。同时确立了枢机主教分为主教、司铎、助祭三个等级。红衣主教平时穿镶红边的黑色长袍，在公开场合除穿红色长袍外，有的也穿紫红色长袍。参加宗教仪式时，还要披上绯红色或红色的短斗篷。

枢机主教除有权当选教皇和选举教皇外，还担任各部部长，被罗马教皇派往各国，担任那里教会的首脑，与罗马教皇保持密切的联系，构成罗马天主教最高的权势集团。在天主教势力较大的国家中，红衣主教作为该国天主教会的首脑，即首席主教。首席主教的权力很大，如有"祝圣"总主教权，有监督各级神职人员行使职权和批准主教会议决定的权利。按规定：被派往各国的红衣主教，每五年要向罗马教皇呈送一份报告；每十年要回梵蒂冈，向罗马教皇述职。梵蒂冈是罗马教皇所在地。现任的罗马教皇是波兰人约翰保罗二世。由罗马教皇任命的红衣主教目前有145人，他们有的担任罗马教廷的重要职务，有的被派往世界各国，掌握那里天主教教会的最高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天主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统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独立自主办教会的方针，由中国人民自办宗教。中国天主教教会的大权掌握在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手中，罗马教皇无权向中国派遣红衣主教。

城中之国——梵蒂冈

梵蒂冈是罗马教皇建立的城市国家。

公元1929年教皇庇护十一世与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签订了《拉特兰条约》，该约规定：罗马西北角的梵蒂冈高地从罗马划出，让教皇建立一个中立城市国家。教皇既是教廷的教宗，又是梵蒂冈国的国家元首，具有完全的立法权、执法权与司法权。教皇还有赦罪、大赦特许、豁免权。梵蒂冈总面积为44公顷，形如不等边四边形，四周有围墙。梵蒂冈城国国旗为直立的黄白两色旗，靠旗竿一侧为黄色，白色部分正中绘着一对交叉形的钥匙，上面是黄色的教皇的三重冠。梵蒂冈的国玺是圆形的，两把交叉的天国钥匙放在中心，衬托着教皇三重冠冕，国玺边沿一圈，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梵蒂冈城国”字母。每年的2月11日，是梵蒂冈国的国庆节。“教皇进行曲”是梵蒂冈国的国歌。意大利语为梵蒂冈国的官方用语。

梵蒂冈国有1000多居民，三分之二以上是侨民，当地居民仅有300多人。教皇从各地教会调来的枢机主教、高级官员、驻外使节及一般工作人员均属梵蒂冈国的公民。永久居住在梵蒂冈的人，必须经教皇亲自批准。梵蒂冈国有自己的军队，但是军队的职责仅仅是保卫教皇和维持社会治安。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具有派遣和接受使团的权利。教皇外交大员有：特命大使（由枢机主教担任）、大使和公使三级。梵蒂冈外交活动由教皇亲自掌握，国务卿执行教皇命令，具体负责，然后由教廷公共事务部执行。梵蒂冈城国在联合国设有观察员常驻代表团，并且与各国际组织有各种接触。梵蒂冈国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邮政、电台和出版刊物。

梵蒂冈国政府机构为五个职能部门：（1）国务院：（2）公共

事务部（相当于外交部）；（3）圣部；（4）三个秘书处；（5）十几个委员会。这五个部门分别管理着宗教与日常事务。

梵蒂冈国设在国外的一些机构享有治外法权。如教皇在罗马城和罗马城外的拉特兰大教堂、拉特兰宫、圣保罗大教堂等。教廷在意大利境内的机构也享有外交豁免权，如教廷俸给管理处、掌玺局、圣职部宫等等。梵蒂冈国境外的领地比其本土要大得多，其面积等于梵蒂冈城国本身面积的10倍以上。

基督的使徒——12宗徒

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共招收了12人为徒，这12人是由耶稣特选，并赋予他们传教使命的。12人也是基督教第一批神职人员，是教会奠基者。在这12个宗徒中，犹大因出卖了耶稣而失去了使徒身份，后由马提亚补而代之。著名画家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把这12个宗徒的表情表现得栩栩如生。

彼得，耶稣赐名“伯多禄”，意为磐石。为宗徒之长。基督教教会称其为第一任教皇。彼得原名西满，以捕鱼为生。耶稣第一次见到他就给他改名为“刻法”（刻法即伯多禄）。要他做“捕人的渔夫”；耶稣决定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因此历任教皇，都自称是彼得的继承人，是天国钥匙的掌管者。彼得对耶稣忠心耿耿，他代表大家首先承认耶稣是“默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同时他也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而且耶稣把“放牧羊群”的重任托给了他，这等于非常慎重地宣布彼得是耶稣的继承人。相传彼得是所有使徒中最著名的神迹施行者。

彼得在公元42年至罗马，成为罗马的首任主教。相传他在尼禄统治时期被处死，临刑前他说自己不配与耶稣受同样的刑罚，而要求倒钉在十字架上。据说他的遗体被埋葬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内。

安德烈，是第一个被指定为使徒的。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他听施洗约翰说耶稣是弥赛亚后，就带着哥哥彼得一起追随着耶稣，对耶稣一直是忠心不二。相传他在帕特雷受难，被钉死在“×”形的十字架上，所以以后基督教信徒就把这种十字架称为“圣安德烈十字架”。他的纪念日为每年的5月9日。

大雅各，渔夫出身，是耶稣最信任的门徒之一，也是基督教三个核心人物之一。据传他性情暴烈，因此新约把他与约翰同称为“雷之子”。在众使徒中，只有他的殉难在新约中有记载。据《新约》记载：耶稣“升天”不久，他便被希律王“用刀杀了”。最早的史料记载，大雅各的遗骸在9世纪时由耶路撒冷移到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城。他的纪念日是每年的7月25日。

约翰，大雅各的弟弟。基督教认为他是《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作者。他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据说耶稣受难时，他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直守候在十字架旁，接受了耶稣的临终嘱托。耶稣“复活”后，是他第一个认出耶稣的。在教会创建时期，他是教会的核心人物之一。耶稣受难后他承担起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的任务，所以他被基督教称为“爱的使徒”。相传他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而是被毒死于以弗所。他的纪念日说法不一，比较混乱。

斐理伯，或译作腓力伯，同安德烈一样，原为施洗约翰的信徒，也是最早追随耶稣的门徒之一。据说他是经巴尔多禄茂的劝说而成为耶稣忠实的门徒的。后在希拉波里斯遇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传他的遗骸后来被转移到罗马十二使徒教堂。纪念日说法不一。

巴尔多禄茂，或译为巴多罗买。他是渔夫出身，原是加利利人。相传曾到亚美尼亚、印度等地传教，后在里海附近的杰尔宾特遇难。他的遗骸现在罗马圣巴多罗买教堂。据说他是被砍头而

死的，其纪念日为每年的 8 月 24 日。

多默，或译为多马。相传他是税吏马窦的兄弟。是耶稣最忠诚的门徒之一。据说耶稣“复活”后只有他不相信，直到触摸到耶稣的身体和被钉的钉痕后才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多默被称为“怀疑的多默”。相传他到印度一带传教，甚至还说他到中国来过。后遇难于印度，是被长矛刺死的。其遗骸现存在意大利的奥尔托纳。纪念日为每年的 12 月 21 日。

税吏马窦，或译为马太，原名利未，是迦百农的税吏，也是耶稣 12 个门徒中惟一不是劳动人民出身的门徒。相传有一天耶稣来到迦百农，见马窦坐在税关上，对他说：“跟随我！”马窦居然爽快地抛弃了自己的工作，跟随耶稣走了。据说《马太福音》是由他写成的。他曾经在巴勒斯坦、埃塞俄比亚、波斯等地传教。最后在何处遇难，说法不一。其遗骸现在意大利萨勒诺。纪念日为每年的 9 月 21 日（西方），或 11 月 16 日（东方）。

小雅各，或译为雅各伯。他的母亲也叫玛利亚，是一直跟随耶稣到十字架和墓穴的几位加利利妇女之一。据说他曾在波斯一带传教，并于波斯遇难。其纪念日为每年的 5 月 3 日。

达太，或译为达徒，是小雅各的弟弟。据说达太非常有毅力，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他。他在波斯传教、殉难，和他哥哥一样死于棍棒。基督教认为他是处于绝望之时的人的保护神。其纪念日为每年的 10 月 28 日（西方），或 6 月 19 日（东方）。

西满，或译作西门，与彼得原名一样。外号迦南人。相传他到过埃及传教，而后又与达太一起到波斯传教，并于波斯遇难。其纪念日为每年的 10 月 28 日（西方），或 7 月 1 日（东方）。

犹大，或译为犹达斯。犹大是耶稣 12 个门徒中惟一不忠于耶稣的门徒。耶稣让他掌管钱袋，可他却为了 30 个银币出卖了耶稣。据载：耶稣受难前夕，犹大率大祭司的差役来到客西马尼园，以恶意的一吻出卖了耶稣。从此“犹大之吻”成为“怀有恶意的亲

近”的代名词；“犹大”也成了叛徒的代称。据传犹大后来也很后悔，把得来的30个银币全都放在了圣殿里，而后在一棵紫荆树上自缢，那棵树被人们称为“犹大树”。《使徒行传》却说犹大用钱买了一块地，结果自己跌倒在那块田地里，而后肚裂肠流，所以，犹大死的田地被叫做“血田”。

马提亚，--译玛弟亚。传说耶稣12个门徒中只有犹大辜负了耶稣的教诲，背叛了耶稣，为了30个银币而出卖了他，最后自杀身亡。耶稣遇难、“复活”的见证人，除他的门徒外，还有约瑟夫·巴沙白斯和马提亚两个人。门徒便拟从他们两人当中挑选一位为耶稣的使徒，以补犹大遗缺，后来抽签选中了马提亚。马提亚先后到犹太境内、里海一带和埃塞俄比亚传教。在传教中遇难，其遗骸在罗马。纪念日为每年的2月24日（西方），后改为5月14日和8月9日（东方）。

亚当与夏娃

天主教相信天地万物以及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旧约创世说》说天主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第一天创造了光，天主将光与黑暗分开，才有了“昼”与“夜”；第二天创造了天；第三天天主创造了陆地、海洋、青草、结种子的蔬菜和树木；第四天创造了日、月和星辰；第五天天主创造了大鱼和水中各种孳生的蠕动生物以及各种飞鸟；第六天创造了各种野兽、牲畜和爬虫。就在第六天，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人，然后将生气吹人他的鼻孔，他便成了有灵的活人。天主给他起的名字叫“亚当”。天主把亚当安置在东方美丽的伊甸园里，让他看守并管理伊甸园。伊甸园里有河流、果树，天主告诉亚当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实都可以吃，唯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即智慧之果）不能吃，吃了必死。天主怕亚当孤独、寂寞，在他熟睡后，就从他身

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她到亚当跟前。亚当为她起了名字叫“夏娃”。亚当与夏娃就是人类的始祖。当时男女都赤身露体，因为他们没有私欲偏情，所以不害羞。

在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蛇是最狡猾的。天主教认为蛇是魔鬼，是进行阴谋诡计的工具。有一天，蛇对夏娃说：“天主真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答：“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乐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死亡。”蛇说：“你们决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将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了。”夏娃看那知善恶树上的果子悦目可爱，又能使人有智慧，便摘下一个果子吃了，她又摘给了亚当一个，他也吃了。吃了果子后，两人的眼睛果然明亮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感到羞愧。于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个裙子围身以遮羞。

天主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对夏娃说：“我要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在痛苦中生子；你要依恋你的丈夫，也要受他的管辖。”然后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为了你的缘故，地成了可咒骂的；你一生日日劳苦才能得到吃食。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有饭吃，直到你归于土，因为你是由土中来的，你既是灰土，你还要归于灰土。”于是亚当与夏娃被天主驱逐出伊甸乐园，天主让他们耕种土地。又在伊甸园安排了长翅膀的天使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把守着生命之树。

这就是有关伊甸乐园中发生的有趣而又生动的神话故事。基督教认为这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事情，并由此引出一条重要的教义，即人类的“原罪”说。基督教认为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从那时起就犯了罪，失去天主的圣宠，一直传至所有的亚当后代——整个人类，亚当的子子孙孙也随之失去了天主的宠爱，背负着原罪。亚当与夏娃之过失，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源。

主教的权戒

权戒是天主教教区主教佩带的戒指。权戒不同于一般人佩带的戒指。因为它是主教神权的象征。权戒象征着耶稣基督赋予主教至高无尚的神圣权力。主教佩带上权戒，同时也象征着主教与教区关系的确立，象征着主教与教区之间的关系是忠贞不二的。就好像新婚夫妇互赠戒指，象征着忠贞不二的爱情一样。权戒一般是镶嵌着宝石的金戒指。红衣主教佩带的是镶嵌着红宝石的金戒指；紫衣主教佩带的是镶嵌着紫宝石、或玫瑰红宝石的金戒指。主教要把权戒佩带在右手的无名指上。主教的权戒是有传承的，即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现任主教在百年之后，要把权戒传给下一任主教。主教虽然由上一任主教处继承了权戒，但是并非终生只能佩带这枚传承下来的权戒，因为权戒和其他戒指一样，在佩带中也会磨损，所以主教上任后可以根据传承下来的权戒磨损的情况再做新的权戒。主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喜好来重新定做权戒。不过主教长期佩带的权戒是要传给下一任主教的。主教的权戒除象征着主教与教会忠贞不二的关系外，同时还具有一项很重要的职能——是供信徒们参拜主教时亲吻、顶礼的圣物。

1978年，北京市天主教“两会”常务扩大会议上，一致选举傅铁山神父为北京教区正权主教。傅铁山正权主教为紫衣主教，所以他佩带的是一枚镶嵌着一块方形玫瑰红宝石的权戒。方形玫瑰红宝石镶嵌在一枚雕刻着两个十字架图案的金戒指上。权戒镶嵌宝石是基督教教区较普遍采取的做法。

教会的神职人员

在公元2世纪时，在各地主持教会的神职人员中出现了主教

(Episcopacy)与长老(Presbyter)。开始“主教”与“长老”意思相似，都是教会会务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一个教会内虽然有众多主持教会日常工作的神职人员，但是不能满足进一步加强教会组织工作的要求。由于教会的日益发展，急需权力高度集中，因此责、权集于一个专业教会工作的主教便应运而生了。主教制形成初期，主教多由当地有地位、有财富、有声望的人担任。主教一般有权祝圣神父、派立牧师，施行一切圣事，即举行弥撒，祭献天主；听教友告解，为之赦罪，负责处理一切事宜。主教统辖所属教区教会。神父隶属于主教。神父在教友心目中的形象就很高大，他的一言一行往往可以左右一切，在信徒中具有“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的作用。神父一般协助主教施行圣事和管理主教所委托的某些教堂。主教是基督教教会中品位最高的神职人员，主教的权威使一个教区有了统一的领导。但各主教管辖区域有大有小，各教会神职人员多少也不相同。教区教友众多，财力雄厚，其主教自然威望高，对其他教会产生的影响就大，有时甚至对其他教区起支配作用。如罗马主教便把自己凌驾于其他主教之上，享有特殊地位与权利。主教制形成初期一般由长老提名，邻近主教们赞成，再由教区全体会众批准或选举。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主教制不受罗马教廷的控制，实行的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主教由教区的神职人员选举产生。有些地区也设副主教。司铎也称神甫，即神父。另外还有修士、修女，他们都是终身为教会服务的传教人员。

主教制主要在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圣公会和东方一些较小的古老教派中实行。我国基督教新派采用会众制，其最高神职人员称牧师，每堂的最高神职人员称主任牧师，各堂独立自主。牧师一词来源于《圣经》，《圣经》中耶稣把自己比喻为牧人，以羊群比喻教徒，所以新教神职人员都称牧师和传道员。传道员是教会基层的宗教工作人员，除牧师与传道员外，还有由基督教信徒

骨干分子组成的义务工作人员（“义工”），如长老、执事等，负责教会的行政事务。

《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基本经典。它由《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两大部分构成，合称为《新旧约圣书》，也称《圣经》。它是基督教信仰的准则。《圣经》有两种版本，即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译本。天主教和东正教多采用希腊文版本，新教各派采用希伯来文本。《旧约圣经》共 39 卷，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圣录》（圣著）三部分。《律法书》共 5 卷，因此也叫《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摩西五经》讲述的是上帝如何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过程。《先知书》共 21 卷，前 6 卷记录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巴比伦、灭他、犹太国，到俘以色列人的过程，一般称其为早期《先知书》。后 15 卷被称为晚期《先知书》。它记录了一些预言、神迹，是一些所谓先知们的著述。《圣录》共 13 卷，是供信徒崇拜时高声朗读用的。《新约圣经》是《圣经》的第二部分，共 27 卷。分为《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启示录》四部分。其中，《书信》13 卷是保罗的书信，它反映了保罗及其信徒对人生宇宙的认识、主张和当时教会的状况。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启示录》预言未来。相传是使徒约翰根据在拔摩岛上所见异象的记录。《福音书》也叫《四福音书》，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马可福音》以《马太福音》为蓝本，据说是使徒马太所著，描写了耶稣的降生和逃难的过程。《路加福音》为路加所著，描写了耶稣的诞生和施洗约翰的出身。《约翰福音》为门徒约翰所著，记述了一些门徒悟道的经过。而《使徒行传》记录了彼得、保罗传教的活动。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会内部宗派斗争日趋统一，《新约圣经》逐渐得到多数教会的公认，被广泛流传使用。犹太教宣称神与人订立“契约”，基督教继承了这一说法。因此，“约”是指上帝和人们所订的契约。从《旧约圣经》来看，指的是上帝通过基督的流血受死而与人之间所订的契约。从《新约圣经》来看，主要内容是讲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降世是为拯救世人，他受难、复活、升天后还将再次降临人间。他就是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世主。《新约圣经》并不排斥《旧约圣经》，而是在《旧约圣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它。基督教宣称《新约圣经》是耶稣降世后神与人重新订立的“契约”——“新约”。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教会内部宗派斗争渐渐趋于统一，《新约圣经》也随之取得了多数教会的公认，其权威地位得以确立。在公元397年第三次迦太基宗教会议上以教会名义做出决议，确定了《新旧约全书》的内容和目次，确定了《新旧约全书》的权威地位。这就是现在世界流传使用的《圣经》。

参考书目：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教务委员会：《天主教教理释义》（内部发行）

王瑞明：《天主教知识百题》（内部发行）

范桥、傅允生：《世界四大宗教三百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印：《基督教要道问答》

后　　记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学术性著作。它既适于专门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宗教工作者的需要，又适于对基督教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们阅读。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一书是《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的姊妹篇。由于我多年从事中国近代史、北京地方史和宗教文化的教学工作，以及在北京佛学院和燕京神学院等宗教院校任教的经历，使我逐渐产生了对宗教研究的兴趣，自 1985 年以来开始涉足宗教领域的研究。偶然的机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郑玉琴老师找到了我，共同商议策划出版这套宗教与寺庙观堂文化丛书

我们奉献给大家的《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一书，以教堂、墓地、传教士与教会学校、著名信徒等基本事实出发，与特定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探寻基督教的传入和北京教堂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同时将基督教文化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读者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去透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得到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每一位作者都多次进行实地考察，采访知情人，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与资料搜集工作，并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吸取了前辈的研究成果。在尊重历史事实注意科学性与学术性的前提下，本书力求做到文词优美，论述生动，以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一书是北京学研究所、燕京研究院

的研究课题。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和出版，是与中央民族大学陈梧桐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云田研究员的帮助分不开的。陈梧桐教授在百忙中亲自审阅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撰写了序言。赵云田研究员多次给予指导，并馈赠资料。特在此向二位专家致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主席、燕京神学院院长敖继增牧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天主教海外联谊会主任、天主教北京教区傅铁山主教，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总干事、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于新粒主任牧师，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吴巍主任牧师，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北京天主教《天光》报石洪喜总编，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副秘书长王戈主任，西什库教堂方朔神父，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杜凤英牧师和北京基督教会珠市口堂李永红牧师等的帮助，并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

本课题在研究中，一直得到燕京研究院西方文化与宗教研究所所长王思敏教授的支持，并得到美国纽约鲁斯基金会的资助。此外，李志刚老师也对本书的写作给予热情的关注，本书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郑玉琴老师的大力支持。对以上所有人士的关怀与帮助，我深感难以报答，只能铭记在心中。在此，我谨代表本书所有的作者，向他们再次表示谢意。

全书在编著中，作者赵之恒副教授、汪井云副教授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北京市委党校的余三乐教授在百忙中赶写了许多章节，作者杨靖筠老师、荀振茹老师、左芙蓉老师、徐威老师也付

出了很多劳动，可以说，书中的每篇文章都凝聚了每位作者的大量心血。本书的完成，是全体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一定会有缺陷和不足之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以期再版时修正。

佟洵

1999年元月于北京寓中